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二十卷

天地玄黄

其　　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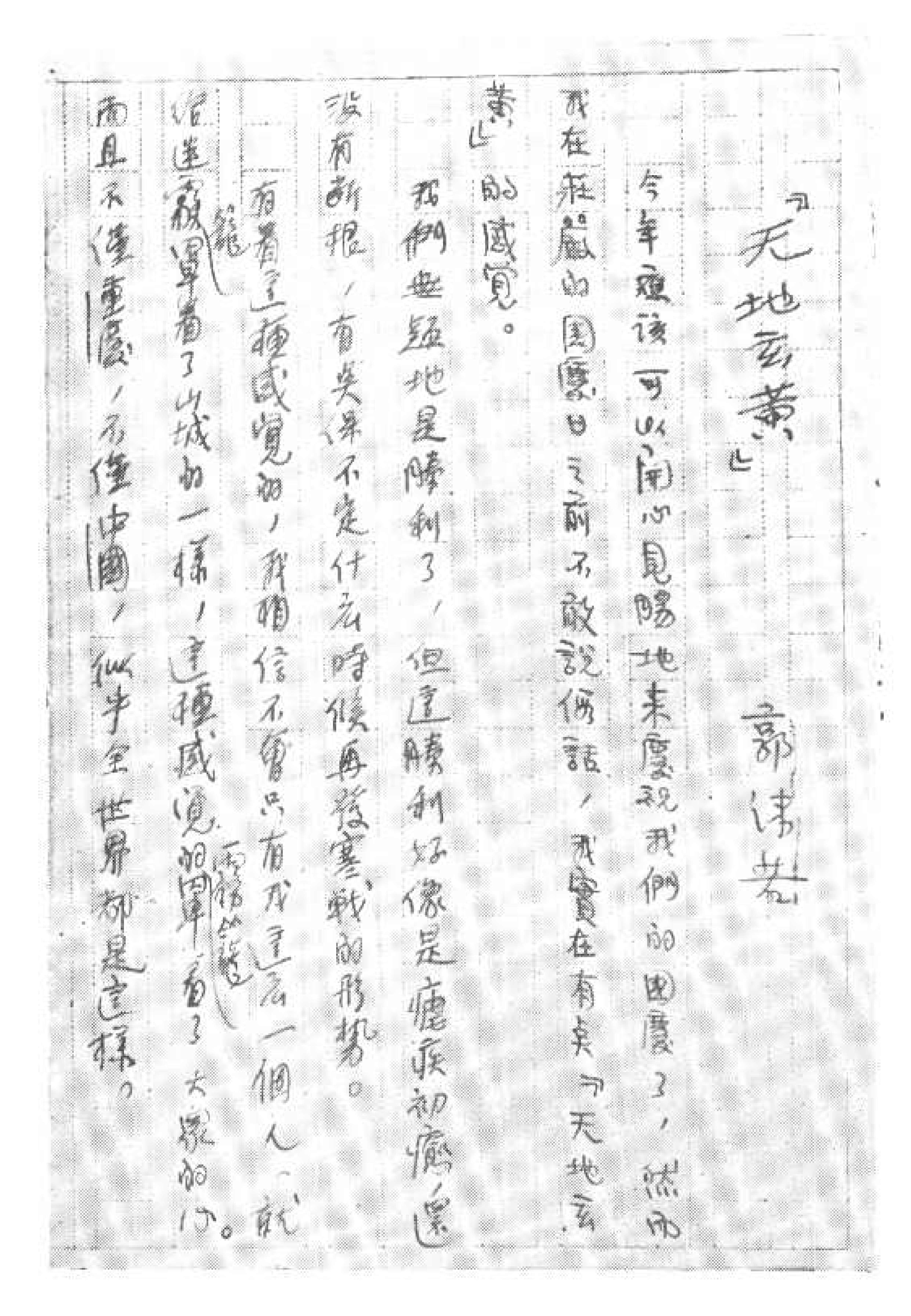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二十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frac{11}{16}$　插页5
字数227,000　印数1—3,200
1992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02-001310-4/Z·52
定价 9.45 元



一九四五年六月访苏前夕与家人在重庆天官府四号的合影


「天地玄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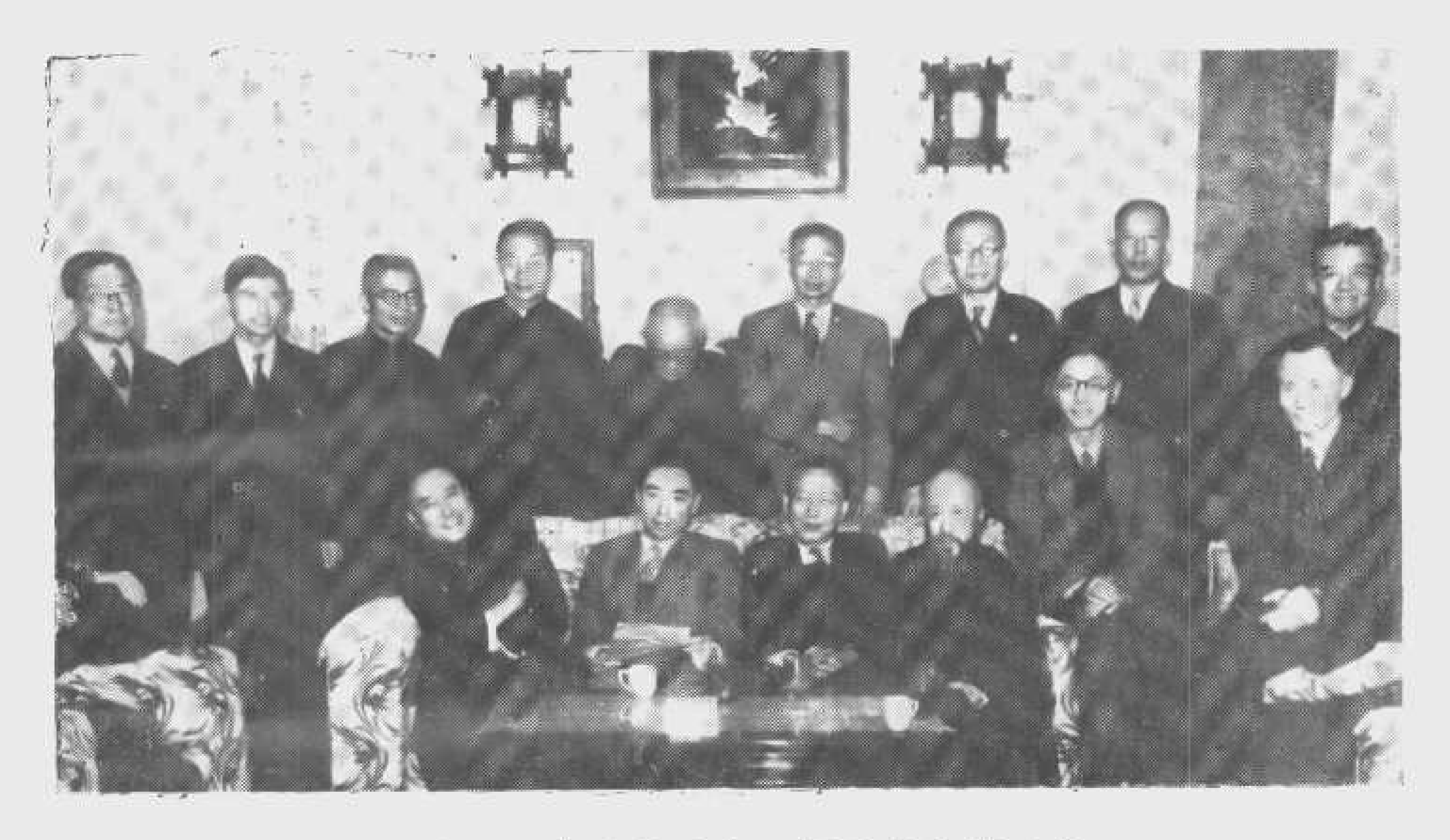
郭沫若

今年應該可以開心見腸地來慶祝我們的國慶了，然而我在莊嚴的國慶日之前不敢說假話，我實在有点「天地玄黃」的感覺。

我們無疑地是勝利了，但這勝利好像是瘧疾初癒，還沒有斷根，有点保不定什么時候再發寒戰的形勢。

有着這種感覺的，我相信不會只有我這么一個人，就像濃霧籠罩着了山城的一樣，這種感覺的陰霾籠罩着了大家的心。而且不僅重慶，不僅中國，似乎全世界都是這樣。

《天地玄黄》手稿之一页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摄于吴铁城公馆

（前排左起：黄炎培、周恩来、作者、沈钧儒、华岗、李璜。后排左起：胡政之、陈家康、陈启夫、蒋匀田、邵力子、罗隆基、吴铁城、李维汉、左舜生。）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上

第二十卷说明

本卷收入《天地玄黄》以及《鲁迅与王国维》、《论郁达夫》、《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和《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四篇文章。

《天地玄黄》原收杂文等七十五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初版。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一九五四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重印本，经作者校阅，删去《民族解放的先锋》、《为美国人设想》、《纪念邓择生先生》三篇，又将《“格物”解》、《“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诅楚文”考释》、《“行气铭”释文》四篇另编于《沫若文集》第十六卷，将其余六十八篇编入《沫若文集》第十三卷。这次重收原删去的三篇，并依写作时间编次；另外将《序〈美术考古一世纪〉》移入本全集考古编。余均据《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版本编入。

《鲁迅与王国维》、《论郁达夫》、《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三篇，原收于《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历史人物》；现《历史人物》中其他六篇已移入本全集历史编，这三篇则根据《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版本，编收于本卷《天地玄黄》之后。

《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原收于《沫若文集》第十

三卷《集外》；现《集外》中其他六篇已移入本编第十六卷，此篇则根据《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版本，编收于本卷《天地玄黄》之后。

第二十卷目录

天地玄黄

天 地 玄 黄

序

这个集子的前大半部是一九四五年胜利后写的一些杂文，本来是和《沸羹集》编在一道的，页数还保存着一贯，便是我这话的证明。但因份量太多，我便决计分开了。好在战前战后实在是绝好的一个段落，两个时期中的情绪和处境，多少是有些不同的。

后一小半部是几篇学术性的论文①，也都是在胜利后写的，这一类的工作可惜做得太少。但在我目前的情形之下实在也做不出更多的出来：因为我手中不要说没有什么研究的便利，就是极普通的工具书都很缺乏。时局动荡倒并没有惹起我的心境不宁，不能研究，而事实是我被摒除在研究的园地之外了。然而霸占着园地的人们，却也一样没有什么研究，那责任倒真怕可以推诿给时局动荡吧。

这动荡也不会太久了。我在期待着研究园地的大开放，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① 作者原注：即本卷（指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沫若文集》第十三卷。——注释者）卷首说明中所举的《“格物”解》等篇。

让一切有能力的人能够有发挥的机会，切实做到“学术为公，文化为公”的地步。

1947年11月11日于上海

天地玄黄

今年应该可以开心见肠地来庆祝双十节①了，然而不然，我实在有点“天地玄黄”的感觉。

我们无疑地是胜利了，但这胜利好象是疟疾初愈，还没有断根，有点保不定什么时候要再发寒战。

有着这种感觉的，我相信不会只有我这么一个人。就跟迷雾笼罩着整个山城②的一样，这种感觉的雾笼罩着了大众的心。而且不仅重庆，不仅中国，似乎全世界都是这样。

疟疾太久了，一时自然也不容易复原。有的人习惯于寒热的来复，一下不来复了，倒好象损失了什么似的，有点怨恨奎宁或阿特布林了。

假使真的断了根，怨恨也无益，时间再经久些，慢慢终要复原的。然而最可担心的是服用奎宁或阿特布林的分剂并没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周报》第八期。

“天地玄黄”，出自《易·坤·文言》：“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①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决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俗称双十节。

② 作者原注：指当时重庆，那个城市是建立在山上。

有够，疟疾并没有断根。这就相当危险了，寒战恐怕会再来。

有什么办法呢，我实在有这样的感觉，天玄而地黄。要玩点训诂学的老套的话，“玄黄，病也”，天地的病情还没有彻底澄清。

我愿意大家多服些奎宁或阿特布林，使我们眼前的天地澄清。

疗治时代疟疾的奎宁或阿特布林，便是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要用这药剂来彻底消除法西斯细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

我希望早早达到这样的一天，大家开心见肠地来庆祝国庆。

1945年10月7日

今　屈　原

亚子先生的诗，于严整的规律中寓以纵横的才气，海内殆鲜敌手。字，行楷有魏、晋人风味，草书则脱尽町畦。这是独创一格的草书，不仅前无古人，亦恐后无来者。

这种能纵能控、亦狂亦狷的辩证的统一，似乎就是亚子先生的独特而优越的性格。亚子先生在外表上不大拘形迹，而操持却异常谨严。他的正义感，峻峭到了极端，使他有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① 的原子弹式的情操。但他信仰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有明敏的博施济众的思想，把他的强烈的感情控制着了。原子弹式地任其发挥的是他的草书，有所控制不作盲目爆炸的便是他的诗。他的草书或许是他的感情的安全瓣，为了有这一安全瓣，怕也帮助了他在控制上的成功。

画家尹瘦石② 曾经以亚子先生为模特儿，画过一张屈原像，这是把对象找得太好了。“佩长剑之陆离”③ 者，是屈原，也是亚子。亚子，今之屈原；屈原，古之亚子也。但今屈原与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语见《论语・季氏》。

② 尹瘦石，一九一九年生，江苏宜兴人。画家、美术教育家。

③ 语见屈原《九章・涉江》。

古亚子毕竟有不同的地方，那似乎就在这感情控制的成功与失败上。屈原的字没有方法看见了；而他的诗，尤其象《离骚》、《天问》，确是原子弹式的诗。那样猛烈的感情无法控制，所以他的生命结果也象原子弹一样爆炸了，虽然也炸毁了一些佞臣和萧艾。

今屈原绝对不会那样任情爆炸的，他的原子能有所控制，控制向了生产方面，诗之多而精，可以寿人寿世。他的诗歌如粟菽，而他的志趣是“使有粟菽如水火”① 。因此，我更希望他的诗歌多多产生，而且更要平易近人，使人民大众能够接受，亦如水，亦如火。有所控制的原子能，能够象水一样普及，象火一样容易到手，那于人民大众是多么大的福利呵。或许有人要担心，成为了洪水或燎原的大火怎么办？如有要担心的那样的人存在，也就是洪水大火有时是必要的证明。

1945年10月20日夜

① 语见《孟子·尽心》。

苏联问题二三事

一　斯大林的健康

近来盛传斯大林病了，甚至有人说已经过世，只是没有发表。不管这些谣传是出于恶意还是无心，足证世界上实在有不少的人在关心斯大林的健康。

据我所亲历的两件事看来，我敢于说，斯大林的健康比三四十岁的人还要旺盛。

第一件是六月三十日的晚上，苏联政府在克里米林宫欢宴科学院院士和各国的代表，斯大林亲自出席，从晚上六点钟坐到十二点钟，足足坐了六个钟头，丝毫也没有倦容。

第二件是八月十二日莫斯科的体育节。这个每年必须举行的全民族的健康检阅，照例在红场举行。这一天天气特别好，斯大林和苏联的其他领袖们站在列宁墓上检阅，从上半天十一点钟站到了下午五点钟，也足足站了六个钟头。

这样绝伦的精力是稍微衰歇了的人所能指望的吗？

这样民主的风度似乎在别的国度里面也是很少见到的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二　苏联是不是民主

几天前，在一个下午，我在南岸连续讲演过两个地方，都有人问我："苏联是不是民主？"怀着这个疑问的人似乎相当多。不仅中国如是，就在外国似乎也是如是。

这要看"民主"的定义是怎样。假使说一个国度里面一切的人民都得到经济上的平等，因而也保障着政治上的平等，要这样才算是"民主"，那吗苏联正好是民主国家，象英、美便还不够民主。

假使说象英、美那样的国家就是"民主"了，那儿的人在表面上好象有政治上的"平等"，而在实际上没有经济上的平等以为保障，那吗苏联要算是超过了"民主"。

苏联是没有私人企业和地主的国家，一切的生产工具、土地、机器等，或为国家所有，或为集体所有。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家庭，构成家庭的各个成员，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人民是真正地在享受着"不虞匮乏的自由"① 了。

因而象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那样恐慌现象，在苏联是没有的。国家的生产准据着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可以无限度的提高，国家的生产也可以无限度的提高。一切的生产是完全看准着需要。

---

① 美国总统罗斯福于一九四〇年提出"四大自由"，即：发表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

事实胜于雄辩。今天战争是胜利了，象英、美都在为复员与失业问题而头痛，而苏联却还要输入意大利的工人二百万以从事建设工作。事实俱在，无庸多言。

三　形同感电

苏联究竟有没有领土的野心？这也是相当普遍的一个疑问。怀着这种疑问的人事实上就是说苏联有领土的野心就是了。但这只是不顾事实的猜疑。

苏联的领土已经够大了，因为科学的进步，近年来又有许多类似奇迹的种子改良和土壤改良，使半沙漠性的荒原，不毛的寒冷地带，都适宜于耕植了。西伯利亚已经有多年生的小麦，滨近寒带的区域甚至于可以栽种柠檬了。苏联人民所关心的倒真真是："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① 人家的眼光要远大得多了。各种和自然斗争的工作正是他们的中心工作，而不是象别的强大国家一样，岌岌不可终日地在开拓海外的殖民地。

当然，苏联毫无问题也须得保卫她的领土。苏联的那种制度存在，只要它是于人民的生活有裨益的，和她接触的人民，为着自己生活的改进，或多或少总要受着那种制度的影响。就如前两个世纪，美国的共和政体一建立了，别的国家不是相继效法吗？形同感电，并不是谁在唆使谁。

1945年11月4日

---

① 语见《礼记·礼运》。

弔星海

我对于音乐是门外，冼星海在音乐上的成就是怎样，我不能够说出什么有斤两的话。但他的为人充分具有着建立新音乐的素质和教养，我是可以断言的。

他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他要把音乐服务于人民，让自己成为人民的响亮的号手；这种立场和志愿便足以保障着他有成为人民艺术家的资格。

照我所知道的，他是坚定着这种的立场，并在逐渐地实践着自己的志愿。

在抗战初期，他在武汉同许许多多的文化人一样，参加了第三厅的组织，他担任着音乐方面的主任科员。他和张曙①两位，事实上在领导着当时的抗战音乐。

后来张曙在桂林被日寇炸死了，星海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的声音差不多都沉寂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②的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这是人民的声音，使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星海，即冼星海（1905—1945），广东番禺人。作曲家。主要作品有《黄河大合唱》组曲、《在太行山上》等。

① 张曙（1909—1938），原名恩袭，安徽歙县人。作曲家。

② 语出唐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得好些人民的叛徒们听了发生战栗。

今年七月我在莫斯科，才知道星海也在莫斯科，而是睡在皇宫病院里的。

听说他是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前夜到了莫斯科，战争爆发了，以一位不懂俄文的他，没有方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在国境上受着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听说他的病很多，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有腹膜炎，有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唡的腹水。他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知道他是由延安去的艺术家，因而特别受优待，受着十分周到的疗治。

听说他在病院里的经过很良好。皇宫病院的规定只有每星期四的下午才能去看病人，八月二号是星期四，我本来都已经约好朋友去看他的，因为临时有别的约会，没有去成。而在下一星期四也因为同样的情形没有去成，而我终竟回国了。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没有在他的生前和他再见一面。

听说他在苏联还制了很多的曲谱，只是因为他病了，还没有得到机会演奏。这些曲谱里面一定有不少的宝贵的遗产被包含着。我们不要忽视了一位人民的号手把他全部的生命所灌注进去的人民的声音。

号手又死了一个，但人民的声音是永远不会沉寂的。

1945年12月3日

历史的大转变

中国近年来时局的大转变，每每以学生运动开其端。“五四”运动固然是历史上划时期的最辉煌的先例。如“三·一八”① 是北伐的先驱，“一二·九”② 是抗战的前奏，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原动力的雄伟了。

“一二·一”惨案③，今天又吹起了推动车轮的号角。尽管血痕犹新，我们对于死难的四位烈士④，和受伤的几十位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一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三卷时，文字略有删节。

① 即“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五千余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大沽口事件”。会后赴执政府请愿，段祺瑞令卫队开枪，打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

②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六千余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爱国学生的行动得到各地学生和爱国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③ 作者原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昆明大专学校学生集会反对内战，讨论时事问题，受到国民党军警暴力干涉，引起大罢课。十二月一日，大批特务到各校强迫复课，并进行大规模屠杀，造成惨案，是为“一二·一惨案”。

④ 指“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四人。



友，还怀着深切的怆痛，但他们是光荣的，他们是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他们在民族临到了歧路，要走向破灭的危险的时候，使轨辙开始转变了。

一切的诬蔑，护短，叫嚣，冷视，可以终止了吧！认定“一二·一”运动的光荣，认定历史的动向，中国无论如何是到了应该转变的时候了！

国民党执政十八年，在这十八年间，以中国积弱，几乎毫无科学基础的地位，而处到墨索里尼、希特拉之流相继毒乱世界，要扭着人类文化倒流的大反动时代，毫无疑问，我们中国的政治作风是受了不少的时代影响。但这影响是应该清算的时候了。

经过了全人类的大流血，长者八年，短者四年，在这历史上真正的旋乾转坤的大搏斗中，人类究竟是禀赋着进化的使命的。墨魔授首，希魔失踪，终竟把这股大逆流挽转回来了。虽然逆流的余波还不免在全世界上推荡，但它将终归平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在这里当然也要靠人类的睿智继续作正确的领导。

人类是到了确实可以按照高尚的理想创造历史的时代了。原子能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在人类史上是远远超过了火的发明与铁的发现的诸种伟大业绩的。虽然今天的原子能还只能用于破坏性的原子弹，而且还只有一二个国家知道这项秘密，但不出三五年之内凡是科学进步的国家都能相继发明；把原子能利用于生产，一般有远识的科学家认定，大约也不会超过十年了！

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辉煌的划时期的时代，一旦原子能利用于生产，世界整个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国家社会的机构，必随之而大改变。新的生产大动力推动着进化大车轮，人类必然飞速度的向前进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的到来，不会是太迢遥的远景了！多么令人兴奋的世纪啊，这个非以全民的规模不能荷担的伟大的世纪！

我们民族处在这样辉煌的时代，我们将怎样来应付呢？我们会瞠目束手，惊得发呆吗？不的！这正是我们民族解除厄运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应付的方法，孙中山先生早就昭示我们了；我们要“迎头赶上”①！

我们并不是野蛮未开化民族，我们虽然落后了，这是要怪清朝三百年的不合理的统治，以及由这统治而招来了的帝国主义的重重捆缚，我们是被动地落了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枷锁，而且省却了走许多的冤路，我们为甚么不能够“迎头赶上”？

能够的，能够的，一定能够的！但总要彻底改换作风才行。

一党专政的作风不能再用了，国民党即使有人材，但中国之大除国民党员之外，难道就没有可用的人材了吗？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应该是某一党的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主人，为了应付大时代、大转变，国家的根本组织法都可以变，兢兢于既成的法统之争，那完全是近视眼式的

① 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

见解。

别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原子能生产时代，内战无论如何是不能再打了。

为甚么一定非打不可？为甚么不能和衷共济，切实地采取“迎头赶上”的步骤？一切的花言巧语、轻举妄动，都可以终止了。与民更始，从新来一套适应新时代的办法吧！“一二·一”的烈士们已经昭示着我们：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扭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

1945年12月15日

我　建　议

我建议：应该设立鲁迅博物馆。

凡是关于鲁迅的资料：他的生活历史、日常生活状态、读的书、著的书、原稿、译稿、笔记、日记、书简、照片等等，还有关于他的研究，无论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专门搜集起来，分门别类地陈列。让研究鲁迅者，让景仰鲁迅者的人民大众，得以瞻仰。

这博物馆可以建立在上海、北平、广州。资料可以分别陈列，不能分割的可用照片。馆长应由许景宋① 担任。可收门票，以所入作为经费的补助。

我这个想法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的大作家，大抵都有在他的名义下的博物馆，例如托尔斯泰的博物馆，馆长是他的孙女；玛雅可夫斯基② 博物馆，馆长是他的母亲；奥斯特罗夫斯基③ 博物馆，馆长是他的夫人。有的是收门票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即许广平（1898—1968），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等。

② 玛雅可夫斯基（В・В・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通译马雅可夫斯基，苏联诗人。著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好》等。

③ 奥斯特罗夫斯基（Н・А・Островский，1904—1936），通译奥斯特洛夫斯基，苏联作家。著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我建议：应该多多塑造鲁迅像。

北平、上海、广州、杭州、厦门，以及其它的任何地方都应该建立鲁迅像，自然以铜像为最好。

我这个想法也是由苏联学来的。我在苏联看见过不少的普希金像、托尔斯泰像。雕刻家似乎都以铸造这种有文化价值的遗像为荣。我们中国的雕刻家似乎也应该走这么的一条路。

我建议：把杭州的西湖改名为鲁迅湖，别的城市或街道要用鲁迅的名来命名，要有政治的力量才办得到。但如杭州的西湖，文化的价值比它政治经济等一切的价值都高，只要约定俗成"鲁迅湖"一定很快的便可以通行。西湖的名字太普遍，差不多不能成其为专名。虽然也有人称之为西子湖，但那是傅会。鲁迅生前似乎不大喜欢西湖，记得他有一首劝阻郁达夫住家西湖的诗①。不过那似乎是由于过分爱它，而引起了憎恨它的俗化的抗议。平心地说，西湖仍不失为一个价值很高的文化区域。假使说缺乏战斗精神吧，我们只要连想到越王勾践的故国②似乎就够了。

我这个想法也是从苏联学来的。莫斯科有高尔基路，普希金广场，玛雅可夫斯基广场。但这个建议我并不坚持，假使有比西湖更适当的地方当然更好。附带一句：如把北平的西

---

① 指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所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

② 勾践，春秋末年越国国君。他被吴国打败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战胜了吴国。杭州春秋时属越国，故有"勾践的故国"之说。

山称为“鲁迅山”似乎也可以。

为使鲁迅的纪念由书斋走到社会，为使鲁迅的精神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我建议如上。

1945年10月17日

兵不管秀才

近来听说有人做了一篇文章主张“秀才管兵”①，作为军队国家化的过渡办法，主张把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交出来由三位大学校长带管，听候裁编。原文我还没有拜读，只是间接地从别人的文章里面看到了这样的大意。听说又有人斥为“书生之见”②。不错，这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书生之见”。但“书生之见”在今天不能算是侮辱，要算是凤毛麟角的理想了。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好几位真正可以配称为“书生”？又有好几位“书生”敢于还有“见”？又有好几“见”还敢于见见世面呢？

“秀才管兵”在别的国家乃至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稀奇，而在今天的中国却成了“书生之见”，此其所以为稀奇。行不通倒是可以保证的。共产党的军队要交出来让秀才管，大约不成问题，因为共产党的将领有好些似乎并不是武将出身。但是国民党的军队，说要交出来让秀才管，那恐怕就有点类似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文萃》周刊第十期。

① 指何永佶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重庆《世界日报》的《秀才管着兵，有理讲得清》一文。该文建议成立“一个秀才三人委员会来解决目前我国的军事问题”。

② 指《世界日报》编者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发表的题为《国家治乱之权》的社评，认为何永佶的建议是“书生之见而已”。

神话了。今天我倒很想让一点步，并不想真正让秀才去管兵，而是要迫切的请求“兵不管秀才”。

兵管秀才是北洋军阀袁世凯所遗留下来的恶政，只要有枪杆子便一切事情都可以管。一直到今天，军人万能可以说是到了顶点。“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便有开枪的自由”，小小一个关麟徵①，这口气倒比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还要大。生杀由我，好不威风！

但是这些“有开枪的自由”的土皇帝们却是万能而一不能。一不能的是什么？就是管兵！打国仗的时候，你们看，不是处处打败仗吗？草木皆兵，望风而逃，一逃比孙悟空翻筋斗还要快。在那时候却是一点“开枪的自由”都没有了。

真是谈何容易，管兵！今天管兵的人有好几位真正读通了《孙子兵法》②？又有好几位能从原文或译文也好，去接近过克劳塞维兹③？能够理解并操纵新兵器的有好几位？懂得什么是构成飞弹或原子弹的原理？这些都是言之过高。试问中国有好的国防地图没有？中国的马种是否已经改良？兵役上的毛病是否已经铲除干净？大兵们没有饿饭吗？有草鞋穿吗？本行内的事根本是一塌胡涂，却偏偏要管到行外来，而且行行都要管。“军人第一，军事第一”，竟成为了军人专政的护

---

① 作者原注：是“一二·一”惨案中的一名主犯，当时他担任云南省警备司令部的职务。

② 亦作《孙子》。春秋末孙武撰。中国古代的军事著作。

③ 作者原注：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军人，十九世纪第一流战术理论家。

符，实在是值得痛心的事。

今天的口号应该是“军人管兵第一，军事卫民第一”。秀才还不便越俎代庖，军人理应少管闲事。应该要求把军与政划分，把军人的权柄缩小。现役军人不能干政，一切有军籍的人不许有任何党籍，军政与军需划分开来，应该组织个别的委员会来统筹支配。

要做到军与政划分，然后兵也才有法可管，管的人也才不出毛病。假使军与政不划分，那么即使让秀才来管了，那些秀才们也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为军阀。袁世凯、吴佩孚不是秀才吗？希特拉不是一位蹩脚画家？墨索里尼不是一位马路记者？然而他们一有兵权在手里的时候又怎么样了呢？

所以我想作一个让价的呼吁，在要求“秀才管兵”之前，先要定下严厉的禁制：“兵不管秀才”！

1945年12月27日

相见以诚

“事实胜于雄辩”，这是最有普遍性而且有永远性的格言。当然这并不是说雄辩就毫无必要，根据事实的辩论是绝对必要的，要这样的辩论，也才理直气壮，真正“雄”得起来。不根据事实，或甚至违背事实，或捏造事实的辩论，尽管怎样的花言巧语，终竟骗不了人；即使能收到一时的效果，待到事实一揭穿了，那效果会成为逆效果的。到这时言语愈花巧，逆效果来得便愈大。

欺骗有时似乎也有必要。例如医生为求病人精神上的安静把实际的病情瞒着，或甚至把相当重的病情说得很轻。又例如父母对于小儿问到自己的来源，每每扯些无稽的小诳。但这些严格地说时，不能认为是欺骗。前者是一种治疗的方针，后者是一种延宕的教育，教育施行过早有时是有严重的患害的。

谈到军事或作战上来，似乎欺骗便有绝对的必要了。所谓“兵不厌诈”①，便肯定了诡诈的效力。但这也只如根据事实的雄辩之类。尽管你是怎样善于用兵的人，你能够出奇制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重庆《新民报》。

① 语见清陆以湉《冷庐杂识·论王文成公精于用兵》。

胜，但总要有兵可用。所以用兵的原则依然是忌"巧速"而贵"拙迟"。这一次世界大战，苏、德之间的旋乾转坤的战役，便是这一原则的最具体的说明了。当希特拉对苏联背信负义，突然发动了闪击战，① 他是多么"巧"，多么"速"。一九四一年岁暮打到了莫斯科的大门，一九四二年又打进了斯大林格勒，在当时希特拉的小胡子不知道会心地微笑了好多次，然而结果怎样了呢？

专门靠欺诈便能打胜战，专门靠欺诈便可以收到任何大小事件的成功，天地间决没有那样的事情。要说靠着欺骗便可以治国平天下，那更完全是笑话。中国搞政治的人似乎都中了些苏秦、张仪的毒，说到政治就好象只是几套骗人的纵横捭阖。事实上只要懂得几套纵横捭阖的，居然也就是政治家或甚至大政治家了。我们只感觉着中国的老百姓可怜呵。

就说苏秦、张仪吧，他们似乎也有"巧速"与"拙迟"之分。苏秦巧，张仪拙，苏秦速，张仪迟，然而张仪成功而苏秦失败了。今天的苏秦、张仪，自己周身都是脓疮，满头都是癞疠，却专门拿一支粉条在别人背上画乌龟，以为这样便把别人骂倒了，自己得意得不亦乐乎。在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眼里，谁又不感觉着这些小丑们的可怜相呢？

今天应该是大家相见以诚的时候了。自己拿出真正的责任心来，大胆地照明自己的丑态，彻底地荡垢涤污。不是骂人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同德国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有效期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却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

丑便可以掩盖得了自己的丑。千层的粉饰也把污垢掩盖不了，理由很简单，因为污垢根本还是存在。

有诚便能有勇，所谓“真金不怕火来烧”。这种人，他能勇于面对现实，勇于正视自己的过错，勇于接受批评，更勇于对抗外来的一切横逆、诬蔑、诱惑、冷视。要怎样才能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①？就要全靠一个“诚”。老老实实的做人，说话，做事，不存一点损人利己的私心，这样便能产出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这样便能够大无畏。我有什么可怕？可怕的就是自己骗自己！

没有诚意的人便没有勇气。这种人鬼鬼祟祟，专门损人利己，做不来一件堂堂正正的事，说不来一句堂堂正正的话。一要装腔作势，立刻便露出了自己的尾巴。但他们也有一项外来的资本，便是靠他人也没有诚意。只要你自己有一毫私心，你有一点软弱，他们便抓到了你这项缺点。于是威胁，利诱，千层的蜘蛛网便罩到你自己的身上了。动也不敢动，活活地便被奸污。这样的现象四处都是，而以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特别明显。但今天是应该相见以诚的时候了，拿出诚意来，大家正大光明地做些对得住人民，也对得住自己的事。

1945年12月28日

---

① 语见《孟子·滕文公下》。

走向世界和平的桥梁

有人说"中国是美、苏之间的桥梁"①。这句话的意思假如更把它扩充起来，可以这样说：中国是走向世界和平的桥梁。

假使今后的世界要得和平相处，美、苏之间必须得到协调。美、苏之间如不能协调而要走到战争的道路的话，那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必然更加残酷。而战场呢？很明显，必然就在亚洲的东部，我们中国。

自从伦敦五外长会议②失败以来，一时为军火商人的贪婪，为反动的国际政治家的阴谋所煽动，美、苏之间的冲突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然而这种阴霾，由于最近莫斯科三外长会议③的成功，又被吹散得相当澄澈了。毕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或在其幕后，是有几位眼光远大的政治家，他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重庆《新民报》。

① 语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重庆《世界日报》短评《美国对华政策的检讨》。

② 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法、中、美、苏、英五国外长在伦敦开会，至十月四日毫无结果地散会。

③ 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问题的决定。

不忍心把人类的安全作为贪婪与阴谋的祭品，而导演出世界大破灭的惨剧。我们作为人类之一员，不惜向他们呈献出无上的赞辞和谢意。

阴谋家们所企图而且所热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顿时要想爆发，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苏联并不是侵略国，她的武力是在保卫她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她如不受别人侵略，她是决不会起来侵略别人的。然而今天要说苏联以外的美、英两国是侵略国吧，我想美、英两国的人民决不会承认。英国的大选，选择了工党①，是人民意志的表露。美国的国会议员明年要大选，为了多得选票，朝野两大党都不得不收揽人心。美国人民是不愿意作无名之战的，因而尽管怎样天大的阴谋家，要煽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也只好暂时收进葫芦里面去了。

不幸的是我们中国似乎还缺乏这样一位能够有透视力的政治家，或者有，而他的见解还未能见诸实施的吧。以我们中国所处的地位，我们不仅没有尽到桥梁的作用，反而有大部分的人跟在国际阴谋家赫尔利②的后面，大做其鼓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狂梦。

我们如果聪明得一点，五外长会议时我们便可以尽到桥梁的作用。处在公正的第三者的立场，替世界人类和未来的

---

① 英国政党，一九〇〇年以“劳工代表委员会”名义成立，一九〇六年定名为工党。多年来与保守党轮流执政。

② 赫尔利(P·J·Hurey，1883—1963)，美国共和党政客之一。一九四四年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年底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于次年十月被迫离职。

子孙说远大的话，我们是可以办到的。然而我们没有说。我们自己早就应该团结，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把和平统一的中国作为我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说话的资本。因为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国人民自身的需要，而且是国际间的需要，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需要。我们要有这样的资本，然后才能够同他们说得出对等的话来。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飞速度地向着反人民、反团结、反民主的歧路上走。有些妄人甚至主张发挥另外的一种桥梁作用，便是把国、共之战发展而为美、苏之战的桥梁。这种狂妄的迷梦，要算无情地被莫斯科三外长会议的成就粉碎了。《天文台》① 上的土望远镜毕竟是瓦片做成的透镜(Lens)，火速丢进茅坑里面去吧。

毕竟国际政治舞台上或其幕后是有几位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妄人们所视为唯一法宝的"原子弹"已被列入禁制的范围内了。原子能的使用"只能为和平目的"。这一项协议是人类理智的大胜利，也是三外长会议的最大的一项成功。原子能限于为和平目的而使用，世界历史会要完全改观了。这一项伟大的发明，较诸人类史上发现了火，发现了铁，将要有更超越的文化贡献。无比的伟大的动力被利用于生产，生产机构和生产诸关系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变革始能适应。反过来说，人类历史正开始走上了以人民为本位的集体阶段，而却有适应这种阶段的大发明出现。这一发明的"只能为和平目的而

① 陈孝威主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创办于香港，原为周刊。一九四五年五月迁至重庆出版，一九四七年迁至上海，改为月刊。

使用”，确实是人类的福音。假使大家信守不渝，努力向着这个指标走去，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人类今后是可以相安无事地步入“民主的大家庭”生活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时代确实是到来了。

我们中国究竟应该走那一条路？这是比火还要明白的事情。“亡羊补牢，尚未为晚”。远之我们受清廷的野蛮统治，落后了三百年；近之我们受赫尔利的愚蠢播弄，落后了三百天。但我们的机会还多，今天就是最好的转舵的机会。已经到了原子能的时代了，不太长的时期之内世界必然改观，我们正应该“迎头赶上”去，抢这个原子能来补偿我们的落后。但假如我们死不觉悟，一定还要背道而驰，别的世界是在以原子能的速度进步，而我们则自然是以原子能的速度相形落伍了。但人民是决不甘心的！人民今天是已经认识清楚了，我们要作为走向世界和平的桥梁。

1945年12月30日

民族解放的先锋

——纪念“一二八”第十四周年

在十四年前的“一二八”的时候，我还在日本当一个亡命客，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情形和上海的同胞热烈支援的情形，我当然失掉了目睹的机会，但这些情形在日本人的心理上的反映，我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十九路军和蔡廷锴的名字差不多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对象。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假使都象十九路军一样，日本人是没有办法把中国征服的。然而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中国并没有好几个十九路军，而在“一二八”之役，十九路军也差不多等于孤军奋斗。到后来，十九路军在福建人民政府的运动失败而消灭了① 的时候，日本人自然是很高兴的了，他们认为在中国除掉了他们的敌手。

但日本人是喜欢崇拜英雄的，十九路军这一悲剧的结束在另一方面也更增加了他们的赞叹。他们不能了解，十九路军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上海事变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进行反共内战。在中共抗日主张和广大官兵推动下，该军领导人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进步势力，公开与蒋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次年初，福建革命政府受到蒋介石的优势兵力攻击而失败。

在“一二八”时有那样强的战斗力，何以在福建终归失败了？这的确也是一个问题。假使用军事专家的眼光来看，或许由数量，地形，时机，装备等可以找得一些重要的因素。但在我们看来，有没有充分的人民力量的支持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二八”的时候，上海市民的抗战热是空前的，人民的爱国心表现为劳军的洪流，为对于英勇士兵的积极助战，英勇的武装同志们受着这样热诚的鼓励自然是更加奋不顾身，相得益彰了。当时，假使中国能够全面动员，和日本作一长期的决战，日本人在当时是还没有十分准备周到的，我们可能挫折了它的野心，使它不得不稍加戢敛，那吗七七以来的大侵略或许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妄动的。但我们确实是自侮而后遭了人侮。

有能力作战的军队，只因派系的不同而受了歧视，更因政治的不民主而使之参加了内争。福建人民政府的组织在中国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史上是要占重要的一页的。但在当时的福建人民乃至全中国的人民并不能了解，人民不知道谁是真正维护人民的，因而人民只是一个旁观者，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和实际让他们认识谁是他们的真正的武力。人民是最老实也是最公正的，他在未能判分敌我之前，他始终是中立者，而且是不怀好意的中立，所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就是老百姓的最坦率的心理。除非你有一边证明不是“神仙”，而确是“凡人”的时候，那他就会出真力，出死力，来帮助你了。同日本人打仗就是这样的，“神仙”与“凡人”分别得很清楚。内部的革命斗争，假使得不到人民的帮助，或一时得到了而不能够巩固人民的帮助，那是不能够持久的。

十九路军虽然成为了历史的名词，但同“一二八”将永受纪念的一样，十九路军也将永远不会被人民忘记的。领导十九路军的将军和将领们今天都还是健在的，他们也一样受着人民的尊敬。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还多，大部分的人就在目前也一定还是在为人民服务，希望他们保持着民族解放的先锋的光荣，永远与人民结合在一道，并纠正中国的军人惯爱脱离人民并鱼肉人民的那种恶倾向。

现在大家都在喊“军队国家化”，但其实应该喊成“军队人民化”。国家也要是人民的国家才行。国家假如只是一党一派的国家，那吗“军队国家化”也只是“军队党派化”的别名而已。唯有是人民化了的军队，当它存在的时候它为人民服务，当它解甲的时候，它依然化而为人民。十九路军正不失为这样的军队的一个示范。

1946年1月25日

叶挺将军的诗

那是新四军事变① 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二)，希夷被囚在陪都郊外的某一地点。秋季快要完的时候了，他的夫人由广东携带着一位八岁的女儿扬眉来看他。他们在狱中曾经会过几次面。我在这时却也得到了极可宝贵的一些意外的收获。

十一月十六日，希夷夫人带着扬眉到赖家桥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她把希夷手制的一枚"文虎章"送给我，作为他给我祝寿的礼物。那是由香烟罐的圆纸片制成的，正面正中用钢笔横写着"文虎章"三个字，周围环绕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十个字。背面写着"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在这之上，希夷夫人用红丝线来订上了佩绶，还用红墨水来加上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重庆《唯民》周刊第一期。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俘，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① 即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答应国民党的要求，将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往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皖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七昼夜，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

边沿。

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实在是使我怀着深厚的谢意和感激。我感激得涔着了眼泪。

不久我们从乡下搬进了城，又从希夷夫人手里得到希夷给我的一封信，这里面还附有一首诗。

沫若兄：

在囚禁中与内子第二次聚会，彻夜长谈二十四小时，曾说及十五日将往祝郭沫若兄五十大庆，戏以香烟罐内圆纸片制一“文虎章”，上写“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两句以祝。别后自思，不如改为下二句为佳：

寿比萧伯纳
功追高尔基

叶　挺　三十一，十一，十四，在渝郊红炉厂囚室中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　三十一，十一，廿一

这里燃烧着无限的愤激，但也辐射着明彻的光辉，要这才是真正的诗。假使有青年朋友要学写诗的话，我希望他就从这样的诗里学。我敬仰希夷，事实上他就是我的一位精神上的老师。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而同时又有透辟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的苦难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能够忍耐的。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一个人不被软化，成为性格破产者，也要被瘫化，成为精神病患者。然而希夷征服了这一切，现在果真是“地下的火冲腾，把活棺材烧掉”，而他“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了。

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希夷在五年囚禁之后恢复自由，晚上在中共代表团看了他回来，又在电火光中返复读着他这首诗。

文艺与科学

在一般的见解里面似乎文艺与科学是被认为极端对立的东西。我们常常听见爱好文艺的青年们说，因为我不喜欢科学那种机械式的东西，所以我要搞文艺。这种见解是皮相的见解，不仅对于科学没有认识，就是对于文艺也没有真正的体会。

一般人眼中的科学大抵是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的常识或者技术科学的应用，这些固然是科学的，但并不就是科学。科学是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最高的阶段，是人类精神辨别是非、认识真理的最高成就。在今天人类的一切部门的认识都不能离开科学，而尤其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是什么？这是祛除主观的成见（私），而以客观的真实（公）为依归的纯正的精神动向。认识客观的真理，更依据真理以处理客观或促成客观的进展，而使之服务于人生，以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这便是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态度加以运用于国家行政或社会事业，也就是民主主义。这在今天是一切的人生活动的准则，文艺工作何能除外？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重庆《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一卷第五期。

文艺工作假使是属于研究或批评的范围，那完全是科学的一个分支，二者的密切关系可以无须乎多说。即使是属于创作的范围，我们也可以说只是科学精神的另外一种化装表演而已。文艺创作本质是人生的批判。即使粗浅一点说，任何创作都不能不经过一道研究过程。伟大的剧曲或小说固不用说，就是一首短短的即兴诗，它也是经过认识过程而来的。虽不必在做即兴诗的当时，而是在能做即兴诗的前阶段上的准备。例如旧式的诗人听见杜鹃的叫声必然要引起怀乡的情绪，他可以做一首即兴的怀乡诗，但在我们今天知道杜鹃是一种残忍的鸟，根本和望帝①的灵魂无涉，我们还能够装着傻瓜，无批判地认为那鸟儿是在喊“不如归去”吗？

没有研究便没有创作。生活体验也依然是一种研究，文艺工作和科学精神是分不开来的。或者有人会说：创作过程是综合，而它的目标在求完美，科学研究是分析，而它的目标在求真实，二者毕竟有划然不同的地方。但这也只是一种皮相的观察。例如科学家研究之余写他的论文时，又何尝不是在进行综合而追求完美？要说到更伟大的科学著作，那情形是更为明显的。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便有人说它是一部伟大的剧曲，前几年日本有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它戏剧化了。

有的朋友爱强调主观，以为科学是纯客观的态度，那样是把主观的能动力量阉割了。文艺创作如也要采取纯客观的科

① 传说周代末年，蜀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死后灵魂化为杜鹃。杜鹃鸣声似作“不如归去”，故古人常用作思归之语。

学态度，那是自然主义所已经走过的绝路，今天的现实主义是不能抹杀主观的。诚然，但我们要说：真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态度，它是要经过客观真理之明朗的认识以养成主观定见之坚毅的操守。科学正是在养成主观的能动力量而不是阉割它。布鲁诺、喀利略① 诸位科学大师宁受炮烙缧绁之刑而不肯歪曲真理，你以为他们是把主观阉割了的吗？

文艺的主观也必然要经过科学的客观才能养成，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事。

1946年3月17日

① 布鲁诺(G·Bruno，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因反对经院哲学，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　喀利略(G·Galilei，1564—1642)，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因反对教会和经院哲学，遭宗教裁判所判罪管制。

《亚洲苏联》序

朱海观同志把美国戴维斯和施特格[1]所著的《亚洲苏联》翻译了出来，这是最适时宜的一件事。我们和苏联无论在历史上或地理上都是有密切关系的邻邦，然而我们一般的人所有的关于苏联的认识实在贫弱得可怜。尽管苏联是已经完成了揭开人类新史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她首先自动废除了帝俄时代和我们缔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了各种特权，归还了所有的租借地，帮助我们完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以不小的人力物力援助我们，而在末期终于协助我们解放了东北四省，然而对于她，我们却没有正当的认识。好些上了年纪的或头脑单纯的人把苏联看成和帝俄时代的俄国并没有两样，因而也就有少数自私自利的顽固分子施其蒙蔽和煽惑的伎俩，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而在最近竟发起类似义和团式的排外行动。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急于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亚洲苏联》为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丛书之一，作者任主编。一九四六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

① 戴维斯（R·A·Davis）和施特格（A·J·Steiger），俱为美国旅行家。二人曾多次到苏联亚洲部分旅行，最后一次是在一九四〇年。所著《亚洲苏联》系他们亲身经历的实录。

纠正的大事。在今天有了这一部书的译出，我相信是绝好的启蒙，故我乐于尽介绍的义务。

本书中所述，象乌兹别克，是我去年七月间亲自去游历过的地方，那里的开发和建设实在是足以惊人。大规模的工场和集体农场，设备完善的研究所，应有尽有的文化机构，差不多都达到了现代的最高水准。而这只是在二十六七年间的成就。在革命以前，乌兹别克是比我们的新疆还要落后的地方。有的朋友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有这样快？我看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的表露。因为一切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都脱离了榨取或剥削的关系，而是以人民自体为本位的。学术和生产配合，生产和人民生活配合，在这样一贯的计划与组织之下作有机的进行，当然会省却了一切的周折。尤其值得注意的，乌兹别克本是帝俄时代的殖民地，而她已完全脱离了殖民地的面貌。苏联是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盟，乌兹别克便是其中的一个。民族自治的原则，据我所亲眼看到的是不折不扣地兑了现的。言语、风俗、信仰，都保存着民族独立的自由。乌兹别克人就是苏联的一位主人，而不再是奴隶了。这儿没有象英国对其殖民地那样的关系存在，建设的速度焉能不快？

举一可以返三，我知道亚洲苏联的其他部分都会和乌兹别克一样。那些地方我虽然没有去过，在本书中恰好把那全部的情形和盘托出了。从这儿可以给我们以几个重要的认识。第一，亚洲苏联都是帝俄时代的殖民地，为什么都从殖民地的命运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二，苏联在四年的爱国战争中，虽然把欧洲苏联的大部分国土沦陷了，而终于获

得了辉煌胜利的原因是在那里？第三，这样对待旧殖民地的苏联制度是不是所谓“帝国主义”？第四，究竟是以什么为动机，使外蒙古终于脱掉了我们的羁绊而自行独立①了？这些问题，我们虚心坦怀地把这部书读了便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

苏联是日新月异的国家，人民力量的无尽藏表现出来的便是建设上的突飞猛进。本书中所述，可能大部分是已经属于陈迹，然而总比我们仍然以对帝俄时代的观感来对苏联的态度是大有距离的。要有明朗的认识然后才有正当的交际。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要做到知己的地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难道又不是这样？为了增进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为了减少由于不了解或误会而生出的种种纠纷，为了使自私自利的顽固分子们失掉蒙蔽和煽惑的活动余地，我们都应该多多阅读这样的书。说得更夸大一点的话，阅读这样的书可以消灭第三次世界大战。

1946年3月27日

---

① 外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一九二一年六、七月，蒙古人民革命军在苏联支持下，击溃了当时盘踞在中苏边境与外蒙古封建主勾结一起的白俄残匪，解放了库伦，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军阀政府脱离关系。

《联合三日刊》发刊词

今天的中国仍然在生死的歧路上，是走向民主团结，还是维持独裁分裂。民主团结则生，独裁分裂则死。

关于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被声明保障以来已经三四个月了，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也有了两个月的历史①，然而一切都还是纸上的文章，而且还在不断地被吞食和涂改。

人民在苦难中伸长颈子望了两三个月，所望到的是什么呢？顽固法西斯分子的愈演愈丑的闹剧，漫天的扯诳，遍地的灾荒。一直到今天，法西斯瘟疫还在大蔓延，竟至闹到了“人心思汉（汉奸）”的地步了。

这样还可以忍耐吗？一切都临到了破产——道德破产，政治破产，经济破产，社会破产。

有的人在专门等待着美国的盘尼西林——五万万或七万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重庆《联合三日刊》创刊号。

《联合三日刊》，重庆杂志联谊会编，一九四六年四月在重庆创刊。

① 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作了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各政党之平等合法、通过普选推行地方自治和释放政治犯的四项承诺；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五项议案：（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和平建国纲领；（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

万五千万大借款的成功。然而在今天不善于保管，不善于运用的盘尼西林，正只是促进病体的死亡。我们反对那种毫无责任的危险的投剂。那样是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的绝大的危机。

一切应该先从自力更生做起。四项诺言的严格执行，五项协议及整军方案①的完全实现，便是起死回生的超盘尼西林的杀菌剂。要把一切法西斯细菌扫荡干净，中国才有希望。

法西斯细菌们也知道它们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它们在死命地挣扎。叫嚣，侮蔑，扯淡，敷衍，阴一套而阳一套，骗，打，恐吓，暗杀，收买，豢养，嗾使，……无所不用其极地，以图延长其自私自利的虺蜮生命。

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吼出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

首先我们要喊出“主权在民”的基调，凡是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一切政治集团或机构，我们不能承认它有什么权。它不仅没有明目张胆的篡国权，也没有大言无耻的骗人权。

各党各派要切实负责实现自己的代表所参预了的一切协议。协议既经公布于世，不能出尔反尔，喊价还价，再来加以污毁或窜改。

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尤其要自己检点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既贤且达。不要藏在无党无派的幌子里面干着助桀为虐的帮

① 指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签署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的基本方案。

闲工作。不要以为所代表的是少数人。中国人民无党无派者比有党有派者多到不知若干倍。你们如果出卖了无党无派的人民，那比有党有派者的罪孽还要深重。

我们所争取的是民主。只是在实现民主有了保障之下，各党各派或社会贤达要参加政权，我们是拥护的。但如民主实现毫无保障，便有人轻率地愿当花瓶，对于任何党派，任何贤达，我们都要加以鄙弃。

我们明确地知道，争取民主的前途是有无限的曲折的。我们没有廉价的乐观，然而也没有丝毫的悲观。

从整个人类理智的进化来说，一切变相的帝王思想，个人本位的自私自利的意识，都要死灭在民主精神的海洋里。进化到了今天，人民的认识使人民的力量逐渐增强，已经强大到足以摧毁一切旧时代的陈根腐蒂了。这是我们的光明的前途。

最顽强的强盗集团，纳粹德意志——法西斯意大利——神道日本，不是都已经先后解体了吗？这强盗集团的残余和保持“法统”（法西斯的道统）的徒子徒孙们，尽管还在跳梁，谁能有更大的力量拉倒进化？

我们要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我们有清楚的客观认识，因而我们也就有坚定的主观操守。我们要为民主精神的彻底实现而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不屈于威武。

今天的中国虽然还在生死的歧途上，但我们知道人民是愿意生而不愿意死，因而我们要坚持着走上民主团结的道路，而排击独裁分裂的继续。

凡是赞成我们这种主张的都是我们的友人，我们请一同携起手来，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1946年4月3日

我更懂得庄子

甲　我现在更懂得庄子了。

乙　什么意思？

甲　你记得《庄子》上有这样的几句话吧？“为之斗斛以量之……”

乙　“则并与斗斛而窃之。

甲　“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

乙　“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

甲　“为之仁义以矫之，

乙　“则并与仁义而窃之。”①

甲　你公然也还记得。

乙　并且我也懂得你的意思了。

甲　你请说说看。

乙　我懂得你在感慨时事。把庄子的话套下来便是：

“为之和平以召之，则并与和平而窃之。

为之自由以要之，则并与自由而窃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重庆《联合三日刊》第六期。一九六一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三卷时，略有改动。

① 以上引语俱见《庄子·胠箧》。

为之民主以号之，则并与民主而窃之。

为之整编以调之，则并与整编而窃之。”

甲 对哪，一点也不错。你请看，不是一切都成了真假两种的《双包案》① 吗？分明是杀气腾腾的扫荡，它也叫作“和平”。分明是统字号的分店，它也叫作“民主”。南通、上海都已经成立了“自由保障委员会”了，他们保障的什么自由呢？不是杀人的自由，捣乱的自由，造谣的自由，贪污的自由，一切法字号、统字号的自由吗？

乙 是的，这是值得愤慨的。庄子当年所处的时代大约也和我们的时代约略仿佛，是新旧两种东西斗争得最厉害的时代。不过问题来了，你更懂得了庄子，是不是你就同意了庄子的不谴是非的办法呢？

甲 庄子并不是不谴是非，他是要另外拿出一套是非出来，把两种对立着的真伪都当成非，而把他所见到的齐生死、同万物的见解作为是。

乙 我不想听你的哲学史讲义，我是想问你，对于现实的感触是怎么样？你是同庄子一样逃避现实而退撄下去，还是同他两样？

甲 有点难说。退撄吧，有点不甘心；不退撄吧，我实在也有点失望了。

乙 我早就明白你的心境了。那是最危险的，你已经在

---

① 京剧名，内容写五鼠精分别化身为假包拯、王朝、马汉等以乱真包拯。

反动势力的面前有点避易了。我们正应当乐观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失望？

甲　乐观？可惜我不能再盲目了。当其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时候，我也曾和大家一样乐观过一晌，可是自从二月十日较场口事件① 以来，我的心境逐渐起了变化。闹到今天，象南通那样惨无人道的血案② 也产生了，北平中央公园来了较场口的翻版，陈瑾昆③ 教授那样老成持重的学者都被特务暴徒们打伤了。一切旧文章都变本加厉，而新花样却层出不穷。组织南通自由保障委员会的人就是组织那种惨无人道的血案的人，人的良心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

乙　你不用那么着急吧，慢慢的来。你不要以为旧的东西毫无改进，或者愈搞愈坏了。其实这一两年来，中国的局面是大有进步的。两年前我们能用"人民"或"民主"这样的字样吗？今天公然连法字号的、统字号的人都不能不冒牌民主或人民了。去年年初，全国各界以及在野各党派要求政府召开党派会议，改

---

①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人民在较场口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国民党派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多人。

②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江苏南通市民众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随后参加集会的顾迅逸、孙日新、孙平天等先后被捕，并遭杀害。

③ 陈瑾昆(1878—1959)，湖南常德人。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次讨论国大代表问题的群众集会上呼吁和平民主，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

组政府，那时候当权者们说“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改组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在那时的高压之下要找人在宣言上签名是多么困难？就连宣言两个字也还不敢用，不是只好使用“进言”吗？结果呢？“进言”① 一进出去之后，费巩② 教授失踪了，至今还无下落；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撤消了③，有好些朋友一直都还失着业。这些仅仅是一年以前的事。然而今天是怎样呢？“分赃会议”早已召开了，政府诸公反而急急于要改组政府。你说这些不是进步吗？尽管假的拚命在假，然而“伪善者的存在正是表明着善的胜利”的。

甲　这些我自然是明白的，而且我也明白这些都是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是人民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强大了，所以逼得反人民、反民主者都不得不伪装和平，伪装民主。然而今天这伪装的后边是有大的国际力量支持着的，所以使我悲观。

乙　慢慢来吧，悲观有何用处？你只要相信人民，你应该

---

① 指《文化界时局进言》。一九四五年二月由作者起草，有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茅盾、老舍等三百十二人签名。载二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 费巩(1905—1945)，江苏吴江人。浙江大学教授。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应约前往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在千厮门码头乘船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杀害。

③ 一九四〇年九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将政治部第三厅左翼文化人全部解职。作者卸去第三厅厅长职务，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界时局进言》发表后，该会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被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

知道人民的力量可以超过任何横强的霸道。把悲观化成力量吧。超过国界，彼此都有人民在作主人。人民的利益，九州万国都是同一的，那就是要得到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和平，真正的自由。我们不要只看见少数管事人的排场，而以为全体的主人都在睡觉。大的国际力量又怎样？希特拉不是强大过一时吗？而今安在呢？

甲　好，我谢谢你。总之，我现在更懂得庄子了。我也另外想到一个大是大非，有机会再谈吧。

1946年4月23日

重庆值得留恋

在重庆足足呆了六年半，差不多天天都在诅咒重庆，人人都在诅咒重庆，到了今天好些人要离开重庆了，重庆似乎又值得留恋起来。

我们诅咒重庆的崎岖，高低不平，一天不知道要爬几次坡，下几次坎，真是该死。然而沉心一想，中国的都市里面还有象重庆这样，更能表示出人力的伟大的吗？完全靠人力把一簇山陵铲成了一座相当近代化的都市。这首先就值得我们把来作为精神上的鼓励。逼得你不能不走路，逼得你不能不流点小汗，这于你的身体锻炼上，怕至少有了些超乎自觉的效能吧？

我们诅咒重庆的雾，一年之中有半年见不到太阳，对于紫外线的享受真是一件无可偿补的缺陷。是的，这雾真是可恶！不过，恐怕还是精神上的雾罩得我们更厉害些，因而增加了我们对于“雾重庆”的憎恨吧。假使没有那种雾上的雾，重庆的雾实在有值得人赞美的地方。战时尽了消极防空的责任且不用说，你请在雾中看看四面的江山胜景吧。那实在是有形容不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出的美妙。不是江南不是塞北，而是真真正正的重庆。

我们诅咒重庆的炎热，重庆没有春天，雾季一过便是火热地狱。热，热，热，似乎超过了热带地方的热。头被热得发昏了，脑浆似乎都在沸腾。真的吗？真有那样厉害吗？为什么不曾听说有人热死？仔细想起来，这重庆的大陆性的炎热，实在是热得干脆，一点都不讲价钱，说热就是热。这倒是反市侩主义的重庆精神，应该以百分之百的热诚来加以赞扬的。

广柑那么多，蔬菜那么丰富，东西南北四郊都有温泉，水陆空的交通四通八达，假使人人都有点相当的自由，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么好的一座重庆，真可以称为地上天堂了。

当然，重庆也有它特别令人讨厌的地方，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① 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

1946年4月25日

① 作者原注：沧白堂是旧时纪念杨庶戡（字沧白）的建筑，在重庆临江门附近。一九四六年春间各民主党派曾在那儿举行几次讲演会，屡遭国民党特务投石捣乱。

文艺工作展望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艺，自内容上说来，总的目标是在争取民主。虽然这个目标时而有所隐晦，时而用别的口号来代替了。例如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抗战时期集中抗日的口号，究其实际依然是争取民主的斗争。但在实践这个斗争上所采取的形式，则不免有些分歧。首先我们由文言改成白话，这形式的变革和新的内容是配合着的。因为新的内容是由外来的刺激而引起的，因而新的形式也不免借重于外来，尽力蔑弃并打破一切旧有的形式。这一发展的结果便是极趋欧化，与人民大众完全脱离，反帝未成，反而成为了买办文艺，洋奴文艺。本来是配合着大众要求的形式，反而被要求其大众化了。大众化的要求，在抗战期间特别亢进了起来，于是旧形式，特别是旧有的民间形式，又恢复了它的光辉，新的民族形式的要求便从而诞生了。

这样发展的路径，不仅文学是这样，其它的姊妹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无一不是这样。国乐与西乐的对立，国画与西画的对立，本国舞与西式舞的对立，那严峻的程度似乎还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上海《群众》周刊第十二卷第九期。

文学的对立之上。然而民族化的要求在这些姊妹艺术的部门却也比文学上所表现的更显豁而且更有成效。例如音乐家尽量摄取民间音乐的手法，用以表达人民大众的情感，因而有抗战歌曲的产生，而最近更有大规模的民族交响乐出现了，综合了中、西乐艺的新音乐正在诞生中。和这同样，综合了中、西画法的新绘画，综合了中、西舞式的新舞蹈，以及其它，都在不断地诞生了。一切都是采取辩证的方式而发展着的，这是应有的发展。

发展是由两方面的矛盾对立，而平行到矛盾的对消。外来形式主要地在形式上更趋民众化以实践民主的要求，旧有的民间形式主要地在内容上更趋民主化以满足民众的需要。这两条平行的发展，不一定便综合而为一，很有可能是发展而为同一内容的多样的形式。就我在苏联所见到的情形来判断，也刚好可以得出这样的前瞻。苏联方面是否有新旧文学的对立，我不知道，我所见到的是关于歌舞方面的。苏联歌舞大抵分为两部，一种是欧美形式（便宜上这样说），一种是民族形式。两种在内容上虽然彼此接近，便是以社会主义的实践为其内容，而在形式上却依然有兄弟姊妹般的独立性。两部常常平行演出，但大抵以欧美形式为第一部，以民族形式为第二部。这先后不一定便是优劣的表彰，然而总是兄弟姊妹般的雁行，却是摆在眼面前的事实。从这里，令我想到了中国新文艺形式的未来，我们这儿也应该产生出同母的兄弟姊妹。由新的方面来的生根，由旧的方面来的蜕变。这样说来，或许有的朋友会误解为二元，但其实是一元的多样化。在今天我们的

文艺似乎可以说是：民主的一元内容，民族的多样形式吧。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民主，不用说也还有它一定限度的内容。这一定的限度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最周密表示于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那个《和平建国纲领》。那虽然是中国今后政府的施政纲领，但也可以说是今后文艺工作者们的工作纲领。那九纲五十三目，差不多每一条、每一句都可以成为文艺上的主题。那些正是今天中国的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民主限度。我们文艺家们似乎应该体贴这个纲领，保卫这个纲领，由文艺上来实践这个纲领，使它逐条逐句得到充实的形象化。这似乎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已经开辟出了一个很宽大的工作门路，是需要我们个别地或集体地充分努力的。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我举出了《和平建国纲领》，也不过想指示出一定的民主限度，事实上那在今天是最低的限度，它是由各党各派协商所得的结果，只是折衷式的东西。文艺家的任务应该比它还要进一步才行。如有人以为折衷式的都是太政治的了，这样的人是早已成为了另一种政治的奴婢的。

文艺内容的政治性，我们必须强调，必须争取民主，争取

和平，打击法西斯，打击反民主，而尤其要打击假民主与假和平。一切反的东西我们不容许它并立，一切假的东西我们不容许它幸存，丝毫也不能容情，丝毫也不能马虎。宽恕敌人，那甚于残杀自己。这首先要求我们在生活意识上与生活实践上要有严密的检点。和平民主运动我们必须积极参加，在一切斗争实践当中去体念人民的一切，扫荡一切非人民、反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的任何东西。从这样的基本生活来产生我们的文艺。假使我们承认文艺有艺术性的话，那就是怎样用适合的形式来表现这种高度的政治性的内容。艺术性，我们把它作为文艺形式方面的问题而考察，这里便可能有多样的艺术性，就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样，政治性与艺术性正具有着这同一的关系。尽管说内容与形式须是有机的统一，然而内容自内容，形式自形式，内容是一而形式可多。和这相同，文艺的政治性要占第一位，在今天不能有两样，而艺术性是从属的，却可以有多样。取消政治性的议论是反动理论，就是想把政治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而借以湮没政治性的任何企图，也只是诡辩式的、玄学式的反动理论而已。那样化了装的理论或许出于无意识，那正证明我们的生活意识还没有充分民主化，自己还不觉地在君临着人民。那是须得清算的。

我们的形式仍然有新旧的两条线。例如拿戏剧来说，话剧的形式必然继续发展，而旧剧如平剧、地方剧及秧歌之类也必然经过升华而发展下去。这两条线在相互影响之下而平行地发展，各具其特殊的艺术性而却发挥着同样的政治性。在

各自的路线上政治性与艺术性可能有种种的对比，政治性与艺术性都强，那自然是最理想的作品，只有在这样的作品里面两者才成了有机的融洽。政治性的养成不能不靠生活实践，而艺术性的养成则还要靠文艺实践。假如是绘画或音乐，这关系便很容易说明。没有作为画家或音乐家的修养，是不能成就一幅画或一只曲子的。在这儿，一切文艺家除生活之外便不能不有技巧上的锻炼了。先从旧有的民间形式来说，如是简单的秧歌，或者无须乎有多么费力的准备，但如要写大规模的平剧或其它地方剧形式的东西，那就非有深厚的素养是不宜轻易尝试的。在今天要求着我们要改正对于旧有的民间形式的艺人和艺术的鄙视了。我们一方面应该向那些艺人们学习技巧，而另一方面要对于他们施以民主的再教育，遵循着这样的途径以改造民间形式。或是说以那种形式来表达新时代的内容。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也就是新文艺作品，今后我们是不应该加以歧视的。事实上，在前我们是歧视了来。诗，我们回避歌谣。剧，我们拒绝话剧以外的任何旧东西。小说，我们极端憎恶章回体。在那些东西的内容饱和着封建思想时，我们的回避、憎恨、拒绝是有理由的。但我们洁癖到了连那种形式都一概加以拒绝，而把“旧瓶盛新酒”的作法认为毫无前途，这种完全是脱离人民的观点，我们忘记了那样的形式是不失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东西。

但我们也不想走到另一极端，以为除旧有形式之外，一切都不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毫无价值。我们不想单纯到这样的程度。新的形式依然是必要，而

且我们正需要使它在中国生根，让它从中国人民生活的土壤里面发育出来。因而我们向外国作家的学习，向外国作品的借鉴，正应该加紧。我们正应该更负责地介绍外国的名作家及其作品，在技巧上我们是可以得到极大的启发的。洁癖到了排外，在今天是极危险的事。我们对于这样的理论不仅不宜接受，而且应该继续排除。文艺上的“义和团”，同样是值得警戒。它不仅不能保卫中国的旧有文艺，而且只有使它愈见萎缩。中国旧有的文艺形式，事实上差不多都是外来，是外来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上生了根，一般人差不多根本忘其为外来了。这在音乐方面最为显著。现在的所谓国乐，无论乐理、乐器乃至乐艺，都是南北朝与隋唐时代的西域的东西。但今天有几位国乐家知道琵琶是外来语，胡琴虽然还保留着“胡”字，谁个不认它为国乐器呢？问题不在它是外来不外来，而是要求它足以和今日的生活内容配合。今天的人类世界在民主生活的内容上已经有一般的共通性，为世界所共通的新形式，在文艺界也就不能不起着前驱的作用。

1946年4月30日①

这篇东西是四个半月以前为北平准备创刊的一种文艺杂志写的。后因时局激变，杂志未能创刊，这篇东西也就搁置下来了。现在重读，恍有隔世之感。文中所说已经和当前局势不甚切合。但强调政治性的一点，觉得在今天是更当加紧的。近来因为时局的沉闷，第三种人的论调逐渐在出现，我们应该毫不容情地予以反击。

① 最初发表时，文末自注为四月三日。

一切都是无轨道，有的退撄，有的高蹈，而大家都有点茫然。可惜本文还没有针对到这些来说。上海诚然是一个“海”，唯其这样，正需要灯塔。

1946年9月18日

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

一　纪念文艺节的意义

八年的长期抗战告了结束，今天我们迎接着第二届的"五四"文艺节，也就是战后第一届的我们的节日。这在我们从事文艺工作者检讨过去与规划将来的工作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我们文艺工作者是以文艺服务于人民的忠实的仆役，我们要深深体验我们的主人全中国人民的需要，他的痛苦的祛除，他的欢乐的获得，他的希望的实现，他的缺陷的补偿，我们要忠实地表达出来，并求其俱足达到目的，我们才算尽了服务的能事。

人民的需要是随时代而进展的，即使旧的一切得到满足，新起的需要又等待着新的努力了。这些便构成为一个时代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

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七届年会定五月四日为文艺节。

时代精神。我们的努力也就要率先把握着这种精神，而不断地、迅速地、美满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八年以前，日寇还酝酿着侵略大战的时候，人民需要团结抗战，我们文艺工作者忠实地做了人民的喉舌。结果抗战实现，团结虽不美满，至少结束了十年的内战。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是可以向着主人奉告无罪的。

抗战开始后，我们集中力量于抗敌文艺的建设，这正是人民给予我们的正确的使命。我们不断地呼吁了团结的加强，鼓舞了前方和后方的敌忾，并打击了不利于抗战与违反人民意志的一切逆流。虽然我们遭遇到了种种的困难，我们始终坚守着了我们的岗位。文艺作品在量上确已超过于战前，优秀的作家们有不少的人在战地上阵亡或者受伤了，而文化汉奸究竟只占少数中的少数。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告慰的。

然而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所负的使命却没应分地完成。我们为了团结每每倾于妥协，我们对于逆流的抵抗太不够，眼睛过于朝向了上层，为了一部分恶奴的凶焰我们也淡漠了主人，为了过度的生活压迫我们更接近了市井。因而使我们平庸，使我们退缨，我们在胜利的争取上没有尽到应尽的力量。我们的胜利是侥幸获得了的，我们的胜利是所谓“惨胜”！在这招致“惨胜”的原因里面也有我们应该负责的地方，我们今天是应该严密地检讨，而作为今后的借鉴的。

在今天，人民在这“惨胜”局面下所发生的新的要求又是甚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去把握着我们的新的任务？

二　和平民主运动的重要

今天，我们的“惨胜”之惨超过了战时。疮痍满目，遍地灾荒，人民不仅从八年的战祸中一时无法恢复，而反人民的顽固分子还在时常鼓动新的战争，传播着法西斯瘟疫，人民已经不能聊生了。

不义的内战，人民是反对的。人民需要和平，不仅需要中国的和平，而且也需要世界的和平。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和世界已经成为了生息相关的有机的连环。

和平要怎样才可以获得呢？靠着外国的援助以企图武力统一者的迷梦是已经临到破灭的时候了。没有人民的武力，自古至今，从不曾有人完成过“统一”的迷梦。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三项协议①签定了，这些并不是少数代表们的文章，而是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全中国人民需要民主团结来完成和平统一。

只有民主才能和平，只有团结才能统一，只有和平统一才能够进行建国工作，恢复战时的疮痍，补偿中国的落后，使中国人民获得一个自由幸福进步的新中国。

帮助我们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国际友人，人民是欢迎的，欢迎他们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一切援助。中国人

---

① 指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定的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协议、二月二十五日军事三人小组签定的整军的基本方案和三月二十七日军事三人小组签定的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议。

民也不会白受他们的恩惠，中国人民从落后、残破、贫困等人为枷锁，一旦解放出来了的时候，他会加倍的奉还，对于全人类的幸福必将有所贡献。

但是，一切相反的国际企图，中国人民则抵死不愿接受。中国人民不甘心于永远做封建残余——法西斯遗孳的奴隶，更不甘心于到了今天还要由多数国的殖民地化而为单一国的殖民地！

和平民主的争取是绝对必要。不仅要国内的和平，而且要世界的和平；不仅要国内的民主，而且要国际的民主。

文艺工作在这样的人民要求之下，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

三　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意义

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过分强调了政治的要求，或者以为在这样紧迫的政治斗争中文艺失掉了它的效用。不，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人类是"政治的动物"，离开了政治的要求，人类便只好是动物而已。一切社会活动都不能脱离时代的中心要求，文艺何能两样？文艺正是极犀利的政治斗争的武器，我们今天不仅不能搁下我们的武器，更应该磨炼我们的武器，使它更加犀利起来。

人民的迫切要求正需要我们呐喊，反人民的一切阴谋黑暗正需要我们揭穿，为人民勤恳服役的忠仆和他们的业绩正需要我们赞扬。

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需要和平，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碍。人民既需要民主，文艺便应当表扬民主而排击一切反民主的存在。积极方面的建设工作固然必要，消极方面的破灭工作在今天是尤其必要。

今天的国内更分明划成了两个壁垒，民主与反民主，和平与反和平。然而反动者的战术却更加高妙了，分明是法西斯的分店也要贴上了“民主”的商标，分明是杀气腾腾的扫荡也要假冒着“和平”的徽号，一切都成了真假两种的“双包案”。有关全中国文艺界的协会不是都已经有两个存在了吗①？

真的和假的应该严峻地分别开来。文艺的目的假使是在求真，求美，求善，文艺便不能容忍那一切混珠的鱼目。真伪不两立，美丑不两立，善恶不两立。人民这样命令着我们，文艺也这样约束着我们。

眼前摆着了两条路，我们应该要严正地守着人民所要求的路。

四　今后的我们应该如何工作

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政治协商会议所协议定的《和平建国纲领》，虽然主要是

---

① 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和不久后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张道藩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

今后的施政纲领，但我们从文艺建国的观点去看它，那九项五十三条的条文，差不多每一句都可以成为当前文艺的主题。我们应该保卫这个纲领，实践这个纲领，体现这个纲领，详细地加以研究解释，并使它得到丰富的形象化。

一　作为个人：我们应该严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场，努力向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的意识彻底大众化，绝对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恶势力抱一个死不妥协的态度。对于协会应当使它尽量地健全发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众，争取广泛的中间层，在各种文艺活动中应积极参加，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战士。要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我们的创作才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和当前的时代配合。

二　作为协会：我们应该尽量地把工作展开，发展地方分会，把全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我们要排除敷衍塞责的衙门主义，息事宁人的官僚主义，逢迎权贵的市侩主义。负责领导，不作帮闲。与会外的和平民主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尽可能争取主动。

协会的定期刊物，我们要把它充实起来，切实地发挥领导的功能。我们要保障作家的权益，在相互扶持的原则之下，使作家生活得到相当的保障。不断地为人民大众或文艺青年服务，尽力培养文艺工作上的人材。

我们应该爱护旧有的民间文艺工作者，欢迎他们加入协会。我们一面集体地向他们学习，一面也影响他们，在和平民主的原则下施以无形的再教育。这样去改进旧有的工作者，同时也就有了可能改进旧有的民间文艺。

我们应该经常地和海外的进步作家沟通声息，交换意见，增加国际间的相互了解，以促进本国的民主化及国际民主化。尽力地和海外的文艺青年侨胞取得联络，劝诱他们组织海外分会，请他们多多担负这项沟通国际的工作。

三　作为侨胞：和国内的文艺工作者在基本原则上应该没有两样，对于祖国的和平民主运动首先应该力求配合。一般侨胞的爱国情绪较为热烈，但因离国久远，多不明祖国真相，因而真伪不分，其爱国热情每每为反动势力所利用。因此我们应该时时关心祖国的现实，力求真相的阐明，务期帮助真正的民主势力的成长，使爱国行动不至流而为害国行动。

对于国外人士的接触，侨胞青年首当其冲，自然应尽双倍沟通联系的责任。举凡有利于祖国的和平民主运动的举措，应该尽力赞助、推动，而详尽地向国内介绍；其相反的举措，应该尽力反对、阻止。作为中国人民捍卫祖国的先锋，把祖国人民的要求不断地向国外作真切的介绍，把足以代表人民的作品向国外翻译，应该是当前极宜重视的工作。

1946年5月2日

学术工作展望

“五四”以来的课题：实现科学与民主，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学术工作者急待解决的课题。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并没有生根，学术工作和生活实践依然脱离，学术没有真正科学化，科学没有真正中国化，因而中国的政治乃至其它一切社会现象都没有真正民主化。民国的招牌虽然挂了多年，而事实上适得其反。在今天是我们应该急起直追的时候。

民主与科学，在本质上并不是两种对立的东西，科学的思维与方法用之于实际生活的处理便成为民主。科学的基本要求是利用厚生，为人民服务。它首先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静心地去体察，发现一切对象的性质、关系、变化与变化所遵循的轨则，进而加以人力的促成、组织、淘汰、提炼，以增加人类生活的幸福。科学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故科学精神实质上也就是民主精神。

但一般人对于科学的认识，却把这种基本的常识忘记了。不仅一般对于科学没有素养的人未能了解科学，就是有好些科学专家，都只精通了他所专门研究的学科的迹象，而忽略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八月重庆《中国学术》季刊创刊号。

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民主精神的，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地说来，我们只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师，而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科学家。这应该是我们所宜坦白承认的一个巨大的缺陷。

因此，今天我们学术工作者所应该担负的使命，也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首先我们自己应该深切地体验科学的精神，不断地加以阐扬，把这种精神播种在任何角落里，让它发出苗条来。这首先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切实的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战士。我们要以科学的武器，来为民主的实现而斗争。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成为社会或国家。或许有人以为这样是使科学成为“政治的奴婢”了，不，不是成为“政治的奴婢”，而是成为“政治的主人”，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这是我们目前学术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如有人要规避或反对这个任务，那种人倒真是“政治的奴婢”。真正的学术工作者正应该鄙夷他，和他作正面的斗争。

学术研究应该和社会生产相配合，社会生产应该和人民生活相配合，要这样科学才能真正中国化，中国也才能真正科学化。但这需要有高度的政治上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不应该是少数政治家的任务，而同时是一切学术工作者的任务，全中国人民的任务。一朝一刻是不能完成的，只好一步一步的来，多方面地策划着全面的进展。在争取政治的民主化，丝毫也不容许我们怠工，在可能范围内科学同生产与人民生活配合，我们是应该作个别的多方面的努力的。简单说来，这就是科学的普及，在以前的学术工作者认为是不屑为的事情，今天正

需要我们低首下心地去做。

高深的研究自然我们也不容怠慢，在我们中国，科学还没有脱离翻译的阶段。随着买办政权的建立，科学也差不多成为了买办科学。中国自已切身的问题，我们很少有深入的有价值的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这样。好些部门都还是等待开辟的处女地。这儿正是我们应该集中力量从事的地方，或许也就是我们从事研究者的本位工作。高深的研究固然需要我们，即如中、小学校乃至幼稚园的教科书或读物，都须得我们不断地加以研究，使它尽量科学化，而且中国化。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的深入，而是将科学精神深入人心。

先进国家的科学成就，我们要不断地注意，研讨，介绍，是无庸多说的。但在今天对我们有一件切要的事情，便是对于苏联科学的接受准备。我们今天对于英、美，乃至法、德、日的科学成就，在接受上是有相当的准备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些国家的语言，通晓的人比较多。独于苏联，尽管她和我们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苏联科学又有着惊人的进展，足供我们借鉴的地方极其多，然而我们的接受准备，却非常不够。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应该加紧的努力的。我们应该不断地介绍而且保持着两国学者间的密切的联系。

苏联对于科学的重视是超过英、美等国的。学术研究，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在苏联成为了三位一体，这也是英、美等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未能做到的。苏联科学成就的突飞猛进是有目共睹的事。在帝俄时代比较落后的一个庞杂的国家，革命

以来仅仅二十八年，已经和英、美并驾齐驱了。比这还有什么更显著的证明吗？这进步是方兴未艾，没有底止的。人民力量的无尽藏开发了出来，便成为学术成就的奔流。我们可以断言：在不久的将来，苏联的成就一定会要超过英、美的。这个国家在一切方面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我们对于她的认识，不仅在科学方面，就是其它方面的一切，也不容许我们忽略。

一切学术工作者团结起来，努力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的科学化，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来领导中国的一切，尽力争取中国的民主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彻底的斗争。

1946年5月6日于重庆

屈原不会是弄臣

前两年，听说成都的孙次舟① 倡导屈原是弄臣的新说，曾经引起了文艺界的辩论。后来昆明的闻一多著了《屈原问题》一文，发表在我所主编的《中原》② 杂志二卷二期上，大体上承认孙先生的说法，但比孙先生进了一步，说屈原诚然是弄臣，但以那样的身份而能革命，却更值得赞扬。两位先生的文章都不在手边，因为明天就要起飞离开重庆了，一切书籍都已经进了箱，因此详细的文句无法征引。

屈原到底是不是弄臣呢？这本来是不那么切要的事。只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了他确是弄臣，那倒也是无法翻案的。不过据我读过孙、闻二先生的文章后所留下的记忆，似乎要下出那种断案的证据并不充分。

唯一的内证就是《离骚》上以男子的身份而讲到女饰的一点。例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仿佛屈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重庆《诗歌》月刊第三、四期合刊。

① 孙次舟，原名志楫，一九〇八年生，山东即墨人。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 文艺月刊。一九四三年六月在重庆创刊，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与《文艺杂志》、《希望》、《文哨》合为《联合特刊》。

就是楚怀王的男妾。问题是在“蛾眉”两个字。《诗经》的“螓首蛾眉”是以形容卫庄姜①，后代文人便把它专门作为形容女性美的惯用语去了。但在屈原时代，应该还没有这样固定。只要一个人的眉毛真象蛾子的眉毛那样秀，无论是男是女，应该一律都可以称为蛾眉的。

屈原的面貌毫无疑问是相当美的，《离骚》上已经明白地说过了：“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态）。”他眉清目秀，无疑还齿白唇红。但有这样生理上的优点，我们不好便直指他为天生的弄臣。诚然，他也喜欢采摘些香花香草来装饰自己，这不是毫无丈夫气的搔首弄姿吗？一存了弄臣的观念去看，屈原的一切似乎也就无往而非弄臣了。然而古代的人，男女的界限并不那么严，用花草来饰身是无分男女的。好在，这种习气近来又摩登起来了，穿西装的男朋友们不是也每每在领襟上插朵鲜花吗？

众女的谣诼，与其说是恨屈原这位龙阳君②把楚怀王的宠爱夺去了，要中伤他，无宁是追求屈原不遂的一些女子，尤其象怀王的宠姬郑袖，恼羞成怒而加以反噬。要这样才可以离间屈原，而屈原在事实上也就遭了离间。

广义的说来，凡是古时候的君臣关系都是主奴关系，要说屈原也是奴隶，那是说得过去的。但要说他完全是以声色事人的一位相公，虽然观念新颖，却嫌证据太不够。屈原是三闾大夫，是楚国贵族屈、景、昭三姓中之一姓的显要，他的身份和

---

① 卫庄姜，春秋时卫庄公的夫人姜氏。

② 龙阳君，战国时魏国的幸臣。通常用来指以男色取悦帝王的弄臣。

小臣宋玉或齐之赘婿淳于髡①毕竟不同。他做过左徒的官，这同一的官后来的春申君②也做过，春申君系以左徒而为令尹，足见那官位相当高，似乎和弄臣的职守也不相称。这些都是相当坚强的反证，似乎也还不容易推倒。

总之，只要有充分的证据，要创说屈原是弄臣，我们也并不想替他掩饰。我们固然是“崇拜”屈原的，假使屈原真正是弄臣，我们的崇拜之念也并不因此而减衰；或许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反而会增加的。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弄臣而能革命，那等于说魏忠贤而兼左光斗③，事实上是有点不可能的。这样的见解是过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

1946年5月7日

① 淳于髡，战国时齐国的学者。赘婿出身。以博学著称，被齐威王任为大夫。

② 即黄歇（？一前238年），战国时楚国贵族。顷襄王时任过左徒，考烈王时任令尹。封于吴，号春申君。

③ 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肆屠戮正直的士人。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明代桐城人。东林党人杨涟弹劾魏忠贤，他参与其事，并自劾魏忠贤三十二条斩罪。后同杨涟一起被魏忠贤诬陷，死于狱中。

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一九四一年在重庆的一大部分做诗的人不期然地把旧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立地便得到普遍的响应。但只公开地纪念了一年，以后便只好由少数人静悄悄来举行纪念了。原因是文运大员①不高兴这个举动，据说是，节日很多，为什么要把端午定成诗人节？诗人很多，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在这前后关于屈原也就展开了政治上的斗争。有的人说，屈原那样的人根本值不得纪念的，恃才扬己，诽谤当道，而终于独善其身，消极自杀，这样狂诞偏激的人，在我们目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当然在今天还要来纪念屈原的人，也就是狂诞偏激之徒，有意恃才扬己，有意诽谤当道，而最好是跟着屈原消极自杀，也就乐得干净的了。太不安分了，公然要纪念屈原！

我自己就是这不安分的一个人，而且也就是被人们最希望我赶快自杀的一个。然而我的不安分却真是到了家，对于屈原的一切我都喜欢，而独于不喜欢他的自杀。因此要想我跳进扬子江或黄浦滩，那恐怕就只好等待“自行失足落水”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张道藩等人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拼凑的文化工作运动委员会的人员。

真的，除掉自杀这一点之外，我对于屈原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喜欢的。首先我喜欢他是尊重人民的人，例如他说：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①

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流涕，而怨天恨人，而克制自己，不作逃避现实的隐遁，试问不是真正尊重人民、爱护人民，而且这尊重爱护之念既深且切的人，谁个能够这样？屈原无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浓重的诗人，而他的政治观点就是替人民除去灾难，对内是摒弃压迫人民的吸血佞幸，对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强权国家，要依人民的意见来处理国政，团结善邻，对于强权拒绝屈膝。这无论怎么说应该是很正确的主张，然而却为当时的当道所不容，而采取了相反的道路，以致“民离散而相失”②，就在屈原在世的当时几几乎见到了国族沦亡的惨痛。他是爱国爱民的人，你叫他怎么能不诽谤，能不怨望？爱得深便恨得切，他的诽谤和怨望，要使千载后的大员们都感觉着震恐，这是理所当然，而在今天一些不安分的人要崇拜他，唉，那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诗形式。那完全采取的是民歌民谣的体裁，而把它扩大了，更加组织化了。他所创造

① 第一、二句见屈原《离骚》；第三句见《哀郢》；第四句见《九章·抽思》。

② 语见屈原《哀郢》。

的"骚体"以"兮"字的反复出现为其特征，这本来是古代民歌民谣的唱诵口调。在今天读音变了，虽然显得文绉绉，甚至文人的别名也就叫作"骚人"，但假如懂得古音去读，那秘密便立地解释了。"兮"字古音是读如"啊"，这是清代音韵学者孔广森的一个发明。晓得了这个发音，你去读《楚辞》以及凡有"兮"字的古歌谣，便可以知道那完全是和言语近亲的音调。跟着你也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在《诗经》中属于庙堂文学的《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等何以不用"兮"字(用者极少)，而属于民间文学的《国风》，何以多用"兮"字了。跟着你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用"兮"字的民间歌谣是无分南北的，以前的人认《楚辞》为南方文体，不同于北方的"雅"、"颂"，从地域上来解释二者的差异，那完全是错误的见解。《楚辞》与"雅"、"颂"的不同是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不同。《楚辞》式的平民文学在北方也有，"雅"、"颂"式的贵族文学在南方也有。前者有《国风》及其它古歌谣可证，后者有徐、楚、吴、越的有韵的钟鼎铭文可证。

从这两方面来考察，我们便可以看出屈原的伟大，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他要享受两千多年来的民族崇敬，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今天的诗人们正是意识着要遵守这样的道路。屈原在诗人们的心中便形成了庄严的形象，而把相传是他的死日的端午节，由人民的节日更规划为诗人节，而加以双重的纪念，那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无可否认，屈原是成为了一个偶像。他是人民意识的形

象化，人民文艺的形象化。这样的偶像，不仅不应该打倒，而且也没有方法打倒的。屈原在生前虽然受着迫害而终至于自杀，但他死后两千多年，人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愿与人民为敌的人，觉得这个偶像是眼中钉，要想用政治的力量来加以再毁灭，那只是徒劳的幻想。诗人节在今年，又全国规模地复活了，这对于那些文运大员们的反抗，不是一首朗诵诗式的宏亮的回答吗？

但也有一种与政治的逆流无直接关系的偶像破坏的主张，那便是"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崭新学说的出现。这学说在三年前在成都纪念诗人节的时候，由孙次舟教授在纪念会的演说上公开发表了。孙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是以一位史学家的立场来发表他的新说，也和十几年前胡适发表他的屈原是虚构人物说① 一样，在孙先生本人可能没有什么政治的意义。不幸孙先生的新说，恰好发表在政治逆流激荡的时候，仿佛就和大员们在相呼应的一样，要摧毁这个人民意识的形象，人民文艺的形象，因而便遭受到剧烈的反击。这可以说是孙先生的不幸。今天让我们平心静气的来检讨孙先生新说的根据吧。

原文不在手边，恕我不能作详细的征引，大体上的论证是这样的。在古希腊、罗马凡是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多是奴隶，中国古时也有这种倾向，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

---

① 一九二一年六月，胡适在一次读书会的讲演中提出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的怀疑。后整理成《读〈楚辞〉》一文，收入一九二四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二集一卷。

所戏弄，倡优畜之”。故如汉代的司马相如、东方曼倩之流是文学弄臣，而在秦前如淳于髡是齐之赘婿，宋玉是楚之小臣，和倡优之为弄臣，实在是并无差别。屈原是文学之士，已然逃不脱这样的命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离骚》，把君臣的关系比成男女的关系，而叙述自己的身份时如妇人女子。例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大有搔首弄姿之态。这就足证屈原不仅是一位文学奴隶，而且是楚怀王的一位男妾了。这样的一番偶像破坏实在是相当彻底。假如纯粹出诸感情来加以反讥，实在是不能使孙先生心服，而且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继孙先生之后也就有闻一多的《屈原问题》出现（《中原》杂志二卷二期），闻先生承认孙先生的说法，但加了一个转语，便是屈原诚然是文学弄臣，但他能够革命，所以愈见值得崇敬。这问题似乎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的确，那样崇高的一位革命文学家，他的身份本来是一位弄臣，比起本来是一位贵族的来，似乎更值得尊敬了。不过我嫌这个说法，论证依然不够。

在奴隶社会里面搞文艺的多是奴隶，而不必都是奴隶。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三闾大夫，毕竟和淳于髡、宋玉等不同。问题应该在“蛾眉”与“善淫”这样的字面了。《诗经·卫风》里有“螓首蛾眉”是形容卫庄姜的容貌的，后世辞人便把这样的字面作为了形容女性的专词，但在古时这样的字面还没有这样特殊化的时候，应该可以有更广泛的使用的。女子的眉毛秀丽，就跟蛾子的那样，自然可以称为“蛾眉”；男子的眉毛秀丽，也就跟蛾子的那样，难道就不可以称为“蛾眉”吗？古人质实，

自己美就说自己美，美得怎样就说美得怎样，我们不能因为屈原自述“蛾眉”，便断定他自比女子。善淫的谣诼倒应该和宫廷的女性有关的，特别是那位宠姬郑袖，我倒感觉着她对于屈原这位美男子起过野心，唯因野心不遂，后来才加以反噬。《卜居》① 里面不是透露了这个消息吗？“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这位“妇人”，不应该是泛无所指。因此我感觉着屈原是文学弄臣，甚至是龙阳之说，证据不够。并不是想在这儿替屈原争身份，只想求其真实。假使真是一位文学弄臣，而能怀抱着那样强烈的人民意识，这比本来是贵族的还要难于说明，因为那样的见解是过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

1946年5月24日

① 《楚辞》篇名。东汉王逸注为屈原所作，近世研究者多有怀疑。

“不要把自己的作品偶像化”

到今天还是一件遗憾。去年夏天，我到苏联去，足足呆了五十天，看了好几位诗人的博物馆，还游览了老托尔斯泰的故乡，独有关于高尔基的纪念部署我却没有看过。大约是以为我已经知道得很详细，所以无须乎要我再看的吧。实在是一件憾事。

关于纪念高尔基的部署，我相信，在苏联是无微不至的。前几年我曾经得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送我一套关于高尔基的照片，一共有一百张，所有高尔基的生平、著作、原稿、信札、剧本演出时的舞台面等的资料，大率应有尽有。每张照片都附有详细的说明，可以说是纸上的高尔基博物馆。这些照片可惜我没有带在身边，不然我们可以随时举行一个高尔基资料展览会。苏联对于文化和作家的重视，即此可见一斑，就在这样小的地方似乎都值得我们学习。

我对于高尔基，事实上并没有作过什么深刻的研究。高尔基于我是精神上的维它命。同一的维它命，在生物化学的学者是研究它的属性、本质、构成、效果，而在普通的一般人则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群众》周刊第十一卷第七期。

“不要把自己的作品偶像化”一语，见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

只是享受。我便是高尔基精神的享受者。真是“百姓日用而不知”①，要叫我说出一个所以然，我就是这样一个不识不知的老百姓的态度。

只是有一句话给与我以特别深的铭感，便是“不要把自己的作品偶像化”。我感觉着这句话是可以使我终身受用的。一个人如把自己所作的任何事物偶像化了，那便自尊自大，自我满足，丝毫也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了。高尔基这样教人谦抑，虚己，实在是极可宝贵的修养过程。高尔基自己便实践了他自己的话。他对于自己的有名的剧本《夜店》便表示过不满意；别人虽然称赞它，他甚至说那剧本是含有毒素的。要能够这样严厉地自我批判，也才是高尔基之所以为高尔基。

高尔基是十分敬仰歌德的，时时提说到他的《浮士德》。或许也就是因为《浮士德》中所包含的哲理主要是戒人别自满足吧。浮士德老博士不能满足于现有的一切，尽力追求至善至美。他对恶魔靡非斯特匪勒斯订下的契约是：只要有一刻踌躇满志，他便立地成为恶魔的奴隶；但在没有那个时刻以前，恶魔是侍奉着他的。待浮士德日后移山填海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已经为忧愁吹瞎了眼睛的时候，他在想象中看见人民熙熙攘攘，便漏了声“美呀暂停一刻”。于是，便把自己输给恶魔去了。我看，这应该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作品偶像化”的形象化吧。

要把自己的作品偶像化，那等于瞎了眼睛，归顺恶魔。

1946年5月30日

---

① 语见《易·系辞上》。

教 育 与 学 习

一个月前在生活教育社① 上海分社成立会上，我曾经发表过一点意见，说中国人动不动喜欢教育人。譬如拿政治来说，我们受训便受了十八九年，到今天还没有毕业。我们不仅时时要听听大人先生们的不知所云的训话，而且文化中心的上海人从六月一日起更要受警官老爷们的管制了。所以我根本不喜欢教育这两个字，教育这两个字何不改为学习？生活教育何不改为生活学习？

我这一席话，听说有一些人，自然是爱在政治上教训人的那些人，不大喜欢，在本埠的某报上向我回敬了一下。我不读某报，内容如何不得而知。我只听人说有这样的语句："假如教育要改为学习，那么教育部就要改为学习部了。"这倒是很好的一个提议，我倒非常赞成。不仅教育部应该改为学习部，教育厅、教育局、教务课、训导主任等等都应该改为学习厅、学习局、学习课、学习主任等等，就是那些教育大员、训导大员们其实都是应该改为学生，再去认真学习学习一下的。这有什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① 教育家陶行知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创建的以倡导生活教育理论为宗旨的教育团体。

么稀奇呢？今天的教育部在前清本来叫着学部，今天的训导主任本来叫着监学的，监者鉴也，是看着大家学习的意思。在定取这些名词的当年，思想似乎比今天的还要开明得一点。

人是应该“活到老，学到老”的。天地间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随地都是，随时都是，任何人谁也不敢说在他存世当中便已经学毕了业，除非他是死了。死也是中途退学而已，其他的同学们依然在这座大自然、大宇宙、大社会的学校中不断地学习。我倒很高兴，幸好这学校两个字还没有改成“教育堂”，当然也有一些是改了，改成了“训练所”或“训练班”之类的什么名堂去了。而在这些名堂下边所“训练”的到底是什么，单看它的字面不就可以不必多费唇舌了吗？

假使我更年青一点的话，我一定会这样说：凡是喜欢谈学习的人是多少有些民主气息的人，凡是满口训练、满口教育的人，那差不多就有点法字号的嫌疑。假使我是更年青一点的话，我说得会比这更要没有分寸，要得罪我所敬仰的认真研究教育的专家们的。自然，我是上了年纪了，我依旧知道教育和学习毕竟有些不同。尤其我急于想学习，我也就急于想受教育。我虽然不敢教人，育人，而我是愿受教受育的。但我要特别声明，象今天的训政，我实在不愿再受训，今天的警管，我实在不愿再受管了。我所理解的教育是要人怎么样去学习，当教师的人是把自己学习的经验供学生的参考。这样的教育，事实上也就是帮助学习的工具。学习是主，帮助的工作是辅。这主从的地位是不容颠倒的。然而今天是颠倒了。今天的训导专家是拿着一根铁链子来锁人，靠着一些铁棒子来管人，这

是在训练奴才，训练牛马，训练鹰犬。敬谢不敏，我是想当人的。凡是不愿意取消人的资格的人，应该都是不堪受教。

我们中国的古代也还是有过些聪明的人，譬如我们古人晓得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①。这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学生要敬师，那是为尊重学习的受教者的本份；教师要强迫人敬，在真正做教师的人，我总觉得怕有点难乎为情。我看见今天有好些年纪青青的大学教授，动辄便爱用“我的学生某某”、“我的弟子某某”那样的辞句，道貌岸然，俨若当今孔孟，我总有点替他难乎为情。这种人也可以说是不知学习之艰难吧。帮助别人学习，尽量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人，这是对的，但动不动要拿着“天地君亲”的身份，要人家供在神龛里，这确实是一种毛病。这毛病，在今天的中国更和政治结了缘。在今天的中国是政教合一，君师合一了。看电影也要肃然起敬，我们今天仿佛在过着沙皇时代的俄罗斯人的生活了。然而，我们却是“民国”了三十五年！

>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
>
> ——《孟子》
>
> 导而勿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
> ——《学记》

这些都是我们古人所说过的聪明话。学问之道要求人“自得”，也就是注重学习的意思。不是牵牛鼻，不是骑马背，不是驾骡车，足见得古代的教师确实是有些深通民主精神的

① 语见《孟子·离娄上》。

人。我们的大人先生们事事都在复古，而独于把古代的精华却真的复还古人去了。他们倒安富尊荣，我们做老百姓的人实在吃不消。一切都是颠倒的，民主成为了主民，倒也丝毫不足奇怪。

然而今天我们是要要求民主的。教育的目的是养成自己学习，自由研究，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手来做的这种精神。受教育者固然在不断学习，施教育者也一样要不断学习，不学则无以教。就是教育儿童的人也不断的要学习儿童心理，不是单从书本上去学，而且要在自己所教的儿童身上去学。要明白儿童的兴趣、性能，你才能够开导他，使他“自得”。这实在是一件献身的事业。这样的教师非是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之下得不到保障，这样的教育也得不到保障。因此，我们在要求教育民主化之前，必须要求政治民主化。训政时期还没有过完也不要紧，但不要当局的大人先生们来继续训，而是要我们老百姓来自己训。警管区不撤消也可以，但不要那些连“黑表”也弄成白表的警政大员们来管，而是要我们老百姓自己来警，自己来管。

一切都是外行而又抵拒内行，一切都不肯学习而又不肯让人学习。只是想管教人，厚颜不惭的大施其“训话”。这就是中国的法西斯症的一种表征。虽然还不是对症下药，所谓治本，但也不失为一种治标的手段，我们今天是应该大声疾呼：

“放下管教的鞭子，学习，学习，再学习！”

1946年6月1日，上海警管区制开始
施行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走向人民文艺

文艺在它原始的阶段上是只有着一种形态的，便是由公众所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存的人民文艺。它是人民生活的直接反映，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好恶和一切愿望，用人民的言语，真率地表达出来，同时也就尽了它的领导生活、批判生活、改善生活的能事。它是社会共同的财宝，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宝。任何开化民族的古代文艺或未开化民族的现存文艺，都往往蕴含着无尽藏的美，而有普遍永恒的价值。何以会这样？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文艺的产生最契合于文艺的本质。

人类社会有了分化，文艺因而也有了分化，有专门向上层统治阶级取媚的文艺，有留在下层仍然为人民所享用的文艺。取媚上层者隶于统治阶级的权势之下，攀龙附凤的结果，逐渐被视为了文艺的正统，而蟠踞着支配者的地位，文艺的美名更几几乎为它所独占了。留在下层的，成为了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土俗的东西。然而中国的一部分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这种土俗的东西才是文艺的本流，所谓正统的贵族文艺或庙堂文艺，其实是走入了断港横塘的畸形的赘瘤。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每逢换一次朝代，差不多就有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出现。这新的文艺形式，追溯起来都是起源于民间。朝代的换取者是由民间起来的草莽英雄，故随着新朝新代便有新的民间形式登上庙堂。但和登上了庙堂的人不久便失掉了他的人性一样，登上了庙堂的文不久也就失掉了它的文性。一部二十四史是人民和贵族的斫杀史，一部文艺史也是人民文艺和贵族文艺的斫杀史。但历朝历代留下了贵族文艺的尸骸，而人民和人民文艺却始终是浩浩荡荡的活流。中国的文艺遗产，只有没有脱离人民生活、没有脱离人民言语的那一部分，是永远有价值、有生命的精华。周、秦以来的民间歌谣，五代的词，元代的曲，明、清的小说，这里面正有不少的这种精华的结晶。所谓扬、马、班、张，王、杨、卢、骆，韩、柳、欧、苏，那些上层文人的大部分作品，认真说，实在是糟粕中的糟粕。试问两汉的古赋，六朝的骈俪，唐、宋的古文，在今天究竟有什么光采呢？好些不是和明、清的八股一样，成了无用的长物吗？

人民始终是保卫着文艺的本流的。一部《水浒传》虽然在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是施耐庵，是罗贯中，是他们两人或和其他别人的集体创作，但它的文艺价值和社会价值，没有任何庙堂文艺可以和它比配。人民并不需要作者的官衔和地位，而是需要有滋养的作品和作品中的养分。黍稷稻粱，松杉桧柏，家家都知道保重；奇形怪象的盆栽，那是脱离了正常生活者的慰情聊胜于无的玩品。请你把一个盆栽放在大森林的边沿去赏玩吧，那贫弱相是多么的可怜啊。

今天是人民的世纪，一切价值是应该恢复正流的时候。一

切应该以人民为本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善，便是美，便是真，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恶，便是丑，便是伪。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现时代的青年如有志于文艺，自然是应该写作这样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人民在今天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最迫切的课题。能够把这个课题抓紧，解答，而且解答得详尽周到，那便是为人民所欢迎的东西，也可能就是最伟大的作品。我们时常听见人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新文艺里面还没有够得上称为伟大作品的成绩出现。假如要追求它的主要的原因，那应该就是文艺工作者还没有认真体贴到人民的需要，而给予以满足的供给。这儿正留着一个宏大无垠的处女地，等待文艺青年们来垦辟。

应该怎样来垦辟这个处女地呢？先决的问题是在人民本位的思想的把握，要把封建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肃清，彻内彻外地养成为一个科学的民主的思想的所有者。是什么种子才能生出什么树木，是什么树木才能开出什么花朵，结出什么果实，这是不能够假冒的。蒺藜上生不出蜜橘，蓬蒿上长不出葡萄。在能写作民主文艺作品之前必须首先是民主的人。凡是不合乎民主范畴的一切想法都必须毫不容情的严密的自行纠正，自己不能成为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东西。一切必须于生活实践中求取正当的解决。先驱者在生活实践中提炼出了一种正确的思想，这思想的发生过程分明是生活在先。但在我们后进者则可以根据一种正确的思想以规范生活，这思想的

体验过程是生活在后。譬如先有测量而生地图，这是前一种，依据地图而旅行，这是后一种。依据地图旅行并不是耻辱，要这样才能使地理知识生根，根据自己的体验，使地图上的知识化为自己的知识，还可能补充或修正它。就这样思想与生活交织，成为写作的蓝本。没有生活实践的思想搬弄便是公式主义的八股，没有思想规范的生活描写便是黄色报纸的新闻。思想，生活，写作，应该是三位一体。

封建思想在我们的意识里植根太深，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也浙漫着它的网络，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看法，很轻易地便落在这种网络里而不自觉察。例如我们在喊"文章下乡"，以为这是很前进的民主思想了。然而为什么不喊"上乡"而要喊"下乡"呢？这可见我们还是轻视人民，轻视老百姓的，我们自己是高高乎在上，而老百姓的"乡下人"是低低乎在下的。这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区区小节，但其实这是思想转换上的根本问题。今天我们搞文艺的人是应该诚心诚意向老百姓学习的。假如依然看不起老百姓，那学习从何说起？看不起老百姓的这种旧毛病，要当如医治淋病、梅毒一样，使它彻底断根。或许会有人怀疑，你这样说说也不过学学时髦，什么"向老百姓学习，向老百姓学习"，老百姓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呢？要建筑长江水闸，我们晓得找萨凡奇①；要制造原子弹，我们只得找科学专家，为什么谈到文艺我们偏要"向老百姓学习"？——不错，一点也不错。治水有治水的专

① 作者原注：这是美国的一位专家，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后曾经到中国来过，说要建筑长江水闸，结果只是空水泡。

家，造原子弹有造原子弹的专家，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而老百姓就是生活的专家。我们要表现农人，为什么不向农人学习？我们要表现工人，为什么不向工人学习？农人、工人在工农生活方面比任何博士、硕士、大总统、大主教还要专门，我们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大画家德勒珂罗亚(Delacroix)① 画奔马，在口角上没有画白沫，受了一位马夫的指摘，马夫在熟悉马的生活上便是专家。看不起老百姓的坏习惯，实在是应该痛加针砭的了。我们要向老百姓学习，学习老百姓的言语，把握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以老百姓的好恶为好恶，合于老百姓的要求者我们极端的爱他，反乎老百姓的要求者我们极端的恨他。由这极端的爱写出我们的颂扬，由这极端的憎吼出我们的咒诅。

这样的文艺当然得不到大人先生们的赞赏，但人民会赞赏你们。到了人民真正成了主人的一天，施耐庵和罗贯中会遍地都是。

1946年6月8日于上海

① 德勒珂罗亚(E·Delacroix，1798—1863)，通译德拉克洛瓦，法国画家，浪漫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

诗歌与音乐

自然界中一切的风声雨声，水声涛声，兽声鸟声，甚至如花开花落的声响，都有一定的顿挫抑扬。人在未有言语时所发出的意识浑沌的呼号叫笑，也都是自成天籁。这些应该是最早的音乐或音乐的母型。人到发现了自然音乐中的规律，于是便有音阶与律吕产生，由于音律的合理组成，使音乐更加成长了。

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诗歌对于音乐似乎只是一种分支或者变种。但言语的音律性有限制，而意识的发展性无限制，意识的音乐超越了音律的限制而成长，于是诗与歌便逐渐分离，诗歌与音乐也逐渐分离了。

随着两者的成长与分离，同时更为社会的分化所强迫，诗歌与音乐都错误地走上了权贵奉仕的道路。技巧归诸宫廷，本质留在民间。技巧随着时代的翻新而翻新，本质随着人民的永在而永在。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人民的愿望，始终保持着诗歌与音乐的不断的本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

三十年来人民在呼唤：要把诗歌和音乐各自的本流充沛起来，要把技巧与本质合而为一，要它们整个地奉仕于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感情，成就人民的愿望。经过三十年的辩证的发展，雅与俗，新与旧，外来者与固有者，渐渐到了可以成为新的综合的时候了。人民在要求着新的人民艺术，新的民族形式。

诗歌与音乐要在这新的要求之下平衡地发展，而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要以人民的意识为意识，时代的节奏为节奏。没有意识的节奏不能成为音乐，没有节奏的意识不能成为诗歌。这一对流动的时间艺术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呼吸，并使其它的姊妹艺术在同一的呼吸之下而发展着新的生命。

就这样，我们服从着人民的号召，我们要创生新音乐与新诗歌。新音乐与新诗歌的大合抱，和一切艺术的大合抱，奉献于我们至高无上的主——人民。

1946 年 6 月 9 日于上海

玩火者必自焚

十五天的停战令①包含着十足的火药气，那分明是一纸哀的美顿书，限期十五个二十四小时，以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而已。

在停战令下后，南京将星云集，为的是什么？长江四口岸向外国人开放，为的是什么？美国的海军指挥机构集中青岛，为的是什么？凛凛烈烈的在“接收主权”，坦坦白白的在奉送主权，为的是什么？……

完全是美国的军阀在那儿操纵，是他们想独霸世界，独占市场，弄得我们中国人大祸临头。他还说我们中国人在“自杀”，做起那么一个悲天悯人的慈祥面孔。算了吧，中国人并不都是阿木林。是你在以中国人杀中国人，并不是中国人要“自杀”。

中国如果要做到真正停战，只好希望美国的军阀们觉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周报》第四十一期，原题为《十五天后能和平吗?》。一九四七年收入《天地玄黄》时，题为《毫不乐观》。一九六一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三卷时，改为今题，文字亦略有改动

①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国共两党关于东北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不久即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马歇尔又出面“调停”，双方达成自六月七日起停战十五天的协议。

他们今天所采取的政策，倒是美国人的自杀。日本人是前车之鉴呀！中国人不都是阿木林，不会屈服在任何变相的侵略之下的。

美国军阀如及早觉悟，撤回他们的驻华军队，停止一切助长内战的军事行动，那内战便自然停止了。用不着假慈悲的劝和。中国的内战是美国人放的火，却在那儿装着风凉人，你怕中国人真是阿木林吗？

自然今天也有乐观的人存在，但不要过早的高兴吧，玩火者是会自食其果的。

1946年6月10日

追慕高尔基

高尔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周年了。受着他的伟大精神的感召，我们年年今天都在纪念他，这一方面固然是我们对于这位伟大导师怀着无限的追慕，另一方面也应该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对于我们自己的检阅，看我们把人民本位的思想，人民本位的文艺，究竟体验到了怎样的程度，实践到了怎样的程度。

十年前，高尔基逝世的时候，莫洛托夫的追悼辞里面有着这样的话："列宁以后，高尔基的死对于我们和全人类是最重大的损失。"这话一点也没有过分。高尔基是列宁的亲密友人，而同时又是一位忠实的助手。他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始终以他的文艺才能奉献于人民，奉献于革命的。列宁开创了人民的新世纪，高尔基开创了人民的新文艺。他们在成就的尺度上虽然有广狭的不同，他们的革命精神是一致的。

在苏联在列宁死后有了无数的列宁的学生，巩固着人民本位的革命政权，使苏联成为奠定世界和平的伟大的柱石。在高尔基死后，也有无数高尔基的继承者，培植着人民本位的

本篇系作者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在上海中苏文化协会等八个文化团体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演词，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上海《联合日报》晚刊。

革命文艺，使苏联文艺呈现出百花烂熳的永远的春天。就这样，由于列宁和高尔基的死所遭受到的重大的损失，在苏联是已经得到补偿了。

但是我们中国呢？列宁死后不久便有孙中山的去世，高尔基死后，仅仅四个月便有鲁迅的去世，这在我们是重重的重大损失。这损失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它的补救。人民本位的思想一直在风雨飘摇，人民本位的文艺一直在彷徨歧路。我们今天的确是应该严格地批判自己，督励自己的时候。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年，就是一九一二年，高尔基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孙中山，那里面有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俄国人也希望能够达到你所达到的成就，我们在精神上是兄弟，在尺度上是同志，可是我国政府和它的奴才们，却要使俄国人民站到仇视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去。"① 这句话正表明着高尔基的超越了国界的伟大的爱憎，他超越了国界对于我们的革命表示着无限的爱，而对于他本国的当时的支配者沙皇政府表示着无限的憎。这儿正表现着人民代表的高尔基的本色，人民的利益是没有国界的。可是高尔基的这句话在今天却该我们来说了。

苏联的十月革命比辛亥革命迟了几年，但他们的成功却是真正的成功。孙中山已经替我们说过："十月革命是全人类的救星，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全人类生出了很大的希望。"② 的

① 语见戈宝权译《高尔基致孙中山信》，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海时代出版社版《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特刊》。

② 此系孙中山《致犬养书》中的遍意，原文为"夫赤露者，欧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强权者之大敌也。"

确的，这是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的人民本位社会主义的革命，人类有权利自行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了。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立即解除了对于中国人民的仇视，而以博大的同志爱、兄弟爱，向我们伸出了手来。我们要问在二十几年前对于我们首先自己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放弃租界，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是谁？不是苏联吗？

我们的革命是受着重重的阻挠的。内部有封建军阀的盘踞，外部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一直不容易成功。在二十年前的北伐前后帮助我们建军，帮助我们打倒军阀的，是谁？不是苏联吗？

这一次的抗战初期，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对我们袖手旁观，并且冷眼讥笑，单独和我们缔订互不侵犯条约①，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来帮助我们抗战，最后在东北终于共同作战，把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了的，是谁？不是苏联吗？

苏联对于我们真真是做到了"在精神上是兄弟，在尺度上是同志"的情份的。然而我们对于苏联的回敬是怎样呢？北伐成功后，接着就来一个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一直反了差不多将近十年。现在抗战胜利了，我们又在不断地放出一些莫须有的谣诼，策动着仇苏运动的老戏。有的人又在那儿高呼：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了。应着国际的逆流，有的人跃跃欲试的很想做一个反苏战线上的急先锋。虽然也有少数头脑简单的

---

① 苏联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双方互不侵犯，当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不得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援助。

人一时受了蒙蔽，但我们敢于说：反苏仇苏决不是人民的意志，也决不是孙中山的意志。

人民的心里是雪亮的。究竟谁个是真正的人民的朋友，谁个是口蜜腹剑的伪善者，人民的心里是雪亮的。我们并不愿意仇视任何国度的人民，但也不愿受任何国度的统治阶级的奴役。人民是不可轻侮的，沙皇的暴政不是早被苏联人民推倒了吗？希特勒统治世界的狂梦不是老早化为乌有了吗？谁愿意和人民对敌的人，不管他有怎样大的武力，迟早会步着沙皇和希特勒的后尘。为了使人类减少一次大流血的惨痛，我们诚恳的希望那些怀着妄想的人们早早觉醒，用兄弟爱和同志爱来解决一切的纠纷。

高尔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我们今天应该检阅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坚定我们的对于人民力量的信仰，用我们中国人民的有力的温暖的手，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紧紧地握着。我们要反对任何变相的法西斯蒂的暴政，我们要抵抗任何变相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组织国际的人民阵线，制止战争，巩固世界和平。这些是今天的民主政治的使命，也是今天的人民文艺的使命。

高尔基精神不死！

人民本位的民主思想万岁！

人民本位的人民文艺万岁！

1946年6月19日①

---

① 根据讲演时间和最初发表（未注明写作日期）时间推断，写作日期应早于六月十八日。

“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

“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的时候，应该是抗战期中的最高潮的时期。那个时期是最值得纪念的。然而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那时候也是文化人所集中着的第三厅的全盛时期，蒋介石发了一万五千元的特别费给第三厅，要第三厅负责主持，开一个大规模的纪念大会。大会似乎连续了三天，阳翰笙、张季龙、田寿昌、洪浅哉及其他列列诸兄，集中了精力来从事筹备、布置、推动，的确是纪念得轰轰烈烈的。

一切计划都是三厅同人们拟就的，其中有一项是慰劳献金，在汉口设献金台三座，武昌、汉阳各一座，此外还有几座流动献金台，是利用卡车的装置，向武汉三镇流动劝募的。当这项计划，由我向当时的政治部部长陈诚当面提出的时候，陈诚坚决认为是毫无把握的办法，他要我们中止这项献金的节目。但已经是纪念的前夜，一切计划都已经公布出去，各处的献金台也都已经搭盖好了，要中止实在是不可能的。陈诚于是为了免得一无所获的难看，他批发了一万元交由政治部职员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三十八期。

干训团团员，集体献金以示表率。这用意固然是很周到的。然而等到献金一旦实际开始的时候，一切的情形完全打破了我们的预测。

踊跃啊！踊跃！外币、法币、银货、铜货、汇票、支票、金表、银表、白金戒指、黄金戒指、金耳环、银耳环、金手镯、银手镯、银盾、银杯、银壶、衣履、物品……如象潮水一样涌到献金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街头的流浪儿、乞丐，都尽力的奔走呼号，不仅自己捐献，并劝别人捐献。捐献的数目积少成多，反而是这些所谓下层的民众，在总的数目中占了较大的百分比。总数在一百三十万以上，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实实在在地完全为我们始料所未及。

就经过了这一次的献金运动，便有了慰劳总会① 的组织出现。这个会在抗战初期做了不少的工作。发动有组织性的慰劳团向南北各战场劳军，大规模地自香港采办药品及交通工具，作为慰劳品及送达慰劳品之用，以仅少的费用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对于那些踊跃捐献的同胞们，可以说没有辜负他们的厚谊。

象这样的献金的办法，日后沿以为例，在各种各样的机会由不同的机关不断地进行过，但出于半强迫性质的多，象“七七”第一周年那样的自发性的踊跃，似乎也就没有再见过了。

在这项事件中，我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也认识了人民的认识。好些不相信人民的人，以为人民是不识不知的乌合之

① 即全国慰劳总会，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成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简泰梁负责实际工作。

众，不能有什么了解和作为，那正足以证明事实适得其反。不相信人民的人对于人民的看法，自然也不算错：因为他们所见到的是人民的冷淡和对于他们的不合作。这适足以证明人民是有甚深刻的了解和机敏的作为。

近来我听见从武汉来的朋友说，武汉就跟死了的一样。我并不因此而悲观，武汉之死倒足以证明武汉人民是活着的。

1946年7月1日

比基尼岛上的试验

七月一日，美国军部违反人民的意愿，在比基尼珊瑚岛上试验原子炸弹。这一试验毫无疑问是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特别是向苏联人民示威。然而，幸还是不幸，原子弹才是一个纸老虎。投弹的结果，军舰上的山羊还在吃草，毒水里面的条鱼还在游泳，地球不仅没有被劈成两半，就是要吃一个面包依然是用我自己的手把它劈成了两半的。英雄们未免失望吧。这一试验或许也算是救了人类。好些原子弹崇拜狂，似乎也可以清醒一下了。

本来是极简单的道理，就有原子弹，原子弹即使是十分凶，为什么一定要拿这个东西来骇人？靠着这个东西想来独霸世界？譬如我们狭路相逢，一位手里拿着马刀，一位没有，有马刀的一位便哼着没有的一位，要他一切得依从他，不然便要把马刀斫下。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看见这样的情景，谁都晓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周报》第四十六期，原题为《皮杜尔与比基尼》。一九六一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三卷时，删去关于皮杜尔的文字，并改为今题。

比基尼岛为马绍尔群岛之一，位于中太平洋。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为美军占领。一九四六年六月起，美国在该岛进行多次原子弹、氢弹试验。

得那就是强盗行为。今天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拿着原子弹去唬骇别人，这不分明也是强盗行为吗？然而头脑昏迷了的杜鲁门，竟称这东西为“神圣的付托”。真是神圣吗？山羊要发笑了！

放下屠刀，是不是立地可以成佛，不敢保证；放下原子弹，那倒毫无疑问，世界便可以立地和平。

连我们中国的内战，认真说也是原子弹在那儿作怪。象林语堂之流，竟盼不得美国人赶快拿一两个原子弹来，投下延安或张家口，炸光那儿不听命的老百姓。那样的狂妄我们姑且不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它的世界政策的分支，而它的世界政策主要是建立在原子弹上的。原子弹鼓励了独霸世界的野心，因而便不能不极力防苏反共。有人说：纳粹德国如果先发明原子弹，希特勒的世界霸业可能成功了。如今原子弹落到了美国手里，于是希特勒未竟之业便传给了美国的野心家。中国人便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受着了美国剩余军火的“救济”，尽管手法如何高妙，骗不了人。把中国人作为美国霸权的防护队，把中国的土地作为美国独占的市场、变相的殖民地，中国人认识得很清楚，是决不会甘心的。如今原子弹的威力骇不了人，还有比原子弹更凶的人民威力，假使美国的野心家们一定要试验的话，也不妨试验试验一下呵。

在三个月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传遍全世界的消息：巴黎有一家广播电台，戏传某日将有原子弹袭击巴黎。于是巴黎人骇死了两个，骇疯了不知道多少，弄得精神病医生忙不过来。和美国野心家的原子弹崇拜狂成对比，这些爱好和平的

巴黎市民却是原子弹恐怖狂。比基尼的试验清醒了美国野心家的崇拜狂，也应该解除了巴黎市民的恐怖狂了。

我们中国人的神经是相当粗大的，向来不害怕什么原子弹。不过也有少数的崇拜狂存在，经过比基尼的试验，他们的失望恐怕比美国野心家还要厉害吧。想起了聪明的老舍先生。前几天，在比基尼试验之前，报上载他在美国一个关于原子能的集会上的演说。他主张美国一面保持原子弹的秘密，一面同苏联谈，要这样苏联才肯谈。苏联是现实主义者，假使原子弹的秘密公开了，那苏联便不会谈了。这有点不象聪明的老舍所说的话。但也有的朋友说，这正是老舍所会说的话。我自己依然保留着这个判断，我相信老舍先生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不过，假使老舍先生真是说过这样的话，那我真要替他同情，恐怕他目前不仅在失望，而且在失悔了。

不认识人民力量的人是没有自信力的。这种人必然要求神拜佛，唯他力是愿。信仰原子弹，在我看来，和向着猪神叩头的图腾主义，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别。

1946年7月10日

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

《大公报》[1]的大主笔王芸生[2]有一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听说前前后后在重庆、天津、上海三处的《大公报》上发表了三次，而且都是接连发表三天的。我近两年来曾发誓不读《大公报》，王芸生这篇大文在重庆发表的当时，我并没有见到，后来在朋友处经再三劝诱，才算草率地读了一遍。让我先不客气的来说，他那是别有作用的文章，借题发挥，却且借错了题。要说"看法"，也并不"新"，丝毫也没有什么独创性。凡是旧时所是者一律非之，所非者一律是之的那种态度，那本是"五四"前后的启蒙时代的产物，近来的史学成就比它已经进步到不知道多少倍了。因此，朋友们要我写篇批评文字，我敬谢不敏，没有执笔。

最近看到蔡尚思[3]的《评王芸生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周报》第四十六期。

① 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一九二六年九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等接办。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版。

② 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河北静海人。曾先后担任天津《商报》总编辑，天津《大公报》编辑、特派员、主笔，《国闻周报》主编等。

③ 蔡尚思，号中睿，一九〇五年生，福建德化人。历史学家。著有《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中国文化史要论》等。

报》四十二期）和周振甫① 的《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看法》（《文汇报·史地》七月九日），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从友人处把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的上海《大公报》借了来，过细地又把原文读了一遍。

蔡、周二先生是以纯粹史学家的立场对原文作严正的批评，原文的纰缪处在大体上也的确得到了适当的纠正。但是王芸生的这篇文章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性论文，他写出的“用意”并不是真的想向史学界提出一个新历史观，而事实上是在历史批评的外表之下执行他的某种政治任务的。关于这一点，蔡、周二先生似乎都没有觉察到，这应该有加以揭发的必要。

在这儿请让我追述一段过去的新历史。

毛泽东主席有一首调寄《沁园春》的“咏雪”，脍炙人口。反对他的人，赞美他的人，和韵之作布满天下。这首词听说本是毛主席的旧作，作于何时不得而知，但传播了出来的是在去年的双十节前后。那时候毛主席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由延安到了重庆，共策国内的和平，在少数友人间便流传出了这首词。听说在毛主席并没有发表的意思，《新华日报》的副刊上也始终没有看见发表。首先发表了它的是重庆《新民晚报》② 的副刊。经这一发表，于是便洛阳纸贵，不翼而飞了。《新民副

① 周振甫，一九一一年生，浙江平湖人。学者。著有《〈文赋〉译注》、《〈文心雕龙〉选译》等。

② 系《新民报》晚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由陈铭德、邓季惺等人在南京创刊。曾先后出过南京、重庆、成都、北平等版。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首次发表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第二版副刊，署名毛润之。

刊》的编者系出诸传闻，所记不免有些误字，以讹传讹传遍了中国。我在柳亚子先生的手册上，看见过毛主席所亲笔写出的原文，不妨把它再录在下边：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字下加＊者与世间传本不同。）

就词论词，在专门研究声律的人看来，或许有些地方犯了毛病。然而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可以使一些尚绮丽、竞雕琢的靡靡者流骇得倒退。词的意境，从表面上看，自然是咏雪，但它的骨子似乎是另外一种情况。我没有向毛主席请教过，不知道他的明确的寓意，但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却应该有揣测的自由。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蜡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早迟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

自从《新民晚报》把这首词发表了以后，不久便有一件出

人意外的事出现，在重庆的《大公报》上忽然也把这首词和柳亚子的和词一道发表了。①起初大家都有点惊异，有的朋友以为奇文共欣赏，《大公报》真不愧为"大公"，乐于把好文字传播于世。然而疑团不久就冰释了。解铃还是系铃人，《大公报》那么慷慨地发表了那两首唱和之作的用意，其实是采取的"尸诸市朝"②的办法：先把犯人推出示众，然后再来宣布罪状，加以斩决。在毛、柳唱和发表后不两天，王芸生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皇皇大文便在他自己的报上公布了。请看他在冒头上的这几句话吧：

> 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

这就是"醉翁之意"所在的地方了。然而可惜，王芸生实在借错了题。王芸生把别人的寓意之作认为"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打倒毛泽东自然也就是打倒了共产党。打

---

①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公报》采用剪辑的作法，把《新民报》晚刊上登载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柳亚子的和词一起刊出。

② 语出《论语·宪问》："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倒共产党自然也就护卫了和共产党对立的党系。这偷天换日的本领是多可爱！王芸生在发号施令："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多么响亮呀！然而这儿所响亮着的正是铿铿的戡乱之声！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民主"，他们是迫压"中华民族"的，"小百姓们"赶快"起来"把他打倒！

正是这一手法，乃王芸生的得意之作；所以他才把他的大文来自行四处发表。传单标语的散发，你还会嫌重复吗？宣布罪状的布告，你还会嫌多贴了吗？《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照我以前的拟议，是帝俄时代替沙皇效忠的那些"大公"，但我今天却又感觉着有点两样了。

毛泽东是不是在提倡"复古"，奖励"迷信"，鼓吹"帝王思想"，这些问题要拿出来讨论都觉得有点无聊。王芸生当然也会明白不会有头脑正常的人来和他纠缠这些问题的；所以他也就敢于阔步论坛，单枪独往了。威风是很威风，戳穿了毕竟还是有点象唐吉珂德。

好的，"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那吗我们今天所"兢兢"的是反对所谓"法统"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正统"、"道统"。不要扯淡！在今天什么"正统"、"道统"已经老早不成问题了，我们倒要请勇敢的王芸生来反对一下一般"小百姓们"所反对的什么"法统"，以及什么"军统"、"中统"① 的那些"统"。毛主

① "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之一。主要头目为戴笠，一九三八年正式成立。"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由陈果夫、陈立夫直接控制的特务组织，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成立。

席是反对那些“统”的。反对那些“统”也正是今天的民意，请王芸生和他所主编的《大公报》也来伸张一下民意吧。

手法尽管怎样高妙，在一篇文章里面尽管怎样善于藏头盖面，自圆其说，然而今天已经不是靠着一篇文章取士的时代了。可惜的是，《大公报》的态度一向是维持“法统”的。一面在尽力维持“法统”，一面却在高呼打倒“正统”、“道统”，这就是真正意义的“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了！

除开打倒“正统”、“道统”之外，王芸生的大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意，便是取消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农民革命，更干脆地说，也就是取消革命。你看他很大胆地这样放言：

>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

这断案下得多么大胆！历代的农民革命，在起初时都能顺从民意，只有在革命成功之后，一些领导者才开始背叛人民，这本是极粗浅的历史常识。然而王芸生对于这样的常识，竟根本没有“看”在眼里。“争正统”，“争统治”，简单的两句话便把一切革命运动都取消了。一切都只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家伙在捣乱，假使没有那些家伙，事实上是为寇的家伙，那天下便会是太平无事的。打倒“正统”原来才为的是要打倒“争正统”，“正统”不存，何有乎“争”！“争”如打倒，“正统”永在！故尔王芸生虽然也在骂那些“为王”者，而实际上他是在为“为王”者诛除“为寇”者的。

关于这层意思，他说得很露骨，并没有丝毫的掩饰。

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瑭、刘豫、张邦昌之辈，勾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权，劫夺政柄，以鱼肉人民。

真是义正辞严，把“为寇”者们骂得有声有色。然而“勾结外援”以维持政柄的那些正统派的儿皇帝们，却在王芸生的笔下得到了超度。言外之意是要让人自行领会的，索性替王芸生说穿吧，今天的毛泽东也在“争统治人民的”，假使毛泽东当权，说不定更坏，而且还有“勾结外援”的嫌疑啦！

文章虽然冗长，做得也煞费苦心。打倒“正统”、“道统”是糖衣，取消革命是核心，取消革命也就是维持“法统”，也就是“只许变，不许乱”的《大公报》的一贯的传统。因此，责骂诸葛亮，责骂曾国藩也不外是糖衣，而责骂毛泽东倒是本意。王芸生画龙点睛，他在号召“中国应该拨乱反治了”。这还有什么两样呢？“拨乱”不就是戡乱么？

直直愎愎的说戡乱，我们还可以表示反对的意思，弯弯曲曲的说“拨乱反治”，我们便被卷进云里雾里去了。尽管是借题发挥，而且借错了题，我对于王芸生的手法，依然是佩服的。然而这也就是我宁愿读《扫荡报》① 而不愿读《大公报》的主要原因了。对不住，抱歉抱歉。

1946年7月10日

---

① 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一九三一年创刊于南昌。曾先后出汉口、重庆、南京、上海、桂林、昆明等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改名为《和平日报》。

让李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

我并不是偶像崇拜者，但我今天要把李公朴塑成一尊民主的偶像。他为民主运动而流尽了他最后一珠血。他的精神和民主运动有机地生合了起来，只要人民还存在着的一天，永远会发生着鼓励的作用的。

因而我要向我们中国的雕刻家或画家们建议：假使有人要替李公朴造像，希望不要单造一个李公朴，一定要象圣母像那样，抱一个孩子在怀里，而且要脸贴脸地呈现着十分和亲的神气。

我和李公朴虽然相识得很久，知道他很有才干，是一位直爽的人，但并没有达到心悦诚服的地步。较场口事件以来，他和我更亲密了，每肯到我天官府的寓里来，来时总爱抱着我的小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和他亲脸。

公朴说：他顶欢喜小孩子。

在这儿我把公朴的本质认清楚了。有人如要问民主精神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群众》周刊第十一卷第十二期。

李公朴（1900—1946），江苏扬州人。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应该怎样形象化？我可毫不踌躕，这样地告诉他：象公朴抱着小孩子的那种和亲的态度就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让公朴怀里永远抱着一个孩子吧！他是为中国今后世世代代的孩子们流尽了最后一珠血，也让中国今后世世代代的孩子们因他的献身而无灾无难地成长。

只有法西斯蒂才会相信，李公朴是死了，被他们用美国特种手枪打死了。让他们去向洋记爷爷报功吧，多谢洋记爷爷大老板给了他们美械师，更给了他们美械特务。

我曾经幻想过：让那些抱枪的人也转过心向来抱抱孩子。今天我可知道那完全是妄想了。相信武器万能的人只好让他相信到象墨索里尼一样的最后一刻。

我也曾经幻想过：帝国主义者经过了第二次大战的惨痛，似乎可以变质了，世界似乎可以不流血地走向大同，今天我可遭逢着了血的嘲笑。希特勒毕竟还是活着，他还要活到第二个“柏林”完全被毁灭的一天。

1946年7月15日

悼闻一多

十一日李公朴遭难，十五日闻一多遇害，同在昆明，同是领导民主运动的朋友，同遭美械凶徒的暗杀。这里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白色恐怖的阴谋摆布。下手人看起来好象是疯狂了，但其实只是一二人在暗里发纵指使。那发纵指使者的一二人，象闻一多这样自由主义的学者，竟连同他的长公子一道，都要用卑劣无耻的政治暗杀的手段来谋害，不真是已经到了绝望的绝顶吗？

谁都知道，一多出身于清华大学，是受了美国式的教育的。当他在美国留学的期间，曾经写过很多有规律的新诗，他的成就远超过徐志摩① 的成就。他虽然和创造社发生过关系，他的诗集《红烛》是由我介绍给泰东书局出版，但他从不曾有过左倾的嫌疑。回国以后一直从事于大学教育，诗虽然不再写了，而关于卜辞、金文及先秦文献的研究，成了海内有数的专家。他所走的路，不期然地和我有些类似，但我们的相见，却只有两回。一回是在抗战初期的汉口，一回是在去年七月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一期。

① 徐志摩(1897—1931)，名章垿，初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字志摩，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主要代表作家。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

赴苏联时所路过的昆明。没想出昆明一别便成了永别了。在先秦文献的研究上，一多的成绩是很惊人的。《楚辞校补》得过教育部的二等奖金，读过这部著作的人，谁个不惊叹他的方法的缜密，见解的新颖，收获的丰富，完全是王念孙父子再来？我所见到的，关于《庄子内篇》的校记及若干《诗经》的今译，也无不独具只眼，前无古人。他还有很多的腹稿待写，然而今天却是永远遗失了。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呀！

谁都知道，由于政治的不民主，中国招致了九年的外寇，弄得来几乎亡国。这是国内外所共同承认的事实。爱国的文人学者们不忍坐视国家的沦亡，同时更认识到国难的症结之所在，故起而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变作风，这仅仅是最近两三年来的事。一多之参加了民主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潮流中有良心的学者的爱国行为，难道这就是犯了该死的罪吗？有一部分人的偏见，认为学者文人根本不应该过问政治，然而政治恶化到了今天，连学者文人都不能不起来过问了，这到底应该谁个负责？孙中山所拟议的国民代表大会，连学生都应该有代表参加的，谁个说学者文人们便不该过问政治？而且今天的学者文人们对于政治的要求，只是作为一个民国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权利的保障，要求废弃独裁，废弃一党专政，难道这便行同不轨吗？

谁都知道靠着盟邦的协助，日本投降了，我们幸而免掉了亡国之痛。亡羊补牢，尚未为晚。我们正应该力改前非，及早废弃独裁，废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从事建设，以图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这也正是我们人民今天普遍的要求，国内国外都

是认为合理而且合法的，没有一丝一毫逾越了限度。然而有权责的人却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不仅不依从人民的意愿，反而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在遍地灾荒、漫天贪墨、万民涂炭、百业破产的时候，却偏偏进行着大规模的内战。而镇压人民的反对，竟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不用多说，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都是在这样违背人民的反动机构之下遭受了暗杀的。今天我们看得很明显，凡是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权利的人便应该杀；凡是要求废弃独裁、要求废弃一党专政的便是罪人。有心肝的人们看，今天的中国究竟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是群众便遭美械师剿灭，是个人便遭美械特务暗杀，今天我们也有权利，请美国有心肝的人公平地看一看，看他们给予我们的援助方式，究竟是收到了怎样的效果！

枉然的，用恐怖政策来镇压人民。历史替我们证明，谁也没有成功过！恐怖不属于我们，恐怖是属于执行恐怖政策者的。人民今天已经到了死里求生的时候了，为民请命的李公朴和闻一多是从献身中得到了永生。李公朴遇难的时候，闻一多说：李公朴没有死。闻一多今天又遇难了，我也敢于说：闻一多没有死。死了的是那些失掉了人性、执行恐怖政策的一二人，他们是死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死！

1946年7月17日

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

李公朴死了。闻一多死了。一多的长公子闻立鹤和他的父亲同时遇难，左右两肺各中一弹，大腿被打断一只，已经不能言语，虽然还未接到最后的恶耗，但断然是凶多吉少的。

今天的情形很明白，这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做人的起码条件的人，都不免要遭受这比霍乱还要恶毒的反民主瘟疫的侵袭。

公朴和一多都是受了美国式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公朴是文化批评家，是平民教育家；一多是诗人，是学者，是有数的名教授，然而他们为了为人民争取民主竟不免遭受了这样的惨死。

尤其是闻立鹤，听说是才进大学的一位十八岁的青年，这在国法上是还未成年的人。他显然是为了要护卫他的父亲，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群众》周刊第十一卷第十二期。

林肯(A · Lincoln，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共和党人。他主张废除黑奴制度，领导了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后被南方奴隶主暗杀。　罗斯福(F·D·Roosevelt，1882—1945)，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民主党人。一九四四年破例连任第四届总统。任内实行过一系列新政措施，加强了美国在世界的地位。

却亲眼看见父亲被暗杀，而自己在死亡线上倒下了。

反民主施瘟使者们的幌子，今天是自行揭穿了。他们说：他们在反苏反共，但事实上他们是反民主反人民。更明显的是，要他们才是真正的“反美”派。他们用美械来打死李公朴和闻一多，那等于是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

公朴和一多为人民大众而牺牲，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他们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头，永远领导着争取自由民主的战斗，永远不会死。

我们今天对于公朴和一多的遗族，负了很重大的责任。公朴和一多都是十分清贫的文化人。尤其一多，他的子女多，除垂危的闻立鹤之外，还有两男两女，而他的夫人是患着心脏病的。一多生前，除可怜的一点教授薪金之外，是靠着治印或写字来维持家计的。这些事实，我们希望不要忽略，一定得周密地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来，才能对得住二位人民烈士。

好些朋友们都在说：这样下去会人人自危了。实情是如此，但自危也没有用处。象闻立鹤那样的孝子都要杀，你有什么办法？“何处桃源可避秦”①？今天真是到了这样的实际。化悲愤为力量，把恐怖还给施行恐怖政策者。学习李公朴和闻一多，学习闻立鹤，为了人民，扑灭反民主的法西斯瘟疫！

1946年7月17日

① 语见夏完淳《遇盗自解》诗。

痛失人师

自从我认识陶行知① 以来，我心里隐隐怀着一个疑团。我总觉得陶先生的脸色不大正常，是一种不很健康的表征。但我不曾听见他说过有什么病。到他昨天因脑溢血而突然去世，我才知道他有血压过高的宿症，我的八九年来的疑团也就冰释了。

知道了他有这样的病，更增加了我对于他的敬仰。他向来没有把这样的苦痛告诉过人，而且根本没有把这种苦痛放在眼里，他一直是忍受着这种苦痛，以献身的精神从事着他的事业的。血压高的人，容易兴奋或冲动，但他却丝毫没有那样的倾向。他处事接物，诚恳和易，十分耐烦；说话做文也蕴藉幽默，没有什么火气。这些可以证明，他的修养工夫确实是做到了忘我的地步。

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是二十三日的晚上，他和好些朋友在我寓里谈了很久的话。八点钟，我们又同赴一位朋友的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①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安徽歙县人。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创办生活教育社等。著有《中国教育改造》、《行知诗歌集》等。

邀宴，在十点钟左右我们便分手了。他那时丝毫也没有呈现出什么异状。在分手时，我还半开玩笑地请他保重身体，“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我这样对他说。“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他也半开玩笑地这样回答了。我现在想起来，这“黑榜探花”倒成了事实了，他恰巧是李公朴、闻一多遇刺以来为民主而死的第三名。迟李公朴十五天，迟闻一多十一天，而都同在这七月里面。真真是多事的七月，可诅咒的七月！

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逢。”这话在今天尤其感觉真切。有学问知识的人比较容易找，而有人格修养的人实在是如象凤毛麟角。陶先生就是这凤毛麟角当中的一位出色者，而今天他忽然倒下去了。尽管说陶先生精神不死，但一个人在和一个人不在，究竟是两样；而何况象陶先生那样的人和他那样的工作，实在是不容易找到替手的。我愿和千千万万的受了陶行知的熏陶的年青朋友们同声一哭。

1946年7月26日

读了陶行知最后一封信

今天(七月卅日)在报上得读陶行知给几位朋友的最后一封信，愈加感佩他为青年们设想得怎样周到，并表现得怎样独创。

他在“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①之外加上“达者不恋”，又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加上“美人不能动”，真真是足以使人惊心警目。

肤浅地看，会觉得是蛇足：因为“达者不恋”已经包括在“智者不惑”里面，“美人不能动”已经包括在“富贵不能淫”里面。但在今天陶先生一定要把这色戒特别注意地揭橥出来，正表示着他的苦心婆心。

在敌伪统治时代，敌伪主要的统治手段之一便是利用色情来蛊惑青年。这风气一直到今天都还弥漫着，在上海满坑满谷的黄色刊物便是比什么也还要明显的证明。今天这些刊物，不仅在上海畅销，而且畅销到内地。在表面上虽然也听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上海《文汇报》。

陶行知最后一封信写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

① 语见《论语·宪问》。

在取缔，而实际上是取缔其它正派刊物的幌子，它们在暗默里是受着保护的。

如今是手段多端。有经济封锁，使你移于贫贱。有利禄收买，使你淫于富贵。有政治暗杀，使你屈于威武。有思想统治，使你惑于宣传。而最厉害的恐怕还是有色情引诱，使你动于美貌。一方面是放任你去糜烂，另一方面是有积极性的勾引，这实在是值得我们青年们特别警惕的事。

但我要替陶先生加一些转语。陶先生的教训应该是适用于男女青年的。所谓“美人不能动”的“美人”不该专指女性（古时言“美人”不分男女性别），如果改成“色情”或许会更含蓄一些。又如“达者不恋”也并没有否认正当的恋爱情绪。譬如应当忧而忧，不失为仁者，仁者是“忧以天下”① 的。应当惑而惑，不失为智者，智者是以“不知为不知”② 的。应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勇者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③ 的。那吗应该恋而恋，亦不失为达者，达者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④ 的。可惜陶先生不能再起，我不能把这些意思就正于他了。

1946年7月30日

此文发表后，沪上某报有人撰文，谓“达者不恋”乃不恋栈之谓。这是自作聪明，没有考虑到陶先生写这信的动机，且将“美人不能

① 语见《孟子·梁惠王下》。

② 语见《论语·为政》。

③ 语见《论语·述而》。

④ 语见《易·乾·文言》。

动”一句直视无睹。我也可以自作聪明一下，替聪明人作一点补充：“美人”者何？美国人也。“不恋”者何？不恋爱美国之金元也。如何？

1947年3月15日

记不全的一首陶诗

四五年前在重庆听陶行知讲过一段故事。

在重庆附近的某一个地方办了一个流亡少年的小学校。办学的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故，中途跑了，于是孩子们便自动地把学校护持下去。他们公举了一个能干的来代理校长，共同奔走经费，相互地教管，切切实实地施行了陶行知所主张的小先生制，虽然他们在初并不认识陶先生。

这些小孩子后来也知道了陶行知，便请陶先生到他们学校里去讲话，因而陶先生也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稀奇的学校。他便做了一首诗来称赞他们。诗曰：

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
×××××××，先生不在学如在①。

这第三句我独于记不得了，几次想问陶先生，见了面都忘记了，现在却再没有当面问他的机会了。这诗在陶行知的日记或手编的诗文集里面想来是会有的，或许不至于永远没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二期。

① 作者原注：他这句话是摹仿《论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意思。

补填的机会吧。

不过这诗的第三句并不怎么重要，似乎是说井井有条的意思。假使高兴要替他填补，就照着这个意思，填上不粘不脱的七个字都可以的。故事的重心倒在第二句。

陶先生把这诗写好，送给孩子们，大家都很欢喜；但其中有一位顶小的，大概只有八九岁光景，独于表示不满意。他说第二句不好。这是最重要的一句，陶先生便问他怎么不好。小批评家的理论出来了。

——你这句诗有三点不合事实。“大孩自动教小孩”，大孩自动，小孩就不能够自动吗？大孩教小孩，小孩就没有教大孩吗？假使真只“大孩自动教小孩”，你说“奇怪”，那有什么“奇怪”？

这犀利的批评使大教育家陶先生吃了一大惊，立刻认错，说“对，对，对，应该改正，应该改正。只改一个字就行了”。于是陶先生把“大”字改成了“小”字。——“小孩自动教小孩”，这就获得了小批评家的满足。

陶先生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是很有用意的。那便是在这儿提出了“向小孩学习”的最好的一个例证。

1946年7月30日

这首诗在行知先生的《诗集》中查出了，第三句是“七十二行皆先生”。这是“二十一年十月”做的，题名《自动学校小影》（见《诗集》第一二一页）。集中又有《佘儿岗自动小学三周纪念》一首（第四七五页），写于二十四年九月四日，诗云：“紫金山为笔，青天为纸，乌

云为墨，动手来写字：立大志，求大智，做大事。”当然就是这个“自动学校”了。这学校在南京，我记成重庆，并记成抗战期间的事，那完全是错了的。特此补正。

1947年3月13日

反　反　常

“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这两句话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说起的，已经成为很普遍的民间谚语。前些年辰起，我们开始讨厌这两句话，认为它是把我们中国人教导向自私自利的路上去了。

这两句话诚然值得讨厌，然而今天的世道已经比这种程度的自私自利大有进境了。

今天的世道是怎么样呢？他人的瓦上霜不用说是不管的，在自己的门前扯烂污，并扯到了别人的瓦上去。你如替他打扫了，都好象还伤了他的尊严呢。

象这样反常的世道，如反其道而行之，或许也就可以恢复常道吧。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今天只好做些倒霉的事情。有伤破落户的尊严时也顾不了那么多，总要先把门前的烂污除尽，再清除瓦上的烂污。这样先培养出利它的精神，或许对于世道能有所改革吧。故尔今天该反过来说：

“要人打扫门前雪，先管他人瓦上霜。”

1946年8月2日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板话》及其它

费了一天工夫，一口气读了两本书，这在我是好些年辰以来所没有的事。

这两本书恐怕是在上海所不容易见到的。一本是赵树理①著《李有才板话》，又一本是《解放区短篇创作选》② 第一辑。

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素朴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

《板话》里面只有两篇作品，还有一篇是《小二黑结婚》，两篇都可以说是杰出的短篇。“板话”两个字已经就够有趣了，原来民间形式的顺口调，北方叫着快板，李有才是出口成章的快板诗人。准诗有“诗话”之例，于是乎作者赵树理便创造了“板话”这一个新名词。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先例，似乎也可以写出《马凡陀板话》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一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三卷时，文字略有删节。

①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作家。著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

② 周扬编，收延安文艺整风以后短篇创作两辑，一九四六年东北书店出版发行。

创作选辑里面一共收了十二个短篇，所写的都是实人实事，但比任何传奇的作品实在还要传奇。第一篇是丁玲①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是国内国外所熟悉的我国有数的名作家，但她的这篇作品和其它的十一篇比较起来，在手法上无宁是有逊色的。这正好是一个标准尺度，由此可以知道其它的十一位作家是已经达到了怎样高的水准。

十二篇中我最喜欢的是康濯②的《我的两家房东》，那可以说是达到了完善的地步。邵子南③的《地雷阵》是“板话”式的颂歌。

总之，我最近算阅读了这两本意外令人满意的好书。我愿意把这两本书推荐为抗战以来文艺作品的杰出者。这两本书我希望能够在上海重版，使它们更能够与向隅的读者群接近。

1946年8月9日

---

①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② 康濯(1920—1991)，原名毛季常，湖南湘阴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灾难的明天》、《我的两家房东》等。

③ 邵子南(1916—1955)，原名董尊鑫，字少南，四川资阳人。作家。著有《李勇大摆地雷阵》、《雪岭红星》等。

司徒·司马·司空

近两月来在全国类似清一色的报纸上，常常看见司徒、司马等字样，而且都是头条新闻。我每天清早看到这些字样，所必然联想到的就是司空。这个偶合实在是注定了马歇尔元帅和司徒雷登① 博士这两位和平使者的命运。他们的任务或企图，终归是要落空的，除非美国的对华政策起了什么根本的改变。

中国的现状闹到今天这样，认真说，完全是美国反动派跟我们搞出来的。日本人和我们打仗的前期，美国丝毫也不肯援助我们，而且拚命的和日本人作军火生意，把汽油和废铁卖给它，一转手再拿来打我们。那时候我们呼吁得口干舌燥，美国的当权者曾经是充耳不闻。到了珍珠港事变前后，美国身受了法西斯日本的威胁，然后才决心自卫，企图消灭被日本侵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上海《文萃》周刊第四十六期，署名公孙龙。

① 马歇尔(G·C·Marshall,1880—1959)，美国五星上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假"调处"之名，支持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次年一月回国。　司徒雷登(J·L·Stuart,1876—1962)，生于中国杭州，父母为美国传教士。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九四九年八月离华回国。

略的危险，而同时又为了减少美国人的宝贵生命的牺牲，然后才看中了我们中国人，开始装备我们的军队，准备把中国人作为替死鬼。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国仇要报，那时候倒也是乐得两全其美的。

然而日本鬼子的聪明并不亚于美国，它看见大势已去，便很快的投降了。真是旋乾转坤地施行了一番越王勾践政策，这样把自己的实力保存了下来，而对国际的民主团结进行离间。这一阴谋收到了辉煌的成功。日本军部在中国的支配地位禅让了给美国军部。从此美苏之间的联合生了裂痕，而中国内部的团结也随着破裂了。今天我们还在审判日本战犯，其实那些现代勾践们在他们的心里倒正在暗暗窃笑。他们在心里无疑地是在这样说："哼，看嘛！看究竟是谁在审判谁！"你们不要以为东条英机①之流太无耻了，失掉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觍颜做着阶下囚；认真说要他们才可能是太上胜利者呀！

我们被美国装备起来替死的军队，就因为日本人的勾践政策的及早施行，没有用来打击日本，而却担负了新的任务。一般人爱说，我们中国人在打内战，其实目前的战争已经不是内战，而是外战了。那是美国军部承继了日本军部的未竟之业，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在实行他们的帝国主义性的殖民地开拓。我们一部分中国人真太忠厚了，满心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特别是赫尔利去后马歇尔来，大家认

---

① 东条英机(1884—1948)，日本战犯。一九四一年十月组阁，兼陆相、内相。十二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兼军需相和参谋总长。一九四四年七月下台。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为五星元帅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救星，他真好象跟圣诞老人一样，只是替孩子们带礼物来的和平使者。可怜可悯的忠厚呵，今天是得到了应分的礼物了。

以一位前任美军参谋总长的世界战略家到中国来做特使，而我们竟诚心诚意的相信，他是在努力和平！赫尔利在中国所执行的政策，不正是五星元帅在参谋总长任内所决定的政策吗？这政策一直没有变更过，只是中间经过了莫斯科三外长会议的声明，不便再象赫尔利那样卤莽灭裂地来执行，而须得巧妙地略略改变作风，以掩盖掩盖世界的耳目。于是乎一面派变而为两面派，战略大家马歇尔元帅便来特使和平了。只有太忠厚了的中国人，才一直死心地相信着，期待着，敬仰着，而且失望着。

大家都还在说，马歇尔元帅初来的时候好，后来就变了。真是忠厚之至呵。初期的马歇尔元帅，他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天晓得，他不过是在布置东北的地雷阵罢了。为了需要时间和掩饰，所以才有停战令的颁布，政协会议的召开，整军方案的签定。但停战令只限于关内而不及关外，这不就是一个机关么？等地雷阵安好了，地雷手暂时抽身让你们去碰。那一次倒确实有些相当的收获。为了要保持这一收获，并且还需要时间来布置关内的地雷阵，于是又来二十三日的休战。休战满期，还由三人小组而继之以五人会议①。为了掩饰得更加巧妙，最

① 三人小组，指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三人组成的停战机构。由于美、蒋蓄意破坏，此小组于同年六月即停止活动。七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又建议成立“非正式五人小组”，邀集国共两党代表专门讨论改组国府委员的问题。

后还把司徒雷登老博士拉出来替换了魏德迈①大将军。几次冒雨往返庐山，象煞有介事。就在这样的掩饰工作之下，关内的布置更加妥贴了，地雷手又准备抽身了，于是便有八月十日的马、司联合公报，宣告和平谈判的模棱两可的失败。忠厚的中国人于是乎又大失所望。这一失望正是那位战略大家所期待着的东西。因为你如失望，便是证明你相信美国真正在调解和平，那便是他的收获。因此他还可以再等机会，等到必要的时候，又可以登场献技。好多人担心战略大家真的会撒手不管了，笑话，他会那么慷慨吗？更有些人对他作这样的责备："为何不尊重政协决议，而要多玩花样？"他何所爱于你的政协决议？那些在我们虽然是甜蜜的果实，而在战略大家也不过是初期的一个花样而已。

总之，中国的局势闹到目前这样，完全该由美国军人负责，特别是该由那位世界战略大家负责。是他干的好事，害得我们鸡犬不宁。他现在正得意忘形地象奈罗②皇帝一样，欣赏他所放的大火，欣赏他所养畜的狮子在围场中吃人，欣赏他所开创的一个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占领奇迹。你在期望"不流血革命"吗？对不住，他却完成着"不流血占领"。请问，美国人

---

① 魏德迈(A.C.Wedemeyer, 1896—？)，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四年任中国战场美军司令及蒋介石的参谋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一九四七年又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身份到中国和朝鲜"调查"。

② 奈罗(Nero claudins Caesar, 37—68)，通译尼禄，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放荡著称。曾杀死母亲、妻子及老师塞涅卡。公元六十四年，罗马城遭大火，尼禄有唆使纵火嫌疑。后在人民起义中自杀。

究竟流了几珠血？然而大半个中华民国不已经成为了“中华美国”了吗？把你占领了，你还得心悦诚服地喊他“干爸爸”。这手腕真不可一世。你担心他干不过麦克阿瑟①吗？哼，他会笑你的。总之，高明的日本人所没有十分成功的“以华制华”，而在美国反动派手里却似乎弄得相当成功了。你可知道吗？马、司联合声明，正是这一成功的布告啦？

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呼喊“美国撤兵”，真是谈何容易！然而美国兵即使如天之福而撤了，那些脱离了美国国籍的美国飞机、美国军舰、一切陆上的美国配备，究竟算什么呢？有的人也在担心美国会公开支持内战，那可是过虑。为什么要开自己的玩笑，摔掉自己的羊皮？战略大家本来是到了又可以抽身的时候了，然而抽不了身。在这抽不了身的现状下边，可能就是战略大家的悲哀。饱经忧患的中国人上了好些次大当，并没有再给予地雷手以立即抽身的机会。你们请看嘛，地雷的火烧到了自己的眉毛，和平老人又要开始活动了。这次又来一个什么新花样呢？中国人民的要求非常简单，七个字：“不要战争要民主”！你又要还个什么价钱？

老实说，我对于五星元帅从来不曾存过一丝一厘的幻想。在初有些朋友认为我是神经过敏，现在似乎全中国人都快要成为神经过敏了。把全中国弄成为一座疯人病院的时候，那就是和平老人大功告成的一天。是“不流血占领”成功吗？请去

---

① 麦克阿瑟（D·MacArthur，1880—1969），美国五星上将。曾任西点军校校长、陆军参谋长以及驻菲律宾美军司令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盟军西南太平洋地区战争。战后任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

问上帝吧!

1946年8月19日

这篇东西写好了十几天了。初脱稿时,有的朋友①看见,劝我不要发表,因此我也就把它搁置了。

这十几天中新花样毕竟又出现了。美国反动派不顾我们中国人民的反对,又把太平洋上作战用的剩余物资卖给国民党,折价八万万五千万美元。借刀杀人,却还要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榨取七千多块法币。

和这杀人买卖同时,“非正式五人会议”又将成立,要来讨论改组政府的问题了。国、共两党代表各二人,加上一个外国客卿司徒雷登来作“非正式”的主席。

这真有趣。一面火上加油,一面是锦上添花。

但这些花样实际上一点也不新,这本是日本人对付我们的老派头,只是矮鼻子换成了高鼻子而已。

1946年9月2日补记

① 指罗隆基。

关于非正式五人小组

内战的烽火漫天遍野地烧得通红，美国又把太平洋对日作战的剩余物资卖给了政府，折价八万万五千万美元(事实上是二十万万美元以上的物资)，这分明是火上加油，表明着美国政府存心支持中国内战。然而就在这时候又由司徒雷登的建议，要成立"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打算邀集国、共两党的代表来专门讨论改组国府委员的问题了。问题的展开真是有趣，有趣得超越乎逻辑的范围之外。

当然，要改组政府，我们也是很欢迎的，政府老早就应该改组了。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有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不仅限于国府委员，连行政院和地方政权都是包含着的，而且改组后的政府所当遵照的施政纲领，即《和平建国纲领》，也同时得到了协议。这些都已经是七个月以前的事了。在政府未还都以前，也曾密锣紧鼓地酝酿过一番改组的声浪，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国府委员的名额分配上，便碰上了暗礁。我们现在也不妨把这些往事回顾一下吧。

在改组政府的协议里面，第一项所揭出的便是"国民政府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委员名额定为四十人”，至于名额的如何分配，便只有口头协定而未及成文字。四十名委员中，国民党占二十，余二十名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分配。但中共及民主同盟①为了要保持三分之一的否决权，故至少必须有十四个名额。

什么叫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对于政协各项协议不大明了的朋友，或许到现在都还在五里雾中吧。对于这样的朋友，我要向他推荐历史文选社所编选的《政协文献》一书，那里面关于政协的各项协议及讨论等，应有尽有。这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事实上是目前中国的民主法典，是应该人手一篇的。我在这儿只把那有关的一项揭在下边：

> 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决议。某一议案，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解释。

这是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一项极重要的协议。在野的民主力量为了保卫《和平建国纲领》，就保持了这一点点的限制，要变更纲领时，不能象一般议案一样，凭过半数通过，必须有“三分之二之赞成”。四十名的三分之二是二十七名。反过来，如有三分之一的反对便不能成立，四十名的三分之一必须是十四名。这就是三分之一的否决权，也就是中共和民盟所

① 即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爱国民主党派之一。一九四一年成立，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现名。初创时主要领导人为张澜、沈钧儒等。

以要争取十四个委员名额的基本原因。

这一点点的争取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施政纲领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所共同协议的成果，也就是今天由训政走到宪政的新法统，当然是要由大家共同遵守的。假如要变更它，就象普通议案一样凭过半数的多数表决，那吗在国民党方面只须争取得党外一票，便可以随时推翻纲领，结果便使改组政府完全失掉意义。

然而争端却不幸就在这儿发生了。中共和民盟想争取这十四名的三分之一的否决权，而中共与民盟以外的人却不愿中共与民盟取得这项权利。青年党争得最起劲，他至少要和民盟争取同等的名额。无党无派的王云五① 则提出“八·四·四·四”的比例，便是中共八名，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无派各占四名。看来好象很公平，而事实上却是打破了三分之一的否决权，中共与民盟只有十二票。自然也许有人会说：难道除中共与民盟而外谁都不民主了吗？这问题只好让事实来答复。青年党自认是“政府与党”，不必多费唇舌。无党无派的公正性已经被王云五本人便代表干净了，他自己不是等不到协议的改组，而已经先跳进政府里面去了吗？

这些其实本是枝节的问题，假使让我来作公正人的话，问题的解决倒并不费事。我想有两项办法。第一项的办法就照着王云五的“八·四·四·四”的比例也可以，但最好要请第一

① 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中山人。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编辑出版过《四部丛书》、《万有文库》、《王云五大词典》等。一九四六年后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等职。

大党的国民党慷慨一点，由所有的二十名里面让出二名来送给民盟。这样使民盟与中共的要求得到满足，也使民盟六派分配平均。而且这样办是有例可援的，关于国大代表的名额，政府不是让了十名给民盟吗？这项办法如果得不到同意，那吗第二项办法就只好使青年党和无党无派的人稍微委屈一下。民盟的构成照政协会议上政府所发表的名单是分为六个单位的，便是民盟、国社党、救国会、第三党、职教社、村教社①。每一个单位，论道理应该各有一名。青年党原来是民盟的一个单位，天公地道的说也应该只能占一名。剩下的十一名，假使中共委屈一点只要八名的话，那吗无党无派便可能有三名了。这样分配似乎也可以相安无事的——说不定青年党要说话，但他们不是自认为爱国主义者吗？假使做了"与党"，你还要争，你到底是争官做，还是争民主呢？

话又说回头来吧，这些问题老早都成为历史了。自从政府还都以后，政治问题久已不谈，政协据某政府官员说是"不

---

① 国社党，即"中国国家社会党"。一九三一年成立，为首者有张君劢等。一九四六年八月同民主立宪党合并，改名中国民主社会党。　救国会，即"中国人民救国会"，前身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成立于上海，主要负责人有马相伯、沈钧儒等。抗战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　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是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成立的以邓演达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邓被蒋介石杀害后，以章伯钧为首，于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战期间曾以第三党的名称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七年二月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职教社，即"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一七年成立于上海，主要负责人为黄炎培等。抗战期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村教社，即"乡村教育社"。

死亦复不生”(大概是等于活埋了),一切的政协决议都被置诸高阁了。内战由东北打到苏北,由苏北打到热河,由热河似乎又要打到张家口,而后方的政治暗杀和绑票殴打事件几乎没有一日的休息。中国为什么竟闹到了这样?我想,我们的美国盟友们心中有数,应该比我们更明白些吧。我不愿多饶舌,我只感觉在今天来谈国府委员的改组,完全是象在变戏法。戏法或许也可以变出一些结果出来,但那结果你可以相信吗?譬如今天靠司徒雷登或马歇尔的努力,硬使政府让了步,使中共和民盟获得了十四乃至更多的名额,我倒要看中共和民盟的朋友们是不是敢于接受?做官请来做官,好好。内战照旧内战,也好好。中共和民盟假使都是一些官瘾十足的朋友,那中国倒早已就天官赐福了。

不愿多说话,且看究竟又有些什么戏法登场。

1946 年 9 月 3 日

读了《李家庄的变迁》

我又一口气把《李家庄的变迁》读完了。

我感觉着这和《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一样的可爱，而规模确实是更加宏大了。这是一枝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扎根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

当然，大也还并不敢说就怎样伟大，而这树子也并不是豪华高贵的珍奇种属，而是很常见的杉树、桧树，乃至可以劈来当柴烧的青杠树之类，但它不受拘束地成长了起来，确是一点也不矜持，一点也不衒异，大大方方地，十足地，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大约是出于作者自己的意愿吧，书的封面上是有"通俗小说"四个字的标识的。作者存心"通俗"，而确实是做到了。所写的是老百姓自己翻身的事，人物呢连名字也就不雅驯，如象铁锁、冷元、白狗、二妞之类，然而他们正是老老实实的人民英雄。事件的进行，人物的安排，都是妥贴匀称地，一点也不突兀，一点也不冗赘。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上海《文萃》周刊第四十九期。

最成功的是语言。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语，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然而文法却是谨严的，不象旧式的通俗文字，不成章节，而且不容易断句。

章回体的旧形式是被扬弃了。好些写通俗故事的朋友，爱袭用章回体的旧形式，这是值得考虑的。"却说"一起和"且听下回分解"一收，那种平话式的口调已经完全失掉意义固不用说，章回的节目要用两句对仗的文句，更完全是旧式文人的搔首弄姿，那和老百姓的嗜好是百不相干的。我自己小时候读章回小说，根本就不看节目，一遇着正文里面有什么"有诗为证"或四六体① 的文赞之类，便把它跳过了。今天还要来袭用这种体裁，我感觉着等于再在我们头上拖一条辫子，或再叫女同胞们来缠脚。作者破除了这种习气，创出了新的通俗文体，是值得颂扬的事。

作家的通病总怕通俗，旧式的通俗文作者，虽然用白话在写，却要卖弄风雅，插进一些诗词文赞，以表明其本身不俗，和读者的老百姓究竟有距离。"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家虽然推翻了文言，然而欧化倒比文言还要难懂。特别是写理论文字的人，这种毛病尤其深沉，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瞎缠了半天，你竟可以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这种毛病，有时候似乎是明知故犯，似乎是"文化人"、"理论家"、"文艺家"那些架子拿不下来。所以尽管口头在喊"为人民大众服务"，甚至文章的题目

① 文体名。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行文通常以四字句、六字句相互交替，故称。

也是人民大众的什么什么，而所写出来的东西却和人民大众相隔得何止十万八千里！我自己就有这种毛病。我自己痛感着文人的习气实在不容易化除，知行确实是不容易合一。这里有环境作用存在。在大家都在矫揉造作的环境里面，一个人不这样就象有点难乎为情，这就如在长袍短褂的社会里面一个人不好穿短打的一样。

因此我很羡慕作者，他是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也就象一株树子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赵树理，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棵大树子。这样的大树子在自由的天地里面，一定会更加长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会成为参天拔地的大树林子的。作家是这样，作品也会是这样。

或许有人会说我在夸大其辞，我不愿置辩。看惯了庭园花木的人，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也会感觉生疏，或甚至厌恶的。这不单纯是文艺的问题，也不单纯是意识的问题，这要关涉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整个发展。口舌之争有时是多余的；有志者请耐心地多读两遍这样的作品，更耐心地再看三五年后的事实吧。

1946年9月17日

怎样使双十节更值得纪念

双十节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国庆，照道理说，每一个人都应当兴高采烈来迎接着它，然而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样。大家的感情都很淡漠，就拿我自己来说，以往已经过了三十四次的双十节了，我认真欢喜了的却只有两回。请让我先回述这两回的欢喜往情吧。

一回是在民国十五年。那年的双十节日国民革命军在围城一个月之后打进了武昌城。那时候我在汉口工作。就在那一天清早，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我在会场上报告了武昌城内的北洋军队开城迎降的消息，博得了全场的起立欢呼。我记得我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话，我说“双十节成为了四十节，六十节了”！意思自然是说武昌陷落是加倍的喜庆，总工会的成立是三倍的喜庆。喜庆还不断的倍加，同在那天在武昌城内先后并活捉着了当时的湖北省长陈嘉谟和守将刘玉春①，武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民主》周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原题为《怎样使双十节更值得庆幸》。

① 陈嘉谟(1881—1952)，字帆亭，河北任邱人。一九二六年任湖北省军务督办，曾守备贺胜桥抵抗北伐军，后被俘。 刘玉春(1876—1931)，字铁珊，河北玉田人。一九二六年任吴佩孚部属第十二师师长兼湖北省省长，北伐军攻克武昌时被俘。

三镇的人真是欢喜若狂，一直热闹了一个通夜。——这一幕竟如昙花一现地过去了。

第二回是去年的双十节。去年不仅是侥幸获胜的一年，而在双十节那一天国、共两党的《会谈纪要》①发表了，国、共两党在四十天的会议之后，同意结束以前的内争而准备召开党派会议来共商国是，中国更似乎开始走上了和平民主的道路。这的确是一件大事件。一般人欢喜的程度虽然没有十五年的那一次那么热烈，然而在我自己以及多数关心国事的朋友们是诚心地额手庆贺了的。大家的欢喜的程度我们可以从消极的一件偶发事件来证明它。在会谈已经得到结果的十月八日的晚上，适逢其会中共代表团的秘书李少石在汽车上被人枪杀了②。这事在当时很引起了剧烈的悚动。少石是廖仲恺③先生的女婿，很有才干，他这遇难不用说是很大的一项损失，深深值得我们朋侪辈哀悼的。然而他的丧事竟由于《双十会谈纪要》的发表而被冲淡了。八日晚遇难，九日晚验尸④，十日应该发丧，却停发了一日。到了十一日，我们才把他送葬到

① 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经过四十三天谈判后，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

② 李少石（1906—1945），广东番禺人。时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从沙坪坝回办事处途中，因所乘汽车车速过快，撞伤一名国民党军士兵后仍未停车，遭枪击身亡。

③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广东惠阳人。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任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等职。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④ 作者原注：我亲自参加验尸，枪是从背后打进去的，子弹在体内已分裂为五粒，证明是毒弹。

小龙坎的山地。——这一幕悲喜交集的情景，但也如昙花一现地又过去了。

为什么国庆竟不能够使得全国欢庆？理由很简单，便是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辛亥革命在实质上仅仅做到了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而且也还没有彻底。清朝统治的基础，封建社会，根本并未推翻。北洋军阀的专横如故，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如故，人民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文化上，丝毫也没有享到革命的实惠。这教人民怎么能够庆幸呢？今年的国庆是第三十五届了，我要很忠实地说，我更是以近于沉痛的心情来迎接着它。毫无疑问，革命在今天依然没有成功。北洋军阀就在二十年前的北伐之役虽被打倒，然而军阀的灵魂依然存在。经过了八年的苦战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了，然而却换来了一个比日本更加厉害的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在形式上是废除了，然而我们的领海、领空、内陆、内河都彻底开放，我们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甚至教育文化等等，差不多全部都受到了美国的控制，我们在事实上竟成为了“菲律宾第二”了。① 在被日本人控制着的时候，是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局面，而在今天我们却陷落到连想保持“农业中国”的地位而不可得。面粉、棉花、烟草、玉蜀黍、花旗橘子、柠檬、金山苹果，各种罐头食物、奶粉、咖啡、洋糖……都象洪水一样由美国涌来，连我们的原始农业也快要被冲到荡然无存的地

① 菲律宾于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被日本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被美国占领。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菲律宾共和国宣告成立，但美国仍通过一些条约对它加以控制。

步，我们毕竟要闹成为“无业中国”了。三千万人以上的灾民等待着救济，内战的烽火蔓延十五省，多数省份虽幸告丰收，而“谷贱伤农”，竟使丰收成灾，更何况征实征借照旧厉行，食粮化为军粮，农民辛苦经年，等于一无所获。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来纪念国庆，谁个能发出由衷的喜悦呢？我要再说一遍，我自己实在感觉着沉痛。

我们中国为什么竟要闹到这样？这在我实在是难于理会。要说“思想分歧”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无所不包的全国所奉行着的主义。中国国民党是信奉三民主义的政党固不待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实行三民主义的诺言，即在解放区所施行的政策，更无一与三民主义相违背。例如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要实现这种主张便须得进行土地革命。这在国民党训政的二十年间不曾做到，中共在某些地域仅实行了减租减息，在某些地域则因抗战八年中农民代地主向敌伪献纳了租税，战后应由地主偿还，乃用土地折合，算逐渐地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了。在这儿我们只看到奉行有消极与积极的不同，并看不出有什么“思想分歧”的迹象。再拿过去的事实来说吧。要说国、共两党无合作可能吗？民国十五年的北伐之役就是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完成了它的前期的发展。八年间的抗日战争，也是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相终始，虽然这合作是有问题，并不曾达到满意的地步。

我们时常听人说：“中共要以武装夺取政权。”这要作为一种宣传，在宣传者本人固然有他的主观上的自由，但我们由客观的事实来判断，这种说法是不合实际的。中共因有武装而获

得局部实行三民主义的实力，倒是谁也得承认的事实；然而它从不曾“称兵犯顺”，想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无宁是始终愿与国民党合作，以期革命的完成，三民主义的全部实现，使中国切实地走上建国的途径。在去年的《双十会谈纪要》发表之后，继之以今年一月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由国、共两党及其它各党派与无党派的代表协商的结果，所得到的五项协议，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和平建国纲领》，便是无上的证明。这一共九纲五十三目，别有附记七项的施政纲领，在各代表全体同意之下表决了下来，蒋介石在闭幕词中并曾加以称赞，认为“确合时代要求，充满了统一性，充满了民主性，实在是渡到宪政时期的最适宜的纲领”。这个纲领倒不折不扣地应该是今天所当遵循的法统了。为提醒注意起见，我们请把那“总则”四项，抄在下边吧：

一，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二，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三，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四，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

这是整个纲领的精神。在这儿我们一眼可以明了的，便是全国都承认“遵奉三民主义”，并愿受蒋介石的领导。虽然有“党派平等”的规定，而事实上是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比如在四十名国府委员中国民党便占二十名，其它如国大代表和军队编制无一不是国民党占绝对多数的领导地位。这“总则”

和各项协议是在中共代表同意之下决定的，我们根据这，不更可以证明中共有充分的诚意，愿和政府合作吗？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和平建国纲领》的拟定，主要是依据中共所提出的"草案"，我们把那"草案"里面的三项总则也抄在下面吧：

（甲）确认国内各民主党派应实行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国内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

（乙）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丙）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我们请把这两项文献比较一下吧。虽然文字上的详略和次第略有不同，而根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并在实际上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领袖·主义·党——这是近年某位党国要人所说的"佛·法·僧"三宝，而中共都甘愿承认，这样我们还能泰然地说："中共要以武装夺取政权"吗？

征诸往事，国、共合作已经不止一次，而且有成效可睹。考诸中共的主张和政策，则甘愿受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以"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坚决避免内战"，为什么在今天一定非以兵戎相见不可呢？国、共合作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之一，所谓"联俄联共，扶植农工"，"联共"便是国、共合作。有人认为不是"联共"而是"容共"，那倒更好，因为"联"还是尔为尔，我为我，"容"却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准许中共跨党了。不必亲密

到那么地步也可以，为什么终竟不能合作呢？

在我认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可以认为是三个阶段，分别奉行可能成为三个政党，综合奉行便可以联合而为一。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平行的，国、共两党断无不能合作的道理。然而功败垂成，自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来，虽然获得了各项合理的协议，而终竟成了废纸。我也知道这里有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在作祟。美国财阀在大战中发了大财，各大公司的资产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的期间已经增加了一倍，而利润由一九三九年的三十七亿元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一百七十二亿元。美国的好些将军们也在几年之间由偏裨小校便升为了将帅，急性地产生出了一大批军阀。军神、财神相互携手，便把美国领上了今天的道路，到处扩充军事基地，到处开拓商业市场，承继着轴心国未竟之业，想要来独霸世界。这是很明显的，美国已经违背了华盛顿、杰斐孙①、林肯的自由传统，更抛弃了故总统罗斯福的民主航线，她在走着她的危险的道路了。然而，为什么我们今天竟这么轻便地便受了美国财阀和军阀的控制？打倒帝国主义的号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往那儿去了？

究竟要怎样才可以使得双十节更值得庆幸呢？答案也很简单。请恢复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彻底实现他的三民主义，

---

① 华盛顿（G·Washington，1732—1799），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时任十三州起义部队总司令，后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杰斐孙（T·Jefferson，1743—1826），通译杰弗逊，曾参与起草《独立宣言》，一八〇一至一八〇九年任美国总统。

实现以三民主义为准绳的政协决议，永远停止内战，成立民主的宪法和政府，限制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谢绝一切帝国主义性的“援助”。假使我们能够这样切切实实地做去，我相信我们中国依然是可以有为的，革命终必成功，我们总有一天一定会达到独立、自由、富强的境地。到那时候，我相信我们全中国的人民，一定会欢天喜地的来迎接我们年年岁岁的国庆。我愿意看见那样的一天迅速地到来！

1946年9月26日夜

为美国人设想

美国之有强盛的今天，是由和平安定得来，但在一部分的美国领导者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的祖先经过了八年坚苦的建国战争，在自由的天地里树下了独立基础。一百六十年间，除掉了有五年的内战——林肯时代的南北美花旗之战以外，美国一直是在和平安定之下发展了来。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虽都参加了，战祸并没有直接波及到美国，美国的生产无宁是受着了促进，美国的资本家们在两次大战中实际上是发了大财的。和平安定赢来了美国的富强，然而今天的美国的领导者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这种客观条件的恩惠，而染上了希特拉戈培尔辈的夸大妄想狂，把和平安定置换成了人种优越，一切都是美国第一，美国人第一，而梦想着"二十世纪是美国统治的世纪"了。

美国处着优越的地位我们并不否认。美国要领导世界，领导人类，美国也确实是具有着这样的资格。在故总统罗斯福执政的后期，美国是曾经尽到了世界领导者的任务。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的宣扬是怎样的响亮呵！他要使美国成为"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日上海《文汇报》。

主世界的兵工厂”，美国确实是做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确实是得到了美国的军需上的接济而赢得了胜利。全世界的人类那时候都瞻仰着美国。罗斯福逝世时博得了全人类的由衷的哀悼，不就是无上的证明吗？但是世界的不幸，也就是美国的不幸，是罗斯福死得太早了。假使他再迟死得三五年，世界或许不至于被美国少数的野心家闹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吧。

美国今天很明显地是违背了罗斯福的道路。在战争结束了的今天，依然想做“世界的兵工厂”，事实明显地摆在面前，美国是成为了反民主的“世界兵工厂”了。昨天的友人成为敌人，昨天的敌人成为了友人，全人类由长期的战争中还不曾喘息过来，而美国的一部分“军事思想家”和财阀八大家，又在鼓吹着甚至组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违背了罗斯福的道路，竟采取了希特拉的道路，因而美国是丧失了世界领导权。这理由很简单。你是领路的人：你走着正确的道路，自然谁都愿意跟着你走，但你走着错误的道路，谁还愿意跟着你走呢？假如愿意恢复领导权，那就请走回罗斯福的旧路，把美国由“世界的兵工厂”变而为“世界的生产局”。假使那样，我敢于保证，全世界的人类都又会接受美国的领导，就是苏联，她需要美国帮助的地方也很多，也决不会来争取做领路者的光荣的。

今天美国的领导者们或许会这样辩解，“我们所走的路依然是罗斯福的旧路。罗斯福时代是把共和民主两党联合起来了，我们今天也正执行着全国支持下的政策”。不错，在形式上看来是没有什么变更，但在实质上完全是太阿倒持。罗斯福时

代引用共和党人是为减少孤立派的阻碍，以期达到走向世界民主大家庭的顺利进行，而在罗斯福死后的今天，美国政府是成为了孤立派的傀儡，不是领导着别人，而是被别人领导着的。我们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今天看见美国傀儡行径，愈见令人追怀着罗斯福总统的雄才大略。

路既走错，不肯回头，而又要强迫着别人都跟着你们走，这就是横行霸道。你们保持着原子弹的秘密，靠这来实行武力劫持。你们仗恃着金元的充足，靠这来作反动势力的收买与维护。到处扶殖反动政权，到处扩张军事基地，到处摧残人民解放的生机。你们竟至于明目张胆地想把已经击败了的法西斯国家从新扶殖起来，在欧洲企图复兴德国，在亚洲企图复兴日本。这些行径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怀疑美国的领导者们，你们的脑神经细胞究竟健全到了怎样的程度？你们竟至那样健忘吗？第一次大战后，英法的绥靖主义把纳粹德国扶殖了起来，而首先便向英法开刀。① 这教训不是够严酷，而且还很新鲜的吗？珍珠港、硫磺岛、冲绳岛这些地方上的火药味② 应该也还没有散尽吧？然而你们的贝尔纳斯③，你们的麦克阿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对德、意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纵容其对外扩张，以牺牲中欧、东欧一些国家为代价取得与德、意妥协。但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进攻英、法两国。

② 硫磺岛和冲绳岛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的两个岛屿。一九四五年美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先后于三月和六月攻占这两个岛。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美军亦遭受很大伤亡。

③ 贝尔纳斯(J·F·Byrnes, 1879—1972)，美国政治家。一九四五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国务卿。

塞竟泰然豪迈地又准备着去重蹈覆辙了。我今天也敢于预言，假使照着这样下去，欧洲的悲剧必然重演，而在我们东方呢，一旦日本皇军的残余势力被放任到可以信任他们去投原子弹的时候，第一枚原子弹必然投下纽约，第二枚原子弹必然投下华盛顿。日本民族，因为脱离原始畛域不久，他们的复仇观念很强，而忍耐的本领也很大，今天虽然屈服在美国军部的势力下边，极尽了顺从的能事，然而养虎者自贻患，那是毫无疑问的。

到了德国和日本复仇的那一天，我更敢于相信，就是你们的同文同种的英国，也不一定会成为你们的朋友。你们在武力和财力上今天是把英国压倒了，世界霸权从英国人的手里滑到了你们的手里，你们以为英国的领导势力会是甘心的吗？战后你们曾以三十七亿五千万元贷与英国，而逼着她放弃经济上的优先权，凡是金镑势力区金元得通行无阻，这是等于收买英国的经济国防，英国人会是甘心的吗？他们是迫不得已忍受着这样屈辱的条件，他们是企图再起的。在这儿，英国的出色人物邱吉尔和其他的人们，他们开始来导演你们了。照着张伯伦的古典电影剧本，引导你们演出他们在前所演过的悲剧，让你们去多树敌人，特别是和苏联去对立磨擦，①而英国得以暗渡陈仓，恢复她旧时的好梦。你们似乎被玩弄在邱吉尔的股掌之上了。

我们中国目前是受着美国政策的祸害最深的一个国家，

---

① 一九四六年邱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演说，鼓吹英美联盟，对抗苏联，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时期的序幕。

我们的政府正在进行着有史以来空前大规模的内战，而在这内战中所使用的二百几十万人的陆军装备，一千架的飞机，二百几十艘的军舰，统是从美国运来的。今后这些械备的补充，就连一粒子弹，一颗螺丝钉，一滴汽油，也都须得再从美国运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美国人民的膏血，然而运到我们中国来所换得的是什么呢？我敢于说：是人民的仇恨。这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事，但事实是这样。美国的野心家，由财阀与军阀所构成的美式法西斯集团，他们是一团败家子，在浪废一百多年来美国所积蓄的物质财产与精神财产。他们所幻想的独霸世界不仅是一场梦，甚至要想独霸中国市场，照他们所执行的方法，简直是南辕北辙。我倒深切地感觉着，美国人今天所处的境地事实上比我们还要危险，悲剧的末路在等待着他们。然而我们却不希望美国一定要走到这样悲剧的末路。我们相信美国的人民是决不心甘的。美国的明智之士如华莱士、蒲柏尔诸位先生，他们也早就见到了这样的危险，他们正在大声疾呼，图谋挽救。华莱士和蒲柏尔的九月十二日的演说，尤其华莱士八月二十三日致杜鲁门总统的长信，那种远大的见解，我们是完全同意。我们相信，那也一定是真正的美国人民的见解。虽然他遭了美国目前反动派的反对，但他已经向美国人民敲出了醒世的警钟，以美国人民的力量和全世界渴望和平的人民的力量，一定可以和财阀八大家及少数新军阀抗衡，而把美国的危机，全世界的危机，挽救回来的。

苏联也在诚恳地希望美国恢复罗斯福的道路。苏联领袖斯大林先生本月十七日对英国记者约尔特先生所发表的书面

问答，已经表明无遗了。美苏之间，我们早就相信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就如象在大战中靠着美苏的协力赢得了胜利的一样，在目前和今后，靠着美苏的协力，一定可以赢得和平和安定。人民的力量可以转移一切的。今天的局面是人民与反人民的斗争，人民是不能够袖手旁观的了。危害世界和平，危害美国安全的是美国当局的现行政策，美国人民有力量使它改变，即使一时还转变不过来，美国人民也尽可以对于这样的政策怠工。例如美国的对华军事援助如立即停止，则中国的内战便可早见结束，即使执行政策者不肯立即停止，只要美国工人停止运输，没有子弹和汽油的补充，中国的内战也依然会停止下来的。这只是一个例证。我们并不是专想为自己解脱，而同时也是在替美国人民设想。尽管局势恶化到怎样程度，美国人民如能和我们配合，自然是如天之福，如其不能，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也必能得到解救。到那时可怜的倒是美国。比轴心国的破灭还要悲惨的大祸会落在美国人民的头上。那时候倒真是噬脐无及的。

1946 年10月 1 日

鲁迅和我们同在

鲁迅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中国也起了很大的变化。鲁迅所诅咒的法西斯蒂，遭受了很大的打击，鲁迅所颂扬的人民的力量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中国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终竟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当然这胜利在我们有一大部分是侥幸得来，但我们敢于说：凡是崇敬鲁迅的人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尽了至善的努力来赢得的。

毛泽东主席说过："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 这是最有斤两的话。鲁迅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对于反人民的恶势力死不妥协的方向。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今天有资格能够站在鲁迅的面前来向着大家说话，也就是因为我遵照了鲁迅所指示给我的正确方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遭了挫折，我逃亡到日本一直呆了十年。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我终于单身地跑回中国来了。是什么人把我呼唤回来的呢？我要坦白地说是我们的鲁迅先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

① 语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这在我是有诗为证的。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七月二十五日，我乘着一只外国的商船离开日本，快到上海的时候，我在船上曾经做过一首旧诗，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或许还有人记得的吧，我自己是还记得的，我现在想向各位朗诵它一遍。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我在当时的确是把我全部的赤诚倾泻了出来，我是流着眼泪把诗吐出的；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它在我的生命史上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但这诗所用的韵是什么人的韵呢？就是鲁迅的一首旧诗① 的原韵。这的的确确是可以证明我在回国的当时是有鲁迅的精神把我笼罩着的。假如没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假使鲁迅不曾给过我一些鞭挞，我可能永远在日本陷没下去，说不定我今天是会在南京和周作人作伴的吧？

这十年当中，鲁迅的肉体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是始终领导着我们的。他那种实事求是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那种坚忍不拔地向一切反人民的恶势力顽强作战的精神，始终领导着我们，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

① 指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文中“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

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

周作人是堕落了，因为他违背了他。闻一多是进步了，因为他追随了他。闻一多说过："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① 这是把生命拿来做了抵押品的严烈的自我批判，象闻一多正是鲁迅精神的最优秀的继承者。鲁迅精神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领导作用，闻一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指标。

我现在真切地感觉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加倍的警惕，我们到底还是做闻一多，还是做周作人，只在我们的一念之差。周作人固然还活着，但他是活着的吗？闻一多固然是死了，但他是死了的吗？在这对于我们是永远的生和死的关头，就要凭着自己的一念的转移，看我们究竟朝着什么方向走！假使我们实事求是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坚忍不拔地死不妥协地向一切反人民的恶势力顽强战斗到底，那便是鲁迅的信徒，我们便可以走向永生。假使我们是反其道而行，那便是鲁迅的敌人，我们便走向万劫不复的死路。

我们中国的近代史差不多是以十年为一周期的。内战了十年，外战了十年，今后的十年工夫可能是在内外交迫之下的坚苦建设的局面。但我们不应该悲观，无宁是应该加倍的振作起精神来应付我们当前的任务，来缩短人民的痛苦。

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有甘心做牛的精神，然后才有"横眉冷对"的胆量。

---

① 语见《闻一多全集·年谱》。

把我们的一切浮躁、苦闷、侥幸、徬徨的情趣镇定下去，我们要定着心，老老实实地来做水牛或黄牛的工作。虔诚地替老百姓耕田，拉车，出牛奶，服务到死还要把自己的皮、肉、骨头、角、蹄子、心肝五脏都奉献出来，一点也没有保留。

这种做牛的态度也就是鲁迅精神的绝好的象征。我们今天一个人应该要变成两条牛，然后才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

或许会有朋友会说，光是做牛，抵得什么事？老虎当前一下把你吃光了。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老虎是只能够吃孤单的一条牛，而没有胆量干犯一群牛的。就是单独的一条母牛，为了要从虎口中救出她的小牛儿，她终竟把老虎撞死了的故事，各位想来是知道的吧？我们不要把牛的力量轻视了，假如我们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孺子”一样，真是象一条母牛为她自已养的小牛儿诚心诚意地甘愿牺牲的那样，我们自然会有力量把那横暴的老虎撞死！

前途尽管有怎样的艰难，人民终竟是要翻身的！民主必然是要实现的！法西斯蒂必然是要垮台的！——这是历史必然的法则！

我们要七十二行，行行出鲁迅！

鲁迅精神永远和我们同在！

1946年10月18日

世界和平的柱石

今天在世界仍然在动荡当中迎接着苏联十月革命的第二十九届纪念日，在我个人是感觉着这个世界和平的柱石，苏联，真好象中流砥柱一样，丝毫也不显得动荡。

经过四年的爱国战争，苏联人民从法西斯瘟疫的大灾难里，保卫了自己的祖国，拯救了全人类。战争期中对于苏联的颂声，是从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里都扬起着的。战争结束后才仅仅一年多，世界的疮痍并未恢复，而对于苏联的诽谤却又快要聚蚊成雷，淹没一切了。这种反掌炎凉的态度，英国的大人物丘吉尔便是一个绝好的世界典型。昨天自己处在危境的时候，不惜一反生平反苏的主张，屈尊求教，请苏联帮忙；今天危机渡过了，便又翻过脸来，把昨天的盟友当成宿仇。这种站在自私自利立场的人，始终是自私自利的。在我们看来，他好象是反复无常，而在他自己却终始一贯。战争前要反苏是出于自私自利，战争中要亲苏也是出于自私自利，战争后又回到反苏仍然是出于自私自利。

这种的自私自利，自然有一件辉煌的外衣，便是“人各为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其祖国”。丘吉尔们虽然顾不到那么多的国际信义，然而从英国的立场上说来，他应该是公忠体国的一位老成政治家。这种相对的逻辑，我们自然是应该承认的。问题只是在那个“祖国”，究竟是什么人的祖国。资本主义的国家，实质上只是少数资本家、特别是独占资本家的权力机构，这已经是今天的常识，可无须乎多费笔墨的。丘吉尔们所谓的“祖国”就是代表少数大资本家利益的祖国，这利益当中是把丘吉尔的发言权包含着的。

丘吉尔们为什么那样宿命的仇视苏联，在这儿我们可以得到本质的了解。那并不是单纯的国与国对立的问题，而是人民利益与资本家利益对立的问题。苏联是人民本位的国家，一切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机构都为人民所有，在那儿资本家和地主形态的人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陈迹了。人民不仅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在经济上也一律平等，这正是世界上最实在、最彻底的一个民主国家。有的人不了解，以为苏联只有经济的民主而无政治的民主，英、美有政治的民主而无经济的民主。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诡辩。请问：没有经济的民主何来政治的民主？没有钱人的子弟连完全的教育都无法享受，能够享受完全的政治上的权利吗？又请问：既有经济的民主何以不会有政治的民主？或许有人说，那答案很简单，苏联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主要的国政都是被操持在共产党人的手里，而且领袖几乎是终身制，和极权国家的独裁者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一般的人民没有政治上的自由的确证。不错，仅就形式上看来，的确会得出这样不正确的结论，诡辩家们也正把逻

辑的重点放在这些形式上，故尔能够兴波引浪，甚至诬称苏联是极权国家。

要解除这种惘惑，事实上也并不困难。不错，苏联是共产党当权，但苏联的那个政党并不同于英、美的任何政党，也不同于旧轴心国的法西斯党团。苏联的共产党，它就是苏联人民的精华，他们是最彻底地代表苏联人民利益的人，也就是最忠实地为苏联人民服务的能干的仆役。他们当政并不是坐在人民头上去剥削人民，而是鞠躬尽瘁地替人民办事。他们可以说是“能者多劳”，在平时要比一般的人民多受工作上的辛苦，在战时要率先做到成仁取义的模范。苏联的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党，那和其它国家的站在一定阶级上的党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形式上的苏联的一党专政，在事实上也就是苏联的人民亲政。苏联的领袖制也就在这同一意义下可以得到了解。领袖是人民中最能干的人，因此他能获得人民的长远的信赖，而使他长远地为人民服务。这倒接近于古代所说的“哲人政治”①，和个人独裁的极权政治是全不相符的。

总之，事实是最大的雄辩。理论难得纠缠，就请看事实吧。苏联是一百八十九种不同的民族所构成的国家，有四十一种不同的宗教，这样一种成份复杂的国家，革命以来二十九年，经过了多次的内忧外患，极其严酷的考验，然而她团结得一天一天地比金刚石还要坚固。这假如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是怎么也不能理会的事。理由很简单，就是这个国家已经

① 作者在《屈原时代》一文中也提到过，儒家“主张‘有德者必在位’的哲人政治”。

实行了真正的民主，民族有自治的自由，宗教有信仰的自由，一百八十九种民族是苏联的一百八十九种主人。更说得广泛一点，一亿九千三百万人民也就是苏联的一亿九千三百万主人。他们之间，是没有主奴上下之分的。工场和土地已为国家所有，也就是大家所共有。积极地推广科学的知识，扩充理智的作用，而对于宗教信仰乃至一切兄弟民族的奇风异俗都听其自然，让它自生自灭。人民在这样的国度里面便如象在一个大家庭里面一样，人人都以国为家，所以生产起来尽力生产，战争起来拚命战争，才仅仅二十九年工夫便已经获得了惊人的建国成绩。这里有象英国和印度那样的关系吗？没有！有印、回冲突的那样的现象吗？没有！有没有经济恐慌的征候？没有！有没有工人失业、农村破产、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军人跋扈、风俗侈靡的倾向？没有，没有，第三个还是没有！这些都是事实，这些事实应该胜过丘吉尔们的雄辩。丘吉尔们就是不高兴这些事实，害怕这些事实，而要尽力歪曲隐蔽，或甚至抹杀这些事实的。为什么要不高兴，要害怕？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怕人民翻身，怕自己国度里的人民感电。但是，枉然的，人民能够永远不翻身吗？

今天世界上着急的就是丘吉尔之流的大人物。正是他们看见了大批的人民在全世界翻身，因而脚忙手乱地正在抢救他们所代表的大资本家、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时势迫促，竟不惜倒行逆施。全世界便形成了一个战后的大动荡，然而是浪打岩头，并不是岩头打浪，人民本位的苏联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和平的柱石，是并不会动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呀，原子炸弹

呀，取消否决权呀，扩充军事基地呀，乌烟瘴气，黑漆一团。这于苏联不仅是丝毫无损，在两两相形之下反而愈见显示出她的巩固嶒崚。在今天我们应该加紧认识这个和平安定的力量的源泉，这是出于人民。彻底相信人民的力量吧！努力肃清一切反人民的乌烟瘴气！

1946年10月31日

人所豢畜者

狗

我是中国人，很不喜欢狗。这情绪似乎是一种国民的情绪。

请看，“狗东西”，这一骂不是超越了阶级，无分贫富，不问主奴？足见狗即有功，终归无赖。

外国人看狗似乎两样，他们称之为“忠实”。这是站在人类自私的立场。其在我们，则正以其“忠实”，故不足齿数。

中国人亦有自甘为犬马者，但终属自谦之辞。自谦即是认明犬马终属下等。故只闻“犬子”而不闻犬郎之称，遑论犬翁犬母矣。

猫

可惜你太小了。

不然你应该能吃更伟大的老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海《文萃》周刊第二年第八期。

猪

呜呼超然。和光同尘①，有寿者相。

我佛如来苦心修行，困而得之者，而我公则出自天授。

是无我三昧②，是至上涅槃③，玄之又玄，圆之又圆，最后多了一声"呜呼"，有损渊默。

骆驼

昂头天外，意则深矣远矣而忘浅近矣。

可惜不能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兔

我能原谅你，你要那样神经过敏。

我也能原谅你，你是那样的多产作家。

---

① 语出《老子》："和其光，同其尘。"

② 三昧，佛教名词。梵文Samadhi的音译，意即"定"。谓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

③ 涅槃，佛教名词。梵文NiyraNa的音译，意即"灭"。一般指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

鸭

板鸭是鸭子典型的最高的形象化。

这形象虽然出自人为，然而内容终是鸭子。可知内容实决定形式也。

鸡　　公

义务宣传家的末路。

鸡　　婆

过火的贤妻良母主义者。

共夫而不妒，而且还要讲究贞操。

多产而不辞劳，公然还要孵化鹅鸭。

鹅

只有这一点好处——在池塘里面浮着，可以假充白鸟（鸿）。

牛

你的力量大，我佩服你。

你替老百姓服务，我赞美你。

但你的肉为什么要那样好吃？

我等待着你的回答。

马

你的脚据说也是从五个指(趾)头进化来的，而今只剩下一个指头了。

我看只有一条进化的路在等待着你：便是最后的四个指头一齐消灭。



象

是一位极端主义者。一切极端的东西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太长，太大，太厚，太粗，太小，太细，太猛，太驯，太笨，太灵，太不调和而又太调和。

万象一如，是大宇宙，象哉，象哉。

金　鱼

她是不会害羞的。

蛔　虫

我代表我们寄生虫同志发言：

我们共同认为寄生虫这个徽号很可以满足。

蚕　子

说我“作茧自缚”吗？笑话！我是作茧来束缚你们。——蚕蛹在锅里这样说。

蜂

须要知道，甜蜜的家庭是一团团蜡的网子。

臭　虫

我是信仰孔夫子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泛爱众而亲仁①。

① 前二句见《易·艮》，后一句见《论语·学而》。

孔夫子的信仰存在一天，我总存在一天。

孔夫子的声名施及蛮貊①，故如今外国也有我的族类了。

为什么不能说是黄种的光荣呢？

跳　蚤

典型的政客。

才在不流血革命，一下又"失踪"了。

虱　子

我和希特拉是同志。

我知道你们厌恶我，但我不能因你们厌恶而不存在。我倒是最大的洁癖家，我在和污秽作斗争。

什么？我不应该传染瘟疫——斑疹伤寒，培斯脱②？

这只是为了要提高你们的纯种化，不然，你们为什么要拥戴我？

其　它

猎鹰——一九四五年以后的美国人。

① 古族名。《书·武成》："华夏蛮貊"。

② 作者原注：鼠疫，Pest的音译。

火鸡——丘吉尔的塑像。

鸽子——丝毫没有保障的乌托邦。

羊子——为什么要生角？

其它——……

1946年11月21日

纪念邓择生先生

邓择生先生和我的交谊是在北伐的最高潮中缔结的，详细的情形见我所著的《北伐途次》，但那所写的只是在行军中由长沙出发至武昌城攻下的一段，虽然是很重要的一段。

择生小我四岁，现在如他还存世的话，应该是五十一岁了。我和他第一次的见面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日期我可不记忆了。他那时候在担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我在担任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见面的地点就在黄埔军校。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热诚的有朝气有魄力的新人，虽然不免过分矜持了一点。那也实在是难免的。他本来是军人，而他那时候才仅仅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那时给予别人的印象恐怕也是矜持的吧。

第一次见面时说过些什么话，现在丝毫也不记忆了。不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海《中华论坛》半月刊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

邓择生(1895—1931)，原名演达，广东惠阳人。一九二六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发起建立中华革命党(即第三党)。后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后人辑有《邓演达先生遗著》。

久他被调往东江，似乎是任东江分校的职务。在他去东江之前也曾到中山大学参观过，并参观过图书馆。但我们在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深入的接触。

六月中，北伐的气运渐渐成熟了。择生又从东江调回，改充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主任。现在也一样成了故人的孙炳文①兄担任他的秘书长。孙炳文是四川人，要算是我的同乡。在他担任政治部秘书长之前，进行过中山大学的职务，尚未成为事实，政治部便成立了。炳文和择生是留德同学，还有章伯钧②兄也是同样的关系，他们三人的交谊很深。就由于炳文的介绍，伯钧兄曾经接受过中大文学院教授的聘书，也就由炳文的介绍，我和择生的交接更加密切了。

那时政治部是新成立的，而又急于要出发，一切关于组织上的，运动上的，宣传上的各种计划和推进，真是百端待理。而择生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很民主的方式——在那时的广州，一般的工作方式都还相当民主。时常邀集各机关各团体各有经验的个人来开会讨论，并拟定方案。我在那时是被邀的一个，是以个人的资格参加的。同以个人资格参加的，有周恩

① 孙炳文(1885—1927)，四川南溪人。一九二二年赴德留学，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被捕，牺牲于上海。

②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来、恽代英、顾孟余①诸位。有好些计划，大抵是出于恩来之手。因为他是中国政治部工作的开山，他的经验丰富而且头脑致密而迅速，在那时我实在接触着一个奇迹。择生也极端佩服恩来。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力。其实择生的计划性和组织力也是相当优越的，只是病在精力分散，不大细密而已。

后来我率性参加了政治部，主要也是出于炳文兄的怂恿。起先打算只是挂一个“顾问”的空名，随军出发，凑凑热闹，由于炳文兄的积极推动，率性担任了宣传科科长。这事在择生是喜出望外的。政治部成立之后已经有了相当的日期了，而宣传科科长却找不到适当的人，还是虚悬着的。要我做宣传科科长，好些人都以为是委曲，其实在我自己实在是一个冒险的高攀。我对于政治工作在那时毫无经验，而政治工作的中心差不多也就在宣传，以一个外行人来担任这项中心使命，岂不是不度德，不量力吗？然而我是冒险地担任了。

在实际担任工作之前，择生曾到我的寓所里来作过一次谈话。我那时候住在东山龟岗，一座红色洋房子的二楼，他陈述他的欢迎之意。他说，他高兴得到我这样的一个人做他的下属，但他仍然要把我当成“军师”一样敬重。我倒是很惭愧的，我存的倒是一个学习的心事，对于他不会有什么大的帮助。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他也问到我革命成功后

① 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中共中央委员等职。一九三〇年在上海被捕，次年牺牲于南京。　顾孟余（1889—1972），河北宛平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我的见解是，要看国民党怎样来适应人民的要求，假使能够随着时代改进，国民党不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假使不然，那就难说。他那时已经有一个雄心，想在革命的进行中，找寻些可以结合在一道的同志，大约他是准备着把我算成这样人物的一位候补者的吧。

我参加政治部的实际工作，是在政治部快要出发的前三四天，因此我最初的几天还是便衣从戎，当然笔是没有投，而是拿着的。为了怕我嫌官卑职小，在宣传科科长之外还给了我一个行营秘书长的头衔。为了怕我的经验不够，特别破格设了一位副科长来辅佐我。在这些地方正可以看出择生对事的慎重与对人的恳切。

在行军的途中我们是时常在一道，他很关切我，但起初对于我实也不免是一种好奇的尝试。他首先怕我不能吃苦，其次怕我过分外行，但也算还好，靠着我的先天的体魄还顽健，我免除了他第一层的忧虑，靠着帮助我的朋友们的努力，也免除了他的第二项忧虑，后来在武昌围城的时候，他差不多把政治部的事情全部都交托给我代理了。

到了十一月的初头，江西孙传芳①的军队被击溃之后，我便奉命到南昌去独当一面，和择生暂时分开了。我当时已被升任为副主任，在南昌过了四个月的炼狱生活。我在去南昌之前，我对于择生有些不大了解，我总觉得他过分讲“策略”，

---

①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自任闽、浙、苏、皖、赣五省联总司令。一九二六年被北伐军打败后即投靠张作霖。后被刺死于天津。

每每爱把革命拿去迁就事实。但我到了南昌之后，我能够了解他了，我接触了现实的另外一面，而且是强有力的一面。这差不多是一张“铁幕”，要碰会碰得血流，摩摩，也只感觉着顽固而冰冷。我于不知不觉之间也就“策略”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初头，南昌和武昌实际呈出了分裂的局面。那年的元旦，择生和我从庐山回南昌，刚到南昌城遇着第三军的一部分军变，几乎在街头吃了铅弹。大约是三日吧，择生单身回九江，他们从武昌坐来的一只汽艇还靠在九江码头附近，顾孟余在九江等他，他到九江去便一同乘船回武昌，完全是一种逃难的情况。在离开南昌之前，他约我谈过一次话，当然也就是话别。他那时哭了。他认为我已经由尝试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他希望我要特别保重。在当时他明白地认为我们是会“永别”的，但情形的发展却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我后来自然也经过一些冒险我也终于回到了武昌，那是四月里的事。武昌方面正进行着第二次北伐，到河南去和张作霖作战。择生要到河南去督师，在他动身的前日他和伯钧和我曾同乘汽车到汉口郊外的跑马场附近兜风。我们的话，谈到了生活的极琐屑的方面。择生的心脏不强手足每每发冷发麻，但他平常是把这些置诸度外的，他的工作非常勤苦。

我在他去河南之后也曾去过河南，结果是失望而返。河南战役虽然把张作霖打败了，然而损失奇重，而从潼关方面打出来的当时的西北军，并不如所想象的那样的进步。结果是主力损失过剧而武汉的据点也动摇起来了。那是择生最苦闷

的一段时期。我和他同乘火车由郑州回到武汉，沿途苦闷得几乎和我不曾说过一句话。

在武汉我们是同住在汉口黄陂路的一栋房子里面的，他住三楼，我住二楼。对面便是某师长的住宅。在楼上架着机关枪对着我们。择生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整天都不下楼，晨夕只听见他那沉重的脚步声在楼上焦躁地踱来踱去。有一天清早忽然不听见他的脚步声了，我知道他在夜里已经离开。在将近两礼拜之后，他已出国达到安全地点，才由他的秘书交来了一封他留给我的信。我们是从此永别了，以后便再没有和他见过面。那时是一九二七年的六月。

择生喜欢读书，在北伐的途中他读着布哈林① 的《唯物辩证法》的德文译本，始终不断，通读了一遍。他长于演说，也长于文笔，颇具政治家的风度。他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他却不高兴自己带兵。在后期武汉政府时代，他是有可以带兵的机会的，我们劝过他自己领率一军以作为革命的保障，他不肯听从。他说："我才把老虎皮脱掉，又要披上吗?"为着这件事情，我始终替他可惜。

择生很看重农民的力量，当时的政治部的顾问铁罗尼②大约也很影响了他，在行军的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讨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在政治上他的确是具有着预见的，但似

① 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1888—1938)，苏共理论家。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真理报》主编等职。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政治局，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出党，次年被处死。

② 铁罗尼，苏联高加索人。北伐战争时期被派来我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顾问，大革命失败后回国。

乎把革命的障碍估计得过低，而想从“策略”上做工夫以减少障碍，或许是他率直的性格使然吧。他的牺牲实在是一件很大的损失。

择生的墓在南京郊外汤山公路旁的一片荒丘上。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到南京时曾经去凭吊过一次。尔来又十年了，听说墓碑依然无恙。我总有一天要再去凭吊一次，以表达我的诚挚的纪念。

1946年11月24日

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近几年来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这运动还方兴未艾，还没有达到它应该到达的目标，从事这运动的人和团体，有好些都还没有到可以充分公开的程度，因此要来回顾这个运动的整个的史的发展，今天还不是时候。不过关于这个运动的历史，我们是应该注意的，或许已经有朋友在搜集史料吧？运动的范围既相当广，参加的人物非常多，而时间也相当长。假使没有人趁早搜集史料，将来恐怕会要丧失的。最好能够有一个组织，先从地域上收集材料；如重庆、成都、昆明、上海、北平、西安、香港等地，都应该有人负专责来从事进行。假使在中国的民主化走上轨道的一天，便能有一部完整的"民主运动史"问世，那是值得庆幸的事。

说来差不多有点象神话一样了。中国虽然号称为"中华民国"，然而有一个时期连"民主"与"人民"这样的字面都成为了犯禁的东西。远的且不说，就在抗战初期，由南京迁到武汉，由武汉又迁到重庆的那起初的三四年，各地的报章杂志上普遍地看不出"民主"与"人民"这样的字眼。起初是天天听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新加坡新南洋出版社《风下》周刊第五十七期。

“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三位一体的口号，继后便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新三位一体。字面虽然变了，内容根本无别。朕即国家，朕即民族，故朕即至上，此“一个领袖”也。意志集中于我不容“分歧”，此“一个主义”也。力量集中于我，不容“割据”，此“一个政府”也。似乎多了军事胜利的一项，然而此乃对内的军事胜利，非对外的军事胜利也。“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者朕之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者朕之用耳。三位一体，归之于朕，如此而已。

“民主”的字面，是什么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是由什么人的手里，大胆地在近几年内又重新出现了的，差不多是值得考古学家来从事发掘的问题了。拿我自己来说，我在二十六年的十月九日替当时上海的《新闻报》① 写过一篇短文，题名叫《惰力与革命》，是为纪念双十节而写的。在那短文里面，我在尾巴上栽了这么两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建立民主政治的革命精神！促进我们的对于专制惰力的扫荡！”在当时，老实说，连我自己都有点感觉着不合时宜的。在当时大家的目标是在争取抗战，只要抗战了，就不民主一点似乎都可以容忍。这样容忍一下，积习既久，于是“民主”字面便等于进了坟墓。久而久之，连“人民”也不敢说了。在三十一年的二月，我把信陵君与如姬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史剧，叫《虎符》，因为写的是历史的东西，我在里面便用了些赵国的“人民”、魏国的“人民”这样的

①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创办于上海，一九四九年六月改为《新闻日报》，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终刊。

字句。然而在第二年要上演的时候，剧本还须得送审，被审查老爷们把所有的“人民”字面都用朱笔改成了“国民”。“国民”本来是现代的新名词，而且说不定是由日本人开始用起的，竟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信陵君和如姬的口里，我自己实在是感觉着有点啼笑皆非的。顺便带说一下，也是那一次的审查老爷们留下的噱头，他们把我剧本中的“舞台左翼”、“舞台右翼”的字面，都改成了“左边”、“右边”。幸好他们还很客气，没有索性把“左”字都勾掉。

然而民主运动终于发动起来了。主要是在苏德战争发动以后，世界成了民主与法西斯的两个阵营的对立，国外来的大浪助长了国内的潜流，并帮着冲开了些反动的压力，于是才渐渐有“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字面公开出现。前几年，就如秃头的人忌讳人说电灯泡一样，“法西斯”的字面也是禁止公开使用的。夏衍有一个剧本叫《法西斯细菌》，竟连名目也通不过，这是一九四三年的事。更有趣的是，我的剧本《高渐离》，因为没有恭维秦始皇，也遭了禁止，这也是一九四三年的事。这样的事情，会有人以为不象神话吗？然而这神话时代，我也知道是还没有过去的。法西斯依然是今天的电灯泡，而“民主”却早有冒牌的假货出现了。

民主运动的潮流，在南方来说，怕是发源于香港，其次波及到昆明，又其次才到重庆、成都，而泛滥到了全国（我这个溯源或许不大正确）。民主同盟是起了作用的，但因我没有参加民盟，因而关于民盟的历史我不能够有详细的叙述。我自己所参预的只是重庆的一个局部运动，其它各地方的情形，我都知

道得不大详细，就连重庆的一段，认真说，我也有点模糊了。这是由于近年的变化和事件太多，一年的光阴差不多要抵上平静时代的十年百年的岁月。一个大脑表皮贴满了重重叠叠的招贴，实在是不大容易耙梳了。这也就是我希望有一个组织来从事编纂的重要原因。假使再不搞，大家恐怕更要模糊吧。在重庆的一段，我本来是有日记的，但那日记还丢在重庆，没有带来，因此我在目前也只能凭着一些模糊的记忆了。

在重庆，就到了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都还没有十分开展。那时候差不多的集会都是禁止的，即使有集会，要想当众畅所欲言，差不多都有生命的危险。这时还是一个伏流期，座谈会相当多，但都局限在书斋或会客室里。公开的集会值得提起的怕只有七月一日在银社的"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①和十一月七日在青年馆的"苏联十月革命第二十七周年庆祝大会"吧。这两个会之得到开成，前者因为是追悼性质，后者因为是有国际关系的原故。在这两个会上情绪都异常悲壮而热烈。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说了话，把大家的闷气着实透出了一些。但到第二年二月，苏联红军纪念节上本拟定再要我说话时，却遭了无形的禁止。而追悼会性质的东西，在邹韬奋之后，再要为杜重远②举行时，结果是流产了。

① 此处追悼会日期有误。邹韬奋逝世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在重庆举行追悼会的日期是十月一日。

② 杜重远(1897—1943)，辽宁开原(一说吉林怀德)人。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留学日本。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主编《新生》周刊，因《闲话皇帝》事件被国民党政府判刑一年又两个月。一九四三年在新疆学院院长任中被军阀盛世才杀害。著有《狱中杂感》。

一九四四年是中国战局最悲惨的一年，日本人企图打通大陆的交通线以拯救自己的危机，发动了中原大攻势，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在十一月的初头更几乎窜扰到贵阳。当时的重庆完全震动了，甚至有迁都西康或兰州的预定。文化界的朋友们也在准备着上山或作逃难的准备了。在这时候民主运动才稍稍显出头来，成为了半公开性质的东西。

在我自己很值得记述的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夜会。那会本来是为欢迎柳亚子先生而设的，亚子先生刚从桂林逃难来渝，大家为他洗尘，设座于天官府七号文化工作委员会内。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自己的寓所便住在四号。当晚差不多所有的民主人士都到了，最使人喜出望外的是周恩来副主席恰在那天从延安飞来，也来参加了我们的宴会。因此，这“双十一”成为了我们朋侪中的一个难忘的日子。沈衡老有一首诗纪念这件事，我要把它抄在下边。喜幸得很，衡老手写的一张小条幅我是随身带来了。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江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惩獬豸冠。
痛哭狂欢俱未足，河山杂遝试凭栏。

十一月十一日晚，饮沫若先生家。既逾二十日，乘行舆下神仙口，望见南山，忽忆其事。得句，因成一律。

十二月二日记。

这诗的头二句把当年的时局和大家的心境含蕴得非常稳

切，大家愁眉不展甚至焦头烂额地熬了多年，谁还有心情举酒呢？何况冷酷的环境还那么重压着！但那晚上大家实在是尽了兴，又“痛哭”，又“狂欢”，而且还跳了秧歌舞。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这诗在年青的朋友读起来，或许不大能够领会，有些句子是须得加注解的。象“感时惊向域中看”那是由骆宾王①《讨武则天檄》的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毕竟谁家之天下”脱化出来的，当时的“域中”自然还是敌伪的“天下”呵。“新阳”衡老说是指我，因为我的《女神之再生》里面有迎接新鲜的太阳那样的句子，“獬豸冠”是衡老自己说他在做律师。亚子先生和我，对这诗都曾经和韵，亚子先生的诗我不记得了，我的一首现在也不妨录在下边。

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当晚同席的有王若飞同志和他的舅父黄齐生②老先生，他们两位不幸在今年四月八日飞赴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而同时遇难。这不消说是民主运动上的很大的损失，因为在重庆

① 骆宾王（约640—？），浙江义乌人，初唐四杰之一。曾任临海丞。后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作《讨武曌檄》。

② 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一九四六年二月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同年四月八日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黄齐生（1879—1946），贵州安顺人。教育家。历任贵阳达德学校校长，广西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和王若飞等同机遇难。

的民主运动，若飞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但我在这儿提起的是黄齐老也纪念着“双十一”的夜宴，他有一首《沁园春》词可以作为证据。

齐老在参加“双十一”夜宴后，不久便回延安去了，其后在今年三月又由延安来重庆，特别代表延安各界来慰劳二月十日较场口事件中的各位受伤者。事毕返延，于其离渝之前二日的四月六日还到我天官府四号的寓所来辞行，那时他为我写出了他那首词，是为“和亚子”而作。

>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祇解妖娆。　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骄。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

这儿的“郭舍联欢”说的就是“双十一”那晚的事了。但我在这儿要声明，那晚的宴席是设在天官府七号，而不是我的住所四号。但衡老的诗，我自己的诗，齐老先生的词，都说得仿佛是在我的家里，那是因为在席前席后都是在我的家里聚集的。唱秧歌，扭秧歌舞，也是在我家里。我那个“家”说来也真是可怜，那只是被轰炸震得来快要颓圮了的一座破院落的三楼，楼上总共三间房间。但我这丝毫也并不是客气的“蜗居”，却从那时起，差不多成为了经常的民主集会的会场，有时竟有聚集到六七十个人的时候。七号要宽大得多，那是单独的一座

三楼三底的院子，民主人士因为找不到地方开会，便都借用这个地点。有一个时期，除掉委员会的办公室之外，食堂、会客厅、图书室，都成为了半公开的会场。热闹的时候，一天竟有三四种座谈会在同时召开。在重庆，凡是和民主运动有关系的朋友，我相信，没有到过天官府的人，恐怕是没有一个的。

一九四五年是民主运动公开化的一年。敌人的军事行动没有向贵州深入，重庆又得到一个苟安的局面。然而在军事与政治上丝毫也没有改善的倾向，民主运动的潮流终于爆发了。那一二两月间，接连着有各种政团及社团的宣言，差不多一致地要求召开党派会议，并组织联合政府。在民主同盟之外，工商界、妇女界、青年界、文化界，接二连三地都发表了宣言。但就我所知道的，此中恐怕以文化界所发表的一次宣言所起的反应最大。宣言是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有三百七十二个人联名，其中包含了很多素来不过问政治的教授、学者、艺术家。这似乎使当局发生了很大的惊异。在那宣言发表了之后，文化界的人好多受了影响。当局出动了好些大员四处进行反攻，开始是分化签名者，使自行登报声明否认，三百七十二人中有四个人这样做了，这当然不抵事。同时则进行威胁。浙大教授费巩的失踪，就是在这次签名之后不久的事。有好些人因此失了业。“罪大恶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终难幸逃罗网了。这个会在三月二十七日偕同国际人士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罗曼·罗兰追悼会之后，于三十日夜奉命解散了。开会是近因，而签名依然是主因。还有反签名运动，由另外一批“文化人”发表了拥护政府的另外一种“宣言”，起初的目的务

想争取三百七十二人中的多数的人重签，然而这目的却没有达到。这反“宣言”，签名的人很多，据说多不见经传，而且有改头换面地重复了的，真真是岌岌乎殆哉的一场恶战。这里有很多悲喜剧，可惜当时没有人把它纪录下来，不用说在今天已经有黄花之感了。

还须得申述的二月二十二日的文化界宣言，其实并没有敢用“宣言”两个字，而是客客气气模仿了工商界及其它的作风，用着“进言”两个字的。那“进言”在报上都发表过，今天看来当然算不得怎么一回事，然而在当时竟闹得天翻地复。我们借此也可以知道，时局终竟也是有些进步了。这点进步当然是不知道费了多少代价换来的。再须得我们提起的，费巩教授至今都还没有下落！究竟是死了呢？还是活着的呢？这应该是代价中的相当重要的一笔了。

黄齐老的词中所说到的“红岩”是中共办事处在重庆郊外所在地的地名。中共办事处在城内另外有一个地址，是上清寺五十号，这儿也就是“周公馆”。这个地方是中共招待文化界或新闻记者的地方。

同在上清寺，有鲜特生① 的公馆，名叫“特园”，民主人士也时常在那儿聚会。一九四五年的下半年以来竟成为民主同盟的大本营。民盟主席张澜② 就是住在那儿的。“特园”很宽大，位于嘉陵江南岸，眺望甚佳。这儿后来由大家赠与了“民

① 鲜特生(1884—1968)，名英，四川西充人。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党军师长、军参谋长。

②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一九四一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后任主席。

主之家”的徽号，是我写的字，还题了一首诗上去，诗我可记不得了。① 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可惜我们在重庆时没有把这儿所经过的一些事情尽量地纪录出来。

黄词中的“衡门”所指的是沈衡老所住的“良庄”，地在枣子岚垭，和“特园”比较接近。王炳南② 的家也在这儿楼上，小规模的座谈会也每每在这儿召开。地方并不很大，但因为是衡老住的地方，差不多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一九四五年的六月，我到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的二百二十周年的庆祝大会去了。当时是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后不久，情绪是相当悲愤的。有好些朋友认为我一定去不成，但我终于去成了。虽然在上飞机之前，还在九龙坡的飞机场上受了两小时的留难。这一件事情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自由究竟有了怎样的限度。我离开了重庆之后，有好些朋友认为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也很希望我不要回来，但我终于在八月二十日又回到了重庆。这一年在世界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动，纳粹德国被打垮，日本也投降了，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的民主运动不用说是受了很大的鼓励的。就是

---

① 作者原注：这诗近来查出，其辞如下：“嘉陵江头有一叟，银髯长可一尺九。其氏为鲜其名英，全力为民事奔走。以国为家家为国，家集人民之战友。反对封建反法西，打倒独裁打走狗。有堂专为民主开，有酒专为民主寿。如今民主见曙光，民主之家永不朽。”

② 王炳南（1908—1988），陕西三原人。曾留学德国。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时任中共代表团秘书兼驻南京发言人。

前一两年，在纳粹德意志不可一世的时候，认为民主制度已经告寿终正寝的人，现在倒真有点如丧考妣，暂时之间颓然自失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德国会打败而苏联会打胜？怎么英、美竟和苏联联合了起来？苏联也是民主国吗？不管怎样瞠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希望在新疆和德国军事顾问重新握手的将军永远失望了（德国军事顾问从中国撤退时，某将军①在飞机场送别，言在新疆再见）。然而最惊人的一件事体发生在重庆，在九月初头当时的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自去延安把毛泽东迎接了出来。这差不多等于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毛泽东！响彻了山城，也响彻了全中国，全世界。经过了四十几天的周旋，终于在十月十日有《双十国共会谈纪要》发表，召开党派会议并改组联合政府的拟议，在半年前还是犯罪的言论，而终经过政府代表的签字而公布了。这是成为了今年一九四六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张本的。

时局的发展真有惊人的迅速。由事后今年一年间的经过来证明，这发展的前途并不容许人乐观，但在当时，廉价的乐观倒也是谁也没有怀抱过的。就在《双十纪要》发表的前两天，都还出过一件悚动山城的凶事。

那是十月八日的晚上，中共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以汽车由城送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归途在汽车中被人枪杀，当晚在天官府附近的市民医院毙命。这真把全民主人士乃至全山城的人都惊愕了，而在我是尤其出自意外的。少石英文很好，且长

① 作者原注：此人是何应钦。

于诗词，是廖仲恺先生的女婿，为革命受过很久的牢狱之苦，而今天又受了和仲恺先生同样的遭遇。他所乘的汽车而且是我的车子①，这当然更不能不使我无介于怀了。

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谁都推测到有很大的阴谋。因而对于时局，谁都没有盲目的乐观，然而谁也没有盲目的悲观。乐观的前途明明摆在目前，只是山路崎岖，羊肠宛转，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屈折迂回，然后才能达到目的。

1946年12月20日

① 作者原注：毛主席到了重庆，办事处的汽车要由主席使用，因此把我坐的汽车借去了，主要是由周公在使用。据一般的推测，少石的被暗杀是替代了周公。（因一时真相未明，故有此说；后经查明，此说不确。——注释者）

王安石的《明妃曲》

王安石有《明妃曲》二首，这在以王昭君为题材的历代的诗词剧曲中应该是最上乘的作品；作为诗人的王安石，在我看来，这两首乐府也是最足以代表他的。自北宋末年以来，许多人都把王安石当成为“不近人情”的执扭家。这污蔑足足有一千年的岁月，许多人云亦云的人，到现在恐怕都还抱着这样的偏见。这是应该怪宋代，尤其是司马光及程、朱之徒的门户之见，索性把它说穿，其实也就是类似宿命的地主与农民的势不两立的斗争。王安石是站在同情农民的立场，想“摧除兼并”与地主阶级作斗争的人，他是产生得太早了，故尔终于得到了一个悲剧的终局，受人唾骂，已经有一千年了。

《明妃曲》虽然只是两首乐府，但在这儿也引起了阶级意识的斗争。虽然在王安石的作品中是最好的诗，然而却也同样受了地主阶级的奉仕者的非难。我现在且先把他的原诗抄在下边吧：

其　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海《评论报》旬刊第八号。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人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便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　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说无语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砂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两首诗，蔡上翔①的《王荆公年谱》系著于嘉祐四年己亥，时荆公年已三十九。据云名贵一时，欧阳修、刘原父②、司马光皆有和篇。当时王安石还未执政，故尔后来和他成为了死对

---

① 蔡上翔（约1716—1810），金溪（今江西金溪）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著有《王荆公年谱考略》等。

②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著有《新五代史》、《欧阳文忠集》等。　　刘原父（约1008—1069），名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著有《七经小传》、《春秋权衡》等。

头的司马光都还和他讲朋友，足见得王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就在这没有问题的地方，到后来却偏偏有问题出来了。

问题之一，出在第一首的“人生失意无南北”。

> 李雁湖注曰，山谷跋此诗云：“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白）、王右丞（维）并驱争先矣。往岁道出颍阴，得见王深父先生，最承教爱。因语及荆公此诗，庭坚以为辞意深尽，无遗恨矣。深父独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人生失意无南北’，非是。庭坚曰：先生发此德言，可谓极忠厚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安石）未为失也。”

这个问题倒不怎么严重，因为王深父① 已被黄山谷折服了。但其实两人都只是抱着孔夫子这个令牌彼此交了一番绥，即使有胜负，于王安石本人的精神是没有摩触着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是托为家人慰勉之辞，固不用说；然王昭君的家人是秭归的老百姓，这句话倒可以说是表示透了老百姓对于统治阶层的怨恨心理。女儿被征入宫，在老百姓并不以为荣耀，无宁是惨祸，与和番相等的。“南”并不是说南部的整个中国而是指的统治者的宫廷。“北”也并不是指北部的整个匈奴，而是指的匈奴的酋长单于。这些统治阶级蹂躏女性，蹂躏人民，实在是无分东西南北的。这儿正可以看出王安石对于民间心理的了解程度，也可以说就是王安石的精神，同情人民而摧除兼并者的精神。

问题之二出在第二首的“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

① 王深父（1024—1065），名回，北宋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人。著有《文集》二十卷。

心”。这儿发生的问题相当严重,竟牵涉到了汉奸心理。

同样是李雁湖① 的注,引范冲② 对宋高宗说的话:

> 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自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

这责备得真是“辞严义正”。不假思索地骤尔看去,必然会以为就使王安石复生都会瞠然自失。向来替王安石辩护的人,如李雁湖也只好要求缓颊,认为“公语既非,然诗人务一时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以此而责备范冲“傅致亦深”。这不消说是承认了王安石的错误,而以诗人的资格,请求特别原情。

蔡上翔是最同情王安石的人,他所著的《年谱》差不多专门替王安石平反,关于这两句诗也很用了力气来辩护。他把重点放在“恩”字上,以为“恩之为言犹爱幸之辞云耳”。这样把“恩”字冲淡一下,以减缓对汉、胡之左右袒。这是无益的。假使范冲再生决不能心服,他会说,尽管就把“恩”字释为爱幸吧,依然是汉浅胡深,未免外中夏而内夷狄,王安石依然是“禽

---

① 李雁湖(1159—1222),名壁,字季章,号雁湖居士,南宋丹棱(今四川乐山地区)人。著有《雁湖集》等。

② 范冲,字元长,北宋华阳(今四川双流)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曾受命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对王安石变法多所反对。

兽”。

然而照我看来，范冲、李雁湖、蔡上翔，以及其他的人，无论他们是同情王安石也好，诽谤王安石也好，他们都没有懂到王安石那两句诗的深意。大家的毛病是没有懂到那两个“自”字。那是自己的“自”，而不是自然的“自”。“汉恩自浅胡自深”，是说浅就浅他的，深也深他的，我都不管，我只要求的是知心的人。这是深入了王昭君的心中，而道破了她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认为她的心中不仅无恩爱的浅深，而且无地域的胡、汉。她对于胡、汉与深浅，是丝毫也没有措意的。更进一步说，便是汉恩浅吧我也不怨，胡恩深吧我也不恋，这依然是厚于汉而薄于胡的心境。这真是最同情于王昭君的一种想法，那里牵扯得上什么汉奸思想来呢！范冲的“傅致”自然毫无疑问，可惜他并不“深”，而只是浅屑无赖而已。

在这儿，蔡上翔斥责了范冲，倒很正当。他说：“范氏积渐有由来矣。冲为祖禹① 之子。祖禹于元祐中以与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获罪。绍兴时，冲又重修《朱墨史》。冲之诋毁此诗一至此极；亦修怨之一端也。”这很明白，表示着范冲与王安石在思想上是世仇。王安石熙宁变法，主在“拯困穷，锄兼并”，本质上是与地主利益作对，故他遭受了当时乃至后世代表地主利益的士大夫阶级的极端反对。司马光成为了他的死对头，神宗死后，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为相，便全废王

① 即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北宋华阳人。曾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后又修《神宗实录》，反对王安石变法。著有《唐鉴》、《范太史集》等。

安石新法，而恢复旧政。范祖禹是司马光的一党，他和司马光一样要反对王安石，事实上是有阶级意识潜在着的。范冲也是一样。这样的人对于王安石的诗意不能作深切的了解，倒也是丝毫不足怪的。

1946年12月20日夜

冷　与　甘

鲁迅脍炙人口的两句诗：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把鲁迅精神表示得非常圆满。

在今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在演说里面引用了这两句，却把“冷对”误成“忍对”去了。不过当我演说完毕之后，自已立即感觉到了我的错误，和这错误的来源。

接着在我之后是周恩来副主席讲演。恩来也引用了这两句，但他又把“冷对”记成“怒向”去了。这不用说也是错误，而且有趣的是错误的来源也和我的相同。

我们事后关于这个小小的问题讨论过一下，恩来说，他在讲演之前，还向坐在旁边的叶圣陶① 先生问过，圣陶先生也以为是“怒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文萃》周刊第二年第十二、十三期合刊。

① 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字秉臣，江苏苏州人。小说家、教育家。著有《叶圣陶文集》。

我说，我们错误的来源相同。这来源是在什么地方呢？也是鲁迅的另外两句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我从这儿上一句记取了“忍”字，恩来刚从下一句记取了“怒向”两个字。

然而，就由这无心的错误，我们倒似乎把鲁迅精神的一面——反抗的一面，很适当地阐发了。

便是“怒”加“忍”等于鲁迅的“冷”。

但可不要忘记：鲁迅精神还有另外一面，那便是鲁迅的“甘”。这应该是等于“爱”加“诚”的。这儿也可以引证鲁迅的两句诗：

精禽梦觉仍衔石，
斗士诚坚共抗流。①

上一句虽然没有“爱”的字样，但里面正含蓄着无限深沉的“爱”，意思是说：为了“爱”，便明知无望，也不失望。

1946年12月21日

① 语见鲁迅七律《题三义塔》。

峨眉山下

我的故乡是在峨眉山下，离嘉定城有七十五里路。大渡河从西南流来，在峨眉山的第二峰和第三峰之间打了一个大湾，又折而向东北流去。因此我的家所在地，就名叫沙湾。地在山与水之间，太阳是从大渡河的东岸出土，向峨眉山的背后落下去。

山很高，除掉时为浓雾所隐藏，或冬天来很早就戴上雪帽之外，一片青苍，没有多么大的变化。

水流虽然比起上游来已经从群山之中解放了，但依然相当湍激，因此颇有放纵不羁之概；河面相当辽阔，每每有大小的洲屿，戴着新生的杂木。春夏虽然青翠，入了冬季便成为疏落的寒林。水色，除夏季洪水期呈出红色之外，是浓厚的天青。远近的滩声不断地唱和着。

外边去的人每每称赞这儿的风景很好。有山有水，而且规模宏大，胜过江南。论道理是该有它的好处，但不知怎的，我自己并不感觉着它的美。这或许是太习惯了的原故吧？我到十三岁下乐山城读书为止，每天朝夕和它相对，足足十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三卷第六期。

年，怕因此使我生出了感觉上的麻木吧？

真的，就是现在，我对于它也没有留恋。旧时代的思乡情绪，在我是完全枯涸了。或许是不应该，但我不想掩饰。倒是乐山城的风物，多少还有使我留恋的地方，那便是乌尤山附近和那对岸的大坝。其所以使我留恋者倒并不因为故，而是因为新。

我在乐山城住小学、中学，一共住了四年，奇妙的是和城仅隔一衣带水的乌尤山，我却一次也不曾去过。

乐山城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处。虽然王渔洋① 说过“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②，但这所说的应该不是指的城的本身吧。

大渡河和南下的岷江在城的东北隅合流而东行，和城相对的北岸有凌云山、乌尤山、马鞍山，鳞次而立，与西南面的峨眉三峰遥遥相对。在凌云山上有唐代韦皋镇蜀时海通和尚所凿成的与山等高的石佛，临江而坐。山顶又有苏东坡的读书楼。因此这个地方一向便成为骚人墨客所好游的名地。

乌尤山本名乌牛山，以山木葱茏、青翠之极有类于乌，而形则似牛，故名乌牛。一说秦时蜀郡太守李冰所凿离堆即此。它是与岸隔绝了的一座孤耸的岛屿。由乌牛而乌尤，是王渔

---

① 即王士祯(1634—1771)，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代诗人。著有《带经堂集》、《池北偶谈》等。

② 作者原注：乐山县旧为嘉定府的首县，故古时又称嘉州。(“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语出邵博《清音亭记》：“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非滥谀也。”——注释者)

洋使它雅化了的。山上有乌尤寺，有汉代郭舍人注《尔雅》处的尔雅台。论山境的清幽，乌尤实在凌云之上。

奇怪的是我在乐山读书的四年间，正是我十三岁至十六七好游的少年时期，我虽然常常往游凌云，而却不曾去乌尤一次。游乌尤，是在抗战期中回乡，离开了故乡二十六年后的一九三〇年①。凌云是彻底俗化，而且颓废了。石佛化了装，一个面孔被石灰涂补得不成名器。东坡楼住着些散兵游勇。洗砚池是一池的杂草。但乌尤山却给予了我新鲜的感触。毫无疑问，是要感谢我是第一次的来游。

乌尤寺同样带着浓厚的俗气，并不佳妙。但山的本身好，树木好，山道好。尔雅台在危崖头，下临大江，在林深箐密中只能听得下面的滩声，而看不出流水，那也恰到好处。我就喜欢这些。晚间或凌晨，在那山下浮舟，有一种清森的净趣，也很值得玩味。

王渔洋所赏识的应该是这些地方吧？只有这些还使我有些系念。那山对岸的胡家坝，一片空阔也令人有心胸开朗之感。但这情趣也是我在一九四〇年回乐山时才领略了的，学生时代也不曾前去玩味过。

假使要把范围放宽些，乐山城也应该可以说是我的故乡。但不应该得很，我对于它怎么也引不起我的怀乡病了。是我自己的感情枯涸了吗？还是时代使然呢？

峨眉山对我倒还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我虽然在那山下活

---

① 应为一九三九年。

了十几年，但不曾上过山去。因此它的好处，实在我也不知道。专为好奇心所驱遣，如有机会去游游金顶，我倒也并不反对。峨眉山之于我，也仿佛泰山之于我一样了。

1946年12月22日

路边谈话

一 序 言

罗斯福在世时常作“炉边谈话”①，我今仿之，试作《路边谈话》。此为序。

二 烽 火 台

关于对华政策，杜鲁门又作了一次声明。

有位记者在电话中要我发表意见。

我说：对不住，我根本没有读它。

——为什么呢？那记者又问。

——周幽王烽火台上戏诸侯的故事②，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指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三三年就职时向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 因称演说如同家人围炉闲谈一样亲切，故云。

② 西周末年，京城附近设烽火台，遇有敌情时则在台上举火报警，以召诸侯驰援。周幽王为使宠妃褒姒欢悦，屡屡点火作戏，终致诸侯不信，他和褒姒乃被犬戎所杀。

——对了，我明白了，伊索普①也告诉过我们，那是“狼来了”。

三 义务广告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令人可怕，它竟侵略到人们的下意识里来了，它使你不知不觉地受了麻醉，反而替它宣传。

我这所说的并无意指责那些买办者流，我是慨叹于被一般认为属于进步范围内的我们的若干朋友。

不信你们请留心一下那几份比较进步的民间报纸的副刊吧。差不多象竞争着在替好莱坞作“三门治仆欧”②。

四 美 满

突然想到美与满的联文有了新鲜的意义。

美国兵不仅不撤退，而且连眷属都要搬来了。

三百年前满洲人征服了中国的时候，在重要的城市里面有满城驻兵，那些满洲兵都是带家眷的。吁嘻嘻，美哉，满哉！

---

① 即伊索(Aisopos，约前六世纪)，古希腊寓言作家。所编寓言经后人加工成《伊索寓言》传世。

② 作者原注：Sandwich-boy是胸前和背后带着广告牌的人，就象夹肉面包，故名。

五 司芬苦士①

司徒雷登博士近来大谈其“建设”与“破坏”。照他的逻辑推论，似乎孙中山都应该属于破坏者流，而缺少建设性的。他的态度，就和他的汉文姓名一样，使我有点糊涂了。我辨别不清楚：这位老博士到底是美国的驻华大使，还是中国的驻美大使？

六 克 莱 武

十八世纪英国经营印度的殊勋者是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他使英国不曾流血便得到了一个庞大殖民地。这位先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我觉得今天的麦克阿瑟还赶不上他。

但是二十世纪的今天，美国似乎又有一位克莱武了。

七 甘 藷

前一向原子炸弹狂猛烈地宣传，原子弹炸过的地方不生草木。这是多么骇人听闻呀！

然而日本的报上载着这样的消息：广岛经受原子弹炸过的废墟，生出的甘藷(白薯)一个重一贯目(约七斤)。这也是

① 通译斯芬克司。此指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

多么骇人听闻呀！

精神上受了原子弹威胁的人也应该产生出一贯目重的“甘蕗”了。

八 超级海派

在平剧界旧时有京派与海派之分，文艺界近来也有人兢兢于作此区别。有人自标为京派以榜其清高，而斥人为海派以责其庸俗。

其实旧时的所谓京派与海派只是封建地主式与近代买办式之分；而今天的新京派则是超级海派，他们是把地主式与买办式合而为一了。

不信你请试试看，你看今天自命京派的人谁有胆量敢说美国人的屁不是香的？

九 黄豆咖啡

周作人曾自标为京派，而名其斋曰“苦茶”。其所为文确有苦干茶味，虽然并不甚苦。

今之自标京派者流，其为味也有如黄豆咖啡。

十 双料赵高

赵高指鹿为马，但不曾指马为鹿。在他的意识中马固然

还是马。

今之巧于颠倒黑白者，不仅说鹿可能是马，而且说马可能不是马。这就是所谓“理未易明而善未易察”① 的真谛。

这种人我们可以尊称之为——双料赵高。

十一　嘴上有血

既有口谈民主而心想做官者。

扩而充之：凡谈民主者皆想做官者也。

更扩而充之：凡不谈民主者不想做官者也。

更更扩而充之：凡反对民主者反对做官者也。

我虽然是在做官而却反对做官，故我最清高，最杰出，最不同乎流俗。

这是新京派教授② 的又一逻辑。

〔**附注**〕 大学教授亦朝廷命官也，不要忘记。

十二　毒与假

明知道是毒物，除非甘心死，谁也不会服它。但假如把毒性掩藏着，而更装成无毒或甚至可消毒，那便害人不浅。

故尔假比毒更有害。假公正比不公正更有害，假民主比

① 作者原注：这是胡适的话。

② 作者原注：此人指沈从文。

不民主更有害，假调人比侵略者更有害，假和平比战争更有害，克莱武比希特勒更有害……

十三　正　反　合

——闻一多是可佩服的，反闻一多也是可佩服的，而我佩服闻一多也佩服反闻一多，是尤其可佩服的。

这是双料赵高主义者的正反合。

你以为他真在佩服闻一多吗？其实他把闻一多降低了三级。

十四　价值倒逆

是非明晰的时候，赏以为荣，罚以为辱。

是非混淆的时候，赏未必荣，罚未必辱。

是非颠倒的时候，赏以为辱，罚以为荣。

到了价值倒逆的时期也就是革命到来的时期，任何相反的大力也阻止不了。在这时所谓建设正是破坏，而所谓破坏则正是建设。

十五　预　　言

有朋友要我说一九四七年的预言。

我说：我预言我在一九四七年死。

听者哗然。当然以为这是不祥之言了。

其实死就是生，我倒担心我在一九四七年不能死耳。

1946年12月31日

新缪司九神礼赞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文协有一个辞年晚会，我本来决定要去参加的，但把日期记成三十日去了。三十日的清早一看报才知道会已经开过，使我瞠然若失。关于"胜利前后到现在的文艺工作的观感"，好些朋友的宝贵意见，我失掉了听取的机会，实在是非常遗憾。

我自己本来也准备着想发表一些"观感"的，今天我把它写在这儿。

我首先要谴责我自己。在这一年多来，我在文艺工作上的努力实在太差，自己深深地感觉着惭愧。前些时候在《文汇报》的史地栏内，看见一位署名"曰木"的先生批评到我①，说"谁也得承认郭沫若在近年来没有多么大的进步"。我真感谢他，他真是说到了我的短处。认真说，我自己是比谁也先得承认，我近年来实在是没有多么大的进步的。

还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听说一提到我便摇头，因为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文萃》周刊第二年第十四期。

① 曰木，原名苏隽，笔名曰木，一九二八年生，上海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说作者关于焚书坑儒及秦始皇等史论"近年来没有多么大的进步"。

我去年曾经“飞莫斯科”，更成为了他的摇头材料。我看到好些朋友为这事在替我不平，其实是大可以不必的。我要更坦白地说一句，我对于我自己也时常在摇头，而且一定比任何教授摇得厉害。不说一年来毫无成就，就是我一辈子到底又成就了什么，真是可怜得很！幸好我还不敢坐井观天，因为我也到海里去游泳过一下。我知道井外的天地还宽广得多，而在那宽大的天地里面无数的大星小星实在光辉夺目。“飞莫斯科”在我倒也同样是一件遗憾，因为自己的本领太低，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更学进步一点，写些可以见人的东西出来。

我倒也并不想故意自谦，借这个我们东方人所特别夸耀的“谦虚”美德以掩盖自己的怠惰和空虚。确实地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是不屑于自我宣传，但也无须乎自我贬责的。我的努力不够，我得承认，但我也不想宽大到让时代和环境的罪过也要由我来担负。“胜利前后到现在”的这一两年到底是什么时代呢？而我们所处的又是怎样的环境呢？费巩教授的下落至今都还不明，李公朴、闻一多的血还没有干，三千万的饥民应该还没有饿死完，蔓延了十九省的内战每天每月不知道要死几千几万同胞，……只要不是白痴，是谁也认识得清楚！

漂亮的四项诺言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宣读。政协的五项决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手亲自参加过草拟。这些都吹掉了。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捱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① 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

---

①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指使特务、暴徒捣毁《民主报》及《新华日报》营业部，制造了流血事件。

由重庆的五百块钱一斤、到上海的四千块钱一斤的猪肉，我自己的嘴亲自吃过。打风遍天下，六月二十二日下关车站打人民代表①，十二月一日上海围剿摊贩②，不佞也躬逢其盛。在重庆，我看见当局宣布废除了将近五十种的束缚人民权利的法令，到上海我又看见当局宣布了禁止将近五十种的呼吁民主和平的刊物。我看见《消息》被迫停刊，《周报》被迫停刊，《民主》被迫停刊，《群众》、《文萃》不准在街头贩卖，③还未出版的《文群》在胎中遭了禁止。这到底是什么时代，怎样的环境呢？我想这样说，大概总不会过分吧？我想这样说——这是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而且是冰雪满地的岩田。我自己没有住在温室里面，敬谢不敏，实在迸不出芽，扎不起根，还不忙说开花结实。

---

① 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公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六月二十三日，各界五万多人在北火车站召开欢送代表团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晚，请愿代表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受伤。

② 一九四六年八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借口"有碍市容"，禁止黄浦、老闸两区摊贩营业，继而又逮捕摊贩近千人。十一月三十日，摊贩三千余人在黄浦区警察局前请愿，遭军警镇压，死七人，受伤被捕者甚众。次日，摊贩五千余人继续斗争，又遭屠杀。

③ 《消息》，半周刊，一九四六年四月创刊于上海，同年五月停刊。《周报》，一九三七年创刊于上海，出四期停刊；一九四五年九月复刊，次年八月停刊。《民主》，周刊，一九四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次年十月停刊。《群众》，周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创刊于汉口，后在重庆、上海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出香港版，卷期另起，一九四九年九月终刊。《文萃》，周刊，一九四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因遭国民党压迫，一九四七年四月起改名《文萃丛刊》秘密出版，同年六月终刊。

然而我这样说倒也并不是想专心替自己解嘲，而是想提醒自己对于更坚毅倔强的朋友们的认识，就在这样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的雪地冰天，而多数的朋友们仍然在不断地生产。小说方面的骆宾基、路翎、郁茹①，谁个能够否认？诗歌方面的马凡陀、绿原、力扬②，谁个能够否认？戏剧方面的夏衍、陈白尘、吴祖光③，谁个能够否认？批评方面的荃麟、杨晦、舒芜、黄药眠④，谁个能够否认？这些有生力量特别强韧的朋友们，他们不仅不断地在生产，而且所生产出来的成品那样坚强茁壮，经得着冰风雹雨的铲削。这是使我得到无上安慰的地方。我们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中还能有生存的兴趣和精神，就是这些朋友们所给予我们的。

还要请容恕我，关于所谓文艺的范围，我不想把它限制在

---

①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一九一七年生，吉林珲春人。作家。著有《边陲线上》等． 路翎，原名徐嗣兴，一九二三年生，祖籍安徽，生于南京。小说家。著有《财主底儿女们》等。 郁茹，一九二一年生，浙江杭州人。作家。著有《遥远的爱》等。

② 马凡陀，即袁水拍（1916—1981），江苏吴县人。诗人。著有《马凡陀的山歌》等。 绿原，原名刘仁甫，一九二二年生，湖北黄陂人。诗人、翻译家。著有诗集《童话》等。 力扬（1908—1964），原名季信，浙江青田人。诗人。著有《枷锁与自由》等。

③ 陈白尘，原名增鸿，一九〇八年生，江苏淮阴人。剧作家。著有《升官图》等。 吴祖光，一九一七年生，江苏武进人。戏剧家，著有《吴祖光戏剧集》等。

④ 荃麟，即邵荃麟（1906—1971），浙江慈溪人。作家。著有《英雄》、《诗与政治》等。 杨晦（1899—1983），辽宁辽阳人。作家。著有《楚灵王》等。舒芜，本名方管，一九二二年生，安徽桐城人。作家。著有《挂剑集》等。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县人。作家。著有《美丽的黑海》等。

诗歌、小说、戏剧、批评里面，虽然现今的文艺朋友们，尤其是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他们把文艺的圈子画得很紧，除掉自己的小说之外差不多就无所谓“创作”。他们藐视诗歌，抹杀批评，斥戏剧为“不值一顾”。文艺的天地应该更要广泛。希腊的缪司九神里面，本有司历史的女神克略（Clio）和司星宿的女神优罗尼（Urania），我们可不要忘记。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有和这类似的精神，我们向来不是把左丘明①、庄周、司马迁那样的思想家和历史家，也和屈原、司马相如一样，作为文学家在看待的吗？假使我们这样把文艺的圈子放宽，那我们还有的朋友值得赞叹。在古代研究方面的杜守素、翦伯赞、侯外庐②，我们不能忘记。在现代研究方面的胡绳、于怀、许涤新③，我们不能忘记。

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文艺形式是随着时代进化的，今天以小说称雄的文坛，在中国是明、清之际以来，在欧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缪司九神里面虽然有叙事诗的女神珈略普（Calliope），并无小说娘娘的存在。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

① 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史学家。相传曾作《春秋左氏传》。

②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史纲》（一、二卷）、《历史哲学教程》等。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等。

③ 胡绳，一九一八年生，江苏苏州人。理论家。著有《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等。　于怀，即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政论家。著有《形势比人还强》等。　许涤新（1906—1988），广东揭阳人。经济学家。著有《中国经济的道路》等。

式。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们成为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早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着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的启示的。有那一种文艺作品能够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那一位大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样广泛？我要赞仰一年多来的进步的记者朋友们，他们真是今天的珈略普，他们的精神反应真有如电光石火。任何危险的场合都有他们的参预。挨打，流血，坐牢，丢命，那一样没有他们的份？他们的文字倒真真正正是用血写出来的！一年多来的文艺上的最高成就应该属于记者。这样的朋友们，恕我把名字写不完，真真是满天星斗。

和新闻记者一样，我要赞礼漫画家。特别在这一两年的期间，漫画界朋友的努力是怎样惊人呵！他们的脑筋是精神上的原子弹。别的地方暂且不说，上海的几份进步的民间报纸和杂志，有那一天那一期能够离得开漫画？漫画不仅等于我们的烟，我们的茶，而且等于我们的饭了！我佩服那机智的锐敏，深刻，丰富而健康。我惊讶于出版家们为什么没人收集起来出它几部"漫画大全"，那应该是可以使不识字的大众读者们把它当成食粮的！

木刻家的刀，暴风大雷雨时的闪电，划破了黑夜的天空。就是帮凶和帮闲，也得看见了那炫目的光芒。木刻家们的辛苦，可庆幸的是已经赢得社会的重视了。《抗战八年木刻选集》① 一书是这辛苦的结晶。这从将近一万份的作品中选出

①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曾于一九四六年"九一八"纪念日在上海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览，后从中选出一百幅，辑为《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同年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一百幅，真可以算得极严格的选择。但我敢于相信，这样的严选仅是由于出版上的困难。《选集》出版的方针是以上层和外国的阅者为对象，版本务求精良，因而成本也就自然增高，这便产生了那样严格的甄选。假使把对象置换成人民大众，象街头出卖的连环画那样，廉价印行，就把一万张全部印出来，应该也不会怎样困难的吧。可惜没有那样做，使帮凶们也寒一寒胆！

戏剧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他们的辛酸在温室作家们当然是连做梦也想不到。在战地服务的工作者有不少已经在前线上作了神圣的牺牲，更有不少的人受过缧绁的痛苦。有的在胜利后被解散了，至今多流落街头。有的虽然被羁縻着，而衣不能暖，食不能饱。在城市服务的工作者，在杀人的苛重捐税与无形的检查制度之下，拖着沉重的高利贷，作朝不保夕的滴血的奋斗。有人在作漫无责任的放言，说“戏剧的思想衰落到不值一顾”，我想说这话的人至少“不曾一顾”倒是事实，在温室中娇生惯养了的名花，那里会知道雪地冰天的惨酷。然而松柏依然是森森的，他们并不稀罕你名花们的“一顾”。

音乐的声音，近来是特别的消沉了。不幸的音乐家们，他们的际遇似乎特别悲惨。抗战之前，聂耳死于海①；抗战以后

① 聂耳(1912—1935)，原名守信，字子义，云南玉溪人。作曲家。一九三五年为避国民党通缉经日本前往苏联，在神奈川县海滨游泳时溺死。作有《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

黄自①死于病，张曙死于敌机轰炸，任光死于江南围剿②，冼星海死于流亡。但他们真是死了吗？音乐的声音真是沉没了吗？不！是他们和其他许多还在苦难中坚毅撑持的朋友，使中国这个无声的沙漠，卷起了抗战歌曲的洪流。那声浪留存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谁能够消灭了它！《黄河大合唱》、《民主大合唱》，在人人的心中作着无声的怒吼，一旦爆发了出来，会要塞满全中国的天空。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的人们，就深怕死这民族灵魂的呼号，然而你能禁制得了吗？

我虔诚地敬礼着这些朋友，这些温室之外的从事小说、诗歌、剧作、批评等文学工作的朋友，从事于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研究的朋友，新闻界的朋友，漫画木刻界的朋友，新音乐界的朋友，戏剧电影界的朋友。朋友们哟，我想称颂你们为"新时代的缪司九神"，你们真以过人的努力，克服着当前的超级地狱，而在替我们播着火种。说你们没有货色拿出来见人者，那是帮凶者的诬蔑！但你们受着这种诬蔑，也正是你们的光荣。目前是一切价值倒逆的时候，鹿是马、马是鹿，黑是白、白是黑，有是无、无是有。你们没有货色可以见王公大人的"人"，而你们尽有洪水一般的货色可以见人民大众的"人"。我礼赞你们，感激你们，是你们给与了我以温暖，以勇气，以鼓励，使我还能坚持着，不至成为丧失了生命力的僵尸。是你们

---

① 黄自(1904—1938)，字今吾，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作曲家。作有管弦乐《怀旧》、歌曲《抗敌歌》等。

② 任光(1909—1941)，浙江嵊县人。作曲家。一九四〇年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作有《渔光曲》、《大地行军曲》等。

给予了我以崇高的模范，使我想抖擞起我的精神，为人民大众服务，服务到我不能再服务的一天。

我要承认，我在前曾经保持过一个生活的原则，便是遇必要时保持沉默，遇必要时“有所不为”。我也并不是想“明哲保身”，而是认为沉默也是一种武器。我是相信着“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① 的。我是生于四川，而又是拿着笔杆活动的人，四川出产的古代文人向我提示了一个殷鉴，使我自己怀着一个戒心：便是“不要做扬雄”！到今天为止，或许我也可以向我们的新缪司九神、向我们的人民大众差告无罪，我虽然没有什么值得奉献的作品产出，然而我幸得还没有把我自己造成为一个“扬雄”。这个可能的危险，在我从事文笔活动以来的二十几年的当中，并不是没有接近我的机会，然而我兢兢业业地把它避开了。我今天似乎可以相信得过，我已经是有了免疫性的。

但到了今天，我却深切地感觉着，那样的生活原则是太消极，太自私，太小资产阶级的了。我不能光是“不要做”，而是应该“要做”。譬如就是做歌功颂德的扬雄吧，我假如做人民大众的扬雄，又有什么不可？我是应该歌人民大众的功，颂人民大众的德的。人民大众才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宙司大神，我们之得以维持着一线的生存而直到今天，实在是他的恩惠。我们的新缪司九神，他们也是受了他的庇荫的，无论你们是已经知道，或许还不曾知道。你们的活动曾经奉献了他来，今后

---

① 语出《孟子·离娄下》：“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也会更专心诚意的向他奉献。我要跟着你们，努力向你们学习，更努力向我们的宙司大神学习。漫画、木刻、音乐，是我所不能做的，戏剧电影的导演和演出也非我所能，但我能写诗歌、小说、剧本、批评。或者我可能把我的力量专门贡献于史学。假使有机会飞，我还是要飞的，尤其"飞莫斯科"。我并不怕教授们向我摇头，我只怕我自己向我摇头，怕我的新缪司九神们向我摇头，怕人民大众向我摇头。我假使努力到使教授们把头摇断，那是最愉快的事。

我依然要在这冰天雪地中挣扎，我要扎根，我要迸芽，我要开花结果。这儿是我的现实。我可能也还要为红白喜事奔走，只要是和人民大众有关的红白喜事也就是我的现实。我听见有声音自温室中来："从现实学习"吧。这是很中听的声音。虽然温室中的"现实"不是我的现实，而温室中的"学习"不是我的学习，但我还是喜欢那个中听的声音。谁个又能够否认，那温室中的花草们毕竟是可怜的呢？他们也有他们的"岗位"，让他们去独自欣赏，或为所憧憬的对象们所欣赏吧。从石榴裙下的现实去学习拜倒，从被窝中的现实去学习自渎，那是不同乎流俗者的自由。至少在这一方面我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我是不愿意干犯别人的自由的。然而我敢于自信，我以前虽然毫无成就，主要的原因大约也就是由于我的"有所不为"，而我今后却是要"有所为"了。严寒的冬季也不会那么太久的。有我们的新宙司大神在上，有我们的新缪司九神在旁，谁能量定我就得不到他们的加庇，使我也可以得到不断的新的"灵感"？

我要毫不容情地清算我一九四六年前的一切，而勇敢地迎接着一九四七年的今天和明天。

1947年1月5日

拙劣的犯罪

前几天由于《文汇报》的工友罢工，送报的人把《大公报》来代替，因此我得到机缘拜读了几天《大公报》。一月廿一日的副刊《图书周刊》上有沈从文① 的《新书业和作家》一篇，我也仔细地拜读了。这篇文章和沈从文的其它一切文字一样，根本是有问题的。今天的民间出版界和作家可以说是站在同一死亡线上，在整个的经济危机之下，在严重的苛捐杂税之下，在卑劣的利诱腐化之下，成本增高了，购买力减低了，发行网破坏了，读者受威胁，书店受劫搜，摊贩受迫害，而黄色的大洪水如象黄河决口一样泛滥着全国的市场。不肯走邪路的民间出版家正在决死地苦撑着，为民族文化保存着垂危的一丝命脉。今天是焚书不必用火，坑儒不必挖土的时代了。这在沈从文之流当然是看不出来的。不，他是熟视无睹，而且极尽了帮闲的能事，一面做掩饰工作，一面做离间工作。书业的不振或不正和作家的受罪，分明是政治问题。一句话归总，政治的不民主使凡百正业崩溃，书业自不能除外，作家也不能除外。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文汇报》。

① 沈从文(1902—1988)，原名岳焕，湖南凤凰人。作家。著有《边城》、《湘行散记》等。

然而沈从文却在这样说：

书业方面和作家间的关系，一起似乎即不怎么合理。……在这个情形下，作家有成就的不易保留……待发展的……近于未成熟即夭殇。这部门工作的推进，我们与其寄托希望于政治，还不如寄托希望于出版家。

好忠耿的前卫，一手轻松便把"政治"的责任推开，而把严重的罪状加在出版家们的头上，是你们使"作家有成就的不易保留，待发展的夭殇"。这还了得！这样扼杀作家、扼杀文化的滔天大罪，请问，你们自己都还处在被扼杀的民间出版家们，你们受得了吗？今天是你们在当希特勒、墨索里尼，你们自己反省过没有？而且你们还不肯体贴政府的德意而藐视法统呢，请看吧！

政府对于书业已有个补救制度，凡有资格请求的，都得到相当结果。可是直到如今为止，我们却似乎还不曾听说这些书店，在固定版税制度外，肯为作者想点办法。

这简直是超越了帮闲的范围，而死心踏地的帮凶了。掩饰工作竟做到"欲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般的大胆，而挑拨离间的大本领也竟想把"三五十个人"的"作者群"鼓动起来，革掉少数民间出版家的蚁命了。好不厉害呀！但是，我自己是颇有自知之明的，我还不够格充当这"三五十个人"中之一个，因而敬谢不敏，不愿受这样的鼓动。

但我在这儿倒还要附带着更正另一件事。沈文里面提到

创造社的事情，也提到了我的名字。我是当事者的一人，因而我应该有权利出而指责和事实不符的似是而非的叙述。沈文里面这样说：

> 先是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诸先生之努力，一面感于受当时恶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一面感于受出版方面压迫，作品无出路，想突破这个独占不合理局面，希望作品有以自见，也希望能用作品自给自足，因此来自办出版，直接和读者对面。努力的结果，虽若干短时期即成两面的突破，过不久终因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

我假如不也是创造社的一个人，对于这个叙述，我只好佩服作者的明于掌故，而且会疑心他也就是创造社发起者之一人了。然而不幸得很，这么一点简缩的叙述，却差不多全盘不符事实。所谓“受当时恶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不识作者何所指？是说当时的“礼拜六”派①吗？他们倒并不曾“压迫”过我们。是指先后约略同时成立的文学研究会②吗？他们不能算是“恶势力”。会与社诚然有过一些由于误会所生的摩擦，但那是相对的，说不上谁“压迫”谁。假使要说研究会“压迫”创造社，又何尝不能说创造社“压迫”研究会呢？

“作品无出路”，更是信口开河。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在北

---

① 文学流派之一，因出版《礼拜六》周刊而得名。作品多写才子佳人，性质与早期的鸳鸯蝴蝶派相似，故亦称鸳鸯蝴蝶派。

② 文学团体。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主办《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一九三二年《小说月报》停刊，该会亦自行解散。

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但那些封建地主式的统治者却还没有十分高明到统治到文化上来，创作出版一切都还是相当自由的。出版家只要你不是鼓睛暴眼的谈革命流血也比较容易商量出版。几家大书店对于我们也从不曾关过门，自然也同样说不上“压迫”。

“希望作品有以自见”，这倒还说得过去。凡是存心作为一个作家，谁也应该有这种的“希望”。但是“希望能用作品自给自足”，尽管通货还没有当今这样膨胀，发行还没有当今这样困难，如不是道地的市侩，谁也不敢存那样的几希的“希望”的。

那吗为什么要来“自办出版”？对不住得很，要在沈从文的贫乏的观念之外提出一个观念来，便是要把创作、出版、读者打成一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生力量。有创造社出版部的章程可以证明，这项资料应该还没有丧失干净。当时的创造社出版部是以读者为股东的，每股五元，有各种应享的股东权利。我想在今天四五十岁左右的朋友，怕有很多是曾经做过创造社的股东。

出版部于民国十五年四月一日成立于上海，但当时成仿吾①、郁达夫，和我都已经到广州。直接负出版部责任的是所谓创造社的“小伙计”②。就在那一年我参加了北伐，出版部

---

① 成仿吾(1897—1984)，原名灏，湖南新化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为创造社发起人之一。著有《使命》、《新兴文艺论集》。

② 指一九二五年以后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的几位文学青年，如叶灵凤、潘汉年、周全平、柯仲平等。

在孙传芳统治之下虽然曾经犯过一次将遭封闭的危险，但靠着达夫的奔走算免掉了那一灾难。其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是文化人的丁文江①在做着上海督办。

北伐的第二年革命阵线分裂，接着我便失掉自由。在十七年二月顶着一个三万元赏格的脑袋子到日本去亡命。创造社便始终在风雨飘摇中。不佞真可谓罪孽深重，祸延本社，终以十八年二月八日，出版部及创造社同时遭了国民党的革命政府封闭，于是寿终正寝。

这就是创造社出版部的简略的经过。它的结束，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沈从文，并不是什么“终因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的。

这种不顾事实、自我作故的态度，就是沈从文的态度。

达夫虽然死了，成仿吾和我还没有死，田寿昌、郑伯奇、阳翰笙、李一氓、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②及不少的“小伙计”和股东们都还没有死．冒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明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

1947年1月25日

---

①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著有《扬子江芜湖以下的地质》、《西南游记》等。

② 郑伯奇（1895—1979），原名隆谨，陕西长安人。创造社发起人之一。著有《最初之课》、《轨道》等。　李一氓(1903—1990)，原名民治，四川成都人。创造社成员。曾主编《流沙》、《巴尔底山》等刊物。　李初梨，一九〇〇年生，四川江津人。创造社成员。著有《怎样建设革命文学》等。　冯乃超(1901—1983)，广东南海人，出生于日本横滨市。创造社成员。著有《红纱灯》、《傀儡美人》等。　彭康(1901—1968)，原名坚，江西萍乡人。创造社成员。著有《前奏曲》等。　朱镜我(1901—1941)，原名德安，浙江鄞县人。创造社成员。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译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替胡适改诗

胡适博士似乎好久没有做诗了，最近在《文汇报》上看见他的一首近作：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①

这样简单的二十四个字，所表现的“心情”却颇悲壮。

第一，博士今年五十六岁了，但他自已觉得还很年青，只是“微近中年”而并非徐娘半老。这在精神上显示出大有可用。

第二，他干脆承认做了黑棋一边的“卒子”。或许有点不甘心而近于牢骚吧？但是，卒子过河，可当小车，横冲直闯，有进无退。看情形，他似乎很想擒红棋的老王了。

这样可宝贵的“卒子”，下棋的人自然是应该宝贵使用的。即使下棋者过分外行，在旁边抱膊子的军师也一定会忠心耿耿地发纵指使的。

因此，这卒子的“命”断乎不允许你那么轻容易“拚”掉。即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① 此诗载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神州社”南京电讯称其“乃自述国大期中心情者”。

使卒子想“拚”，主子也未必许“拚”。这正是这个“卒子”的聪明过人的地方，乐得悲壮一番，不免以进为退。

虽然不那么悲壮，但总要更显得老实一点——我想，倒不如把“拚”字索性改成“奉”字。

1947年2月5日

向普希金看齐

今天二月十日我们来举行普希金逝世一百十年祭，这个日子在我是有双重意义的纪念日。去年的二月十日我们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捱打，到今天也恰恰一周年了。同时捱打，而且打得头破血流的李公朴，已经为民主运动而牺牲了。今天我们在这儿纪念普希金，我怎么也不能忘记我们的民主战士李公朴。假使他今天还在的话，他可能是在今天的大会场上做总指挥的，然而他已经离开我们半年多了。

李公朴是卓越的社会教育家，民主运动的战士，是谁也知道的。但李公朴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卓越的歌者，他也是喜欢普希金的一个人。在较场口事件后他有一次曾经向我说："我们中国的诗人，文艺工作者，应该向普希金看齐！"今天这句话要算是我们的宝贵的遗产了。

一点也不错，我们应该向普希金看齐！不仅在作为诗人，作为文艺工作者，在写作诗文上应该向普希金看齐；就在做人上，在立身处世上，我们尤其是应该向普希金看齐。普希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和我们相隔虽然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普希金的时代很相仿佛。他所走过的路，他在文艺上和人格上的光辉的成就，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为诗人，作为文艺作家，普希金是俄罗斯新文学的开山，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于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同这些光辉的名字一样，他也不仅是俄国的大诗人，而是超越了国境了。

他的成就是很宏大而且广泛的，他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写历史研究，在各方面的成绩不仅多而且精。他是有名的博学多能的作者。他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手稿要经过四五次的修改，一点也不肯苟且。但他一经写定之后，就是沙皇的命令要叫他改变，他也是不听从的。他的作品的风格异常清新俊逸，有莫查特① 小曲中的愉快的跳跃，拉斐罗② 绘画中的生动的气韵，这些当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这些并不是专靠他的天才得来，而是主要地靠着他做人的努力上得来的。

他的做人的态度，在我认为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学习：第一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二是他的为革命服务的志趣，第三是在这两种生活原则之下，他发挥尽致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气概。

普希金虽然是贵族出身，但他的生活态度首先就是反对

---

① 莫查特（W·A·Mozart，1756—1791），通译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之一。作有四十余部交响曲和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等。

② 拉斐罗（Raffaello Sanzio，1483—1520），通译拉斐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作有四大壁画《圣礼的争辩》、《雅典学派》、《巴那斯山》、《法律》等。

贵族的。他是人民的朋友，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以文艺的武器来诚心诚意地替人民服务。他采用着人民的言语，利用着民间的传说、历史上于人民翻身有关的故事，作为他的创作工具和材料，以促进人民的解放。所以在普希金的创作中，他是把俄罗斯的人民意识、俄罗斯的言语、俄罗斯的历史，整个复活了。卢那卡尔斯基说过这样的话："在贵族普希金的心中，觉醒了的并不是贵族阶级，而是人民，国家，语言，历史的必然性。"① 这是对于普希金的最正确的认识，也是普希金的本质。我们要了解普希金，就要了解这人民的普希金。这种人民本位的精神是最先值得我们学习的。

普希金当然并不是职业的革命家，但他在俄国革命的推动上，在解放农奴，推倒沙皇政权的近代俄国的产生上，他本人和他的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根据他那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当然是革命的朋友，是为革命事业而服务的。他以他那叛逆的思想被沙皇政府监视，过流窜生活，遭受种种的迫害，然而他始终是站在革命队伍的一边。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叙述：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曾经有过一次十二月党人的叛变②。党人们鼓动起士兵们在上议院的广场反对新

---

① 卢那卡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通译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家、文艺批评家。著有《浮士德与城》、《解放了的唐·吉诃德》等。引文见《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一卷《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② 指俄国贵族军官组织的"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在乌克兰、彼得堡举行的旨在废除农奴制度的起义。起义遭到镇压，彼斯捷尔等五位领袖被处决，一百多人被流放。

即位的尼古拉一世，要他退位。尼古拉一世用武力来把这事件镇压下去了。领导者五人受了绞刑，一百二十多个人充军到西比利亚。那时候普希金正被软禁在他的故乡米海洛斯珂奕，受着看管。但到第二年的九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很想施点仁惠来笼络人民，他命人从米海洛斯珂奕就象递解囚犯一样，把普希金星夜兼程地送到彼得堡。沙皇宽大地接待着他，宣说已经把他赦免了。那时沙皇问他："假如去年十二月你在彼得堡，你是不是会参加十二月事件？"普希金答应得很直率。他说："陛下，无疑，我是一定会参加的，因为在造反的阵营里都是我的朋友。"这样的一个插话，不正表示着普希金的革命精神吗？普希金的这种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同时在这个插话里面，我们倒感觉着一些惊奇，普希金那样的回答，尼古拉一世倒没有说立刻把他关起来，这位沙皇的宽大倒是值得我们羡慕的了。

普希金虽然是贵族，但他的家况是很式微的。特别在他结了婚之后，他的夫人挐搭丽亚是一位交际花，只顾她自己在社交场的出入，而不管普希金的死活。普希金就为了他的太太背了一身债，靠着写作来偿还。他有时是被逼得走头无路的，然而他不曾为了贫贱而改变节操。

他的夫人挐搭丽亚是一位美人，尼古拉一世也喜欢她。为了得以时常和她亲近，得以让她在宫廷参加舞会，他赏赐了普希金一个小小的官职，便是侍从小臣。这假如是落在一些攀龙附凤的卑鄙文人手里，就是做了一名小小的"卒子"都是要感觉着受宠若惊的。然而在普希金，把这件事看成了莫大的

耻辱。所谓“富贵不能淫”，他确实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的。

他在彼得堡的生活是受着沙皇和宪兵队长本根多尔夫的双重监视，连写作和发表也没有丝毫的自由。普希金有名的历史悲剧《波理士·戈都诺夫》①，打算要出版，要送呈给尼古拉一世亲自审查。那位真是名实相符的“傻皇”，竟把别人的悲剧误解成喜剧，而下出一条手谕，要普希金仿照斯柯特② 的作风改变成历史小说或故事，普希金坦然地拒绝了。他说：“我并不想改变自己所已经写成的东西，不能不表示遗憾。”这应该是“威武不能屈”的一个很好的证据吧？

这样有叛逆思想的人在沙皇政治之下当然是不会容许安然存在的。借刀杀人的阴谋便在纵容、掩饰，甚至暗中鼓励之下发生了。法国的一位保皇党，名叫丹特斯，逃亡到俄国。沙皇任命他为骑兵近卫队的一个军官。这丹特斯同时又被荷兰公使额克伦收为义子。丹特斯和普希金夫人发生了恋爱。额克伦竟写匿名信去嘲笑普希金。因此便把普希金激怒了，终于向丹特斯投出了手套，而遭了丹特斯杀人犯的卑鄙的枪杀。

这事情照我们东方的观点上看来，或许会嫌普希金过于轻率吧？但这也正是普希金的精神。普希金他自己知道，他是俄罗斯人民的代表，是俄罗斯文化的代表，他的受了侮辱也就是俄罗斯人民受了侮辱，俄罗斯文化受了侮辱，故尔他不惜

---

① 通译《鲍利斯·戈尔诺夫》。

② 作者原注：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人，浪漫主义的前驱者。

把自己的血和生命来做抵押，要把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的名誉争取回来。他虽然受了卑鄙的暗杀，死了，但他真是死了吗？死了的是普希金的身体，永远活着的是由普希金所代表着的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俄罗斯精神。

由于普希金的死，俄罗斯人民的确是从几千年的睡眠当中醒来了。无数的青年学生、工人、农人、小市民，都关切着普希金的受伤，而悲痛着他的死。参加了他的葬仪的，一共有三四万人。这是俄罗斯人民所第一次表示的集体行动。这行动却把沙皇震惊了。他起先本来是没有把事件重视的，丹特斯已经被宣告无罪；然而看到了这群众的威力，众怒难犯，被逼得不能不把丹特斯免职而驱逐出境。荷兰公使额克伦也被他本国的政府撤职召回了。就这样，我们请看，普希金是死了吗？普希金是永远没有死的。

我们今天来纪念普希金，就要认识他这些精神。这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革命服务的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有了这些精神，所以才能有普希金的在文艺上的成就。只要有了这些精神，就从事于文艺以外的其他任何工作，我们都可以保证是可以产生出无数的普希金的。

我们今天要向普希金看齐，站定人民本位的立场，为人民解放、民主实现而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地步。假如有丹特斯、额克伦那样的外国流氓，要侮辱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中国人民的姊妹，我们要不惜以血和生命作荣誉的保证。

普希金精神不死！

人民解放万岁！

民主成功万岁！

1947年2月10日

序《苏德大战史》

人们的健忘性是可以令人惊愕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隔仅仅二十几年，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发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隔还不到两年，一些好战的英雄们又在作第三次大战的酝酿了。

第三次大战将在谁与谁之间战？

这已经是公认的预测，将在苏联与美国或英、美之间，将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有人相信，这是一种不能避免的宿命。但在我们看来，实际的形势并不严重到那样。

首先是人类已经进化到了今天，不再那么愚蠢了。人民是决不欢迎战争的，不仅苏联的人民不欢迎，就是英、美及其它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欢迎。

人民非到自己的生存受到极严重的威胁，他是决不轻易容许战争的状态存在的。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光明书局版《苏德大战史》。

《苏德大战史》，焦敏之著。为作者主编的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丛书之一。

今天，英、美的人民受着苏联的严重威胁吗？苏联的人民受着英、美的严重威胁吗？

在我们看来，这样彼此间的威胁根本就不存在，还不忙说到严重不严重。

苏联的建国原则，根本在和平建设。她要使她社会化了的生产更加提高起来，让人民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苏联根本是脱离了人剥削人的那种制度的国家。

人剥削人的对外发展，那就是找寻殖民地，就是侵略。对内虽是资本家剥削工农大众，对外便是富有民族剥削落后民族。苏联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

但她为什么要有那样强大的军队？

那是保卫和平建设的武力。她一个单独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敌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为了保障自己的建国原则，她不能不有那样的武力。

那武力之所以强大，主要的原因就在它是保卫人民的利益，它是人民的武力。假使一旦这武力要用于侵略，那是违反人民的利益，它可以立地失掉人民的支持，而丧失它的强大。

苏联是决不会先发制人而从事侵略性的战争的，这个我们可以断言。她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充分地自给自足的地步，无所仰求于英、美。而英、美呢？要想到苏联那样的国家去殖民，当然也不好作那样的梦想了。

威胁并不存在于英、美与苏联之间，威胁倒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间，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彼此之间，存在于英与美之间。

今天是美国资本主义登峰造极的时期，为要保障她的资本主义的繁荣，或预防周期性经济恐慌的来袭，她不能不企图独占世界市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就不能不在全世界扩充军事基地，并保持雄厚的军事力量。

故在世界上还有可供开拓的殖民地，或可供蚕食的较弱的资本主义国的市场存在，美国决不会和苏联作正面冲突。

今天美、苏之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其实那只是好战者所施放的烟幕。为了要侵略别人的殖民地或干犯别人的主权，而借口说“我要替你防盗”。

斯大林元帅在最近答复英国记者的话说得好：“应该把现在进行着的关于‘新战争’的叫嚣，和目下并不存在的‘新战争’会实际发生的危险，加以严格的区别。”①

美、苏之间的第三次大战的叫嚣是烟幕，那种战争在实际上要发生的危险是并不存在的。

然而今天在世界上的确还有战争。那是资本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战争，即使有的是采取着内战的形式，但也掩不过它的本质。这主要是由英、美所引起来的，与苏联无关。

苏联决不欢迎战争，但也不畏惧战争。世界如果得到明智的指导，循着不流血的途径而达到理想的最高发展阶段，苏联一定是欢迎的。但假如这条路一定要用别种的方式来走，

---

① 语见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消息《答复英国记者，斯大林发表时局谈话》。

她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她也坚决地相信她必然要得到最后的胜利。

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属于以人民利益为利益的国度。人民的利益是超越了国界的。自来的历史发展都在替我们证明着这个事实。最近的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替我们证明得鲜明。

当一九四一年六月尾德国挟其席卷了十六个国家的战胜的威力，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闪击战，长驱直入，公然打到了莫斯科的大门。

那时候同情苏联的人，不是天天都在替苏联担心，幸灾乐祸的人们，不也是每天清早都在等候着莫斯科陷落的消息吗？然而莫斯科始终没有陷落，而德寇终竟被打回去了。

在一九四二与四三年，德寇攻到了斯大林格勒时不也又激起了同样的情绪吗？斯大林格勒成为了全世界的心脏，它的形势的一张一弛使全人类的脉搏一起一落。自然也有幸灾乐祸的人们认为斯大林格勒一定会陷落，然而斯大林格勒始终没有陷落，而德寇终竟被打回去了。

这记忆应该还是新鲜的吧？我们为什么那样关心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这不纯粹是由于对苏联的同情，而是关切着人类的命运，也就是各个人自己的命运。

苏联如果抵挡不住纳粹德国，全人类便要受法西斯的奴役，整个的人类文化会被和盘推翻，希特拉的魔力真会把历史发展的进向掉转一个箭头了。

然而苏联把德寇挡住了。苏联人民不仅从危殆中救起了

自己的祖国，也从危殆中救起了整个的人类。我们请回忆一下吧：只要自己不是法西斯蒂，在苏联打了胜仗的当时，我们大家不是都由衷地表示过庆贺吗？

然而我们真是健忘得可观。这些往事相隔还不过三两年，而我们差不多完全忘在脑后了。我们受着一些好战者的烟幕式的宣传，把三两年前对于苏联的赞扬，一变而为恐怖或忌惮。这实在是值得惊异的事。

为了医治我们的健忘症，我乐于推荐焦敏之的这部《苏德大战史》。我们请把往事温习一下吧。看苏联在这次大战中作了多大的贡献。

最要紧的还应该看取苏联究竟是怎样性质的国家，苏联在这次大战中究竟是以什么决定的因素获得了胜利。

苏联的红军、红海军，乃至空军，毫无疑问是无比的强大，但这强大的原因是从那里来？有良好的训练，有精进的技术，有卓越的领导者，这些固然是没有问题的。

最大原因是在于人民的解放，是在于人民成为了真正的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是人民的一切。因而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胜利也就是人民的胜利。这便是我们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王者之师，天下无敌"。

苏联是人民的国度。假使我们为便宜起见，承认古代的"王道"这个名词，这是与"霸道"敌对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政治或文化，那吗苏联这样实现了经济民主，因而也就实现了真正的政治民主的国家，倒实实在在是奉行着"王道"的。

只有在"王道"之下全世界的人民才可以合流，全世界才

可以进化到大同的境地。

但这是历史的必然，“霸道”必然灭亡，“王道”必然胜利。

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

1947年2月18日

序《白毛女》

去年年初还在重庆的时候，便听见朋友们讲到《白毛女》的故事，非常感动人。我听说已经被编成为一个歌剧，主要采取的北方的秧歌形式，而使它组织化了。再是这个歌剧在北方关内关外各地演出都收到很大的成功。故事本身已经十分感动人，据说它是出现于北方的一个事实，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典型的悲剧（就其前半言），更加上形象化的表演和音乐的配合，那感动人的力量，毫无问题必然是很宏大的。那时自己很抱憾，不要说这样的演出没有机会欣赏，就连歌剧的原本都无法接触，真是使人发生了焦躁的一件事。

算好，在去年六月，陆定一① 同志北归之后，不久他便寄了两本书给我：一本是《吕梁英雄传》②，一本就是《白毛女》。我如饥似渴地立刻把《白毛女》捧着读了一遍。故事实在是动人。全体的歌词有乐谱配备，假使是懂音乐的人，那所得到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文萃》周刊第二年第二十一期。

《白毛女》，歌剧。一九四五年一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等执笔。

① 陆定一，一九〇六年生，江苏无锡人。政治家。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② 章回体长篇小说，马烽、西戎合著。

印象，不知道又要深刻多少倍。可惜我是不懂音乐的，因此除当作一个故事阅读之外，我便不能有更进一步的领会了。但我渴望着能够看到这剧的演出。一个歌剧，不听演出而只看剧本，那认识是绝对不够的。

不过就剧本论剧本已经就是一件富于教育意义的力作了。这是在戏剧方面的新的民族形式的尝试，尝试得确是相当成功。这儿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虽然和旧有的民间形式更有血肉的关系，但也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从新的种子——人民情绪——中自由地迸发出来的新的成长。

一切为了人民。这个观点虽然比较容易获得，但要使这观点形象化，把自己的认识移诸实践，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我自己来说，虽然很知道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我们早就呼喊着人民文艺的创造，但积习难除，一拿起笔来，总是要忸怩作态的。这里是有环境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存在决定意识"，毕竟是真理。譬如在一个西装的社会里，你尽管知道中装或许更暖和、更经济，你如一个人或少数人要穿出中装，那周围的眼睛可能把你当成狂人看待。我在这一点上很能够谅解，今天上海市上的文人为什么还在醉心波陀勒尔①。其实就是解放区内的文艺上的真正解放，不也是最近三两年的事吗？

---

① 作者原注：法国唯美主义的诗人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作品有《恶之花》最有名，是象征派的前驱。

要征服一种观念已是不太容易的，还要使新的观念蔚成风气实在是更难。要紧的还是环境的变革。因而变革环境的主观努力，在我们也是不容忽视的。努力鞭策自己，努力寻出适当的范本来供自己观摩，也供集体的观摩吧。在初虽然是“一日曝，十日寒”①，靠大家的努力，我们可以逐渐做到“十日曝，一日寒”的地步。终久会有一天，会看见天天都是太阳的。在这个意识上，我特别佩服马凡陀，马凡陀似乎尽可以扩大起来，也来产生《白毛女》了。

附带着我想表示一点质疑。白毛女的“白毛”不知道是一种怎样的实际。是全身的毛发完全翻白了，还是因为不洁净而着了灰，抑或是头发上的虱蛋过多，而成为灰白？我听见这个故事时已经质问过，没有得到解答。剧本里面也没有说明。在生理上，少年时期全身毛发翻白，是难得理解的。或许是喜儿因为营养不良，精神劳瘁，而得到了白血症（Albinism）？我想解放区里面不乏有近代医学知识的人，应该能够把这个小小的质疑消释。

我提出这个质疑，并无心怀疑到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的意思是不应该容许有一丝一毫的非科学性或神秘性的阴影存在。如这“白毛”缺乏科学的说明，那不免便是阴影。从前的史书上有过这样的传说：张献忠②在四川杀人，四川人多逃进山野里过活，积久，身上长了“绿毛”。我是不相信这“绿毛”

---

① 语出《孟子·告子上》：“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② 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曾两次进兵四川。

说的人。因此，我对于“白毛”的来历要想问一个究竟。我不希望有任何可能的阴影减少这个故事的现实性。

1947年2月22日

春天的信号

一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一切的花草树木都要迸出鲜嫩的苗条。即使是被压在巨石下，也有那比铁钻还要坚韧的苗条，从残冰剩雪中迸射出来，响应着光明的节奏，合唱着生命的凯歌。

这是战斗，是进步，是发展，是创造。

这是新鲜，是酣畅，是饱满，是葱茏。是富有弹性，是幼稚。

我们欢迎幼稚，歌颂幼稚，歌颂人类的青春。

二 我在故我思

并不是“我思故我在”①，而是我在故我思。

我们不想把脚后跟当着大脑使用，把脑袋子在地面上独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上海《文汇报》，系该报《新思潮》周刊发刊词。

① 语出笛卡尔《谈方法》：“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我们只有健全的常识，也只尊重健全的常识。我们尊重青年人的想法，尊重老百姓的想法，这些想法把它扩充起来，也就是科学的想法。

神学鬼，玄学鬼，超人鬼，野兽鬼，一切都和我们没缘。

在我们民族的幼年时代，就是唯心的心也还是唯物的物。心字的古写，本是心脏的象形。把心脏作为思想的机关虽然错了，但思想有物质的机关主持，却是万分正确的。

我在故我思，但如果我思则我也就在。

三 “不尽长江滚滚来”

生命是不间断的，思想是不间断的，发展是不间断的，战斗是不间断的。向前进展一步，是有惰性或摩擦力拖着你向后退转一步。这儿便生出战斗。生命要克服惰性或摩擦力，而始终保持着进展，生命本身也就是战斗。

万千的种子散播出去，实际上只能得到少数的萌芽；万千的萌芽进射出来，实际上也只能得到少数的成长。这或许不免是浪费吧。由万千的浪费获得少数的成长，而使生命的流不至间断，创造不至间断，那实在是至可宝贵的收获。

“不尽长江滚滚来”！但你要知道，它从空中陆上乃至地下，不知道吸收了多少的水分才汇成了那样一条雄浑的长江。在长江还没有流到崇明之前，不知道有多少的水分在中途被挹取或蒸发了。

这是自然界的浪费。人类虽是自然界的一环，而是有意

识的一环，他是不甘心这样浪费的！人类历史的努力也就在克服这种浪费。

不要紧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固然都是随同宇宙以俱来，但即使我的生命今天浪费了，乃至我儿女的生命在今天也一同浪费了，宇宙的生命依然是要发展前进的。

存世一天便向发展贡献一天，脑细胞活动一天便向发展的思想效力一天。这是人生的庄严的使命。

四　预防白浊式的点滴

有人说“文化是一点一滴造成的”①。但任意的一点一滴并不就成其为文化。文化不仅有量，而且还有它的质。任意的一点一滴不仅不能有质的净化，而且有时候连在量的构成上都会发生反的效果。

我们并不反对一点一滴，但要问这一点一滴是不是合乎文化的本质和动向。

文化的本质就是创造，是人类意识克服自然惰性或摩擦力的那种努力。它的动向始终是发展，是前进，是使更大多数人获得更大的幸福。

合乎这本质与动向的一点一滴便能有质与量的增加，而且达到一定阶段时还必然发生更高一个阶段的质变。

但是，我们要烧开水，而你却一点一滴的不断地渗进冷

① 作者原注：这是胡适的说法。

水；我们要时间前进，而你逆着钟摆的动向一点一滴地加力；结果，水永远被你渗成冰冷，而时辰的钟摆也终会被你停止了。

这样的一点一滴，何殊于白浊患者的一点一滴？

为了文化的保卫，我们要预防这种白浊式的点滴，免得它毒害文化，并毒害人生。

五　理甚易明·善甚易察

点滴主义者有一个漂亮的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①

不错，这看来相当漂亮，但其实是幌子。待合乎他的利益他要说话的时候，他可以不要任何"证据"；待不合乎他的利益他不敢说话的时候，所有的"证据"都丢进茅坑里去了。

但我们也不要那么天真，以为那种漂亮的幌子就是真正的科学。

真正的科学是更谦虚，然而也更勇敢的。它有时有十分证据只能说一分的话，而有时有一分证据却敢说十分的话。

当其我们探求物象的关系时，我们要有无数的证据然后才能归纳得出一个规律。但当其这个规律一被揭发，我们依据它便可以解决不少的未知的问题。

在这前一阶段，你要说"理未易明，善未易察"②，那是你

① 作者原注：胡适的话。

② 作者原注：这也是胡适的话。

的审慎；但在这后一阶段而你要貌为谦虚抹杀科学的预言性，乃至常识的预言性，那是你的阴险。

爪哇的猿人仅仅被发现了一个牙齿，但谁能否认爪哇猿人的存在呢？

虽然只是一根嫩苗，只要它不遭遇斧斤，我们可以预言，它一定会拔地参天。虽然已经是拔地参天的古木，即使它不遭遇斧斤，我们也可以预言，它是必然会归于死灭。

这是常识性的预言，然而也就是科学性的预言。科学是常识的提高，常识是科学的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程序上普及。这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进展过程。

我们要准据着这种过程，在方生之中看出它未来的伟大，而在既成里面看出它不久的死亡。

人民是主人，他必然有大翻身的一天，也必然有大合流的一天。合乎人民本位的便是善，便是进步，事虽小亦必为之。反乎人民本位的便是恶，便是反动，力虽大亦必拒之。

这在我们看来是“理甚易明，善甚易察”的。

六　歌颂人类的青春

为人民服务，为进化服务，这是我们的信条，我们要抓紧着当前的现实，作思想上、文化上的策进。

首先是明辨是非，分别敌友。凡是反人民、反进化的一切封建思想，买办意识，法西斯主义，假民主，假自由，假科学，都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对于敌性的对象并没有准备下多余的

礼貌。

变相帝王思想的明星主义，排比一些所谓学者、名流、专家、大师的大名，一品当朝，八仙贺寿。我们是鄙薄它的。

变相英雄主义的炫学态度，罗列一些不必要的专门知识，洋文术语连篇，传曰书云满纸；骗内行则不足，骇百姓则有余。孔雀开屏，却遮掩不着后面的一个漏洞。我们是唾弃它的。

变相第五纵队的文化侵略，译述一些不相干的零碎杂识，或有心，或无心，替帝国主义者作义务宣传。说月亮也是外国的好，说外国也有臭虫。我们是排击它的。

我们欢迎青年，我们欢迎没有名流意识的真正学者，没有大师臭味的真正专家。这样的学者和专家也就是永远的青年。青年哟！你是人类的春天！

我们要再说一遍：一切为了人民，为了进化。我们不怕幼稚，不怕别人骂我们幼稚。不，我们宁是欢迎幼稚，歌颂幼稚，歌颂这人类的青春。

1947 年 2 月 25 日

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

《新文艺》，今天第一次和读者见面，姓名的介绍应该是有必要的。这个刊名是《文汇报》① 的编辑会议确定下来的。六种副刊②，日新又新，新新不息，于是思想、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艺，一律都成了“新”字辈的弟兄。

但这新氏六弟兄，我们在暗默中都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是应该以人民至上的意识为意识的。这是我们共通的核仁，从这儿分道扬镳地作出新的展开。因此，我们这一批的新，和《新原人》、《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③ 那一批的新，断然不同。本是粪土之墙而涂上些廉价油漆，本是枯枝槁木而贴上些洋纸剪花，那自然也可以算是“新”，但和我们是同姓不同宗的。

我们准据着这样的意识来从事文艺活动，因此我们的《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上海《文汇报》，系该报副刊《新文艺》发刊词。

①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于上海，次年五月被迫停刊。一九四五年九月复刊，一九四七年五月被国民党查封。解放后再度复刊。

② 指《文汇报》主办的《新思想》、《新社会》、《新经济》、《新文艺》、《新教育》、《新科学》六种周刊。

③ 都是冯友兰的著作。

文艺》本质上应该是人民文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这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水准。

我们多谢朋友们的关注，特别是这样富于友谊的一个义务预告，说我们“将合编一水准极高之纯文艺周刊，选稿严格，态度认真”(见上海《新民晚报》二月二十四日的《艺文坛》)。这个短短的消息，确实是把我们的水准和态度都规定好了，我们是要努力做去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人民高”。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本质的文艺本来就是人民文艺，这在任何民族都是文艺的本流，而且站着极高的地位。脱离了人民本位的文艺，虽然借政治的力量可以博得一时性的月桂冠，但其实那是堕落。旧式的《剧秦美新》是堕落，新式的《看云》、《摘星》① 是更悲惨的堕落。那样的作品虽然冒充过、或冒充着“纯文艺”的佳名，其实那是最混杂的排泄，不必说到纯不纯，根本就不是文艺。

“纯文艺”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要作这样的认识：凡是人民意识最纯，丝毫没有夹杂着对于反人民的权势者的阿谀，对于不劳而获的垄断者的赞颂，或钻进玻璃室里作自渎式的献媚，丝毫没有夹杂着这些成分，而只纯真地歌颂人民的辛劳，合作，创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对于反人民者一切丑恶、暴戾、破坏的如火如荼的憎恨。这样的作品，我们便认为是今天的“纯文艺”——纯人民意识的文艺。

---

① 作者原注：《剧秦美新》是扬雄歌颂王莽的文章；《看云录》(应是《云南看云集》——注释者)和《摘星录》是沈从文的文集。

这样的纯文艺，在我们积习太深的知识分子的确是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受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思想的陶冶，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受着，而且又还活在厄运一天一天加深的半殖民地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一切观点差不多根本是倒逆的，卑成了高，杂成了纯，伪成了真，恶成了善，丑成了美。这一切都应该要费很大的努力才能够把它们颠转过来。

我们应该还没有忘记“三寸金莲”这个名词吧。在前女子缠足时代，人为的畸形小脚的一扭一捏叫作“潘妃步步生莲花”。那时代这三寸的小东西陶醉了多少的色情狂呀！大家把这个东西认为无上的美，而把农家妇女的天足认为无上的丑。今天这观点虽然已经颠倒过来了，但这个记忆，我们应该还保留着的吧？

事实上我们并未那么健忘。“三寸金莲”的时代，认真说，在我们并没有完全过去。这只变形成为了高跟鞋，或珂尔塞特① 的腰线美。不仅是这样，连我们整个的脑袋子都还在裹脚带里面过活。人民的友人陶行知的遗言：我们文化人的头是“三寸金头”。我们会感觉得他这嘲弄是苛虐吗？岂敢，岂敢，好些朋友似乎还在以有这“三寸金头”为无上的高贵呢！已成三寸者自诩高贵，未成三寸者尽力想在头上穿高跟鞋。风气是这样，环境是这样，大家都在沾沾自喜，而看见大头国人士反而认为是妖怪了。

然而，今天已经到了应该放头的时候了。把“三寸金头”

---

① 珂尔塞特，英语 Corselet的音译，意为妇女胸罩。

解放出来，成为接近自然的头，而使本是自然的头永远不要受缠缚。要这样，我们才能回复到纯真的人民意识。要由这种意识发生出来，然后才能成为纯真的人民文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水准极高的纯文艺”。

但这种基本工作，实在要费很大的努力才能够做到。因此，我们是准备“选稿严格”而“态度认真”的。

“选稿严格”倒并不是专门对外来的稿子而言，而主要倒还是准备侧重于严选自己的稿子。自己的稿子，宁缺毋滥。一个人或少数人主编一种刊物，那种刊物便成为了他的擂台。那样的思想和作风，不管是封建垄断式的或买办独占式的，不管是京派或海派或京海合派，应该是过了时的东西。我们不仅不想沾染，而且准备尽力反对。

外来的投稿，只要合乎人民意识，我们都尽量欢迎。我们抱定意识第一主义。只要是意识正确，我们要尽力赞扬。我们特别欢迎青年的投稿，有着最大的决心准备把这个小小的园地作为青年作家所共有的园地。工人、农人、士兵、店员、学生，在我们认为是最有希望的纯人民文艺的创造者。他们的作品，不问任何形式，都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必要时，我们可以尽润色的义务。我们的主要目的，不单在产生新的作品，而是在产生新的作家。

我们要注重批评。要严格地批评自己，并严格地批评别人。当然，并不敢作无原则的严格。我们的原则，不嫌再说一遍吧，也就是人民本位。准据着这个原则，对己对人，都毫无假借。我们自然欢迎外来的批评，特别是严格地批评我们自

已。接受批评的这种良好的态度，我们是想尽力培植的。一个人在真正获得了人民意识的时候，他必然能够获得这种态度，和悦地、感激地接受严格的批评。因此，我们对于鲁迅的遗产，杂文形式中的匕首投枪，我们特别重视的。我们宝贵这个遗产，并欢迎这种匕首投枪。

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声明，非有绝对的必要时，我们不准备登载文艺作品的翻译。希望朋友们不要认为我们是藐视翻译，我们认为那样的工作不应该零割碎剐的做。那样的工作应该更负责任地以专书的形式或借杂志的篇幅来发表。我们所占的是日报纸面，日报的文艺栏用与现实脱节的译文来搪塞，除掉中国而外，九州万国都很少先例。我们认为，这无形中是买办意识在作祟。对不住，我们是要纠正这种偏向的。我们并不承认：月亮也是外国好。

我们的态度，大体上也就是这些。这是大家的意思，让我笔记了下来的。我们的理想是：尽可能做成一部人民的打字机。

1947年3月1日

青年·青年·青年

在今天的局势下，做青年的人实在是难乎其为青年了。

造成了今天这样局势的，我们这一代的人谁都有责任！是我们太不行，没有把中国搞得更好一点，反而搞得更坏，使后一代的青年，这样的受苦受难。我们谁还有资格向青年们大着面孔训话呢？

今天已经不是青年的老人们，谁也有做过青年的时代。我们做青年的时代有今天这样的险恶吗？

我自己生在小地主的家庭，没有领略过一丝一毫的饥寒的滋味。在中、小学时代虽然被斥退过三次，但也不曾感受过连和平地在学校读书都会有生命的危险。

今天是怎么样呢？算一算吧，民国以来究竟流了多少青年的血？而且这宝贵的血依然还在流，还在我们的眼前流，还在我们的手下流，还在向我们的嘴里流。我们这一批上了五六十岁的人，竟已经成为了吸血的大魔鬼了。

我们今天谁有资格向青年训话？我们应该少张几次嘴，少吸几次青年的血，那便是对于青年的无上功德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青年就是进步，就是道义的象征，决没有真正的青年而自甘堕落的人。

古人说："世间无不是的父母。"我今天却敢于说："世间无不是的青年。"青年假使堕落了，假使有什么不是，那并不是青年的过错，而是老年人的过错，社会的过错。

青年人谁个不想好学？凡是青年人谁都有好胜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① 的那种态度，是每一个青年人所具有的。问题是你究竟有什么东西让青年可学？今天做大、中、小学的教师们固然有很多负责任的老师，但他们自己已经就在饥寒交迫、生命威胁下过日子。责任负好，饭碗难保。这样的情势给青年们是一种怎样的教训呢？

青年人谁个不想做人才，而甘愿成为奴才？要养成人才，有养成人才的环境和准备。职司青年教育的人在环境和准备上没有做好而且做坏了，竟做坏到让青年们都不能安心读书而起来说话，这到底是青年的错还是管理青年者的错？

青年人始终不会错的。他们是毫无污染的明镜，一切是非美恶，他们辨别得很清楚。即使青年有了过错，甚至于由有望的人才变而为驯善的或横暴的奴才，但那也只是一时性的被动。只要他还是青年，一旦觉悟了，而主动地把那污染揩掉，明镜依然是明镜。

"浪子回心一片宝"，这不是在我们民间谁也知道的一句至理名言吗？青年们是始终有望的，谁也不能对他们绝望，他

---

① 语见《礼记·中庸》。

们自己也无须乎绝望。他们自己就是大家的希望。

真是令人绝望的，倒是那死不觉悟、或为自私自利而明知故犯的那些吸血成性的老年鬼。作恶，骗人，奴化青年，屠杀青年，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二天性。那种人便是青年的死对头。那倒不仅仅是盲肠，而是人类的癌。有了癌的威胁而要求治疗，这不是青年的权利吗？

在今天癌肿蔓延的这样局势下，真真是难乎其为青年了。但青年们，他们是自会开出一条生路来的。他们自己就是一条生路。

他们是智者，勇者，仁者。他们本身就是弥漫于全世界、全中国的民主潮流的动机，并不是谁在鼓动他们，而是他们在鼓动着进化。他们自己就是进化。

进化的潮流是谁也不能阻止的。青年们朝向自己的目标，自会不断的勇猛向前。即使暂时遭了阻碍，而不免迂回停蓄，但经过了那一时性的沉默，终也会勇猛向前。即使有些分子被卷入了西流而倒退，他们也会经过几个回漩之后而勇猛向前的。

请看昆明死难的于再①吧！为了民主，为了减少同学们的牺牲，而他自己抱上一颗将被投出的手榴弹而同归于尽了。

我们听见孔夫子说过"杀身成仁"的话，但不曾看见孔夫子"成仁"。我们也听见孟夫子说过"舍生取义"的话，但不曾看见孟夫子"舍生"。

---

① 作者原注：死于"一二·一"惨案，当时是昆明南菁中学教员。

释迦牟尼有“以身饲虎”的慈悲，但释迦牟尼并不曾“以身饲虎”。耶稣基督有代人赎罪的博爱，而他的钉上十字架还是出于被动。

于再并不是教主，他是一位青年，一位仅仅二十五岁的青年，但他的的确确地是做到了“以身饲弹”！主动地“以身饲弹”！

我有一个最大的希望可以在这儿陈述：今天的老年们应该虔诚地忏悔，努力向青年学习；拿出自己的良心来尽保护青年的责任。罪孽已经够深重了。

中国终会靠着下一代的青年而得救！

1947年3月8日

序《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魂。

作词的光未然①，我们今后还可以多领受他的创作；但作曲的冼星海可惜在前年已经在莫斯科病死了。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星海是悲多汶②型的音乐家。他本生在星加坡，到了中学年龄才回祖国来进中学，但因为对于音乐的酷好，中学未毕业他便到了法国去进行音乐方面的修养。他在这儿窘迫万分，实际是半工半读。

朋友们，你们应该欣赏过《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电影的吧？那里面的一位男主人公住在角楼里，把天窗开开，伸出半身在屋顶上专心拉提琴的那个情景，你们应该注意到吧？那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香港《华商报》，原题为《怀冼星海》。

① 光未然，原名张光年，一九一九年生，湖北光化人。诗人。《黄河大合唱》作于一九三九年，由冼星海谱曲。

② 悲多汶(L·van Beethoven，1770—1827)，通译贝多芬，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之一。作有交响曲九部、钢琴奏鸣曲三十多首等。

是把星海的故事，拿来做了模特儿的。

星海同时是一位革命家，尽管他那样专心于音乐，但他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妄人。他是要以音乐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的。因此，神圣的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能不放弃他的学业而从海外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了。

回国后便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我们曾经朝夕共处了二年光景，他终竟上延安去了。这《黄河大合唱》就是在延安产生的。

在一九四一年苏德大战爆发的前夕，他到了莫斯科，目的自然是做音乐上的更深的研究。战事的影响使他没有充分达到目的，他想回国，但在国境附近徘徊着，因而致病。以一九四五年竟长逝于莫斯科。这实在是无可补偿的一个损失。前年暑间，我到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正病在皇宫医院里，可惜我失掉了去看他的机会。听说他在苏联境内流浪时曾经做了不少的曲谱，本拟在病好之后，在莫斯科开一次演奏会的。这事情自然是流产了。他的那些乐谱我相信是不会遗失的，总有一天又会回到祖国来，让祖国的兄弟们领受他的鼓舞。

星海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是永远和我们在一道的。听吧，黄河在怒吼！那就是他的灵魂在怒吼，是中国的灵魂在怒吼！

1947 年 3 月 10 日

消 夏 两 则

一 寻 人

“人乎，人乎，魂兮归来！”

这是我在三十三年二日八日替《浮士德》第一部的东南版所写的序文的标题。我那时在替日耳曼民族招魂。我说：“日耳曼民族未听此劳苦人之教训，误为狂兽所率领而已群化为虎狼，毒性所播，并使它族亦多效尤而虎狼化。人类在如海如洋的血泊中受难，因而于苦劳人之体念倍感深切。——人乎，人乎，魂兮归来！”

然而到了今天，我感觉着这太肤浅了。人的“虎狼化”吗？不！假使站在虎狼的立场，就会反对这样的表现。虎狼虽然是肉食性的猛兽，但它们在同类间是很少自相残害的。虎吃虎，狼吃狼，是很少见的事。然而人吃人，人杀人，而且集体的吃，集体的杀，却是家常茶饭事了。人不是比虎狼还要残忍，还要猛恶吗？

三十年前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医科。有一次在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精神病的教室里，教授叫人引了狂人出来示范，那是一位躁性狂，被两个人控制着，总想脱身，两眼放着可怕的光，口里不断地叫着：人到那儿去了？人到那儿去了？人到那儿去了？……

那样简单的呐喊，喊得我真有点毛骨悚然。

我们那时相信他是狂人，但他真是狂人吗？

假使他真是狂人，那我今天也就算发狂了。因为我是想这样呐喊：

"人到那儿去了？人到那儿去了？人到那儿去了？……"

二 牛的教训

陶行知过世转瞬就已一周年了。

今天是周年忌后的第二天，早晨寿昌和力扬在朋友处借了一部汽车来约我同到大场去，访问育才学校。

很晴朗的天气，虽然在盛暑，但在汽车中有凉风涤荡，觉得很舒服。

好久不到市郊了，一到田畴间，好象才突然发现了的一样，原来还有这么宽的自由天地！

道旁有些无花果园，果实已大逾拇指。

正是芝麻开花的时候，那青白的钟形花在浓碧的厚叶下，显得特别新鲜。

到了学校，一切都还在建设中，把美国进来的一栋活动房屋，顶上天去做成楼房，下面砌了很高的砖壁准备作为礼堂之用。我感觉着：这是最好的废物利用。

是谁发明了这样的利用法，实在是值得赞美。

遇见了不少重庆的熟朋友，我虽然第一次来，但好象回了自己的老家。

柿子树四处成荫，结着青的果实。

我喜欢的广东木莲，两大株，对称地种在正院前面的园子里，可惜花时已经过了。我追念着那厚大的莲花样的白花，那浓重而毫无吝惜的香气。厚朴树也把花时过了。

陶行知的遗像挂在大堂的右壁正中，壁次有好些纪念文字，是昨天做了纪念会所留下的。

但陶行知却分明在我的眼面前走着。

我们首先被邀去看了学校后面的牛栏，养着五条母牛，骍色而间插着一些白色箭毛。

学生们自己在挤牛奶。

牛是没有穿鼻的，据说驾御上相当困难。一出了栏，很不容易追捕，入栏时也要很多人拖。下船后曾有一次一条牛跑了，开了一部吉普车去才追回来。

中国人发明了穿鼻的办法——这到底是值得赞美，还是值不得赞美的呢？我在心里这样想。

五条牛看见我们一些生人，它们歆动了一下，不一会，整齐地排成一列，都把臀部朝着我们。

真是可以佩服，那样的整齐划一。

这分明是不欢迎的表示。

我相信牛是看见了都市去的人，带着了一些都市臭。以臀部相向，大概是以臭对臭吧？

牛！我倒希望你们把头掉过来，就跟田单的火牛①一样，向你不喜欢的人牴触。

参观了附近的托儿所，听了育才小朋友们唱歌，看了他们跳舞。吃了他们煮的饭，新鲜毛豆，新鲜番茄。

有这么多的亲人在这儿，有这么宽的自由天地在这儿，我为什么一定要苍白着一个面孔呢？

我真不想走了，我愿意在这儿看守牛栏。

是的，我得让那五条牛也回过脸来，和我亲暱。

1947年7月28日

① 田单，战国时齐国人，相传燕伐齐时，单任齐将军，以“火牛阵”败燕兵。

我并未见魏德迈

事情真有点希奇，今天清早一见《时代日报》①，一个大标题《魏德迈晤郭沫若》，细看是“美国新闻处上海十四日讯”，我不禁大笑。这是怎么回事呢？

接着看《新闻报》、《大公报》，都登载着我见了魏德迈，而且都作为“本报讯”。《大公报》甚至还说我“向魏氏提一书面意见”，更是天外飞来的奇事了。

当然，我应该向美国新闻处及其它各报去函请求更正，他们肯不肯更正，倒也又是一项小小的测验。

认真说，我对于魏德迈并没有丝毫愿见的意思和必要。甚至于有些朋友要去，我都劝他们最好不要去。象魏德迈那样的一位忙人，今天飞东北，明天飞台湾，后天又飞广东，在我们中国领空中飞来飞去，两只贵耳里塞满了“报告”，我们实在是应该体谅体谅他一下才好。

我是中国人，我倒赞成我们应该“自力更生”。请别人来帮忙，固然不是自力，请别人不要帮忙，也同样不是自力。

1947 年 8 月 16 日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原名《新生活报》，同年九月一日改名《时代日报》，一九四八年六月停刊。

一封信的问题

今天展读《人世间》① 第六号许寿裳先生所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有这样一节：

> 他又告诉我：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说道，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因之罗氏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并没收到。因为那时创造社对我笔战方酣，任意攻击，便把这封信抹煞了。……鲁迅说罢一笑，我听了为之怃然。

许先生叙述得很婉婉，而于措辞之中却严正地寓有春秋褒贬的笔法。鲁迅的“一笑”自然表尽鲁迅的宽大与不念旧恶，而寿裳先生的“怃然”则既悲文物之堙灭，复悯人性之卑劣，真是慨乎其难言了。

不过这个问题却是值得追究的一个问题。

在抗战前一年我还在日本亡命的时候，看见了增田涉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人世间》月刊复刊第二卷第一期。

① 综合性刊物。一九四二年十月创刊于桂林，初为半月刊，曾一度停刊；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上海复刊，改为月刊，卷期另起。一九四九年二月终刊。封凤子主编。

《鲁迅论》①，发表在《改造》②杂志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这篇文章被台湾的一位文艺青年翻译成了中文，登在他们的杂志《文艺青年》③上，因为他们寄了一份给我，我便接触到这个问题的第二次的提出。我当时写了一封信给台湾的青年们，说明我相信，创造社的朋友们不至卑劣到这样的地步。当时敬隐渔④还在，罗曼·罗兰也还在，我以为是可以弄得一个水落石出的。台湾的朋友们把我的信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了，惹得那位霸气十足的英雄增田涉又回骂了我一通，说：他就恭候着我的一个水落石出。

惭愧得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我结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逃回了祖国来。回到上海一探问，才知道敬隐渔得了狂疾从法国回来，不久便蹈海死了。糟糕，这算是死了一个证人。八年抗战当中，为着工作忙，也为着时局的不如意，把这个问题也就寄放着了。但不幸罗曼·罗兰在三年前又成了故人了。

半年前承一位朋友送我一册许广平编印的《鲁迅书简》，这是鲁迅手笔原稿的影印。我看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答Y⑤的信上，正由鲁迅的亲笔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儿这样

① 增田涉(1903—1977)，日本汉学家。一九三一年来华时结识鲁迅。《鲁迅论》即其所著《鲁迅传》，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四月《改造》特别号。

② 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山本实彦主办，东京改造社发行。

③ 应为《台湾文艺》。月刊。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创刊，台中台湾文艺联盟发行。张星建编辑。作者的信发表于该刊一九三五年二月第二卷第二号，题为《〈鲁迅传〉中的误谬》。

④ 敬隐渔，四川遂宁人。创造社早期成员。早年留学法国，曾将《阿Q正传》译成法文，载于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杂志上。

⑤ 指姚克，原名志伊，字莘农，一九〇四年生，浙江余杭人，剧作家。著有《西施》、《楚霸王》等。

说着：

> 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

和许寿裳及增田涉的文章对照起来，可知这儿所说的"一封信"，也就毫无疑问，就是罗曼·罗兰批评过《阿Q正传》的那封信了。

真是可惜的很，一九三三年离信的寄出也并不"太久"，敬隐渔和罗曼·罗兰既都还健在，索性就严格地"查考"、"搜寻"，也并不就会"将永远找不到"的。不过，好在那"永远找不到"的评语，却在许寿裳的《印象记》中找到了一些，便是"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幸吧。

不过我对于这问题却想追究一下。罗兰的信究竟是那一年那一月写的呢？可惜各种资料上都没有明白地记出。但由这两句话中可以约略推得出一些线索。

一　"那时创造社对我笔战方酣，任意攻击，便把这封信抹煞了。"

二　"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

查创造社和鲁迅笔战，迹近于"很讨厌"鲁迅的，是从一九二八年的年初开始的。这年的初头我害了一场大病，二月初

便亡命到了日本。成仿吾是在当年的五月也经由日本，再渡往苏联，更经由西比利亚而往欧洲。在仿吾走后，王独清① 负过一次短期间的责任。不久王独清和陈独秀② 结合，便和创造社水火，因而脱离了。创造社本身呢？是以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被武力封锁了的。

说到"笔战方酣，任意攻击"，那当得是一九二八年二三月以后的事。我倒幸运得很，那时我已经不在上海，而且对于创造社的事务早就没有过问了。假使那封信的寄出是在五月以后，那吗仿吾也不能负责的。说不定是王独清起下了恶意。王独清是精通法文的人，而他那时又在创造社负责，他的嫌疑实在很严重。然而不幸得很，这王独清也成了故人了。

老实说，我到现在也并不想把这责任就推到王独清一个人身上，弄成一个死无对证。我对于问题却认为实在很有可疑的地方。

第一，这封信究竟是不是真实，"译者敬隐渔"回国时是发了狂的，他的话就绝对可靠吗？

第二，信即使真有，但由欧洲寄回国的信往往遗失或延期，谁能够证明它确切是寄到了创造社？

第三，谁能保证那信不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创造社

---

① 王独清(1898—1940)，陕西长安人，诗人，创造社成员。著有《圣母像前》、《独清译诗集》等。

②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任中央局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因坚持错误，并组织反党派别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被封后才寄到，因而失落了？

第四，创造社起下了那样的黑心肠，“把这封信抹煞了”，到底是谁的见证？

因此我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当然我并不是怀疑鲁迅，而是有点怀疑敬隐渔其人。

敬隐渔是我的同乡四川人，他本来是成都天主教堂所收养的一个孤儿。他的天分高，后来便受了天主教的严格的教育，法文和拉丁文的教养都很深。我们在办《创造周报》的时候，他到了上海，住在徐家汇的一座天主教的学堂里面。他用法文翻译了我的《函谷关》和《鹓鸰》，都先后登在《创造周报》上，因此便时常到我寓里来。后来他竟成为了创造社的中坚分子，自己也写小说，仿吾是十分激赏的，曾夸示为“创造社所发掘的天才”。

隐渔很瘦削，个子很小，但一双眼睛却极大而炯炯有光，每爱瞵视。日本话称瞵视为Kiorori，因此我们也就给了他一个诨名叫“屈罗里”。他自己说他懂催眠术，我们虽不曾教他试验过，总觉得他是带着几分阴阳怪气的。

不久《创造周报》停刊，创造社一时呈瓦解之象。我那时候又朝日本去呆了半年回来，敬隐渔落魄在上海，是我劝他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他翻译了，并由我介绍到商务出版。因此他和罗兰通信，并得到了罗兰的劝诱与资助而游学法国。这以后的事我就不大知道了。只是听人说，罗兰待他很好，而他却是很有些荒唐的地方。再则，他往欧洲后，和创造社便疏远了，而和当时的文学研究会倒发生了更

密切的关系。

我就根据这些，对于这位狂死了的“天才”，实在是不能相信的。请想想看：敬隐渔赴欧洲以后，创造社的刊物上便不再见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却每每发表在文学研究会有关系的刊物上，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他为什么不寄给文学研究会转致，或“请他们发表”，而要“寄给创造社”呢？鲁迅的对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更加亲密，你怕敬隐渔是不知道的吗？我敢于拿人格来保证，那位“天才”决不是那样迂阔的人！因此我敢于说：问题实在是有点近于莫须有。我对于鲁迅是尊敬着的，对于许寿裳也是尊敬着的。但我也爱我的朋友，我敢于相信，与创造社关系较深的一些朋友，如成仿吾、郑伯奇、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等，决不是那样“抹煞”别人的信件以图快意的那种卑鄙的人。因此，我虽然已经弄不出一个水落石出，而我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是怀疑着的。

至于鲁迅说“这社是很讨厌我的”，在这儿也得稍稍申述一下。

创造社同人对于鲁迅并无怨嫌。成仿吾在当年从事批评的时候，他严烈地批评过周作人和文学研究会的某些朋友们，倒是事实，因此他被周作人讥谥为“苍蝇”，而被其他的人们斥骂为“黑旋风李逵”。凡是稍通文坛掌故的人，这些故事是容易回忆起来的。但仿吾对鲁迅的《呐喊》却是赞扬过的。郁达夫之于鲁迅，更有点近于崇拜了。

鲁迅对于创造社的一些人，起初也并不那么“讨厌”，《两地书》里面有一封给许广平的信上说过这样的话：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这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写的信。那时候我已参加北伐，就在那一天我正奉命离开武汉往九江、南昌一带工作。这可见鲁迅也认创造社的同人们是在“向旧社会进攻”的，而不惜和他们“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

更有趣的是，鲁迅先生这“第二野心”，恰恰和我当时所怀抱的见解，不期巧合。第二年的十一月左右，我失掉了自由回到上海，那时鲁迅也住在上海。我曾同郑伯奇、蒋光慈①诸兄商议，把《创造周报》恢复起来，作为启发青年的言论机关，并请求鲁迅领导。他们两位去和鲁迅商量，鲁迅也就答应了。因此《创造周报》复活的广告便见诸报端②，负责人是以鲁迅领头，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位。这是有报可查的。

但不久仿吾游历日本回来，还有继续回来的所谓“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他们那时候异常尖锐，都不赞成我的主张，因而便把成议打消了。这对于鲁迅的确是对不住的一件事。而更对不住的是《文化批判》③出版，竟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

---

① 蒋光慈(1901—1931)，原名儒恒，安徽霍邱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拓荒者》等刊物。著有《少年飘泊者》、《咆哮了的土地》等。

② 此广告登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时事新报》。

③ 创造社后期创办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于上海，同年五月停刊。丁嘉主编。

我那时候失掉了自由，在上海反正是不能久呆的。我的意见一受到多数同人的反对，我也就退让了。接着更害了一场斑疹伤寒，九死一生地算恢复了转来，我便跑到日本去亡命去了。

这些往事回忆起来，我想也并不是毫无意义。这一方面证明创造社并不"讨厌"鲁迅，而鲁迅也并不"讨厌"创造社，只是由于一部分朋友的认识不足，惹起了一场"笔战"，说遗憾倒也是值得遗憾的。不过我也还要替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说几句公平的话。他们的批判鲁迅即使是出于错误的认识，以为鲁迅代表着封建意识的残余，但他们是对事不对人，存心在打击封建意识，并非打击鲁迅。后来那些朋友，一反而推戴鲁迅，不就是很明白的证明吗？

可惜得很，今天有好些朋友们，死的死了（如郁达夫、朱镜我），活的分散在四方（如成仿吾、何思敬①、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更有的被关在监狱里（如郑伯奇），我得不到他们共同来证明这一件事——这一件"抹煞"罗兰来信的事，我实在不仅"怃然"，而且有点遗憾。

但我敢于相信这些朋友们并不那么卑鄙，这儿毕竟还是保留着一个问题。

1947年8月30日

---

① 何思敬（1896—1968），名畏，浙江余杭人。创造社成员，学者。译著有《哥达纲领批判》、《战争论》等。

国画中的民族意识

古代名画家中不乏民族意识浓烈的人。

有名的《心史》的作者郑所南①，在南宋灭亡后，画兰露根不着土，表明大宋的疆土已经没有了。他有一首很痛快的诗，把这层意识说得很明白：

纵使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
千语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

和这遥遥相映的是元朝末年的王冕②。这位豪放的天才画家，在朱元璋③造反时，他曾经做过他的谘议参军，革命性也可以说是很强烈的。他喜欢画梅，在画上也题过这样一首同样痛快的诗：

猎猎西风吹倒人，乾坤无处不生尘；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① 郑所南（1241—1318），名思肖，字忆翁，连江（今福建连江）人。宋末诗人、画家。著有《一百二十图诗集》、《郑所南先生文集》等。

②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梅花屋主，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元代画家、诗人。著有《竹斋集》。

③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明朝开国皇帝。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年在位。

胡儿冻死长城下，始信江南别有春。①

元人统治了中国的疆土将近一百年，然而统治不了的是中国人的心，由这些画人的诗不是明白地表明着的吗？

明朝灭亡后的那位八大山人②，可以说是尤其奇特的了。他装哑一辈子，卒至郁郁以死。人们说他狂了，其实他何尝狂。他在绘画中不仅是一代巨擘，且长于书法，据说“有诗数卷，祕不示人”。诗是失传了，现今仅存的是《题山水画》的一首七绝：

郭家皴法云头少，董老麻皮树上多；
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江河。

请反复读这首诗吧，你可以认为他真是有点狂疾吗？不，绝对的不！假使容许我们作更进一层的了解的话，倒可以悟出南宋以后的中国画，尤其山水画，为什么酝酿成了一种回避现实的倾向的主因。

画山水，应该就是顶现实的画材了。山是此山，水是此水，在人类史开幕以来的几千年内没有什么变更。然而就连这样的题材，在南宋以来的画人都成为回避现实的逋逃薮了。因为在这山水中点缀着的人物衣冠、楼台建制，都十分地可以表现着时代。

---

① 王冕的《应教题梅》诗，见陈衍（宝琛）石遗室本《元诗纪事》卷二十一。

② 即朱耷（约1626—约1705），谱名统鍙，别号雪个、八大山人等，南昌（今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画家。

在这儿，元末四大家，清初四大僧，以及所谓“四王”，[1]他们在山水画上的倾向差不多是一致的，便是人物必古衣冠，楼台必古建制。这到后来一直便成为了定型。凡是画山水的人，直到今天差不多都还脱不掉这个窠臼。

我们简单地斥为逃避现实，认真说倒是有点冤枉古人的。那些有山河之痛的古人，所以酝酿成了这样的一种倾向，倒是出于极现实的深刻的民族意识呵！

后人把这民族意识忘记了，而只拘守着那逃避现实的皮毛，倒是极可悲悯的事。

不过我们倒也不能专门指责国画家，要说国画仅学着古人的皮毛，新的美术又何尝不是仅学着西洋人的皮毛呢？更说宽一点，不仅画家是这样，举世滔滔，不都是在学西洋人、尤其美国人的皮毛吗？

要紧的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尤其人民意识的觉醒，但请留心，这决不是排外，也决不是复古。

1947年9月6日

---

① 四大家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　四大僧指八大山人（朱耷）、石涛（朱若极）、弘仁（渐江）、髡残（石谿），他们都曾出家为僧，故称。　四王指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厚祁。

序《民主化的机关管理》(节录)

值得慨叹，我们中国人近来被人叱斥为不懂科学，不懂民主，甚至是全面的腐化无能。我们中国人真真是这样吗？不，决不！不懂科学和民主，全面地腐化无能的，不是中国人民，而只是少数的“自私自利”之徒。但不幸的是这“自私自利”的闰统却掌握了中国政权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使中国人民的能力，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作充分的施展，因而我们是显得落后了。然而，人民是全智全能者，“三个臭皮匠，赛得过一个诸葛亮”！假使嫌这话不雅驯，那也不妨从书本子上引些话来雅驯一下吧：

> 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
> 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
>
> ——《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篇》

中国人知道得民主原理已经在两千多年以前，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但我们今天也深深地明白了，我们的少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增订第一版《民主化的机关管理》。

《民主化的机关管理》，黄炎培著。

数人之所以腐化无能，就是因为“自私自利”，不能够用众。众是最有勇力，最有明智的，不能够用众岂不成为最庸弱而无能吗？因而我们倒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最大的独裁者便是最低的无能者。

中国人民是有资格谢却“腐化无能”的叱斥的。如其不信，请看中国人民能够作主之后的中国吧。那将表现为：不仅是一个点缀的“田纳西”（T.V.A.）①，而是全面化的“田纳西”。

1947年9月16日

① 作者原注：T·V·A·即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之简称，中译名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美国一九三三年建立的水利工程组织。

再谈郁达夫

关于达夫，我已经写过一篇《论郁达夫》，收在《历史人物》里面了。

最近看见王任叔① 的《记郁达夫》（《人世间》第二卷第一期），有些地方提到我和达夫间的关系，然而显然有着错误，因此我想再来谈谈。

> 是他，这郁达夫，在日本《人名大字典》上，地位比郭沫若还高。"郭沫若就是这样妒忌我郁达夫的"（达夫亲自对我这么说），谁还不知道郁达夫呢，……

我可不相信郁达夫果真说过这样的话，恐怕是王先生记错了吧？

第一，所谓日本《人名大字典》，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人著的，什么书房出版的。第二，在字典上的地位的高低，我也不懂这意义。既是字典，应该郁达夫是一项，郭沫若是一项。郁达夫的郁，照日本的汉读是读为Iku的，郭沫若的郭是读为Kaku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上海《文讯》月刊第七卷第五期。

① 王任叔（1901—1972），笔名巴人，浙江奉化人。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监狱》、《莽秀才造反记》、《文学论稿》等。

的。如依罗马字的顺次排列，I在K之前，郁自然比郭会高。如依日本假名排列，无论依照“伊吕波歌”的顺序或“五十音图”的顺序，郁字都得在郭字之前。再说，依汉文的笔画吧，郁也当得在郭之前。我怎么幼稚到那样可怜，会因在字典上的地位的高低而“妒忌”达夫呢？达夫又何至于幼稚得那样可怜，要说我因为字典上的地位的高低而妒忌他呢？要吗，除非那字典的编法，就和班固① 的《古今人表》的编法那样，是分了上中下的人品的，不然这字典上的地位的高低，我实在有点不能理解。

或许是编字典的人在叙述我和达夫的项下，曾经为我们较量过高低，而加以评骘吧。这倒是可能的。事实上达夫是比我高，我向来都承认。关于这层，我比任何第三者的日本人认识得更清楚，达夫也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他的天资比我高，学识比我高，外国文和外国文学的修养比我高，中国旧诗的成就比我高，小说是他的专长，当然更比我高。这些我都是一向承认的，我有达夫这样的朋友感觉过骄傲是实在，怎么能说我“妒忌”他呢？要说别种意义上的“地位”，创造社根本就没有过严密的组织，说不上谁高谁低。不过要拿学级来说，成仿吾要高我们一级，应该算他最高。达夫虽然和我同级，但他学的是经济，大学三年毕业，我学的是医学，四年毕业，我在中间为创造社的建立，曾回国休学一年，因此达夫的大学学程是早我两年毕业的，自然他就高过了我。创造社的各种刊物如《创造》

①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著有《汉书》。

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①、《创造月刊》，乃至《洪水》半月刊、《流沙》、《文化批判》、《思想》② 等等，我都没有负过主编的名义。初期的几种，主要是达夫和仿吾负责的。如要以主编者来定高低的话，我也得承认，达夫和仿吾都高过我。但我何至于因为这样的高低而生"妒忌"呢！

所以我不能相信达夫会对任叔先生说过那样的话，那一定是王先生记错了。

自然，我和达夫，也有过一些龃龉的地方，那是无可讳言的。普通的"兄弟"不是都还要"阋墙"的吗？但龃龉的动机也并不是出于"妒忌"，更说不上是因为地位的高低。本来这些往事，我在有些机会上都是叙述过的，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不妨把来汇集在这儿。

第一次的龃龉：

这是一九二三年在编《创造日》的时候发生的。当时的政学会（即后来的政学系）有一个机关报在上海叫《中华新报》③，由张季鸾④ 在主笔政。张季鸾和我们都是大高同学会里

---

① 《创造日》，日刊。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创刊于上海，同年十一月二日终刊。

② 《洪水》，半月刊。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次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终刊。 《流沙》，综合性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刊于上海，同年五月终刊。 《思想》，综合性月刊。一九二八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同年十二月终刊。

③ 政学会，一九一四年成立，主要成员为国民党的右翼分子。其机关报《中华新报》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

④ 张季鸾（1888—1941），原名炽章，陕西三原人。《大公报》创办人和主笔，中国新闻界新闻自由的倡导者。

面的人（日本留学生毕业于帝国大学及各高等学校者合组为大高同学会），有一次就在同学会的聚餐上，季鸾向我提议，要创造社的朋友们替《中华新报》编一个副刊，我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答应和大家商量。在我和达夫、仿吾商量的时候，我是不赞成出的。我的理由是政学会的倾向有问题，《中华新报》报格不高（当时在上海只是三四等报，销路百来份），我们也忙不过来（当时有《季刊》和《周报》）。但达夫和仿吾都赞成出，我也就退让了。于是我们分工，我对《周报》更多负些责任，仿吾和达夫对《创造日》更多负些责任。但我得承认，我们在情趣上是有些龃龉的。不幸《创造日》只出到一百期，由章士钊的来沪，而被报馆方面提议停刊了。

第二次的龃龉：

这是在《创造日》创刊后不久的事。北大教授陈豹隐要赴苏联，他所担任的统计学，一星期有两个钟点，他打电报来请达夫去担任，充北大的讲师。这时我是不赞成达夫去的。达夫应该把他的使命放在文学上，何必去教统计？讲师的地位不大冠冕，何必屈就？《创造日》刚创刊，达夫一走，如何维持？但达夫和仿吾都主张去，我也就退让了。不过我也得承认，我是感觉着有点不舒服的。特别是达夫去后一直不替创造社的刊物写文章，一时俨然把我们当成了路人。

第三次的龃龉：

这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创造周报》办了一周年要停刊的时候。达夫去北平后不写稿子，仿吾已决定赴广东大学任理科教授，我自己在意识上有了转变，《周报》便决定停刊，我跑到

日本去搞社会科学去了。而达夫在这时却决计与太平洋社①合作，由太平洋社与创造社合办《现代评论》②，这是使我最伤感情的一件事。太平洋社的主要人物就是王世杰、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陈源③那一批大学教授，我认为和他们合不拢来，而且把文艺拿去作为并不进步的政论的附庸分明是一种后退。然而达夫和仿吾商议的结果，便在《周报》上登出了合办《现代评论》的预告。我在日本看见这预告时是伤心痛哭过的。结果达夫在《现代评论》的地位，后来自己认为是"小丑"，还惹起语丝社④的误解认为我们帮凶，我和仿吾都还捱过骂。实在是大不值得的一件事。

---

① 指太平洋杂志社。王世杰、周鲠生等人主办，一九一七年三月成立于上海，出版《太平洋杂志》，一九二四年停刊。

② 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迁至上海出版，次年十二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胡适、陈源、徐志摩等。

③ 王世杰(1882—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著有《比较宪法》、《中国奴隶制度》等。　周鲠生(1888—1971)，原名览，湖南长沙人。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等职。著有《近代欧洲外交史》、《国际法》等。　杨端六(1885—1966)，湖南长沙人。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会计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著有《信托公司概论》、《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等。　皮宗石(1887—1976)，字皓白，湖南长沙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武汉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湖南大学校长等职。　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著有《西滢闲话》等。

④ 指《语丝》杂志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语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主编。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同年十二月在上海复刊，鲁迅、柔石、李小峰先后主编。一九三〇年三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川岛、刘半农、章衣萍、林语堂、钱玄同、江绍原等。

第四次的龃龉：

这是一九二七年在北伐期中的事。我那时在南昌，达夫辞去了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回上海来专门负责经营创造社。他用“曰归”的笔名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广东事情》，尽量暴露了广东方面不满人意的地方。我认为不妥当，曾经分别写信与仿吾和达夫，表示意见。那时上海还在孙传芳的管制下，广东情形尽管不满人意，总还是革命的大后方，不好在敌人的管制区域去加以揭露；何况创造社的朋友们都集中在广州，而我又在前方，我们的步调这样不一致，会弄得大家难处。但就以这一封信为导线，后来竟惹得达夫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了。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那时候达夫和上海新月社① 的人们太接近了，那些人们是在孙传芳、丁文江的羽翼下的，因此便遭了创造社小朋友们的反对。达夫对这，或许曾有误解，以为是出于我的策动。达夫在前多少有过一些偏见，他总以为创造社的小朋友们多是我的私人，其实那完全是误解，达夫后来也当然是觉察了的。

就这样，龃龉又加龃龉，我们终至于闹到过绝交。这些都是事实。但决不是谁“妒忌”谁，也决不是谁的地位高低的问题。在达夫正式宣布绝交后，他公开地写过文章来骂过我，骂过仿吾，骂过创造社的其他的人，有达夫的文章可以复案。我也忍受不过，曾经隐讽地回答过一下，大约是写在《桌子的跳

① 现代文学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陈西滢、闻一多、邵洵美等，该社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次年三月创办《新月》月刊。

舞》里面的吧。我们那时都还年青，感情彼此都不容易控制，是值得遗憾的事。但我始终对达夫是怀着尊重和惋惜的意思的。我尊重他的天才，尊重他的学殖，尊重他的创作成绩，更尊重他的坦白直率，富于情谊，为了朋友每每不顾一切，把自己置诸度外；但我可惋惜他有时候比我更加轻率，做事情往往太不思前想后，过于冲动，而且他往往过分自贱自卑，这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自暴自弃或不自爱不自重的程度的。可是今天我得承认，这些都正是达夫的美德。他那样容易忘我，实在是他的品格崇高的地方。我自己比起他来，实在是庸俗得非常。我虽然也是一位冲动性的人，但比起他来，我要更矜持得多，更有打算得多了。我做一件事情，每每有点过分的思前想后，而采取保守。在表面看来，我好象是一位急进分子，而达夫倾向于消极，而在我们的气质上，认真说，达夫实在比我更要积极进取得多。但他的积极进取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适当的展开，那是应该归罪于时代和环境的。

然而达夫行事尽管有时候过于轻率，有时候容易被人利用，但他本质上是一位善良而无私的人。他只要一发觉他的轻率，被人利用，他便能够立刻回头，不致陷入太深。他和太平洋社的关系，和新月社的关系，都是这样。但他和创造社的关系却是恢复了的。我们几位老朋友，尽管闹翻过一次，结果还是言归于好了。我们是和弟兄一样，虽然十年反目，但把目再反过来，依然又是兄弟。我现在请说到他和我的复交吧。那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年底，达夫曾经游历过一次日本，我那时候还住在日本千叶县的一个乡下市川。他亲自到市川里来访

我，我们是高兴得无以复加的。那时的情绪我写过一篇《达夫的来访》，收在《归去来》一个集子里面了。

那一回达夫曾先后到乡间三次。我因为他的关系，也被东京的日本文人们邀去参加过几次欢迎他的宴会。达夫是十二月十七日离开东京的，我还曾赶到东京驿去送行，但正碰着车子开。达夫站在最后一节的头等车的最后的凉台上，挥着帽在向车站上很多送行的人惜别。我跑去杂在那些人众中间，他恐怕是没有看见的（关于这层，后来见面后我也忘记问到）。我跟着车子跑了一段，放开喉咙喊了好几声"达夫"。这些情形仿佛还是昨天的事一样。

达夫那时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他的到东京纯粹是游历性质，但他遭到日本人的误解倒是实在。那时候日本人正积极筹备着对于中国的大侵略，在经济国策上在搞着所谓"战时体制"，在政治上在搞着什么"国体明征"，又有什么"社会新编制"。一句话归总，法西斯体系的完成是在露骨地加紧。因此，一般有爱国情绪的中国留学生也是在被加紧监视中的。达夫在这样的局势下去游历，表面上虽然受着一些文人们的欢迎，而实质上却受着宪兵警察们的监视。在十二月五号，研究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日本人士曾经邀请达夫在学士会馆讲演，讲中国的诗，但在未开讲之前便被警察禁止了。

第二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件爆发，我在七月二十七日便逃回到了中国来。我的回国的经过，在初日本人方面因为不明真相，是有过一番揣测的，他们以为是和达夫有密切的关系。达夫在半年前之来，就是负了这个使命。这种揣测很具

体地表现在佐藤春夫的一篇小说里面，题目似乎是《亚细亚的儿子》，曾经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后来并且电影化了的。那就是把我的归国拿来做了题材，而加以种种想象的成分，并说到我回国大感失望，后来又跑到殷汝耕①那边去从事"大东亚和平运动"，做了一座大医院的院长，于是大团圆。中间关于我回国，就把达夫的游日连接上了。他把达夫写成为一个间谍，而且写得很坏。这位佐藤春夫和我们并不生疏，他在介绍鲁迅上更曾经被国内一部分的朋友们感觉着亲暱的，但他事实上是日本军阀的一个号筒，他是大日本主义的一位积极的鼓吹者。达夫游历东京时，对他曾经特别表示过敬意，但没想出在他的笔下竟被写成了不可想象的反派。达夫为这事曾经写过文章来驳斥，那时我们同住在武汉，是武汉还没有陷落的时候。这篇文章将来总可以有方法查出吧。就是佐藤春夫的那篇小说，一定也可以查出的。在武汉时，最初看见那小说的是崔万秋②，因为他在国际宣传处服务。他们经过特种关系，是经常可以见到日本的报章和杂志的。

我现在倒感悟到了。佐藤春夫的那篇小说，说不定和达夫的遇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把达夫写成间谍，而把我的回国归到达夫的策动，这可能是代表着日本官宪的意见。即使不是奉命而写，但经他一个人的想象那样写成之后，他是有很

① 殷汝耕（1885—1947），浙江平阳人。曾先后参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卖国条约。一九三五年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以汉奸罪被处决。

② 崔万秋，一九〇四年生，山东观城（今划归河南范县）人。国民党复兴社文化人。曾主编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

多的读者的人，自然可以把那种误解传播得很广，而使那种误解也就成为日本官宪的意见了。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日本人是很褊狭的，而且复仇心很顽强，达夫如被那样误解，日本宪兵要不甘心他，那真是近情近理的事了。是这样，我们竟直可以说：佐藤春夫把达夫杀害了！

佐藤春夫的揣测，其实完全是误解。这误解传播得似乎很广，就在王任叔的文章里面也说着这样的话：

> 而且，也是他，这郁达夫，曾经做过蒋委员长顾问，当过中央设计委员会的委员；而且还是他，抗战的直前，去过日本，和许世英大使共同设计把郭沫若弄回中国来的。日本人一定是痛恨郁达夫死了的，……

这差不多就完全承受着佐藤春夫的揣测。其实关于我的回国，达夫虽然有着一些间接的关系，但对于直接的策动是毫不相干的。我现在可以把我回国的经过，扼要地叙述出来，因为现在是可以公开的时候了。

在芦沟桥事变前两三个月光景，达夫从福州突然给我一个电报，说当局对于我将有重用，要我赶快回国。我回电请他把详细情形告诉我，但他却没有回信。事实也就阴消下去了。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帮助了我行动的是钱瘦铁和金祖同①。瘦铁在王芃生②的系统下做情报工作，他曾经把我的意思通知当时在国内的王芃生，得到了政府的同意，他便为

① 钱瘦铁（1896—1968），名厓，字叔厓，江苏无锡人。书画家。 金祖同（1914—1955），笔名殷尘，浙江嘉兴人。著有《郭沫若归国秘记》。

② 王芃生（1893—1946），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外事训练班和中美合作所教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研究所主任。

我负责进行购买船票等事项。祖同便奔走于东京与市川之间传递消息。当然大使馆方面也是知道情形的。一切的准备停当了，我于七月二十五日破晓离开市川，在东京和瘦铁、祖同取齐，乘快车到神户，改乘加拿大皇后号回国。祖同是一同跟着我回国的。在动身之前，我曾关照过大使馆，请拍一电报通知达夫。因此，我在七月二十七日到上海时，达夫竟从福州赶来迎接了我。当时我问了达夫，他打电报给我的经过，他只说是当时福建省主席陈公洽①要他打的，他也把我的回电给了陈公洽，但以后却没有下文，一切经过的详情他也不知道。他劝我往福州去，但我谢绝了。达夫就在当天下午便乘船回福州去了。

这，就是达夫对于我的回国所参预的全部，事实上他只做了一番间接又间接的传达消息的工作，并不是他"和许世英大使共同设计"把我弄回中国来的。这真是把达夫冤枉死了。但为什么又选到达夫来和我通消息呢？这在后来我是弄清楚了，虽然也并不怎么清楚，只是一个大略。

我回国后便住在上海，当局曾经要我到南京，我没有去。一直到九月底，又由陈诚的推挽，我终竟到了一次南京，见了一次蒋介石，只两三天工夫我又回上海来了。在回上海的前夕，我去访问张群②并向他辞行。是他亲自把底细告诉了我，

---

① 陈公洽（1883—1951），名仪，浙江绍兴人。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福建、浙江省政府主席，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职。

② 张群（1889—1990），字岳军，四川华阳（今属成都）人。政学系首领。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

我才把这个闷葫芦凿破了。

原来四五月间，在庐山有重要的聚会，张群和其他的一部分人，说到了我，认为可以让我回来做些工作了。在当时我是受着通缉的，必须蒋介石点一个头，我才有公开回国的可能。张群在一个机会上向蒋提出了，也得到了允许，因此我的回国便不成问题了。但怎样把这消息来通知我呢？陈公洽那时也在庐山，便想到达夫和我的关系，所以就由他通知达夫，由达夫再通知我。这些经过，连达夫自己也是不知道的。

这里顺便我还想叙述一点后来的事。

在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我以十一月二十七日赴香港，后来又到广州。在第二年的正月六日我接到陈诚的电报邀我到武汉。到了武汉，才知道有政治部的复活，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① 任副部长，要我担任第三厅，主持宣传工作。我知道工作的困难，无心再作冯妇，在二月我逃到长沙去躲避了一个月，但终竟躲不掉，只好又回到武汉。筹备了一个月，在四月一日才勉强把三厅成立了，比其它的厅后了两个多月。政治部的编制原本是一厅两处，挨着次序，第三厅是只包含第五处和第六处的。第五处主管文字宣传，由胡愈之担任处长。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由田寿昌担任处长。但在筹备中蒋要我们添设一处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我便想请达夫主持，立即打电去福州邀请他。但因工作迫切，等不得他来只得就近请

① 黄琪翔（1898—1970），字御行，广东梅县人。早年追随孙中山，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

范寿康①担任了。因此等达夫到达武汉时，三厅的组织已经完全就绪，便只好聘他为设计委员了。有的人不了解这些经过，曾经责怪过我：认为我既把达夫请来，又不重视他，而给他一个闲差事。这完全是局外人的一种皮相的观察。认真说，三厅的工作连我自己根本就是不愿意担任的。勉强担任下来了，受着种种的牵制，工作无法开展。稍微开展了一些，其他组织动员的工作又配合不上来，而且彼此做些相对消的事。那真是痛尽了头。所以要说是闲，则三厅三处的工作差不多无一不闲。我倒宁肯真的闲下来，可以减少些苛烈的责任感。当时三厅的人大家都是很苦闷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牢骚。因此假如由得我自由，我就让达夫来做厅长，我去做设计委员，倒也是心甘情愿的。达夫在设计委员的地位，曾自由自在地驰骋于台儿庄等战区，在我们倒是艳羡不置的。

总之达夫的长才未尽，竟死难于异域，是可悲的事。而他的死可能还是因为曾经营救我而招致，那就更使我没齿不能泯此哀思了。力量不足，生不能够尽保护朋友的责任，死又不能够表彰，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然而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1947年10月18日

② 范寿康(1896—1983)，浙江上虞人。曾任中山大学秘书长、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等职。

读了《俄罗斯问题》

一口气读完了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①，真是愉快。

这的确是一个好剧本，一部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无怪乎在苏联要受到破纪录的大欢迎了。

但听说在美国方面被认是反美的宣传文件，禁止演出。那倒正适合乎本剧所批判的美国今天的现实。不那样，或许已经不是今天的美国了。

其实这何尝是反美呢？在我看来，倒是百分之百的亲美。不过所亲的是林肯的美国，人民的美国，而不是八大财阀集团②的美国罢了。

要说是宣传吧，它只是说明了一点：苏联人民不要战争，而美国人民也不要战争。但我很知道，单只这一点，已经就是不能见容于今天的美国的。

一点也不错，美国的麦克菲逊之流，他们“四分之一是苏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香港《华商报》。

① 西蒙诺夫（К·М·Л·Симонов，1915—1979），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日日夜夜》等。其所著《俄罗斯问题》作于一九四六年，获一九四七年斯大林文学奖金。

②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控制美国经济的摩根、洛克菲勒、库恩、洛布、梅隆、杜邦、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八大财团。

联的敌人，四分之三是美国人民的敌人”。

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斯密司既不能见容于今天的美国，《俄罗斯问题》当然也就不能上演于今天的美国舞台了。

但《俄罗斯问题》是不朽的，同样，我也相信明天的美国，也就是纯粹的林肯美国，一定是属于斯密司。

1947年10月30日

全世界心地光明的人都表示由衷的庆贺

伟大的十月革命今年满了三十周年了，全世界心地光明的人民都会表示由衷的庆贺。

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是苏联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虽然有不少的战争贩子们，为了扩充自己的私欲，仇视社会主义，因而仇视苏联，今天还在叫嚣着企图灭绝全人类的战争，但他们是会为人民所共弃的。他们如有前途，希特拉、墨索里尼，就是他们的前途。

谨愿以兄弟的情谊紧紧地携手，共同建设人民本位的文化，拱卫和平民主，绝灭战争。

1947 年 11 月 7 日

〔**本集注释者**：王锦厚　伍加伦　钟德慧
陈厚诚　邱沛篁〕

本篇系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电文，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时用今题。

其　　他

鲁迅与王国维

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但我很抱歉，在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见过面，在他们的死后，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卓越贡献。毫无疑问，我是一位后知后觉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在一九二〇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作者和作品的题目都不记得了。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时候雁冰先生还没有用茅盾的笔名）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那时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①，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这信在他所主编的《民铎杂志》②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三期。

① 李石岑（1892—1934），又名邦藩，湖南醴陵人。“五四”前后历任《民铎》杂志、《时事新报·学灯》、《教育杂志》主编。后又任上海中国公学、广州暨南大学教授。著有《美学之原理》。

② 月刊。一九一六年六月创刊于东京，一九三一年一月终刊。

发表了。我却没有料到，这几句话反而惹起了鲁迅先生和其他朋友们的不愉快，屡次被引用来作为我乃至创造社同人们藐视翻译的罪状。其实我写那封信的时候，创造社根本还没有成形的。

有好些文坛上的纠纷，大体上就是由这些小小的误会引起来了。但我自己也委实傲慢，我对于鲁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记得《呐喊》初出版时，我只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搁置了。一直到鲁迅死后，那时我还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帮助，把所能搜集到的单行本，搜集了来饱读了一遍。象《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我只读过增田涉的日译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原文。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是有过一次可以见面的机会的。那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年年底，鲁迅已经辞卸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回到了上海，我也从汕头、香港逃回到上海来了。在这时，经由郑伯奇、蒋光慈诸兄的中介曾经酝酿过一次切实的合作。我们打算恢复《创造周报》，适应着当时的革命剉折期，想以青年为对象，培植并维系着青年们的革命信仰。我们邀请鲁迅合作，竟获得了同意，并曾经在报上登出过《周报》复刊的广告。鲁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麦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仿吾、光慈、伯奇诸人。那时本来可以和鲁迅见面的，但因为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牵累，不免有些踌躇。而正在我这踌躇的时候，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回国了，他们以新进气锐的姿态加入阵线，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种"退撄"的办

法，认为《创造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没有恢复的必要，要重新另起炉灶。结果我退让了。接着又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掉。病后我亡命到日本，创造社的事情以后我就没有积极过问了。和鲁迅的合作，就这样不仅半途而废，而且不幸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论战，几乎弄得来不可收拾。这些往事，我今天来重提，只是表明我自己的遗憾。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真可以说是失诸交臂。

关于王国维的著作，我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天，读过他的《宋元戏曲史》。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小本子。我那时住在泰东书局的编辑所里面，为了换取食宿费，答应了书局的要求，着手编印《西厢》。就因为有这样的必要，我参考过《宋元戏曲史》。读后，认为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但我也并没有更进一步去追求王国维的其它著作，甚至王国维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没有十分过问。那时候王国维在担任哈同①办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大约他就住在哈同花园里面的吧。而我自己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过一些时间，可以说居处近在咫尺。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假使当年我知道了王国维在担任那个大学的教授，说不定我从心里便把他鄙弃了。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时候，哈同花园的本身在我便是一个憎恨。连那什么"仓圣明智"等字样只觉得是可以令人作呕的狗粪上的霉菌。

真正认识了王国维，也是在我亡命日本的时候。那是一

① 哈同(S·A·Hardoon，1847—1931)，英国籍犹太人。一八七四年来华后，在上海开办哈同银行，曾投资出版《艺术丛编》，创办仓圣明智大学。

九二八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开始作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甲骨文、金文发生了接触。就在这时候，我在东京的一个私人图书馆东洋文库里面，才读到了《观堂集林》，王国维自己编订的第一个全集(《王国维全集》一共有三种)。他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然而这已经是王国维去世后一年多的事。

这两位大师，鲁迅和王国维，在生前都有可能见面的机会，而我没有见到，而在死后却同样以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就因为这样，我每每总要把他们两位的名字和业绩联想起来。我时常这样作想：假使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的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可惜我对于两位的生前都不曾接近，著作以外的生活态度，思想历程，及一切的客观环境，我都缺乏直接的亲炙。因此我对于这项工作虽然感觉兴趣，而要让我来作，却自认为甚不适当。六年前，在鲁迅逝世第四周年纪念会上，我在重庆曾经作过一次讲演，简单地把两位先生作过一番比较。我的意思是想引起更适当的人来从事研究，但六年以来，影响却依然是沉寂的。有一次许寿裳先生问过我，我那一次的讲演，究竟有没有底稿。可见许先生对于这事很注意。底稿我是没有的，我倒感觉着：假使让许先生来写这样的题目，那必然是更适当了。许先生是鲁迅的至友，关于鲁迅的一切知道得很详，而同王国维想来也必定相识，他们在北京城的学术雰围气里同处了五年，以许先生的学力和衡鉴必然更能够对王国维作正确的批判。但我不知道许

先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兴趣。

首先我所感觉着的，是王国维和鲁迅相同的地方太多。王国维生于一八七七年，长鲁迅五岁，死于一九二七年，比鲁迅早死九年，他们可以说是正整同时代的人。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鲁迅生于浙江绍兴，自然要算是同乡。他们两人幼年时家况都很不好。王国维经过上海的东文学社①，以一九〇一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物理学校。鲁迅则经过南京的水师学堂，路矿学堂，以一九〇二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弘文学院，两年后又进过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王国维研究物理学只有一年，没有继续，而鲁迅研究医学也只有一年。两位都是受过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的。两位都喜欢文艺和哲学，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过尼采。这理由是容易说明的，因为在本世纪初期，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两位回国后都曾从事于教育工作。王国维以一九〇三年曾任南通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心理、伦理、哲学，一九〇四年转任苏州师范学堂教习，除心理、伦理、哲学之外，更曾担任过社会学的讲座。鲁迅则以一九〇九年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的教员，第二年曾经短期担任过绍兴中学的教员兼监学，又第二年即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担任了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就这样在同样担任过师范教育之后，更有趣的是，复同样进了教育部，参加了教育行政工作。王国维是以一九〇六年在当时的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总务司行

① 罗振玉、蒋伯斧等于一八九七年左右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主要研究日本文化。

走，其后改充京师图书馆的编译，旋复充任名词馆的协调。都是属于学部的，任职至辛亥革命而止。鲁迅则以一九一二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部员，初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迁北京，又改为佥事，任职直至一九二六年。而到晚年来，又同样从事大学教育，王国维担任过北京大学的通信导师，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鲁迅则担任过北大、北京师大、北京女子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的讲师或教授。

两位的履历，就这样，相似到实在可以令人惊异的地步。而两位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他们两位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旧学都在幼年已经储备了相当的积蓄，而又同受了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想要成为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志望虽然没有达到，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王国维的力量后来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鲁迅对于先秦古物虽然不大致力，而对于秦以后的金石铭刻，尤其北朝的造象与隋唐的墓志等，听说都有丰富的搜罗，但可惜关于这方面的成绩，我们在《全集》中不能够见到。大抵两位在研究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他们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集，严格

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的力量则多多用在文艺创作方面，在这方面的伟大的成就差不多掩盖了他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一般人所了解的鲁迅大抵是这一方面。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但王国维初年也同样是对于文学感觉兴趣的人。他曾经介绍过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叔本华① 的美学思想写过《红楼梦评论》，尽力赞美元曲；而在词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的理论（"不隔"是直观自然，不假修饰）。自己对于诗词的写作，尤其词，很有自信，而且曾经有过这样的志愿，想写戏曲。据这些看来，三十岁以前，王国维分明是一位文学家。假如这个志趣不中断，照着他的理论和素养发展下去，他在文学上的建树必然更有可观，而且说不定也能打破旧有的窠臼，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前驱者的。

两位都富于理性，养成了科学的头脑，这很容易得到公认。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偏枯，他们是厚于感情，而特别是笃于友谊的。和王国维"相识将近三十年"的殷南先生所写的《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里面有这样的一节话："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可以抛弃

① 叔本华(A.Schopenhauer, 1788—1860)，德国哲学家。著有《世界即意志和表象》。

他的主张。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度。"（见述学社《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①，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这样的态度，据我从鲁迅的亲近者所得来的认识，似乎和鲁迅的态度也很类似。据说鲁迅对于不甚相熟的朋友也不愿意多说话，因此有好些人也似乎以为鲁迅是一位孤僻冷酷的人。但他对于熟人或质疑问难的人，却一样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两位都获得了许多青年的爱戴，即此也可以证明，他们的性格是博爱容众的。

但在这相同的种种迹象之外，却有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那便是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王国维很不幸地早生了几年，做了几年清朝的官；到了一九二三年更不幸地受了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这样的一个菲薄的蜘蛛网，却把他紧紧套着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夏间，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了张作霖，一部分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他却在六月二日（农历五月三日）跳进颐和园的湖水里面淹死了。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象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十六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这是和鲁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

① 国学月报，一九二四年五月由述学社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九年一月终刊。

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国维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无宁是在骂他。忠而悫，不是骂他是愚忠吗？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泽的大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之职的徐世昌①，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十六年却还要"殉节"，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吗？遗老们在下意识中实在流露了对于他的嘲悯。不过问题有点蹊跷，知道底里的人能够为王国维辩白。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别有死因的。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他为什么要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看待。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前举殷南先生的文字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所谓"挚友之绝"，所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伪君子罗振玉，后来出仕

①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天津人，清末曾任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等职。一九一八年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统。

伪满，可以说已经沦为了真小人，我们今天丝毫也没有替他隐讳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国维的身世的人，把这一段隐事更详细地表露出来，替王国维洗冤，并彰明罗振玉的罪恶。

但我在这儿，主要的目的是想提说一项重要的关系，就是朋友或者师友。这项关系在古时也很知道重视，把它作为五伦之一，而在今天看来，它的重要性更是有增无已了。这也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人的成就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数。王国维和鲁迅的主要不同处，差不多就判别在他们所有的这个朋友关系上面。王国维之所以划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未始也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且让我更就两位的这一项关系来叙述一下吧。

罗振玉对于王国维的一生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人，王国维受了他不少的帮助是事实，然而也受了他不少的束缚更是难移的铁案。王国维少年时代是很贫寒的。二十二岁时到上海入东文学社的时候，是半工半读的性质，在那个时候为罗振玉所赏识，便一直受到了他的帮助。后来他们两个人差不多始终没有分离过。罗振玉办《农学报》，办《教育世界》，都靠着王国维帮忙，王国维进学部做官也是出于罗的引荐。辛亥革命以后，罗到日本亡命，王也跟着他。罗是一位蒐藏家，所藏的古器物、拓本、书籍，甚为丰富。在亡命生活中，让王得到了静心研究的机会，于是便规范了三十以后的学术的成就。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

契考释》一书，实际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单只这一事也足证罗之卑劣无耻，而王是怎样的克己无私，报人以德了。同样的事情尚有《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和《重辑仓颉篇》等书，都本是王所编次的，而书上却署的是姬觉弥的名字。这也和鲁迅辑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而用乃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的相仿佛。就因为这样的关系，王更得与一批遗老或准遗老沈曾植、柯绍忞① 之伦相识，更因缘而被征召入清宫，一层层封建的网便把王封锁着了。厚于情谊的王国维不能自拔，便逐渐逐渐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罗振玉是一位极端的伪君子，他以假古董骗日本人的钱，日本人类能言之。他的自充遗老，其实也是一片虚伪，聊借此以沽誉钓名而已。王国维的一生受了这样一位伪君子的束缚，实在是莫大的遗憾。假使王国维初年所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位落伍的虚伪者，又或者这位虚伪者比王国维早死若干年，王的晚年或许不会落到那样悲剧的结局吧。王的自杀，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

鲁迅的朋友关系便幸运得多。鲁迅在留学日本的期中便师事过章太炎。章太炎的晚年虽然不一定为鲁迅所悦服，但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无疑是给了鲁迅以深厚的影响的。在章太炎之外，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

---

①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居刑部主事。著有《寐叟题跋》、《寐叟乙卯稿》等。　柯绍忞(1850—1933)，原名邵忞，字凤荪，山东胶县人。曾任清廷翰林院编修等职。著有《新元史》、《文献通考注》等。

培[1]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蔡、鲁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差不多有点象罗、王之间的关系。或许不正确吧？然而他们相互间的影响却恰恰相反。鲁迅此外的朋友，年辈相同的如许寿裳、钱玄同[2]，年轻一些的如瞿秋白、茅盾，以及成为了终生伴侣的许广平，这些先生们在接受了鲁迅的影响之一面，应该对于鲁迅也发生了回报的影响。就连有一个时期曾经和鲁迅笔战过的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鲁迅也明明说过是被他们逼着阅读了好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文艺理论的书籍的。我这样说，但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我有意抹杀鲁迅的主观上的努力。我丝毫也没有那样的意思。我认为朋友的关系是相互的，这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就是一种阶级关系，我们固然谁也不能够脱离这种关系的影响，然而单靠这种关系，也不一定会收获到如愿的成就。例如岂明老人[3]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应该和鲁迅的是大同小异的吧，然而成就却相反。这也就足以证明主观努力是断然不能抹杀的了。

准上所述，王国维和鲁迅的精神发展过程，确实是有很多

---

①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光复会、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九一八”后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著有《蔡元培选集》。

② 钱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文字学音篇》、《古音无邪纽证》等。

③ 即周作人。

地方相同，然而在很关重要的地方也确实是有很大的相异。在大体上两位在幼年乃至少年时代都受过些封建社会的影响。他们从这里蜕变了出来，不可忽视地，两位都曾经经历过一段浪漫主义的时期。王国维喜欢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文艺，鲁迅也喜欢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鲁迅的早年译著都浓厚地带着浪漫派的风味。这层我们不要忽略。经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两位都走了写实主义的道路，虽然发展的方向各有不同，一位偏重于学术研究，一位偏重于文艺创作，然而方法和态度确是相同的。到这儿，两位所经历的是同样的过程，但从这儿以往便生出了悬隔。王国维停顿在旧写实主义的阶段上，受着重重束缚不能自拔，最后只好以死来解决自己的苦闷，事实上是成了苦闷的俘虏。鲁迅则从此骎骎日进了。他从旧写实主义突进到新现实主义的阶段，解脱了一切旧时代的桎梏，而认定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神圣任务。他扫荡了敌人，也扫荡了苦闷。虽然他是为肺结核的亢进而终止了战斗，事实上他是克服了死而大踏步地前进了。

就这样，对于王国维的死我们至今感觉着惋惜，而对于鲁迅的死我们却始终感觉着庄严。王国维好象还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而鲁迅则是一个伟大的完成。

我要再说一遍，两位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在这儿我倒可以负责推荐，并补充一项两位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便是他们都有很好的《全集》传世。《王国维遗书全集》(商务版，其中包括《观堂集林》) 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

塔呵！

但我有点惶恐，我目前写着这篇小论时，两个《全集》都不在我的手边，而我仅凭着一本《国学月报》的《王静安先生专号》和许广平先生借给我的一份《鲁迅先生年谱》的校样；因此我只能写出这么一点白描式的轮廓，我是应该向读者告罪的。

再还有一点余波也让它在这儿摇曳一下吧。我听说两位都喜欢吸香烟，而且都是连珠炮式的吸法。两位也都患着肺结核，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没有被这种痼疾所征服。特别是这后一项，对于不幸而患了同样病症的朋友，或许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吧。

1946年9月14日

论郁达夫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一九一四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人物杂志》第三期。

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

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已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

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

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当时在我，我是感觉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余家菊① 的误译，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于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适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自认为轻易地树下了一批敌人。② 但经他这一激刺，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③。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

① 余家菊（1898—1976），字渊，湖北黄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青年党。曾任《醒狮》编辑。著有《国家主义概论》等。

② 作者原注：他后来曾经写过一封信来，向我缓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

③ 黄仲则(1749—1783)，字汉镛，江苏武进人。清代诗人。著有《两当轩全集》。　《采石矶》，郁达夫的历史小说，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象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一九二〇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时机并未成熟，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医学搞毕业是一九二三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仿吾是从湖南东下，达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地干了一个时期。《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一九二三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名份是讲师。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后的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一九二四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①到武大②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这时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上海有了“五卅”惨案发生，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的小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来，达夫也写过一些文章。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我接受了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剧。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贱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广州之后只有三个月工夫，我便参加了北伐。那时达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长职务便只好交给王独清代理。假使达夫是在广州的话，我毫无疑问是要交给他的。这以后我一直在前方，广州的情形我不知道。达夫是怎样早离开了广

---

① 石瑛（约1879—1943），湖北阳新人。曾先后赴欧学习海军和采矿冶金，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后任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和考试院诠叙部部长等职。

② 指当时的武昌大学。

州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又怎样和朋友们生出意见闹到脱离创造社，详细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脱离创造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断绝了交往，他有时甚至骂过我是“官僚”。但我这个“官僚”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后来达夫对于我是恢复了他的谅解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到日本去亡命，这之后一年光景，创造社被封锁。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在这期间的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①女士结了婚，创作似乎并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大学打算聘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②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常的惊讶。

就在芦沟桥事变前一年(一九三六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我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国去游历。就因为他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次年的五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有下文。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我得到大使馆方

---

① 王映霞，一九〇八年生，浙江杭州人。郁达夫妻，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新加坡与郁达夫离异。

② 作者原注：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头子，利用过达夫和创造社的招牌来办《现代评论》的。

面的谅解和暗助，冒险回国。行前曾有电通知达夫，在七月十七日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他那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上海，达夫又回福建去了。

一九三八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夫挈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它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来不可收拾了。

达夫到了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着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星加坡沦陷，达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说他已经牺牲，有的人说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

世了。

十天前，达夫的一位公子郁飞来访问我，他把沈兹九①写给他的回信给我看，并抄了一份给我，他允许我把它公布出来。凡是达夫的朋友，都是关心着达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艺战士假使只落得一个惨淡的结局，谁也会感觉着悲愤的吧？

郁飞小朋友：

信早收到。因为才逃难回来，所以什么事情都得从头理起，忙得很，到今天才复你，你等得很着急了吧。

你爸爸是在日本人投降后一个星期才失踪的，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大约是凶多吉少了。关于你爸爸的事是这样：在星加坡沦陷前五天，我们一同离开星加坡到了苏门答腊附近小岛上，后来又溜进了苏门答腊。那时我们大家都改名换姓，化装了生意人，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来历。有一次你爸爸不小心，讲了几句日本话，就被日本宪兵来抓去，强迫他当翻译。他没有办法，用“赵廉”这个假名在苏岛宪兵部工作了六个月。在这期间，他用尽方法掩护自己，同时帮忙华侨，所以他给当地华侨印象极好。他在逃难中间的生活很严肃。那时我们也在同一个地方，不过我们住的是乡下。他常常偷偷地来看我们，告诉我们日本人的种种暴行，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后来，他买通了一个医生，说有肺病不得不辞职，日本人才准了他。

一年半以后，星加坡来了一个汉奸，据告日本宪兵，说他在做国际间谍。当地华侨为这事被捕的很多，日本人想从华侨身上知道你爸爸是否真有间谍行为，结果谁也说没有；所以仍能平安无

① 沈兹九，一八九八年生，浙江德清人。胡愈之夫人。曾任《妇女生活》杂志主笔、上海《申报》副刊《妇女园地》编辑。

事。在这事发生以前，我们因为郁宗汉先生和王任叔们俏在棉兰，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棉兰了。他和汪金丁先生和其他的朋友在乡间开了一间酒店，生意很好，就此维持生活。

直到日本人投降后，他想从此可以重见天日了，谁知一天夜里，有一个人来要求他帮忙一件事情，他就随便趿了一双木履从家里走出，就此一去不返。至于来诱他出去的人那是谁，现在还不清楚，大约总是日本人。我们为了这事从棉兰赶回苏，多方面打听，毫无结果。以后我们到了星加坡，又报告了英军当局，他们只说叫当地日本人去查（到现在，那里还是日军维持秩序），那会有呢？

问题是在此：日本降后，照例兵士都得回国，而宪兵是战犯，要在当地听人民控告的。人民控告时，要有人证物证，你爸爸是最好的人证，所以他们要害死他了。而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层；没有早早离开，反而想在当地做一番事业。

你不要哭，在这几年当中，你爸爸很勇敢，很坚决，这在你也很有荣誉的。况且人总有一死的呀，希望你努力用功！再会。

你的大朋友　沈兹九

看到这个"凶多吉少"的消息，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象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普通一个公民，国家都要发动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我现在只好一个人在这儿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① 说过"英国宁

① 加莱尔（T·Carlyle，1795—1881），通译卡莱尔，英国作家、哲学家。著有《宪章运动》、《英雄与英雄崇拜》等。

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实在的，在这几年中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达夫的母亲，在往年富春失守时，她不肯逃亡，便在故乡饿死了。① 达夫的胞兄郁华（曼陀）先生，名画家郁风的父亲，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离了婚，已经和别的先生结合。儿子呢？听说小的两个在家乡，大的一个郁飞是靠着父执的资助，前几天飞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了毒手。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达夫的遭遇为什么竟要有这样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月3月6日

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陷富阳的日军强迫郁达夫的母亲陆氏驮运货物，郁母于夜间躲入住宅夹壁中，同月三十一日终因冻饿致死。

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

最近吴辰伯① 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除掉少数几篇“缺”或“缓交”的之外，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工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校补了一些誊录上的错误和夺落，填写了一些古代文字，更把全部的标点统一了。全稿的字数我没有过细计算，大约总在一百五十万字以上吧。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加民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极少数。因此从这整个的遗稿上使我得到一个这样的印象：一棵茁壮的向日葵刚刚才开出灿烂的黄花，便被人和根拔掉，毁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哭他的内兄钱漱广的一句诗。这两三个礼拜来老是在我的脑子里和口角上盘旋着。闻一多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恨事。他假如不遭暗害，对于民主运动不用说还可以作更大的努力，就在学问研究上也必然会有更大的贡献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学》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

① 即吴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著有《朱元璋》、《读史札记》等。

我本来打算再把遗稿作第三次的校读，然后细心地来写一篇《闻一多的为人及其为学》那样的文章。但《大学》的主编夏康农① 先生为了急于要纪念一多，一定要叫我提前写作。我现在只好粗枝大叶地写些他的做学问的态度吧，主要地局限在整理古代遗产这一方面。

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是很广泛的。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证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将来他的《全集》刊布后，凡是细心阅读过它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我现在姑且举两个例子在这儿。

第一，他有一篇《诗新台鸿字说》，解释《诗经·邶风·新台篇》里面“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那个鸿字。两千多年来读这诗的人都马虎过去了，以为是鸿鹄的鸿，但经一多从正面、反面、侧面来明证，才知道这儿的“鸿”是指蟾蜍即虾蟆。古人曾叫虾蟆或蟾蜍为“苦蠪”（见《广雅·释鱼》和《名医别录》）②，苦蠪就是鸿的切音了。苦蠪为鸿亦犹窟笼为孔，喉咙为亢。而

① 夏康农，原名检，一九〇二年生，湖北鄂城人。曾参与创办春潮书局，后任《春潮》月刊编辑和《大学生》主编。译有《茶花女》、《结婚三重奏》等。

② 《广雅》，解释词义的专书，三国魏人张揖著。《名医别录》，医学丛书，凡一卷，清代黄钰辑。

更巧妙的是有一种草名叫屈龙的，别名也叫着鸿。《淮南子·地形篇》“海闾生屈龙”，高诱① 注云：“屈龙，游龙，鸿也”。这确是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解成虾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能畅通。全诗是说本来是求年青的爱侣却得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也就如本来是想打鱼而却打到了虾蟆的那样。假如是鸿鹄的鸿，那是很美好的鸟，向来不含恶义，而且也不会落在鱼网子里，那实在是讲不通的。然而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

其次，再举《天问·释天》里面解释“顾菟”的一条吧。“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问的月亮的情形。向来的人都把顾和菟分开来，认为顾是顾望，而菟就是兔子。到了清代的毛奇龄②，认为顾菟不能分开，是月中的兔名，算是进了一步。直到闻一多，又才举出了十一项证据来，证明顾菟就是蟾蜍的别名。蟾蜍一名居蠩，与顾菟实一音之转。同一转语则为科斗，为活东，与蟾蜍实为一体。《汉少室神道阙》③ 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科斗后期之形，故知顾菟亦即科斗。闻先生举了十一例以证成其说，虽然他还在浩叹“既无术以起屈子于九泉之下以为吾质，则吾虽辩，其终不免徒劳乎？噫！”，但我敢于相信，他的发现实在是确凿不易的，并

① 高诱，东汉涿郡涿（今河北涿县）人。著有《孟子章句》、《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等。

② 毛奇龄（1623—1713），字大可，浙江萧山人。清代经学家。著有《西河合集》。

③ 在今河南登封县城西六公里处的少室山下邢家舖村，约建于东汉元初五年至延光二年之间。

不是"徒劳"。

象这样细密新颖地发前人所未发的胜义，在全稿中触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瞠惑的地步。这样一位富有发明力的天才，我隐隐地感觉着，可惜是用在文字学或文献学这一方面来了。假如是用在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方面，不会成为更有益于全人类的牛顿和爱迪生① 吗？我固然无心要在文献学和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中定出轩轾的差别。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理文献或文学，其实也就是科学。但如站在功利的立场，那价值的广狭，的确是大有由旬的。虽然在中国也尽有的是这样的功利学者，认为一个古字古义的发明实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星球。② 或许是吧，但我并不想那样夸张地看，我相信闻一多先生也不曾那样夸张地看的。

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家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彻底地实践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但他的彻底处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考据，他把考据这种工夫仅是认为手

---

① 牛顿(I·Newton，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著有《光学》、《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　爱迪生(T·A·Edison，1847—1931)，美国发明家。先后发明自动电报帮电机、留声机等，并发现被命为"爱迪生效应"的热电子发射现象。

② 作者原注：这是胡适的话。

段，而不是认为究极的目的的。请看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上所说的这样的话吧：

>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境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境，(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凡是古书，把这三种困难都是具备着的，事实上并不限于《楚辞》。因而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同的课题。尤其是第一种，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但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实在还没有产生出过一部好好的文化史。专家的研究也是同样。汉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阶段上盘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阶段，只是在第二阶段的影子上跳跃。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阶段上来，然而也只在这里踯躅，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这是当然的。要想知道“时代背境”和“意识形态”，须要超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才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①。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那便无从客观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不用说你更不能够批判那个时代和

① 语见苏轼《题西林壁》诗。

那个意识。就象孩儿期中孩儿自身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和意识的一样，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停滞也就必然地汇成了封建意识的污潴。要澄清这污潴，今天正是时候了。

我们再看一多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中叙述着他的苦衷吧。他认为他所拟定的三项课题，最好是同时交卷，然而为情势所迫，他一时不能够全部完成，“只好将最下层，也是最基本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他认为这是“权变的办法”，是他所极不愿做的。然而为了“可以腾出时间来多做点别的事”，他终于这样做了。这引言是写于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八日，也正是民主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我们看他这样急于想“腾出时间来多做点别的事”的苦心，不可以看出一多以后的活动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吗？但我在这儿注意地引用到这段文字的用意，倒侧重在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全盘的计划，而且在完成计划的各个步骤上的评价他是丝毫也没有陷于自我陶醉的。“校正文字”和“诠释词义”的工作，这些正是考据家们所兢兢焉乐道的事业，而在他只是基本的准备工作，而且“校正文字”还只是“最下层”。这不明显地表示着：他丝毫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过分的夸大视吗？他的《楚辞校补》在他自己看来既只是第二第三阶段上的作品，我们准据着这同一的自白，也可以知道，他对于他的《周易义证类纂》、《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庄子内篇校释》、《离骚解诂》等，这样一连串的在文字训诂上极有价值的文字，也不过是视为第二第三阶段的工作罢了。其实这些著作，当代的考据家们，假使

能有得一篇，也就尽足以自豪的。事实上是他们一篇也没有，已经就在自豪了。一些旧式的或新式的卫道者，不是根本连字都不认识，便在那儿以仲尼复活，墨翟再生自命吗？闻先生不是这样的糊涂虫。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一九四四年的五月三日的晚上，在昆明的联大新舍南区十号教室里，曾经举行过一次"五四"历史座谈，据记录，在周炳琳、张奚若① 等发言之后，闻一多发言。他曾经这样说过：

> 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但是你们现在好象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

他这就是说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里面去革中文的命。他说"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教育经验和心得，它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它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今天搞中文的人谁个具有这样的抱负？旧式的卫道者不用说了，就拿现在

---

① 周炳琳，字枚荪，一八九三年生，浙江黄岩人。曾任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等职。 张奚若（1889—1973），字熙若，陕西朝邑人。曾任中央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期间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一些搞"国文"的新式学者来说，不是月月都在那儿祖述桐城①，甚至还在赞扬八股吗？那些君子们不用说不是中文的革命叛徒，简直是唐、宋盛世的辅命功臣了。要说猗欤休哉，也的确是值得说一声猗欤休哉的！

然而一多却不是这样的功臣！他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本态度。为了要得虎子而身入虎穴，决不是身入虎穴去为虎作伥。他在写考证文字的时候照例使用文言，但他认为"未能免俗"，他梦想着要用白话文来写考证文字。这也是见于《楚辞校补》引言里的话，可见他就在迫不得已使用文言上，都没有忘记要扬弃文言。但他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即最上层的批判时代背境与意识形态上，他是断然把文言扬弃了的。这段工作，他虽然做得不多，但已经开始在作。而且在作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变迁和改进，也是可以明白地看出的。这可以把他的《庄子》和《人民诗人屈原》两篇文章拿来做证明。

一多不仅在《庄子》的校释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题名就叫《庄子》的论文，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的礼赞。这篇文章可惜稿件中没有注出写作的年月（整个《一多全集》稿的缺点，便是各篇文章都没有注上年月），不知是什么时候写的。但从那内容上看来，必然是他比较早年的作品。他是在那儿诚心诚意地赞美庄子，不仅陶醉于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还同情于他的思想。请看下面的这些摘录吧。

---

① 指清代散文流派桐城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櫆、姚鼐等均为安徽桐城人。

有大智慧的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象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

是诗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起他那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精神。

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使你加倍地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磨，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磨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魄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龚自珍《书金伶》）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地，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

这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大约就是新月时代的闻一多的表白吧？你看他那陶醉于《庄子》的"乐不可支"的神情！他在迷恋着"超人"，迷恋着"高古"、"神圣"、"古铜古玉"、"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甚至于迷恋于庄子的"道"。"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的是"有大智慧的"人。意在言外地憧憬着要"象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庄子的"道"是什么？那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黄老学派所悬

拟的宇宙万汇的本体。眼前的宇宙万汇是可视、可闻、可臭、可触的感官界，但这感官界的来源是有一个超越于感官的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臭、不可触的实质的本体。那本体的名字就叫着“道”。宇宙万汇都是这“道”的化身，一切变化都是“道”的活动。“道”是宇宙万汇的创化者，也就是宇宙万汇的真正的主宰者（“真宰”）。所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前一时代的所谓“上帝”的混沌化，“上帝”是有眼耳口鼻的人形，“道”是没有眼耳口鼻的混沌而已。万物都是“道”，也就是说万物都是神。庄子的思想在我们中国古代本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印度的古代和希腊的古代某些形而上学家的想法是共通的，在反对神、反对宗教、反对建立在教权上的统治方式上，很有足以使人迷恋的地方。而加以庄子的古今独步的文笔，的确是陶醉了不少的人。我自己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极端崇拜庄子的一个人，就是晚年来反对庄子最力的鲁迅，他也很称赞庄子的文章，甚至于也沾染过庄子的思想。鲁迅自己说过：“就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和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① 但鲁迅是从庄子思想中蜕变了出来，闻一多也同样把庄子思想扬弃了。

闻一多扬弃了庄子思想，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表现在他日后一转而痛骂道家了。

> 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
>
> ——《关于儒·道·土匪》

---

① 作者原注：《写在“坟”后面》。

他斥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儿、道家是骗子。他说“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墨不如儒，儒不如道”。这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

如从对于文化史的贡献上来说，这层思想的转变可以说很具体地表现在他的由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

我们在上述《庄子》一文中看见他以屈原和宋玉并称，说“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没有庄子伟大。这完全是一种旧式的看法。但在近作《人民诗人屈原》里面，看法便完全不同了。“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的？他举出了四种原因。第一，屈原虽然是楚国的同姓，却“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这样，首先在身份上，屈原便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中的”。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第四，“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

这四种条件，在他认为，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

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就这样，闻一多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假使屈原果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那么有了闻一多，有了闻一多的死，那“唯一”两个字可以取消了。屈原由于他的死，把楚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闻一多也由于他的死，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了。替人民报仇者，人民亦必为之报仇；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为之催生——催向永生的路上行进。

闻一多毫无疑问是永生了。他真真是“求仁得仁”。他不仅在做学问上获得了人民意识，而在做人上更保障了人民意识的确切获得。然而话又得说回来，他的很快地便被催向永生，在一多自己虽然是一种至上的成就，在人民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收获，然而很苦痛地是伴随了一个过高的代价。假如在一多获得了人民意识之后，再多活得十年，让他在事业上，在学问上，更多多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的收获想来也不会更微末的吧？在他把文化史批判的准备工作刚好完成，正有充分的资格来担当批判过去、创造将来的时候，却没有让他用笔来完成他的使命，而是用血来完成了。不能过分矫情的说，这不是重大的损失。

"千古文章未尽才",在今天我读着一多的全部遗著,在惊叹他的成绩的卓越之余,仍不能不为中国的人民,不能不为人民本位的中国文化的批判工作,怀着无穷的隐痛。"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起来"! 在革命工作上我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在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工作上我也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

1947年8月7日

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

胡适最近有一封给周鲠生的公开信，标题为《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在各地的报纸上四处发表。他主要是驳斥周氏的《历史要重演吗?》那篇文章。我为慎重起见，想把周氏的文章找来看看，靠着朋友帮忙，好容易在《贵州日报》二月八日的《星期论文》上看见了，而在同一张日报的第三版也登载着胡适的那封公开信，毫无疑问，两篇文章都是转载的。

周文里面，在国际形势中揭发了两个事实：

(一)在西方民主社会有些人士心目中，今日关于对德、日和约问题之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两国的复兴，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战时这两个强敌以抵制其他一个战胜的盟国。

(二)国际上现在并没有真正不能解决的争端，也还没有绝对势不两立的国家集团。我们并相信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象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

根据这两个事实，特别是前一个，周氏十分担心，认为是“很危险的倾向”，他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扶植战败的德国以抵制苏联的“历史要重演”，因而他也提出了两项对策：

(一)在和平政策主张上应当避免再开倒车。联合国的列强应当一致贯彻战时表白的消除侵略势力之根本政策的精神，以订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香港《光明报》新第一卷第一期。

并执行对德对日两和约。在和约规定之下，大家应当本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之大方针，切实管制两国，不但全部解除他们的武装，——军事的及地理的——并且彻底消灭他们的文化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一切可以助长侵略势力的因素。

（二）即令今后世界上真有任何一个侵略国的话，正当的办法也只是由那些对维持和平特别有责任的联合国的列强，运用联合国全体的力量，保持集体安全。而决不可以为着要抵制一个现存的侵略势力，又来扶植培养另一个潜在的或许更危险的侵略势力。

这些都本来是七平八稳的叙述，而且叙述得非常婉婉客气。在今天美国的世界政策很露骨地是扶植德、日以抵制苏联，而周氏只把他说成“有些人士心目中”的“倾向”。在周氏的立场，他自然是有几分顾忌的，他是国家的官吏——武汉大学的校长，而且又是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亲友，在今天彻底投向美国怀抱，并希图引起美、苏战争以求拯救垂危政权的“国策”之下，要对于美国政策有所訾议，并对于苏联稍示公道，那可以说是近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周氏在今天还能提出他那样的主张，我倒佩服他具有几分胆量。说话要那么谨慎，是值得我们谅解的。然而他这谨慎，这顾忌，这婉婉客气，却被胡适抓着了。胡适就从这里开刀，把他所揭发出的两项提示都化而成为“问题”，便是说那些都不是事实，因而把他所提出的两项对策，也就完全抹杀了。我们请来追究一下胡适的理论吧。

首先来看他的关于对德、日政策的看法。

胡适抓着了“有些人士”的那种“倾向”，认为是“只不过是

言论自由的社会里的几个私人意见”。这样轻轻的一手，也就把天下人的耳目都象掩蔽尽了。接着便斥责周氏“不应该太看重这种个人议论而忽视那些已经正式公表的方案与文件”。于是他便提出了“美国提出而英、法热心赞成的《四强共同制止德国武装的四十年协约草案》”。他说：

这是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国政府正式提交苏、英、法的，一九四七年四月马歇尔先生在莫斯科又重行提出，两次都被苏联打消了的。这个协约的主要目标正是一种维持集体安全的武力来长期制止德国的侵略势力的复活。当初美国政府曾表示，同样的四十年协约可以适用到日本。这是美国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在贝尔纳斯先生提出之前，曾经美国参议院的两党领袖仔细研究讨论过，将来当然可以得参议院的批准。

他就根据这一举例，下出“三个判断：一，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根本政策；二，西方国家决不要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三，所谓‘防制德日的复兴’，并没有不许德、日民族在世间过和平生活的意思。……所以西方民主国家不能不考虑如何替他们保留一部分的工业生产力，使他们可以靠生产来养活他们自己”。

我相信胡适写到这些地方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很得意的，小胡子在鼻下可能作过狐步舞。哼！你看！我这实证主义的法力！我的一个实证便把你周鲠生和其他一竿子人反美袒苏的论调肃清了。四强管制协约是美国提出来的，英、法都热心赞成，只有你苏联反对，这到底是谁在扶植德、日呢？谁在扶植德、日“以抵制其他战胜的盟国”呢？西方民主国家是要“德、

日民族在世间过和平生活的”，但有一个“非西方民主国家”却在反对。言内之意，言外之意，都把美国塑成为了一尊“和平女神”，而把苏联影射成一个魔鬼。这得意之笔的确是值得得意的。我不想否认：胡适是会做文章。他是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人，既有证据了，他要说话还不能理直气壮吗？我倒要看你怎么能够驳倒他？

然而胡适是在耍戏法，他那套实证主义是骗人的。我们现在只要把那《四十年协约草案》追究一下，他的全盘的骗局便戳穿了。

那本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巴黎四外长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最初提出时只是“管制德国二十五年计划”，后来经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修正才改为“四十年”的。且看那“管制德国二十五年计划”的简略的内容吧！那儿规定着应该废止的有七项，可以准许的有两项。

一，应该废止者：

1.所有德国武装军队及半军事性质之党卫军及秘密警察；

2.参谋团或同样的机构；

3.军事设备之生产、制造或输入；

4.海军船舰及任何附属物品，尤其包含潜艇等；

5.飞机及其任何装备，包括高射炮等防御物；

6.任何军事基地、军械库或防御工事之维持；

7.战时工厂、研究院、实验室及新发明之特许权，计划图表等。

二，可以准许者：

1.配有轻武器之民事警察保留权；

2. 建筑、开矿、农垦及类似之和平经营所需要之小量炸药之保存权。

我这所根据的是美国合众社的电报，虽然不是全文，但我相信，胡适一定可以放心，这儿不会有什么故意的歪曲或遗漏。这个提案到当年七月九日才开始讨论，英、法代表都曾有些小意见，但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修正意见最为严整。他提出了八项修正意见：

(一)对于防止德国的恢复军国主义和重整军备没有充分保障；

(二)二十五年为期太短——至少应为四十年；

(三)在消灭德国军国主义的意义上还比不上《雅尔达协定》和《波茨坦协定》；

(四)没有规定消灭德国的战争工业；

(五)没有规定继续消灭德国的纳粹化；

(六)缺乏防止德国重建军国主义的政治基础；

(七)没有包括关于继续支持苏联赔偿的建议；

(八)把占领期间缩短了。

我这所根据的也是美国合众社的电报，请胡适检阅一下当时的中外报纸，便可能得到实证。这是关于四强管制德国公约的论争的第一回合，在这一回合上没有达成协议，但只由贝尔纳斯接受了"四十年"的修正，把议案保留了下来。然而，在我们的"实证主义者"看来，便是这草案第一次"被苏联打消了的"，你说他真是在"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吗？

接着是论争的第二回合，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

地点是莫斯科，人物在美国方面换成了马歇尔。这一次倒真真是四强共同制止德国武装的四十年协约草案了，但由马歇尔所提出的"草案"和贝尔纳斯所提出的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只是"插入了一项条款，规定该项公约，可以按期加以修正"(据法国新闻社电，马歇尔提案时的说明)。当时莫洛托夫即提出修正案，"认为美国所提草案，有下列诸缺点"：

(一)未曾提及肃清纳粹；

(二)未有四强管制鲁尔之任何规定；

(三)未有清理及移转德国大企业之特别条文；

(四)未有根据基本自由建立德国民主秩序之规定；

(五)未有土地改革之规定；

(六)结束盟国占领之条件欠当(据英国路透社电)。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把这修正意见和原案比较一下，看究竟那个彻底一点，那个真正在替战败国的人民设想，在为他们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设想。然而在讨论议案的场合，马歇尔却坚决拒绝莫洛托夫的任何修正意见，而迫着莫洛托夫对美国提案在"是"与"否"之间取决。

这样的外交态度是我们从来所没有见过的，大约这就是军人外交的本色吧。除非是奴隶或附庸，我想任何人站在莫洛托夫的立场都不会接受马歇尔这样的军令的。当然议案也就在相持之间搁置下来了。这情形也就是胡适所说的第二次"被苏联打消了的"的实际。

你们请看，胡适这位"实证主义者"，他的所谓"实证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假使我们真是站在纯正的公证人的立场来说话的话，这个被胡适所夸饰为"美国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实在是替美国人、替美国的历史开了一次不小的玩笑。论道理，在《雅尔达协定》和《波茨坦协定》里面，既规定了要"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要"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完全非军事化"，照着那些规定切实管制下去，使德国人民真能享受民主生活为止，同盟国便算尽了责任，何须乎还要来一个那样"破天荒的政策"，只是在形式上列举一些禁制，而把精神完全忽略了！提案既多此一举，比《雅尔达协定》、《波茨坦协定》还要退步，自己虽然说"可以修正"，而又坚决不接受别人的修正，天地间有这样蛮横的外交吗？要说"破天荒"，单只这一点也真可算是天字第一号的"破天荒"。其实这些"政策"的用意，在今天已经是很明了了，一句话归总，便是存心和苏联不合作，要执行"巨棒"外交。文官的贝尔纳斯态度还不够强硬，所以才换成武将的马歇尔。马歇尔到了莫斯科，四外长会议① 刚开幕，我们不要忘记，便有杜鲁门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公开反苏的声明发表。除非是傻瓜或帮凶，谁看不出美国当局的用意呢？是的，"武装德日是英美法与澳洲、加拿大诸国的人民绝对不肯允许的"，这倒用不着胡适来"武断的说"，天地间又那有那样的傻瓜要来公开武装德、日呢？公开是一套，暗里是一套，好话说尽，坏事做完，这倒不仅是我们中国一部分人的拿手好戏呀！就为了"人民绝对不肯允许"，所以必须粉

① 指一九四三年十月中、苏、美、英四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会后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饰，但那粉饰是不能认真的，一要认起真来，那就只好“拉倒”了。

戏法是怕戳穿的，戳穿了不仅胡适的公开信不值半文钱，“美国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也不值半文钱。然而胡适还在那儿伪装“天真”，亏了他说得出“至少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国家在他们管辖的地域之内没有武装德国人或日本人的嫌疑”。是的，这一点至少我也承认的。但我请他翻一翻他们“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大公报》吧，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社论《德国问题向后转》里面就揭出了这样的数字：“英区的二八四座军需工厂仅拆了二十四家。”这说的是鲁尔区，现在已同美国合并经营了。再请他读读《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的《日本半月》吧，那儿开头的一节里面便有这样的话：“横须贺军港还未毁，神户基地完好无恙，神户一个装钢厂是给海军造船造炮的，规模之大象一个钢铁城，并未列入赔偿拆迁之列。日本的警察是世界有名的，原封未动；庞大的渔船队驰骋海上，还有几百万退伍军人，在乡间还存在着明的暗的组织。”《大公报》和《大公报》的王芸生，我相信是没有吃卢布的，我想胡适也一定能够相信。看到这些文字，对于自己的伪装“天真”害不害臊呢？别的证据，象释放战犯、包庇一切旧势力、强压真正的人民活动、制造人为饥馑，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必多说了。不过胡适其实也并非那么“天真”，他说话也是很有分寸的。譬如他说：“我们似乎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谴责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日和约的政策改变。”“没有”之上加“似乎”，“理由”之上加“充分”，那就是承认你也有理由。何况说“政策改变”，本是见仁见智的

事情；譬如丘吉尔当英国危殆，他需要苏联来替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改变了二十年来反苏的态度，我从前错了。"但等纳粹德国打败了，英国的危机过了，他又大喊起膺惩苏联的老调来。你说他是变了吗？他何尝变呢？此其所以为"政策"，此其所以为"策士"呀！但是要说"西方国家决不要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老兄，怕又未免说死了一点吧？把"决不要"改成"不至于"，是不是来得更活脱些？

是的，胡适的文章是做得煞费苦心的，我得承认；然而做来做去，在逻辑上却合不拢来。他拿着两个问题在那里使双刀，上一个问题尽力替美国辩护，说她"决不要扶持德、日来抵制苏联"，下一个问题却肯定苏联是比德、日还要可怕的侵略国，在逻辑上讲来，自然是应该"抵制"，而且也可以"扶持德、日来抵制"了。这正是胡适的本心，也是西方"民主国"的本心，但这样的本心是不好公开出来见天日的，自然必须掩饰。西方"民主国"的政策在掩饰，胡适的文章是掩饰的掩饰，这样你叫他怎么合得上逻辑来？这苦心是值得体谅的，胡适的文章如要合逻辑，他会一个字也写不出。

我们请再来看，他所"问题"化了的第二个"问题"。

在公开函的后半段胡适指斥了周鲠生所揭发的第二个事实，"我们相信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象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他这样说：

> 老兄这句话一定要引起不少人的怀疑，因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还有些人觉得这个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因为他的本钱比德、日还

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还更伟大，他的势力比德、日极盛时还更普遍。

一个"心目中"，一个"觉得"，再加上两个"可能"，于是乎苏联便被肯定为"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的"侵略势力"。这样可怕的东西，难道还不该用原子弹来轰炸吗？难道"扶持德、日来抵制"，还算错了吗？然而仅仅"心目中""觉得""可能"，实证主义者的"心目中"也"可能""觉得"自己的立脚不稳，在这儿不消说又应该引用实证了。实证是怎样的呢？

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最要紧的要算是这一节，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的"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表示得比国家主义者的曾琦① 还更要爱国。"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写得多么"逼人"呀！然而所谓"这许多事件"，其实就只是《中苏条约》缔订的一件。中苏条约的缔订，在雅尔达会议，英、美、苏之间先有了谅解，那时英、美因为要争取苏联参加东方战场，所以同意了后来在《中苏条约》所规订了的苏联的要求。那就是所谓"雅尔达秘密协定"。要说这协定、这条约有损中国的权益，应该指斥英、美、苏三国，而尤

① 曾琦（1892—1951），原名昭宗，字慕韩，四川隆昌人。中国青年党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人。曾和左舜生、余家菊等主办《醒狮》杂志。

其是缔结了这种"丧权辱国"的南京政府，把责任专放在苏联身上，那就别有用心了。

平心静气地把《中苏条约》来研究一下吧。到底那一点使中国吃了"亏"，那一点使中国受了"侵害"呢？靠着苏联的参战，把蟠据着整个东北十四年以上的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了，我们收复了失地。为了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苏联和我们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但只有三十年的期限，三十年之后都是要"无偿归属中国政府所有的"。这就足以使得爱国者胡适那样伤心吗？在日本人手里的时候，不曾看见我们这位爱国者伤过一次心，当日本人的势力在抗战之前由东北开始侵蚀华北的时候，爱国者不是曾经主张把北平作为"文化城"，不加抵抗而奉送给日本的吗？

《中苏条约》缔订的时候，我适逢其会也在莫斯科。缔订条约的中国代表宋子文①、王世杰等，两次到苏联来去都是美国的飞机专送。他们在莫斯科，我只看见他们处处受到盛大的欢迎，胡适所用的"逼订"的"逼"，我倒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义。老实说，最伤感情的，怕还是条约附件的关于"外蒙古"独立的照会吧。"外蒙古"尽管在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中国，我们在惰性上还保留着宗主权，但从那一照会承认"外蒙人民投票决定"，我们便把宗主权的虚名也失掉了。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的条约签字的时候，有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说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我那时还有点出自意外。我认

① 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人。历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外交部长等职。

为苏联不至于作这样的要求，这样会伤我们中国人的面子的。然而后来条约正式公布，“外蒙古”的独立的确是被中国政府承认了。很多比较开明的朋友都为此事不平，心里实在骾下了一件难过的东西。一九四六年春季反苏大游行，全国规模地使青年学生被激发了起来，我看，主要的怕还是由于“外蒙古”独立这一团大酵素吧？这本是不甚冠冕的帝国主义式的感情。“外蒙古”的独立只要于“外蒙古”的人民更为幸福，我们为什么要顾全自己的面子？但这还是从理性一方面来的说法，假使更从事实来说，我想在今天就是南京政府中的最反动分子怕也在心里暗暗欢喜：“幸好‘外蒙古’是独立了！”你想，假使“外蒙古”没有独立，那不是可以直接参加革命，和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吗？“外蒙古”的军队是机械化了的，而且还有空军，在抗日战争中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假使“外蒙古”没有独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势力不是更要雄壮吗？在这一点上，我倒看出了苏联的领袖们早就没有干预中国内战的私心，他们只肯出力帮助“外蒙古”人民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和幸福，没有劝他们委屈一下，留在中国的内部作为革命的酵素。

“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更完全是讼棍式的措辞。当然多少还保存了一点客气，只说“拆洗”，没有说“洗劫”。但，果真是“整个被拆洗”了吗？假使真是那样，我保证南京政府决不会再开起大兵去“劫收”那片废墟，美国帝国主义也决不会那样卖气力去支持南京政府了。我不曾到东三省去看过，“拆”的程度怎样不得而知，但断断乎不会“拆”而至于“洗”。昨

天才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鞍山，日本人所全力经营出的钢都，被南京政府“劫收”后，不是一直都还在生产吗？

如果“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另一铁幕是不是也笼罩住了日本、南朝鲜、台湾、青岛呢？《中美商约》的签订；内河航权的开放；海陆空基地的普遍设置；在美国的指令之下和敌国日本开始交易，把华北的食盐、海南岛的铁苗运往日本；在麦克阿瑟的纵使之下日本渔船可以自由的在中国领海捞渔；在麦克阿瑟纵使之下日本警察可以殴杀华侨；美国兵到处横行，可以在北平公开强奸北大女生而无罪，可以在上海打死臧大咬子而无罪；美国舰队可以在中国领海内自由演习；魏德迈痛骂南京政府腐败无能，马歇尔、司徒雷登都在痛斥中国内政；只要是美国人，无论是怎样的流氓痞棍都可以指挥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不断地把剩余军火和美元送来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实行日本人所梦想了几十年而没有成功的“以华制华”……胡适！你假如也是“人”，是不是也感觉着“这许多事件逼人（你）而来”呢？然而你在拚命替美国辩护，比美国人自己还要辩护得起劲，我知道你已经不是“人”了，至少你已经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人”了。

不过你有些话也说得很有道理，假如容许我“断章取义”的话，你的这一段文字是有价值的：

> 暴力是终久靠不住的，德国、日本都是眼前的镜子。一个强国也还需要朋友，需要诚心爱护他的朋友。无论怎么强大的霸国，到了邻舍害怕他，朋友抛弃他的时候，就到了开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这几句话倒说得很不错，但可惜你把对象找错了，我倒要借用来向着你所崇拜的“言论自由的社会”说，向所谓“西方民主国”说。那样的“民主国”的“言论”本来并不怎么“自由”，在今天要来掩饰恐怕也相当吃力吧？一边是黑人没有公民权，黑人在受私刑，另一边是十六个同盟共和国有同等权利参加联盟苏维埃，一百八十九种民族的人民有同等权利参加民族苏维埃；一边是打起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旗子四处去查拿思想犯，另一边是高张着民族形式的华盖，接受着多种多样的文化遗产；一边是贫者无立锥之地，另一边是耕者已经有其田；一边是国家财力集中在八大财阀集团手里，另一边是一切生产工具，无论工场或土地，都为人民所公有；一边是拿着并不秘密的原子弹在那儿作威作福四处扩充军事基地，另一边是全民合力，埋着头努力新五年计划的提早完成；到底那一边比较自由，那一边比较民主呢？到底那一边是靠“暴力”在那儿日谋侵略的“霸国”，那一边是值得和他携手的真正的善邻呢？这些，我们今天在文字上来辩论，人们或许至少可以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①。但我却坚决地相信，这一绝对的是非，在你我这一代就可以见诸事实的，虽然你我都已经是上了五十六七岁的人。

你说你以前“梦想”过“新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对不住得很，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梦想”而已。苏联假使真是照着你的“梦想”做去，真

---

① 语出《庄子·齐物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的傻到“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那吗苏联老早成为了历史上的名词了。你自认为是二十多年的苏联的老朋友，失掉了你这个朋友你在为苏联“惋惜”，但我敢于相信，苏联人民倒会怜悯你在反抄丘吉尔的老调，但决不会以失掉你这样的一位假朋友而认为可以“惋惜”。我本没有你聪明，但就从不曾作过你那样的“梦想”。“和平”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人民的幸福。假使“不恤任何代价”至牺牲人民的幸福以求奴隶的“和平”，那人民是决不会允许的。美国的华盛顿和林肯，也不曾实践过这样的“梦想”。苏联在敌性国的包围当中维系了她的光荣的存在，毫无疑问，是因为她有强大的武力。但她的武力是保卫和平的武力，而不是破坏和平的武力，只要是知道尊重人民利益的人，这点区别应该是明白的。如果真不明白，我们可以尽义务说明，如果要故意歪曲，那就让他去继续“梦想”吧。希望他早迟也有梦醒的一天，到那时他不会再说“梦”，或者已经根本不会“想”了。

我也决不“梦想”：美国会“爱好和平”到牺牲他的原子弹。那种“神圣的付托”，除非使它不“神圣”了，它才无所“付托”。这日期也不会太远的。苏联不是相传已经有了原子弹吗？即使眼前没有，谁能断定他将来也不会有？有的国家，天天拿着原子弹来恫骇人，而不算是“侵略势力”，没有的国家，天天受着恫骇而不屈，却算是“侵略势力”，而且比德、日还更可怕，那真真是原子狂的逻辑！就让它爆炸吧！那样的东西恫骇不了人，也煽惑不了人，儿戏的鞭炮而已。

不错，“中国北边”有“世界第一长的边界”，而且没有设

防。如果你所说苏联是“侵略国，苏联倒可以随时来侵略”我们。怎么办呢？是死心踏地把中国送给美国让他来设防吗？真是笑话了！老实说，我们与其作些不顾事实的杞忧，最好是使自己不要成为法西斯性的败种，或帝国主义的附庸。我们的国假使成为人民的国，任何外来的“侵略”，我们都可以免疫。人民的威力比任何原子弹或其它新武器的威力还要大。

然而，我也不相信“历史要重演”。第二次大战后的人民力量已不同于第一次大战后的往日了。各国的人民已经有充分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和世界共同的各种问题。美国的马歇尔不是早在那儿呻吟“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临到了垂危吗”？明天的美国不是属于马歇尔、杜鲁门，而是属于美国人民，那是毫无疑问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谁也不能把它扭转。

1948年2月23日香港

附 录

历史要重演吗？

周鲠生

三十年以前人类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果，军国主义的中欧帝国集团完全崩溃，自由主义的西方民主国家完全胜利。战胜国方面，一致认定穷兵黩武的德意志帝国对战争负全部责任。因此，巴黎和会强迫德国接受历史上最苛酷详而密的媾和条件。主持和会的列强政治家特别注意防止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复活。《凡尔赛和约》除掉厉行惩罚赔偿原则外，尚有防制的作用。和约条款中如调整国境、限制军备和兵器制造、驻防莱茵等等，对于削弱德国的力量，防止侵略势力复活，在当时也以为是至当不易之办法。可是和约刚刚成立，舆论和政策便起反动。威尔逊总统的国际和平政策，因在国中受敌党攻击而被推翻，《凡尔赛和约》根本不为美国所支持。在美国，乃至在英国，舆论的同情渐渐倾向于战败者之德国，人们认为和约的条款太苛刻而不公平，甚至认为根本的无法履行。经济家从数字上断定和约条款违反经济原则，实际执行不可能。历史家从外交文件中搜寻材料，证明战争责任不专在德国。做这类翻案文章，一时成为时髦，专家学者因此博得盛名，也是不足怪的事。可怪的是战胜国方面的西方列强，在防制德国侵略势力复兴上，原来立于一条阵线，乃到了执行和约的时候，他们的政策便

分歧起来。经济利益的立场，政治均势的考虑，使得有的西方国家不求切实执行和约，以防制敌国复兴，反而以抑制盟邦、扶植敌国为国策。其结果是，《凡尔赛和约》自始即未获彻底的有效的执行，德国逃避或解除和约条款的箝制，获得机会从事经济的军事的复兴计划。等到希特勒上台，新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基础早已奠定。然而保守主义的西欧政治家尚不省悟欧洲新威胁出现的可怕，还想利用德意志的势力以抵制苏联。到了一九三九年欧洲大危机，德、苏间居然于八月成立中立协约，而欧洲大战，随即因波兰问题爆发，西方民主国家多年对德政策的矛盾和错误，在这里充分表现恶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两年多，而主要的对德、日两和约，现在还没订成。表面上很多的时光消磨于外长会议关于召开和会起草和约之程序问题的争论，骨子里则是列强对德对日政策分歧。他们对于和约各有打算。不复能维持战时共同对敌政策的精神。自联合国列强共同作战以来，他们的宣布而着重之和平政策，是在永久防止德、日两国侵略势力的复活，免致他们的邻邦或世界再受威胁。德、日两敌国既经先后无条件投降，列强起草和约自应当本着这个共同大方针进行。可是两年以来，由于联合国的列强，尤其美国和苏联的对抗，议和政策已不一致。西方民主国家渐有对于解决德、日问题，决定两国的将来，在根本方针上作重行考虑之倾向。人们以为今后欧洲的危险，在于苏联之向外发展的野心，后者一方面控制东欧，同时尚图从中欧向西推进。于是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利益，不在极端削弱德国，而在扶助民主的德意志复兴。这样一个复兴的德意志，自然倾向西方集团，增加民主势力，而于安定中欧，阻障苏联尤有必要。基于这种考虑，则将来对德和约的制定和执行，自然要趋向宽大。这是人们关于对德问题之一种新看法。

特别使我们关心的还是对日本政策的演变，麦克阿瑟元帅管制日

本，友邦人士认为成功，对于日本政治经济的现状，西方民主社会相当满意。反之，人们对于战胜者之中国现状则颇多失望。在战争期间，中国签字《莫斯科宣言》，正式进入四强之列，原来出于罗斯福总统之推崇。当时美国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认为暴日打倒之后，在远东方面，要靠战胜的中国做一个安定的势力。可是胜利之后，人们鉴于中国经济的危机，政治的不安，以及“内战”的发展情形，乃怀疑：在最近的将来，是否能期待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出现，是否能靠中国作远东安定的势力。西方民主国家，为防止苏联向外发展政策活跃于远东，总是利于有一个对抗的力量。人们既认为中国无大希望，于是又想到战前他们曾经倚重过，而战后仍认为值得扶持的日本。

总括起来，在西方民主社会有些人士心目中，今日关于对德、日和约问题之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两国的复兴，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战时这两个强敌以抵制其他一个战胜的盟国。这种思想和政策的反动，现在虽然尚没有表现于具体的方案或公表的文件，可是从各方面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初步但是很危险的倾向，——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将要重演吗？这是关系今后世界和平及人类死活之一个重大问题。在大战期中联合国列强政治家所表示的一贯的精神是要为国际永久和平根绝侵略势力；而战后厉行管制敌国，使侵略主义者不能恢复军事的经济的实力再来威胁他国，则认为联合国列强的共同责任。现在和约尚未订立，列强政策已呈分道扬镳之象，是不是又要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德政策的复辙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德国一败涂地，但是不到二十年，她又成为威胁欧洲乃至世界之最可怕的势力。那一个大势力的培养成功，民主国家，尤其英、美，不能不说是要负一大部分责任。在远东方面，战前日本之强大，得力于西方列强之扶植和纵容也不小。英、美尤其重视日本的力量和地位，一般

认为远东安定的因素。甚至“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保守主义的人士，并不主张援助中国，抑制日本侵略行为，反而利于日本控制满洲，积极向大陆发展，以牵制苏联势力，因此而牺牲中国领土主权亦在所不惜。“七七”事变发生以后，西方民主国家仍不肯援华抗日。及到欧战继起，日本利用时会，扩大侵略活动到南洋，乃至太平洋全部，以致所有对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列强都感受威胁，那时候悔已无及了。最值得记忆的是，西方列强原来扶植德国，意在回复大陆均势及抵制苏联，而不意到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妥协，均势全破。他们原来想利用日本的强大，在远东对抗苏联势力，而不意到一九四一年春间，西方列强最危急之时，日、苏间居然订成中立协约，致一时令人感觉有日、德、苏形成联合阵线，共同对待西方列强之恐惧。对于西方民主社会，那个历史的教训应当是够大的了。

人们如果不是健忘的话，在和平政策主张上应当避免再开倒车。联合国的列强应当一致贯彻战时表白的消除侵略势力之根本政策的精神，以订立并执行对德对日两和约。在和约规定之下，大家应当本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之大方针，切实管制两国，不但全部解除他们的武装，——军事的及地理的——并且彻底消灭他们的文化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一切可以助长侵略势力的因素。现今联合国的列强间情感冲突、利益争执的处所很多，尤其美国与苏联形成对立之局诚不可讳言，可是外交协商之途径并未闭塞，联合国组织仍然是大家共同尊重而应用之和平机构。国际上现在并没有真正不能解决的争端，也还没有绝对势不两立的国家集团。我们并相信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象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因此我们不认为现在就有根本变更政策的理由。即令今后世界上真有任何一个侵略国的话，正当的办法也只是由那些对维持和平特别有责任的联合国的列强，运用联合国全体的力量，保持集体安全。而决不可以为着要抵制一个现存的侵略势

力，又来扶植培养另一个潜在的或许更危险的侵略势力。人们的原意以为如此可以使两个侵略势力互相抵消，其实反而会使世界上侵略势力增多。我们中国向来有所谓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之策，在近代外交上那套旧把戏曾经试过而不见效，有时反招危险的结果，受人讥评。

联合国列强为世界和平定百年大计，眼光要放远大点，再不可以弄巧反拙了。

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

——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

胡 适

鲠生吾兄：

前几天我读了老兄《历史要重演吗？》那篇文章，我颇惊讶我们两个老朋友对国际局势的观察竟相隔离如此之远！所以我今天写出两点不同的意见来，请老兄指教。

第一，老兄此文的主要论点是谴责"西方民主国家"对德国、日本的和约政策的根本改变。老兄所谓根本改变，是说西方国家眼前颇"有些人士"看到对德、日和约问题的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两国的复兴。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战时这两个强敌以抵制其他一个战胜的盟国"。

老兄也承认这种倾向"现在尚没有表现于具体的方案或公表的文件"，只不过是言论自由的社会里的几个私人意见而已。我觉得老兄似乎不应该太看重这种个人议论而忽视那些已经正式公表的方案与文件。我试举美国提出而英、法热心赞成的《四强共同制止德国武装的四十年协约草案》，这是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国政府正式提交苏、英、法的，一九四七年四月马歇尔先生在莫斯科又重行提出，两次都被苏联打消了的。这个协约的主要目标正是一种维持集体安全的武力来长期制止德国的侵略势力的复活。当初美国政府曾表示，同样的四十年协约可以适用到日本。这是美国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在贝尔纳斯先生提

出之前，曾经美国参议院的两党领袖仔细研究讨论过，将来当然可以得参议院的批准。如果我们要判断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日和约的根本政策，这一类的文件似乎更值得我们的研究吧？

我观察西方民主国家的负责言论与行动，可以作三个判断：一，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根本政策。在这一点上，不但波茨坦会议曾有严重的决定，西方国家的朝野主张也是绝对一致的。二，因为根本不许德、日两国重行武装，所以西方国家决不要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老兄试想想，那有不武装德、日而可以利用他们来抵制苏俄的道理？我可以武断的说：武装德日是英美法与澳洲、加拿大诸国的人民绝对不肯允许的。三，所谓"防制德日的复兴"应该解释作尽力防制这两国的武装与侵略势力的复兴。这里并没有不许德、日民族在世间过和平生活的意思。德国民族有七千多万人，日本民族也有七千多万人。谁也不能毁灭这一万五六千万人。可是谁也不能长期掏腰包来养活他们。所以西方民主国家不能不考虑如何替他们保留一部分的工业生产力，使他们可以靠生产来养活他们自己。这不是过分的宽大。为了根本消灭将来的循环报复，为了根本维持比较久远的和平，这种政策是不能避免的。

这三个观察，老兄认为有点根据吗？如果我的看法不算大错，那么，我们似乎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谴责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日和约的政策改变。至少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国家在他们管辖的地域之内没有武装德国人或日本人的嫌疑。

第二，老兄在此文里说："我们相信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象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老兄这句话一定要引起不少人的怀疑，因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还有些人觉得这个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因为他的本钱比德、日还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还更伟大，他的势力比

德、日极盛时还更普遍。有这种忧虑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老兄有什么法子叫他们不害怕不忧虑呢？

就拿我自己做个例子。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我是一个多年深信和平主义的人，平常又颇忧虑中国北边那条世界第一长的边界，所以我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新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Peace at any Price）。老兄总还记得，我曾用这"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和平代价"一个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说他从《布雷司特-李托乌斯克和约》(《Brest-Litovsk Treaty》)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对德不侵犯条约都可以说是"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表示。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这些事件确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但我总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因为我的思想里总不愿意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老兄还记得我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的演说，我还表示我的一个梦想：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兵士防守！前几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先生访问苏俄与中国，他在重庆下飞机时发表的书面谈话里，还引我那个中、苏边界不用武装兵士防守的梦想。老兄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大作《求得太平洋的和平》（《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里，也还引我这个梦想的全文(九一页)。

老兄，我提起这一大段自述的故事，为的是要表明我对苏联确曾怀抱无限希望，不愿意想象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

但是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

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这是世界最不幸的事，也是苏俄自身最不幸的事。苏俄是世上第一个疆土最大的国家，今日是他的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全世界公认他是两个最大强国之一。这正是他应该亲善睦邻的时期了。暴力是终久靠不住的，德国、日本都是眼前的镜子。一个强国也还需要朋友，需要诚心爱护他的朋友。无论怎么强大的霸国，到了邻舍害怕他，朋友抛弃他的时候，就到了开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即如老兄，难道你真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吗？老兄试回想你我两人在五六年前对苏俄那样热心的期望，试回想我们当时亲眼看见的西方民主社会对苏俄那样真诚的友谊，——我们不能不惋惜：苏俄今日被人看作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真是苏俄自己的绝大不幸，自己的绝大损失了。

以上讨论的两点，我很诚恳的盼望老兄坦白指教。

胡 适 三七，一，二十一夜

〔"其他"注释者：吴传兴〕

文学编编后记

一九七八年十月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之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分卷、编目和注释、编辑工作即开始进行。

文学编编辑组在编委会主任委员周扬和副主任委员石西民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具体组织领导，初期由吴伯箫负责，鲁歌组织实行；继之由王士菁(不久调离)、马良春负责。周扬、石西民相继去世后，一九八八年九月林甘泉、马良春增补为副主任委员，马良春继续兼任本编负责人。本编顾问为戈宝权、孙席珍。

本编的注释、校勘、编辑和审稿、定稿是一项复杂的集体工作。吴伯箫、楼适夷、鲁歌、向云休、黄淳浩、桑逢康、劳季芳、郭平英、杨均照、赵存茂等参与本编的筹划、拟订方案和分卷编目、试注试编。王廷芳、闵洁、雷仲平先后参与本编的编务组织和协调。编委会资料室的同志协助查找资料。

具体编辑工作，第一卷至第五卷诗歌部分，由鲁歌负责，鲁歌调离后，由本编编辑组共同完成；第六卷至第八卷戏剧部分，由黄侯兴、康林负责；第九卷至第十卷小说散文部分，由桑逢康、黄淳浩负责；第十一卷至第十四卷自传部分，由劳季芳、

郭平英负责；第十五卷至第十七卷文艺论著部分，由黄淳浩、桑逢康负责，楼棲任顾问；第十八卷至第二十卷杂文部分，由陈尚哲、杨均照负责。本编各卷图片由郭平英供稿。审稿、定稿工作，诗歌部分由石西民、王士菁、马良春负责；戏剧、小说散文和文艺论著部分由石西民、马良春负责；自传、杂文部分由马良春负责。黄侯兴协助通看了十一卷以后的部分书稿。

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云休、方殷、李启伦先后担任诗歌部分的责任编辑，其余各卷的责任编辑均由张敬棠担任。

本编在编辑整理过程中，还得到有关单位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协助，谨在此致以谢忱。

一九九一年一月